刘晓庆·我的自白录

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0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https://archive.org/details/wodezibailucongd0000liux

刘晓庆

我的自白录
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刘晓庆继《我的路》《我这八年》后一部全新的自传，记述了她在艺海文海商海情海中的浮沉挣扎跌打滚爬酸甜苦辣，谱写了她从少不更事到电视连续剧《武则天》的上映这二十余年的心路历程，是迄今为止刘晓庆最完整、最袒露的自我剖白。她那不同常人的情感历程，她那对“名”的情有独钟，她那一切与钱有关的窘事喜事丑事麻烦事，她都毫无遮掩淋漓尽致赤诚坦陈，让你直面一个赤裸裸活生生真真切切有血有肉独具个性的刘晓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对复杂的生活和人生，会从中获得一个新的视角，多一层认识和理解。



童年的刘晓庆



《同志，感谢你》剧照



与外婆和母亲在一起



饰演《芙蓉镇》女主角胡玉音获"百花奖"、"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春桃》剧照



《大碗茶》舞台演出剧照



《风华绝代》剧照



《武则天》剧照





台湾拍摄的 MTV 剧照



与国际著名导演波兰·斯基、影星加里森·福特在一起



在法国受到当地华侨热烈欢迎


与谢晋、姜文合影



与法国著名演员拉芬在一起



在美国好莱坞访问



与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合影

参加柏林电影节





在法国嘎纳电影节

在法国巴黎公社墙前





在澳大利亚



《芙蓉镇》外景地与姜文等演员在一起

在家中获赠的印尼
总统苏加诺的藏画前





与香港卫星电视
中文台合作专题片
《刘晓庆：打开引号》



在深圳蛇口
自己的别墅前



打台球



艺术照片







艺术照片

艺术照片









艺术照片

目　录

缘　起〔1〕
1　电影真是残酷的事业〔10〕
2　我的少女时代〔27〕
3　我的第一次结婚又第一次离婚〔43〕
4　令我难堪的事层出不穷〔52〕
5　《我的路》多磨难〔58〕
6　身无分文真令我窘困〔63〕
7　第一次“走穴”最后感觉像小偷〔72〕
8　“走穴”太有劲干脆当“穴头”〔82〕
9　我需要一个真正属于我的爱人〔99〕
10　陈国军肯为我而离婚〔112〕
11　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118〕
12　大年三十夜一件无头案〔124〕
13　真是一场恶梦〔132〕
14　离婚“持久战”终告结束〔137〕
15　又一场新的“马拉松”〔141〕
16　“无情”的“情人”〔153〕
17　我的第二次结婚——已有裂痕的婚姻〔167〕
18　为钱奔走，为钱发愁〔172〕
19　可怜巴巴在美国办个人影展〔179〕

20　“芙蓉镇”——我和姜文〔191〕
21　姜文会出现在我所在的任何地方〔205〕
22　再和姜文搭档共演北京戏《春桃》〔214〕
23　有了第三者暴风雨开始来临〔223〕
24　我再也不觉得陈国军亲切了〔232〕
25　决不能再回家去〔240〕
26　离婚吧，我对陈国军说〔248〕
27　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257〕
28　从女厕所狼狈出逃〔263〕
29　我偷税十八万?〔272〕
30　我对律师说：我没有偷税〔280〕
31　三场官司缠身，发表“息影声明”〔288〕
32　关键的一仗〔298〕
33　带保镖拍《红楼梦》〔307〕
34　是钱使我现在一筹莫展〔324〕
35　没有报纸愿意登载我的声明〔330〕
36　上青岛找检察院说理去〔339〕
37　和母亲大吵是要她不要过于节约多多花钱〔344〕
38　发生在Y城的“打观众”事件〔349〕
39　在自贡灯会“与记者吵架”〔357〕
40　我终于又属于了自己，但我没有钱〔364〕
41　为了钱应港方之约拍《大太监李莲英》〔376〕
42　再上青岛去找税务局申诉〔394〕
43　在青岛税务所的重要一幕〔403〕
44　我在焦灼中等待着〔413〕
45　我终于到了法国巴黎〔418〕

46　在巴黎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428〕
47　在香港涉嫌使用假护照〔435〕
48　多米尼加领事馆给了我狠狠一击〔446〕
49　为救晓红再请“大庄”〔455〕
50　去香港“大榄女子监狱”探监〔462〕
51　臂戴黑纱，我走在巴黎的街头〔470〕
52　10354案子正式开庭的那一天〔474〕
53　天上真的掉下个大金娃娃〔479〕
54　我又处在漩涡的中心〔486〕
55　我鼓动姜文当导演〔490〕
56　商海无情〔502〕
57　我成了“打官司专业户”〔513〕
58　为了武则天，我重又粉墨登场〔519〕
59　我心里是一片瓦蓝瓦蓝的天空〔529〕
尾　声〔532〕

附录　作者简介〔540〕

魏晓霖：每天都捧出一轮太阳（代后记）〔546〕

缘起



我坐在飞机上。这是一架波音757飞机。蓝天，白云。我的雇员们在我的后面，整整齐齐的一排。他们交头接耳，在整理工作记录及计划。西装革履，意气风发。

我们由北京飞往深圳。

刚刚参加完电视连续剧《武则天》的开机典礼，又去深圳举办"晓庆"牌化妆品及我其他产品的新闻发布会。

飞机正在使你毫无感觉地以每小时九百八十公里的速度

飞行。

我坐在最前面。无阻挡地眺望窗外，一片阳光灿烂。骤然间，一种异样的感觉升腾，升腾，弥漫我的全身：我不再是一个电影明星了；至少不单单是，不纯粹是一个电影明星了。

在刚刚结束的钓鱼台国宾馆里举办的《武则天》开机典礼上，几年来又一次仅仅以电影演员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我，已有了几分的不自在。坐在一大群中央领导人中间，前面有制片人、导演，后面有摄影师、化装师……又回到不用自己首当其冲、左右张罗的环境里，这种感觉使我轻松然而却又陌生。

几年来，我完成了不同领域两种截然不同角色的蜕变：洗去铅华，薄施粉黛，成为一个生意人；从艺术创作集体烘托的包装中挣脱出来，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领导者、决策者。

圆桌会议厅被缭绕的烟雾所包围，置身于清一色男人世界的生意场中，自己是那样的柔弱、渺小而年轻。时常担心自己坐不稳椅子或是没有足够洪亮的嗓音谈判的同时，又惊讶地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着过去想也从未想过的庞大事业！

生命对于我们是这样地偶然：这一个爷爷和那一个奶奶在一个特定的瞬间相爱才会有你爸爸；那一位姥姥和这一位姥爷在另一个特定的时刻在一起才会有你妈妈；而要你妈妈和你爸爸相结合，恰恰是时候才会有你。况且，不知有多少生命得不到出生！

感受着天地涅槃的伟大，沐浴在生命的浩森之中，我秉行着新的座右铭——想做就去做。

我是一个幸运者。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这样讲。在过去，抱着近乎感激的心情我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十好几年的青

春。奋斗，成功，焦虑，恐惧，充斥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空间，直到一天惊回首，已过去了三十多个岁月。想想自己的年华去了哪里?最灿烂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干了些什么?想不出来。模糊中觉得大概都是在纷乱的拍摄现场，黑暗而憋闷的摄影棚录音棚里消磨掉了。剩下的是什么?是那空洞、抽象，看起来光芒四射实质却残酷冷漠的四个字："电影明星"。

从小到大，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力量在指挥我、指点我。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直觉吧。

每到一个关键时刻，每到一个三岔路口，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走哪条路，有一双无形的手推我去一个地方。

而这些路和这些地方最终都引导我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成功。虽然有些路在当时泥泞难行，使我濒临绝境，可最后都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并还得到意外收获。

这些感觉使我心里存在着一把无形的尺子：用尺子一量我就能预知到自己是否适合作这件事并且是否成功。通过这把尺子的事做起来虽然艰难但是感觉舒服并且得心应手，不通过这把尺子的事根本就不做并且毫无兴趣。所以，我无为而治。我做我喜欢做的有兴趣的事，并且努力把它做好；我完成了从强迫自己到逐渐不强迫自己再到绝不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的全部过程。

一直以来，我认为电影演员只是一种生涯而不是一桩事业。虽然我热爱电影为它付出了最光彩的年华并且得到巨大的回报。我得了六次电影"百花奖"、"金鸡奖"，还有所有官选民选最佳女演员第一名；无论是我写的书我做的事我唱的歌我拍的电影还是我谈的恋爱我打的官司，都热闹非凡并且轰动一时；据说有人为了见我一面肯出一百万美元，还有人为了

看我一眼付出宝贵的生命,有人为了和我说一句话被人群挤踩得血肉横飞,虽然我觉得这一眼未免太昂贵,并且认为牺牲生命血肉横飞实在罪孽,可信程度也大打折扣,可是我想演什么角色就能演什么角色,想找到最好的合作者就能有最好的合作者,从而心想事成游弋在艺术的自由王国,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也许是物极必反吧?烦恼和恐惧一直在我胸中,并且逐渐成为主流。

几年以前?至少在十年之前,有一个声音就在不停地告诉我:“够了!足够了!去做新的事!到时候了!……”这种声音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频繁,以至于时常把我从梦中唤醒。

做新的事?做什么事?茫然。

每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做新的事是我从来的需求:学音乐够了就去拍电影,拍电影够了就去写书,写书后又录磁带唱歌,不满足再去做制片人,再不然出国办影展,开演唱会,和香港合拍了再与台湾合拍,演了正剧演喜剧,演完喜剧再演武打片,女皇演过了,垃圾婆演过了,温柔的、性感的、年轻的、年老的都演过了,剩下的只有演神经病、老处女了。

这几类角色又如何能充实我突然之间觉得漫长的一生?新的事?还有什么?

还在较早的时候,刚刚把《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拍完,我来到《芙蓉镇》剧组。

由于马不停蹄的拍摄而感到身心疲惫的我简直不能掩饰对电影的厌倦,我时常对周围摄制组朋友志得意满地多次重复说:“不想拍了。这部戏以后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无敌最寂寞。”当我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地大概说了八次,还是九

次?十次?突然有人对我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你还早得很。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这是姜文。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

犹如在背后击一猛掌,我从此开始了与姜文激烈而长久的辩论以至争吵。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捕捉反面信息就是我的特长。

我们无数次在拍摄现场为了“话剧好,还是电影好”闹得不可开交无法继续拍摄。导演谢晋及全组成员只有停下来等我们吵完平心静气以后才能再开始工作。

可是我确实不想拍了。真的不想拍了。面对众多的剧本及导演热忱的邀请我兴味索然。电影对喜新厌旧的我来说已经毫无新鲜感也没有刺激性。我不想做同一件事做那么久。拍电影的时间太长了,我的个性不允许我再往下做。如同再美味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腻一样,电影这道佳肴我是“吃伤了胃口”了。

我讨厌电影明星的一切:访问、拍照,参加各种会议,应酬。我开始不见记者,同他们吵架,从不参加三个人以上的集会或活动,只要看见有摄影机或是照相机对着我便条件反射神经质地大喊:“不!”

而同时我贫穷。徒有显赫的声名却不具备哪怕是起码的物质生活。我没有房子住,也没有“拜客衫”,还有那么多的官司及数不清的麻烦:偷税啦,离婚啦,和记者吵架啦,打观众啦,桃色新闻啦……一切都随着电影明星这个头衔成几何级数地膨胀,而我的工资却不能增多。我可怜的每个月五十元人民币的报酬和我一起同强大的社会作长期、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荒唐可笑的螳臂挡车。

当巨大的社会车轮风驰电掣般开过并轻而易举淹没了我声嘶力竭的呐喊之后，我突然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了深深的沮丧。去你妈的电影明星。真他妈的没劲透了。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十几年的青春换来这一大堆的乱七八糟。我不是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观众吗？要是每个观众给我寄一分钱，不，哪怕是一半的观众每人给我一分钱，再不，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哪怕是八分之一八十分之一八百分之一的观众每人给我一分钱，那是什么成色？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可是没有人给我寄钱。没有任何人给过我一分钱。只有个别的观众寄钱给我替他买书什么的，我一看钱不够还得倒贴，就根本没收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我在愤怒与悲哀之中翻滚、挣扎。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然后我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我当然不愿意灭亡。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一爆发之下我去了法国。远离了电影明星。此一去整整九个月。

九个月之后我回到了北京。洗净铅华，摇身一变，我成了一个商人。一切对我来说已是别有洞天，换了人间了。

虽然我参加拍摄电视连续剧《风华绝代》，可一切对我已有了新的意义。我面临着另一种挑战，生命的第二次冲刺，我进入崭新的人生。

在数不清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得相当多的问题是："做生意和做演员有什么不同？能否为我们谈谈你做生意的甘苦？"

"甘苦"？几年来的生死沉浮，怎"甘苦"二字了得？而做生意与做演员有那么多的截然不同，无异于在几年之内拔苗助

长地上了十几所大学。

普天下的报纸如雪片般飞来，再次掀起“刘晓庆现象”的狂潮：“刘晓庆在××市购地二百亩，建一座明星城”，“刘晓庆在××市投资××亿，修建豪华区”，“刘晓庆在××市……”，“‘晓庆’牌系列化妆品席卷京城……”，“‘晓庆’牌饮料……”，“‘晓庆’牌美容加湿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在此之后的新闻则是：“刘晓庆哪有这么多钱?”于是报界、新闻界又抛开我这个当事人，围绕我的钱包开展讨论，众说纷纭。

找我支持、捐款、赞助的信件堆积如山。仿佛我这里每天都会从天上洒下“钱雨”，而恰恰是掉到我这个小小的地方。

许多人都断定我挖到了金矿，理直气壮地到公司来要钱，我不在或是给不了就臭骂我一顿，就像这里是他家的银行。

办任何事，买任何东西，只要看见我公司的名片，就狮子张大嘴劈头盖脸咬一口，根本置报纸上认为我其实没有什么钱的言论于不顾，取他们所需。借钱的、找我投资的络绎不绝，每天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形形色色各类人等使公司职员应接不暇，忙乱不堪。

公司成员一再增多，经营范围总是在扩大，仍然跟不上社会的需要。

我又重新陷入舆论的重重包围之中。无论我自己本人的意愿如何，人们就是要关心你，管管你。虽然我当了老板目的是退隐幕后，可大家还是当你在前台，仍然把你作为假想对象指手划脚议论一个溜够。

这当中最多的问题则是：“你如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每个人都想发财。每个人都想了解并且借鉴别人的生财之道。

问得多了，自然就又开始烦了。索性横下一条心，还是自己把自己拎出来得了。这就是我最早想写本书的起源。

囫囵地把从明星——生意人的过程回忆一遍，路途中竟充满了惊险，于是我最初在心里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我的六次危机》。当然模糊中觉得可能不止六次危机，因为是草草想来大约重大危机是这么多。其实脑海里觉得这本书的标题应该是《我的 X 次危机》，而最后的定稿只有看写出多少次危机再填空填上了。

整天走马灯似地来回忙碌，写书的事也就一再搁置下来。直到一天深圳有一位叫王星的先生来访，讲到即将在深圳的一次文稿拍卖：

王：我们想在深圳举行一次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文稿竞价？搞得成吗？

王：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提高文化的地位，从而使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我们想搞一次文稿拍卖。希望你能参与、支持这一个活动。

我：哦。那肯定我的书价格最高喽！（笑）

王：（笑）所以我们想得到你的一本书。

我：我没有书。只有一个标题。给你们一个标题吧。可以吗？

王：标题也可以。什么标题？

我："我的六次危机"。（突发奇想）不，"从电影明星

到亿万富翁”。

（我拿出纸来，在纸上写下“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又一想）不对，富翁是男的，应该是：“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婆”。

王：“富婆”太老了，叫“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吧。

我：（开心地大笑）好啊！“富姐”不好念，叫“姐儿”吧。

大家开怀大笑，我又掉“富翁”的“翁”字，写上“姐儿”。于是就成了今天这本书的副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事过之后，我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文稿拍卖的新生事物恐怕是搞不成的，尤其是在深圳——人们称为“文化沙漠”的地方。中间，王星曾几次与我联络，大约是两三次吧，要求我写什么委托书之类，我匆匆写了之后传真过去，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几个月后，突然一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个大字标题：“刘晓庆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拍卖了十七万”。十七万！和我几年前牵扯到的一个偷税官司数字一样。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又听到消息说变成了五十万、八十万，又过了一个月，组委会请我去了深圳。

在深圳，又一声拍卖的槌声敲落，我的书拍卖了一百零八万。说是我的书，准确地说其实只是一个标题，因为我还只字未写。

就像是鸭子上了架，这下子非写不可了。

电影真是残酷的事业



铺开纸张，坐在桌前。脑海中奔腾汹涌，一时间难以平息。和写《我的路》时一片空白相比，十年来增加了太多的内容。想起那会儿小小年纪居然感叹"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实在是幼稚可笑得很。无病呻吟得很。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岁月倥偬，转眼间我从一个小女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我拥有了一切：金钱、声名、地位、

成功、美貌、健康，同时我还拥有温馨的家庭、理想的爱情。

可这是怎么回事？就像月亮，表面看上去皎洁、光明，高挂在天上，而在月球的背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充满了凄清和悲凉。

记得一九九一年初，香港卫星电视中文台为我拍摄了一个《中国影后刘晓庆特辑》，并且安排了我与台湾记者越洋对话。其中有一个记者问我："你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我回答说："成为一个电影演员。"记者又问："那么你认为最不幸、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成了电影明星？哪一天？哪一时？我记不清了。我是明星吗？

事实摆在面前：这么多炫目的光环，这么多的污泥浊水、重重苦难。哦，电影是一门多么残酷的事业啊！

我承认，我曾经有过十分飘飘然的时刻，在我的少女时代。当我拍完了第一部电影《南海长城》，人们一见我便叫我"甜女"的时候，在我拍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一出门满大街人叫"刘晓庆"的时候，当第一次看到人们蜂拥而至，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的时候，当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中国最有权威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封面的时候，云里雾里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

时常看任何电影杂志，观赏任何歌舞表演，或是坐在放映间里，我都为自己是一个电影演员，从事电影这个艺术王冠上的明珠这一事业而感到无比自豪。"无比自豪"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也是在那些时刻才真正深切领会到的。哦，当时的我

是多么陶醉而怡然自得啊。

我想,每一个成功者都经历过我当时的过程。

从影近二十年,看到银河星空无数璀璨的明星殒落,有些只划过一道闪电便瞬息即逝,才为我当时所处的环境而后背直出冷汗。

失败的考验固然严峻,经得起成功考验的人更少。能够从跌倒处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再继续前进的比经得起成功的概率要高,甚至高得多。

年纪轻轻由于过早成功,背上了包袱或是被社会定了型或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或是很难再超越以前或是觉得已经足够而"范进中举"的大有人在。从一定意义上说,成功是对成功者的一种扼杀。

尤其在电影行业,绝大部分成功者在成功之前都是不能随自己的心愿选择剧本的。有一个拍片机会已十分难得,根本不能也不敢提出异议。也许第一部戏的角色并不是他(或她)的所长,只是勉为其难而已。稀里糊涂地努着劲拍完了第一部戏,凑巧由于导、摄、美等各方面配搭十分出色在精致的包装下得到了成功,于是各种赞赏、各种荣誉便迅雷不及掩耳地滚滚而来。刚开始还怀疑自己是否真如大家所赞誉的那样高与天齐,可日子久了,时间长了,泡在一大堆逢迎动人的词藻当中,就成了"三人成虎"的故事了。

知道"三人成虎"的故事吗?

某甲从街上跑来,告诉某乙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某乙大笑,根本不信。又跑过来某丙,告诉某乙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并且色泽斑斓。某乙将信将疑。又跑过来某丁,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张牙舞爪要吃人。某乙大惊失色,扔下背包行囊

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三人尚且就能成虎，那么百人呢？千人呢？上万人上百万人呢？岂不是飞沙走石、山走路水倒流？

那些成功者都是涉世之初，还不具备辨别能力当然也没有抵抗力，于是自己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伟人了。甚至比大家认为的还要出色，还要不得了，也就把第一部也许不是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当成了自己的所长，背上了成功的包袱。他(她)们不敢超越自己，不能否定过去，深怕砸锅，唯恐失败，只有接二连三地重复，直到观众狠狠地将他(她)抛弃。而实际上，可能他们真正的才华还没有发挥，真正成功的时刻还未来到便彻底完蛋了。

还有的成功者，侥幸在一部戏里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于是社会及电影界便蜂拥而上，抢先将他(她)定了型，只允许他(她)演同一类角色，不认可他(她)的创新，于是也将一些真正的天才扼杀。

一九八〇年，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开始在全国颁发选票。

当时的中国电影与现在的形势截然不同。

在那时，电影是中国老百姓唯一的一项文娱活动。没有电视，没有卡拉OK，没有舞会，没有生意从而也没有钱赚，在此之前甚至都没有电影，"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电影整整停止了十年。

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新一代的电影演员，我们都来自四面八方，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专业表演训练，纯属"在野党"。可是电影，作为艺术王冠上的明珠在中国独霸天下。毫不夸

张地说，我们这一代的电影人，在当时实实在在地拥有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观众。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看电影、不喜欢电影，我们的作品占据了中国老百姓相当部分的时间，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对他们人生的一个时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活动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此之前，“百花奖”只举行过两届，“文化大革命”停止十年之后，第一次恢复“百花奖”的活动，而“金鸡奖”还没有诞生，作为中国电影唯一当然也就最有权威的电影奖评选覆盖了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

印有选票的那一期《大众电影》被抢购一空，《大众电影》编辑部专门重印了几次也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专门就他们手中仅有的几张，甚至是一张大众电影“百花奖”选票展开几天到一周的讨论，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成了举国上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而我当时拍完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并且已在电影圈及全国范围内放映过了。

根据“百花奖”规定，凡是本年度在国内公映过的影片都具备评选的资格。这么说，我有三部影片，也就是有三个角色可以参加竞争了。

有消息说，我是本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热门人选。而我的几部影片从各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众口一词，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收发室，每天观众给我的信件、邮包堆积如山，我不得不用麻袋去装。天天到北影来找我签名的、找

我要照片的、向我表示崇拜的、爱慕我的、想跟我谈恋爱的、抱着被子蚊帐来跟我结婚的等等，络绎不绝，使传达室的大爷烦躁不堪。

而我只要在北影厂区内行走，处处都看得到以汪洋厂长为首爱才如命的北影人给我的春风般的笑脸，他们不管跟我熟不熟是否跟我见过面，都会停下来对我说："你演得很好。""你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我自己本身呢，正是处在腾云驾雾的时刻。虽然我还未调到北影，我与丈夫的家庭关系不算和睦。

可想而知，我对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怀着极大的憧憬及向往，并且在内心深处，下意识地存着捕风捉影的希望。

我天天向《大众电影》的一位摄影师——我认她为我的内线，打听选票的情况，我得知她们为拆选票，编辑部的员工加班加点，熬更守夜，辛苦备尝。

她告诉我，我的选票与另一位演员不相上下，编辑部的人都说我们俩之间谁没有得奖都怪可惜的。我提议她选十张票作抽样调查，拜托她第二天将结果告诉我。

第二天等不及我打了电话给她，她告诉我已抽样过了，在这十张当中我的选票要多一张，我欣慰了一些。在煎熬之中又过了几天再打电话给她，她兴高采烈地告诉说我的得票遥遥领先。

那时，我已结了婚。我和丈夫住在平安里的一个又黑、又暗，没有自来水也没厕所的阴暗平房里。丈夫的父母住在和平里中央乐团宿舍，两位长辈都是中国音乐界卓有成就的音乐家。平时我们在小黑窝里住，只礼拜六晚回他父母家。

在离他父母家不远,《中国电影周报》的总编李文斌(当时他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住在那里。我还未调到北京,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几个朋友,李文斌一直关心我,他的家离我公公、婆婆家又近,于是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

自然"百花奖"是我们唯一的话题。他和他夫人一起替我分析形势、预测结果。我每次都提供一些新消息,然后再车轱辘似地重复我的问题、担忧及信心。我们预测的结果有喜有忧,而喜通常占了多数。

当我三步并作两步跨上八楼,横冲直撞闯进他家告诉我得票遥遥领先的消息时,他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喜出望外,而只是平静地说:"那就好。不过你得不了最佳女演员奖也没有关系,你的《瞧这一家子》还可以得最佳配角奖嘛!"

什么话!我当然要得就得最佳女主角奖,因为《小花》、《婚礼》我都演得好。《瞧这一家子》虽然也参加评选,可是我在里面饰演的张岚全片一共只有二十八个镜头,根本没有得奖的可能。再说当时"百花奖"也不分男女配角,配角奖只有一个,不像最佳男女主角至少名额多一个,得奖概率太低了。

我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心中继续对最佳女主角的追求。

我的丈夫及他的全家比我还要操心。尤其是丈夫的父母,疼我、关怀我甚至超过他们的儿子。

我和我的丈夫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在那个年代,虽然时兴自由恋爱,但我不想找电影界的同行,于是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王立。刚见面他吓了一跳,说我的脸比桌面还要黑,因我头一天才从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的外景地回来,后来耐着性子与我相处,竟发现我是上帝专门为他创造的。于是

有一天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交待了我们交往的情况，当然把我大加赞誉了一通。

他的母亲接了电话，听完儿子唾沫星子乱溅的报告，停顿了几分钟后问："儿子，你打算去四川吗？"因我当时还在四川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调到北京。儿子也停了片刻说："您还是先见见再说吧！"

几经说服，终于在一天我去了他父母家。心中并没有怀着"非他不嫁"的信念，我自然、青春、活泼，谈吐之间也许透着几分才华并且还有点儿横溢？

总之我山南海北侃天侃地神聊了一通，约一小时后，大大方方告辞了他的父母，回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南海长城》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

"刘晓庆，电话！"远远地有人在喊。

我走出房门，绕进过道，抓起那仿佛在世界另一端的公用电话。

"你知道我父母对你怎么评价吗？"听筒里传来他激动的声音。他是学钢琴专业的，时时处处都十分激情。

"我不知道。"我说。尽管心里一边想着我是嫁给你又不是嫁给你父母，一边出于虚荣再加上好奇我仍然竖起耳朵听。

"他们说你是五分！你听见吗？"

"……听见了。"半天我说。

"我刚回去，我妈电话就打过来了，第一句话就说：'儿子，听着，你找了一个五分！'你懂吗？五分就是满分！我父母对你满意极了。"

"我懂。"压抑着心里那份得意之情我说。"那我不能调到北京怎么办？"我问他。

“我父母说了，‘不用担心，她自己完全有能力到北京来工作的！’”

那以后，几乎每周我都去他父母家。《南海长城》放映了，我更成了他父母以及全家的骄傲。知道我每个礼拜六都会去他父母处，时常有他父母的同事等在那里要“参观”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周六，中央乐团宿舍停电，有几位叔叔阿姨已等了好半天了。由于又去李文斌处讨论“百花奖”的事，我到的时候天已全黑。摸着黑走进屋内，刚刚与他父母打了招呼，就有人手忙脚乱地找蜡烛。几根蜡烛全都点亮，大家把它们放在一起向我靠拢，所有的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只听见全体发出惊叹之声：“啧啧、太漂亮了！”“跟她婆婆当年一个样！”

丈夫的妈妈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同时更著名的是公认的美女，我瞟了婆母一眼，心中不敢受之当然。选演员时就是觉得我形象不过关才左试镜右试镜，都下汕头体验生活一个月了北京还在选演员，化装室里化装师评论我额头高、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等等缺陷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内心里实在是觉得不可能比婆母更漂亮的。

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赞美，两位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一边听一边插话，夸我的话来得比大家还多许多。以前未结婚时总听别人说婆媳不和，婆婆虐待媳妇、打骂媳妇什么的，结婚以后发现才不是那么回事。

可以这么说，两位老人是天下最善良、最优秀、最有教养的长辈之一，直到如今我仍然十分想念他们。

那时候文艺界时常放映“参考片”。所谓“参考片”，其实就是外国影片，不许公开放映但允许文艺界内部观摩学习。

中央乐团也时常有票。

只要一有“参考”票，他父母一定给我们，假如只有一张，肯定是给我。每次都是丈夫陪我去，我进电影院看电影，他坐在门口一边吃冰棍一边等我看完了出来。

和丈夫离婚之前，我到他父母家去哭诉，一边泪流满面一边添油加醋带渲染地数落丈夫的种种不是，说完了我的委屈后，他父亲对他母亲说：“听听，这就是你的好儿子！”

此次“百花奖”的评选，他的父母比我还要关心十倍。他们理解我正处于上升时期、奋斗时期，这次“百花奖”评选对我来说无异于是“鲤鱼跳龙门”，是我艺术道路上关键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我调进北京的开门钥匙。

“百花奖”颁奖大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得奖的呼声越高，我越忐忑不安，我的心里开始“倒计时读秒”。

许多重大的时刻往往都从毫不起眼、平凡普通的环节开始。

这一天，我在北影放映室看我正在拍摄的电影《神秘的大佛》样片。这是“文革”后拍摄的第一部武打片，而我、葛存壮等演员们都从没有拍过此类影片，争强好胜的我为拍武打动作摔得遍体鳞伤。几天前练习武术，我从站在地上的教练头上鱼跃过去再翻滚一周，跳了两次都成功了，第三次为了动作更漂亮更潇洒我过早弯了膝盖，结果在翻滚时膝头擦到左脸，左眼周围立刻出现一大片淤血，成了一个“乌眼青”。

“乌眼青”和摄制组的导、摄、美、演员们一起坐在放映间里，全身每一个关节都疼。银幕上正放着样片，没有音乐，没有台词，只有画面，放映间里鸦雀无声。只有我过几分钟不得

不换一种姿势，椅子随着我缓慢而迟钝的动作嘎嘎作响，我身边坐着《大众电影》的总编崔博泉。

崔博泉是电影界的元老之一，一生都从事电影宣传事业。他热爱电影，对我们呵护备至，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崔妈妈”。

他虽然年纪不算老，却是中国电影界的资深前辈，从默片时期的老明星如阮玲玉、胡蝶到后来的白杨、张瑞芳，然后是王晓棠、田华、谢芳直到我们这些新苗，都与他有过交往，他亲眼目睹明星们的兴衰存亡，是电影界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继往开来的中国电影史的活见证。

时至我写书的今日，崔博泉已白发苍苍，尽管他精神矍铄，我仍然开玩笑地称他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当时的崔博泉正当壮年，他是本届“百花奖”的主办人、负责人。那天凑巧他在北影公干，于是被导演邀请进来看我们的样片。银幕上无声无息地变动着画面，我仍然浑身酸痛在椅子上翻过来调过去。

“这次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是陈冲。”他突然说。我扭头看他，眼前有许多小星星在飞。“你是最佳配角奖获得者。”他继续说。

“哦。”我回头看着银幕，什么也看不见。

恍惚中听见老崔的声音远远地：“本来这次‘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和配角奖都是你一个人的，但因为你有两部影片参赛，一部《婚礼》、一部《小花》，两个角色选票号码不同，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票数分散了。”

我猛地又扭头过去，像一个拨浪鼓。

我瞪圆了眼睛盯着他看，充满了恼怒，就像一个一点火就会着的装满了汽油的汽油桶。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无话可说。我也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第三届“百花奖”获奖名单公布了。情况完全没有朝我预期的方向发展，我不仅没有得到最佳女演员奖，人们也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拍案而起大声疾呼为我鸣不平，而是纷纷向我祝贺：祝贺我获得了最佳配角奖！

天知道我根本就不想得这个臭配角奖。我是主角，凭什么得配角奖？本来主角奖和配角奖都是我的，为什么不公平？假使本届奖公平了，两项殊荣都被我一人获得，那是什么成色？

没有人理我这个茬。无论我怎么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地球照样转，太阳照样高挂在天上，花草禾苗照样茁壮成长，世界万物仍然按部就班地各得其所。

只有零星几个朋友安慰我。人数少得可怜，一二个吧。就连这一二个可怜的人数里也没有一个是立场坚定分子，他们不约而同都觉得我够幸运的了：《瞧这一家子》只有二十八个镜头却获得了配角奖；《小花》、《婚礼》我演的角色分别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第二名第三名；其中《小花》的角色我还获得了上海《文汇报》“文汇电影奖”最佳配角奖，同时我还获得文化部颁发的“青年创作奖”。

我昏头昏脑地参加了“百花奖”及各种奖项的颁奖仪式。

懵懵懂懂地上台，踏着棉花下台，领完了这个奖领那个奖，文化部的“优秀创作奖”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去领，赖在外景地不去北京，结果是张金玲帮我领了奖。

那些程序是怎么过来的我简直不能记忆，心中只充满了委屈与不平。也不敢与人多说话，只怕一触动伤心事便会当众“泪飞顿作倾盆雨”。

几年以后偶尔一次翻看过去的报刊杂志，突然看到一张我在那届“百花奖”为大家表演打扬琴的照片，还有慰问部队战士与陈强一起表演《瞧这一家子》张岚打电话片断的照片，真为我当时的毅力感到吃惊，没想到我处在如此巨大的失望之中还能有头脑清醒的余地策划出表演的节目，尤其是还能演奏那速度节奏极快难度又高的扬琴独奏曲《欢乐的草原》！

我有没有打错许多音符？只有天晓得。

奋发图强，“愤”发图强。自那以后，我拍每一部影片都为创作精品而拍，都为显示我的实力而拍，内心深处希望人们能为自己的错误后悔。

扪心自问，其实只是为了得奖而拍。这个角色没有得奖，换一种角色来演，这种类型、风格的影片拍过了，就换不同类型、风格的影片去拍。反正一年里接的剧本多得很，最多的一次同时有三十个剧本在等我去演，挑选的余地大着哩。

一个、两个……几个角色过去了；一部、两部……好几部影片拍完了；一年、两年、三年……一下子又是几个年头了。……

我没有得奖。我一直得不到奖。

后来，“金鸡奖”诞生了。我还是没有得奖。

李秀明、张瑜、方舒、岳红、龚雪、斯琴高娃、潘虹、李羚……差不多所有的中国电影女演员都“轮流坐庄”，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奖项，而我却总是与奖无缘。

虽然每一次民意测验我都是最喜爱的女演员第一名，可是，却总是与“百花奖”、“金鸡奖”失之交臂。

差不多每年都有事故发生：《神秘的大佛》虽然作为中国“文革”后第一部武打片票房为全国第一，可是不能参加评奖；《原野》没有获得通过，不能在国内公映自然不能参加评奖；《潜网》由于描写多角恋爱引起争论也不能参加评奖；《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因为是与香港合拍片也不参加评奖；我独立制片并主演主唱的电影《无情的情人》由于牵涉到某些民俗风情问题被停映，当然也不可能参加评奖……

不能参加评奖肯定就得不了奖。我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影片的拍摄和自己的表演上越来越严格，同时我也越来越失望了。

在沮丧的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观众面越来越广，对我赞赏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我的抱屈心理？也许我为了得奖而一部影片换一种风格、一个角色换一个形象恰恰符合了人们喜新厌旧的个性？

同时我也心惊胆颤地看到许多得奖的明星和没有得奖的明星开始殒落或是已经殒落了！年纪轻轻还没有开花开朵便永远失去了发挥自己的天地了！

人们不允许他们修正自己的错误，不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唇亡齿寒，物伤其类，这些前车之鉴使我开始考虑我的人生设计。

我甚至感谢并且开始庆幸当年我没有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了。正因为如此使我清醒，使我没有昏昏然；正因为如此使我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从而没有背上成功的

包袱；正因为如此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努力在艺术上追求完美；正因为如此我不停地变换形象，从一类角色跳到另一类角色；正因为如此使我保持了观众，使人们认为我的努力及才华超过我的所得，产生不平心理从而认为那些得奖的演员们不如我……

我的影响渗透了全中国。虽然我从没有得过奖，可我上台为得奖的演员颁奖，在观众心目中，我是无冕皇后。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大众电影》破天荒发行专辑讨论“刘晓庆现象”。

我开始仔细分析许多明星转瞬即逝的原因，并对自己的成功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仔细观看明星们的作品及他（她）们的做事为人，一点一滴地回想我走过的道路。我想起了《大众电影》。又是《大众电影》！

不久前，《大众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举办专题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刘晓庆现象”。编辑部去了工厂，去了大学，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用了极大的篇幅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可是我对这种千载难逢的特别待遇竟不以为然！殊不知在那个时代除了中央领导人再不就是去世的老艺术家在特别的纪念日（比如说一百周年诞辰什么的）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别人能享受到这份殊荣！

恩将仇报，我跳起脚与老崔大吵了一顿。《大众电影》编辑部有一位编辑平日与我相熟，我打电话去把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恩”，本来一直不能得奖就是我的心病，现在他们又来集体扼杀一个天才的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在关于"刘晓庆现象"的讨论里，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本人的色彩、个性比对我的表演更感兴趣。那位编辑作为相熟的哥们，居然也趋炎附势，人云亦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肯定这种说法，简直岂有此理。更有甚者，一位叫王××的文章对我大加攻击，把我批驳得一无是处！只有一位女士写了几句话使我略微感到有些欣慰，好像她是姓邱，文章大意是说："晓庆，我的孩子，我一直在关注着你……"

当然这篇小文章于事无补。我为他们没有充分肯定我的表演而痛心疾首。

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作为一个社会人，以我的个性、思想、观点、行为，再加上我的电影、我的企业、我的书、我的演唱会、我的音乐夯不郎混为一体，从而奠定了在中国现时代地位的时候，"刘晓庆"三个字的含义也就早已超越了我自己肉体、灵魂的本身。

而当年的那本《大众电影》正是对后来几足鼎立的自己的启蒙和提醒。

我的人生就像是打台球。而我是一个球艺不高的球员。我的全部证明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学道理。时常发生的情况是：本来我想打这只球，吃不下睡不着去研究打它的战术，眯缝了眼睛屏住了气息全力以赴打出一球，结果球根本没有朝我希望的道路前进，它横冲直撞自由散漫地去了另一个地方，把别的我从未想过的球打进了洞里。而我还是得了分。尽管不是我事先安排好的结果，但我仍然是赢家，常常是那个别的球得分反而比我预想的高。

突然我的后脊梁出了一背的冷汗。我一着急后背就会出汗。我好比一头黄牛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脚底下遍是坑

坑洼洼，想绕开就是绕不开，只能一边踏着泥泞向前，一边怨天尤人地埋怨命运的不公平，等以为快到目的地了站起身来喘口气，结果发现只有这条艰难曲折的小径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自己已站在比目的地更远的地方。

我越想越后怕。假如当时第三届"百花奖"我同时得了"最佳女主角奖"、"最佳配角奖"，我是否能经受得起成功的考验呢？我是否能承受得起众望所归，满足人们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呢？人们也会由于我一下得奖太多而失去对我的新鲜感而将希望与同情寄到别的演员身上，我纵然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扭转这种历史潮流，于是我年纪轻轻还没有反应过来艺术生命就结束了。

那么，观众也就看不到我演的花金子、胡玉音、慈禧太后、春桃等形象了。一句话，我也没有今天了。

我的历史证明，许多事都被我歪打正着。因为要辩诬而写了《我的路》，结果引起全国大小报纸的批判却被人们大加赞扬并因此加入了作家协会；我与丈夫离婚自己痛苦万分却闹了一个举国上下的大新闻；《原野》影片虽然八年不能上映却该看的人都看过并且评价相当高……真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虽然歪打正着，我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2 我的少女时代



我离过两次婚。尽管在艺术上声名鹊起，却穷困潦倒，数次濒临破产边缘。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校长，由于父母是川东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过贡献，解放后经济上有着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的家乡四川成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好几次和妈妈在街上、在公共汽车站旁，都看见过饿死的

人的尸体。我还看到一个人刚拿着一个饼在吃另一个人跑来夺走，边吃边跑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一次我们全家在饭店吃饭，突然有人往我的碗里吐了口唾沫，我觉得不能下咽，他泰然自若地将我的饭拿过去，公然吃了下去。

除了看见这些情景以外，我自己本身并没有太感觉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据说在那三年期间，农村颗粒无收。

由于父母级别较高，我们总是有补助。记得最清楚的是有高知专用票，时常发给我们黄豆吃。我们还每隔一定时期可以凭票在饭店改善伙食，饱餐一顿。

小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与周围相比是宽裕的。况且我家人口又少，只有我和妹妹两姐妹，加上爸爸妈妈，后来接来了外婆，一共只有五口人。母亲手脚大方乐于助人，这方面对我后来很有影响。

父亲精通中国历史并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我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父亲与我脑海中男子汉的形象相去甚远：个子又矮又小，头发又少又秃，像冬天荒芜的草地。他是川东地下党员，又出生于地主家庭，“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地主”。在牛棚里他宁死不屈，坚决不肯供出他的“同党”（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同党），造反派打断了他的双腿，从此他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只能坐在轮椅里上街了。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成天“之乎者也”，崇拜孔老二，时常因为自己姓“冉”而自诩是孔子第四十几位得意门生冉什么的后代。他是成都体育学院保健系的教授，在体育学院工作多年。有一天晚饭后散步时他突然问妈妈：“怎么那些跑步的学生鞋子上有钉子呢？”“书呆子”的父

亲居然连钉鞋也不知道。

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亲生父亲离了婚并且各自都有了新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儿女，于是我一个人成了单个分子。父亲姓冉，母亲姓刘，我和妹妹一人跟着母亲姓一人跟着父亲姓。

我们家里是典型的“严母慈父”。母亲性急，望女成龙，时常对我打骂，而我又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硬脾气，每次与母亲吵架过后，决不会我先与她和好。记得一次母亲打得我鼻子出血，我就故意埋头对着地，眼看着血流了好大一片，母亲百般哄我才肯下台。

而我妹妹则与我大不相同。第一她挨打很少，因为她比我小，身体又比我不好，再者我的鬼点子总是比她多，更主要的是她比我会拐弯。如果她挨了打骂或是罚站，我们大可不必理她，让她站在那里好了。如果她站累了或是看见我们开始吃饭觉得饿了，就会突然干笑一声，把自己接下台后没事人似地解放手脚或是若无其事地坐到桌旁吃饭。我时常骂她是“软骨头”。后来看小说《红岩》，更是一边看一边对照她的表现，认定她一旦被特务抓去肯定要当“叛徒”。

我们姐妹俩几乎没有什么地方相似：长相、秉性、高矮、胖瘦，全是出于两个不同的版本。她羡慕我有灿烂的成就，我羡慕她那完整的生活。

妹妹父母双全，家实际是她的家，我其实是外来户。妹妹自己还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活泼聪明的儿子及能干并且热爱家庭有责任心的丈夫。他们的小单元融合在我们全家的大单元之中，与妹妹相比我所有的是残缺不全的人生。

我不仅是外来户并且没有老公也没有儿子。我们家就像

是童话里写的那样：一群鸭子，其中一只鸭子带来一只大蛋，所有的鸭子都当成是自己的蛋拚命孵它，拚命养它，结果从壳里跳出来一只丑小鸭，最后成了一只天鹅，只不过天鹅没有飞走，它恋恋不舍心甘情愿成了这个鸭家庭的一员。

在申请入团的时候，班主任觉得我与父母、妹妹都长得不像，于是让我回去问个究竟，母亲怕我入不了团只好告诉了我还有一个离了婚的父亲的真相。当我听到此事时没有什么震惊，只是为我的亲生父亲并不像班主任所猜测的那样是大干部或是什么显赫人物而感到有些遗憾。

在此之后家庭的航线仍然如常进行。全家都知道这件事并且也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有时还议论，但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亲情。我明白"阶级情"绝对可以重于骨肉情就是从我与父亲这件事上深刻体会出来的。

父亲成天给我们讲成语故事，许多成语故事尤其是"二十四孝"影响了我一生。"卧冰求鱼"、"老莱子"等主人公成为我孝顺父母的楷模。孝顺、孝顺，不顺就不为孝。在我长大成人后，几乎从没有与父母红过脸、吵过架。在我心目中，父母永远是对的，在父母面前子女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孝顺是无条件的。

我一直没有去国外工作或在外国定居，很大的一部分理由是因为父母、外婆健在，我遵循一个信条：父母在，不远游。

小时候我是父母的孩子。长大后我是全家的阿姨。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我对他们的牵肠挂肚。

我的外婆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是她老人家把我带大。我们一家五口人是三世同堂。后来妹妹的孩子出生就变成了四世同堂。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懂得尊重老人。孝顺父母，

尊老爱幼是我的原则。

成都虽然处在天府之国四川盆地的中心，可是阴雨连绵、气候潮湿，冬天没有暖气，屋里比屋外还冷。我小小年纪便会在临睡前为父母外婆灌好热水袋放在他们的被子里暖被窝，每天在父母外婆午睡起来时一杯热茶送到他们的面前。每到星期天全家的衣服、被子都是我洗，只要我在老人身边就绝不会让他们干一点体力活。

妹妹在孩子出生以后就去法国念书，小侄子四十天就由专人陪同，一个小不点睡一张软卧到了北京。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带大，好几次给他换尿片，他小鸡鸡一翘尿就洒到我的锛儿头上。

业余时间我就和他"打架"，他开枪我演死，只要他嘴里"叭"的一声我就变换各种姿势倒下，比我演电影还逼真。再不就是演习隐蔽，他从那个柜子后面钻进去，我从这间床下爬出来，匍伏前进、卧倒、剪铁丝网，嘴咬一下导火线扔手榴弹，从来不会忘了音响"轰"!

他不爱吃饭我就教他唱歌，他刚一张嘴我一勺饭就到了他的嘴里。在他的眼里，我是最漂亮的，只要电视机里出现一个美丽的女人大特写或是在杂志上看到一张动人的封面，他就会指着说："姨妈。"

后来我有了条件把父母外婆都接到北京，外婆及侄子一老一小至少每个星期一次的"大扫除"是我的"包活"：洗头、洗澡、剪头发、剪手指甲、剪脚趾甲，忙忙碌碌，并且以此为乐。我的亲人们因为我这个不安分的"弄潮儿"而遭受了许多动荡，当然这是后话。直到现在我仍然和父母、妹妹妹夫、小侄子住在一起，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式大家庭。我们和睦相处，相

濡以沫，家庭生活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我们全体都崇仰这句话："家庭幸福是最大的财富。"

"孝心感动天和地"，这是外婆给我的评语。在我去法国期间，我的外婆去世了，她享年九十三岁。

外婆一生悲惨凄凉，晚年才稍微享了一点点"清福"。外公是一家大地主的儿子，从小游手好闲，与外婆结婚不久，由于抽鸦片烟将家里所有东西典卖个精光，扔下外婆及四个孩子一命呜呼。

外婆二十三岁就守寡，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她是小学教师，靠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她自己没有再结婚也没有过情人，辛苦了一辈子，我长大明白事理后每想起这一点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由于我是外婆带大的，更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和外婆的感情格外深。小时候我是外婆的外孙女，长大以后外婆是我的"娃娃"。我对她的关心无微不至，每次出门都千叮咛万嘱咐，要外婆保重，听我的话，"乖一些"。

外婆从没有出过四川，后来我将她接到北京，专门让她坐飞机，时年她已九十岁。开始我担心外婆不习惯飞机起落，怕她身体吃不消，结果她上了飞机竟毫无感觉。等飞机已停在北京机场，她问我们："飞机飞了吗?"

外婆出生在清朝，而我是现代派，我们总有些小小的"摩擦"：跳猴皮筋她说我"年纪轻轻女娃子家别把腿跷那么高"；洗衣服只要看见有泡沫她就说我太浪费；我喜欢明亮她习惯节约，经常是我在前面开灯她跟在后面关灯，而过一会儿妹妹又去把灯打开。

在北京住了一年多，由于我离婚全家坐火车南迁，又一年

多以后外婆在深圳无疾而终。

我时常感到我爱我的亲人远胜过爱自己。但是爱心可以获得成功这一点我已在后来多次认识到。我因为爱父母结果作起了房地产，我由于安葬外婆想起了建公墓，我由于……这一切我会详细在下文一一加以描述。

可是我的婚姻却经历了两次变革。

在成名之后，一次与一群即将要考电影学院的女孩子聊天，她们问我："作一个好的女演员首先要具备什么?"我说："是一位好女人。"我自认是一位好女人，这一点历史已经有了验证。

虽然我两次离异，但在对方心中我是"五分"。当我第二次离婚时在法庭上，法官劝解对方说到我不是一个好媳妇时，对方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您错了。刘晓庆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

尽管由于报刊的渲染或是人们的误解，在大家印象中我反叛、不规范、不循规蹈矩，可我实际上在骨子里受封建礼教、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很深。

无论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成群结队的男人总是围绕在我的身边。有人说我的眼睛转盼流光，背地里叫我"小情种"。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时，大学本科的大哥哥们总是来找我聊天。有的人是帮我打饭，有的人是替我抄乐谱，我什么事也不用干。十三四岁时我已接触了"恋爱"，只不过那时我头脑里谈恋爱的概念就是无论吃橘子吃苹果都分给他一半而已。

在学校里我总是鼻孔朝天。男同学们都说："刘晓庆?不

敢想。”临近毕业去成都一个工厂辅导业余宣传队，那是一家很大的钢管厂，全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男工。人们叫它“光棍厂”。我在工厂除了教他们唱歌跳舞外，另外还体验工人的生活，开了八个月的车床，工人们封我为本厂的“钢花”。我当然不会忘了在厂里穿行时工人们看我的眼光，那眼光就像是饿了的猫看到了一块好吃的蛋糕。

然后我被分配去了农村，安排在一个玉米园种场。全大队都是男工，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小姑娘。我们受到了冷落。除了河对面的男知青对我们关怀备至以外，我们没有被重视从而也没有得到任何特殊待遇。农场工人们和农民们对我们的青春美丽视而不见，也从不评选什么“场花”、“林花”或是“玉米花”之类，他们重视的是劳动。像我这样外表好看却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姐对他们来说只是累赘，因为我拿一份工资（我是带薪劳动）却干半个人的活，分了他们的口粮，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他们认为我是“绣花枕头一包草”，“漂亮的脸蛋又不能长大米”。就像《红楼梦》里的焦大，没有人爱上我这个林妹妹。

当我干不出队里派给我的活苦不堪言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假如有一位农民，当然是男的，他每天来帮我锄草替我施肥，我一定会嫁给他。可是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幸好他没有出现，不然我的历史就会改写了。

我时常感叹命运的神奇。人生真是变幻莫测，此一时彼一时。

前次我去北海，在北海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盛大欢迎晚宴上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开始我没有回头。成名之后处处都有影迷叫我的名字，对此我已司空见惯，何况在北海并没有

熟人。那声音连续叫了几声，我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眼，没有发现认识的面孔，于是又置之不理。有人走到我的面前，一个声音在说："刘晓庆，我是谢婆。"

谢婆！是我在音乐学院附中一位同班同学的外号。我猛然抬头看到一张陌生的脸，那张脸上写满了沧桑。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

我记得在学校他学二胡专业，鬈发，长睫毛也鬈鬈的，虽然是男生却漂亮可爱得像个女孩子，他姓谢，于是我们给他取了"谢婆"的外号。毕业后他分配到四川阿坝州藏族自治区文工团，听说娶了一位藏族姑娘作妻子。可现在他已面目全非，看上去可以当我的大叔。

"认不出我了吧？"他说。

我一边请他坐下，一边不得已地承认着。

在聊天当中我得知他和他的藏族太太有了两个孩子，由于老婆的原因他一直在阿坝。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不离婚？"片刻之后我问。

"她人很好，我们很和睦。"接着他邀请我去四川某单位参加一个活动，我告诉他我从不随便参加任何活动。他说如果我能去，那个单位的领导可以将他全家调到成都，并请求我答应他的要求，一股东西突然堵塞了我的咽喉，我赶紧点头答应了他。

深圳有个豆花庄，老板是我的四川老乡，与我相熟。早先她在北京开饭庄，后来去了深圳发展，每次去深圳我都去她那里吃饭。一次我们吃得高兴，听到在旁边表演的唢呐独奏吹得不错，吩咐我的秘书给他小费一百元。秘书把钱给了他，他站起来大声说："刘小姐，谢谢。"老板赶紧介绍说他也是来

自四川，是音乐学院我们大学本科的同学。我马上抬眼仔细一看，模糊记忆中有些轮廓：在学校他是高年级的学生，成绩又好，一直是我们小班同学崇拜的偶像。过去在学校我仰望着他，没想到十几年以后，我们已是天壤之别。

最使我震动的，是我的同学们那安于现状的表情。也许对他们来说，能够从四川出来，到深圳或是北海工作已是鹤立鸡群，很不得了的事情了。

假如我当初与一个农民结婚，假如我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肯定我还远不如他们。幸运的是当初没有农民愿意娶我也就没有人追求我，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追我，我已调离农场了。

一九六九年底，我费尽心机参了军。虽然是一九六九年底入伍，算的是一九七〇年的兵。参军的第二天便野营拉练，在徒步行军一千多公里后把我分配到了电影队。有电影时放电影，不放电影时负责宣传队工作。

穿上军装，别提我有多神气：漂亮、俊俏，婀娜多姿，挺胸昂首，绝对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标准楷模。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吸引了所有的眼光，又变成了一块好吃的蛋糕，而且是涂满了奶油的蛋糕。

我所在的部队是地方部队，只有几个女兵。到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如沐春风，看到军官觉得是伯伯叔叔，看到战士觉得是哥哥弟弟，唯独忘记了他们都是——男人。

俗话说，“当兵当三年，老母猪变貂蝉”。这句话刚开始听到我并不理解，后来在实践中发现这句话着实再准确不过。许多战士都是长年在哨卡、在荒山，突然来了我这只双眼皮大

眼睛的小母猪，岂不是看到了天上的仙女下凡？

在机关，我受到了上上下下军官和战士的欢迎。我属于政治部，政治部首长是我的上司。由于我吹、拉、弹、唱几般武艺都会，又是唯一的一个毕业于专业文艺学校的高材生，军区对我异常重视。刚参军时，我和其他十几个文艺兵经常被叫去为一个或几个首长表演。我们像在舞台上那样，面对咫尺之遥比我们人数还少的观众又跳又唱，还使出浑身解数演奏我的扬琴独奏。

后来，演员的队伍开始减少了。从十几个人到四五个人，四五个人又减成两三个人，最后变成我一个人的事了。我经常在午睡时或是上操上课时被叫到首长的办公室，由其他战士替我把扬琴支好退出后，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给首长演唱。

首长们开始为我写诗。写的是词牌，什么“钗头凤”之类的，我不大懂，但感觉得出来好像写得不错。总是收到首长及军官们给我的诗和信，表演时往观众席偷偷扫上一眼，看到的全是对我怜爱备至的眼神，心里暖融融的，觉得在部队里真是不错，和农场大不一样。

我在部队里茁壮成长，出落成一个越来越英姿飒爽的女兵。“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年轻的战士们和军官们开始追求我。可是，我是一个战士。根据规定，在部队里战士是不许谈恋爱的。

何况我还在争取入党。在争取入党期间无论党考验你的时间有多长都是不能出任何差错的，有男女关系或是作风问题还了得？再说我是从宣汉县农场入的伍，部队上转业复员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一旦我转业或是退伍又回到农村，我也就再也回不了成都，回不了家了。

性命攸关，根本不能寻思这方面的事情。我从来都很乖，听党的话。

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和前途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再回农村。我可输不起。恐惧之中，我写信告诉了表哥。他是我亲舅舅的孩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在部队当兵，由于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表哥给我回了信。可是信又被宣传队一位战士拆了。因为他一直喜欢我而我没有反应，他怀疑我在外面有男朋友于是私拆了我的信。铁青着脸他找到我，要拿枪“崩了那些狗日的”！我百般哄劝流泪哀求也没有用。

那天晚上，我们在军区礼堂演出。礼堂里同往常一样，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开演前战士们此起彼伏地喊口号，各连队气宇轩昂地互相拉歌。大厅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由于惊惧，我一直在后台手脚发颤。

我是宣传队的红人。宣传队在我的负责下已成为全成都军区的样板、最有名的“乌兰牧骑”式宣传队。我们的队伍短小精悍，每个队员都一专多能，节目精彩活泼，很受战士们的欢迎。就拿我来说，全台一共十一个节目，九个节目都有我，是货真价实的“台柱”。可是今天演出我心乱如麻，一边演出一边拚命控制住那眼看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好不容易支持着到了晚会的终场。

很快人已散尽，舞台上只有我在收拾琴谱、服装及其他道具。

远远地有人从灯架上走下来，是那位喜欢我的男战士。他在等我。我不敢理他。

匆匆做完手上的事情，关了礼堂的最后一盏灯就往外走。

没想到我刚关了灯他就扑过来，抱着我贴在墙上："那些首长对你干了些什么？"

我拚命挣扎。一边挣扎一边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关你什么事？"

他气喘吁吁，狂怒得像一头野兽，"说，那些首长究竟对你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

"你不说也没关系，反正我要杀了他们！"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你去杀吧！有本事你就去杀吧！你才会死无葬身之地！"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他倒在一大群谱架上，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堆响声。

"是谁在那儿？"礼堂里突然灯光大亮，领导我们的陈干事站在门口，正大步向台上走来，慌急中拉开后台小门，我狂奔出去了。

这一下全完了。我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现在就是浑身都长了嘴也说不清楚了。入党、复员、回成都，全都成了泡影。坐在宿舍的床上，脑子里漆黑一片。

熄灯号吹了好久了。我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根本不能入眠。

"刘晓庆！"宛如一声炸雷，"腾"地一下我从床上跳下来。"×干事让你去一趟。"一个声音在说。

到了办公室，一眼看见那个男战士在场，犟头犟脑地，但老实得多了。我坐下来。

我们一起详细向领导交代了当黑灯以后在礼堂舞台上的具体动作，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行为。这个交待的本身令我们

无地自容。

一天、两天、几天过去了。我惶惶不可终日，就像一个死刑犯在刑场上等着那致命的一枪。枪声一直没有响。我在受煎熬。

分区有许多随军家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处处遭到她们的白眼。也许是由于那位男战士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我“勾引”了她们的丈夫？在她们的眼里我已是一只“狐狸精”，专干偷鸡摸狗的勾当。可是我当时还根本不懂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儿。

去小卖部买东西，总是给脸子瞧，把找的钱和东西狠狠地一摔。睡不着觉去医务室，刚拿了两颗安眠药就听见有人说：“别给她药，成天五迷三道的，当然睡不着觉喽！”

天也昏昏，地也黑黑。突然我想到了死。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可是怎么个死法好呢？

这一天，机会来了。

分区机关举行手榴弹实弹演习。按规定，手榴弹的实弹演习必须要能扔出五米远才可以参加。我没有扔过，心想大概扔不出两三米。但是我头一个报了名。反正也没有人查。于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演习场。

教官给我们详细讲了要领。大意是先拉弦，后扔弹，扔出后卧倒之类的话。这一套在练习扔木头做的教练弹时已听过无数遍，我根本没听。

大义凛然地看着远处的群山，脑海中浮现出黄继光、邱少云、许云峰、成岗等烈士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心中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魄。我一点也不痛苦，心里宁静、明朗，想到当我

死后人们脸上的各种表情，会由于认识到是他们制造了冤假错案而悔恨不已，会承认我的清白无辜，觉得自己已是胜利者。

“轰……”教官先作了一个示范，然后实弹演习开始。

一排、二排、三排，干部战士们蹲下，拉弦，扔出去，再卧倒，一群群的手榴弹连珠炮般地炸响，土块、泥块满天飞扬。

同志们个个兴高采烈，议论纷纷。我们也走上自己的位置。

擦掉溅到脸上的尘土，我拿起属于自己的那颗手榴弹。

教练的口令声远远地传来，我们一起蹲下、拉弦，扔出去、卧倒……我突然站了起来。手榴弹扔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

从身后扑上来一个战士，我们一起摔倒在地上，连拽带滚，我们滑到了山坡下面！

“轰轰轰轰轰……”

手榴弹全部炸响了。我冲着那位战士又踢又打，像一个疯子。

事后，那位战士受到了口头表扬。因为他没有受伤，于是口头表扬。如果是重伤，肯定会受到嘉奖。

这一天，上级军区来了人，要我去接待。抱着带罪立功的心理，我圆满、周到地完成着我的任务，凭着聪明伶俐很为我们分区长了脸面。原来是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听说我们宣传队有许多人才，于是到这里来物色青年演员。

偶然出于必然，他们看中了我。于是调我及另一位女战士去重庆复试。复试之后又回军分区等待消息。在等待之

中，我与那位男战士的问题暂时不作处理。

只剩下调动这一棵救命稻草了。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等待时间是那么久，我已奄奄一息。

在回房间的楼梯上，看见与我同去重庆考试的小蒋卷着一床凉席，背着一个被盖卷，哼着歌儿走下来。心里一震我伸手拦住她的去路："你去哪儿?"

"没有通知你呀?"小蒋诧异地问。

"没有呀!通知我什么?"我气都出不过来了。

"调到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有我，还有你。"

"真的——呀!"我俩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活像一对神经病。

几天以后，我们到了成都。在战旗话剧团三个月后，我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试镜头。拍完《南海长城》后又回了一次成都军区，然后就没有再回部队。我的艺术生活从此走上了正途。

在军分区的经历给我的少女时代刻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切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忘怀，它影响了我的婚姻从而也变革了我的一生。

3

我的第一次结婚又第一次离婚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南海长城》的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王立。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

当时我在成都军区话剧团，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我是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生，他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生，我学民族乐器扬琴，他主修西洋乐器钢琴。我在四川，他在北京。每个条件他都比我高一截。

刚见面时他嫌我比桌面还黑我觉得他条件还不错，后来

他觉得我是五分我又嫌他戴眼镜不够男子气。不管我们互相嫌这嫌那，我们仍然抽时间约会，努力争取走到一起。

由于是朋友介绍我们相识，见面时大家都目的清楚，任务明确。虽然说有些“拔苗助长”，但禾苗不一定都活不了。就像一棵树虽然只有树干没有枝叶，看上去秃拉巴几不伦不类既可笑还愚蠢，但树干毕竟是最主要的不是?窗户纸先捅破，树叶慢慢再长也行。

这也是我本人的意愿。我不愿意找电影演员，也不愿意和搞电影专业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不自信?也许是怕对方花心?当然这只是那时的想法。后来的历史证明，我一直在文艺界的窝里转，总出不了这个圈。

相互之间生诧诧地约会了几次，我参加拍摄的电影《四渡赤水》下马停拍，我就回四川去了。当我初涉银海，在电影的深水里扑腾了几下又回到战旗话剧团的时候，我已经提了干，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也是一个有六年军龄的“老兵”了。

我具备了谈恋爱的资格。领导、同志们都关心起我来。没几天，总政歌剧团的调查函件就发到了我们团的收发室。在部队里，每个人谈恋爱都是要汇报的。并不是说你已经谈上了恋爱才汇报，而是思想上一动了这根筋就要向领导汇报。领导会为你考虑，为你调查，了解对方的家庭出身，主要是政治表现等等，等批准了以后你们才可以谈恋爱。在这些过程当中，哪怕是被蒙在鼓里的对方也会清醒，等领导一批准那天，基本上生米就已经煮成了熟饭了。

总政歌剧团的调查函揭露了我本来不是秘密的秘密。因为觉得与王立只是相识，根本谈不上是恋爱，况且自己也还没有萌发“爱情”，根本就没有想过向组织上汇报请组织上调查

的问题。离京时少嘱咐了一句，对方的函件这么快就来了。

来自总政治部的函件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我们团迅速回了信，在回信的同时也发了一封调查王立的函件。这一来二往，我和王立的恋爱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了。而我这个当事人还没有想好。

在我还没有认真想当然也就没有结果的时候，团里领导通知我，我们的恋爱被批准了。并且我被问到是打算在成都结婚还是在北京结婚？我的人生大事等于就这样被确定，因为那个时候在部队里只要公开了恋爱就得结婚，不然绝对是道德败坏，十恶不赦，在大家眼里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于是我开始在心目中把王立当成丈夫给他写信。反正我不能再有别的选择横竖就是他了。差不多每天我都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热情洋溢的信。看着这些信我努力陶醉并且给自己下任务每周二、三必须回信，还绞尽脑汁使我的信纸布满甜蜜动人的辞藻，我给他织毛衣还给他织毛裤，由于相隔太远分开太久他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淡漠，凭着他的来信我的去信编织我们的未来，并且把他塑造成了另一个心目中理想的人。

可我还是不想结婚。同志们都催促我，父母更是心切。我简直不觉得结婚有什么好。有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思念。我不思念任何人。书上写的那些关于爱情的话语太肉麻了。

我只是沿着不知是谁为我安排的轨道在前进着。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轨道。大家如此，我只有如此。跟着走就是了。

而令我心急如焚、日夜焦虑的是我不能再拍电影。许多电影厂来借调我，团里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就是不放。尽管我只是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演舞女演工人跑龙套，再不就

是京剧《杜鹃山》改编成话剧只演第三场，我演 B 角根本没有上台实践的机会，可团里还是不放。

我恨死了团里的领导。心里暗暗发誓一旦得逞绝不轻饶他们。可我首先必须“得逞”。我又如何能得逞呢？

第一次我自己想到了婚姻。我可以提出结婚！结婚我就可以去北京，他们不能阻拦！到北京结不结婚还不是由我。总之一切到时候再说！

简直没想到婚姻还能作跳板，此时对男友不嫌我远在四川没和我吹灯满怀着感激。

想好了就开始进行。一切顺利极了。手续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团里开了一封介绍信，大意是“特介绍我团×××前往北京与你团××结婚”之类。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王立，告诉他我很快会去北京，让他到车站去接我，此时我已万事俱备，只等火车票了。

火车票拿到手，马上到邮局给北京发了个电报。告诉我到北京的准确车次、时间，免得错过。

王立书生气十足，几次从北京托火车列车员给我带东西，总是怕我接不到，想出许多花样来。一次把我和他的合影从中撕成两半，让列车员拿着他头像那一半，另一半寄给我，到了火车上两张照片一对，暗号接上，东西就可以取走了。几年之后我们闹离婚时我曾经想到过这个细节，莫不是当初他把我们的合影一分为二，预示了今天的不和？

发了电报回来收拾行装，队长告诉我军区宣传部已同意把我借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同志，感谢你》了。没有什么反应，我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同意也得走，不同意也得走，现在说，晚了！我再不会回来了！

穿隧道，过铁桥，撞上"詹天佑挂钩"，火车朝着首都北京风驰电掣般行进。心里没有恋爱，没有婚姻，只有电影，只有珠江电影制片厂。

十次特快[1]喘着粗气，缓缓地进入北京车站。从读了不知多少遍的《同志，感谢你》剧本上抬起头来，一眼就看到了窗户上兴奋的王立的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那个感觉决定了我们的悲剧。我发现我简直错了。

他和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完全是两码事。他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他！仿佛从半空中被摔到地上，我好疼。

我心里没有爱，只有陌生。我真的错了。可是，我兜里揣着婚姻介绍信。我是来和他结婚的。我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尽管我们并没有入洞房，可是没有什么不同。没有退路。退回去比现在还糟糕。

当天晚上，我们就结婚了。看来他作了不少准备。我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化妆，我没有亲人更没有好友在旁边，匆匆忙忙，公事公办地掀开了我人生崭新而重要的篇章。

我不能掩饰自己对男女之间亲昵的厌恶。在少女时代刻下的烙印像电影镜头在我们之间叠现，我反感婚姻生活，我讨厌男人。

---

① 在《我的路》中为了简便曾写到去北京是坐飞机，实际是火车，以本书为准。

结婚刚两天，我一定要走。尽管心里有对王立的歉疚。第四天早上，我这个没有新婚感觉的新媳妇就离开新婚丈夫走了。

当我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其时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我们的婚姻是我过去经历的牺牲品。蒙在鼓里的王立莫名其妙。对我的反常行为他以为只是我累、烦、压力太大，他希望改进我们的家庭生活。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以外，我正在拍摄《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这三部影片对未成名、在北京还谈不到立足的我来说是背水一战。我倾注了全部的心力。

我和王立的要求越来越有距离。在分别一年，饱尝了相思之苦后，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没有经过表演学校训练的我如牛负重，举步维艰。

我简直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来去顾及王立。全总政歌剧团都知道我们相聚的难得：只要我有哪一天不拍戏在家休息，王立就会在宿舍走廊里大喊一声："你们谁也别到我家来，刘晓庆回来了！"于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打扰。

我们房间里没有自来水，假如要出去打水或是买菜，王立会小心地把我锁在屋里。

他告诉我，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最讨厌墙上那滴答作响的时钟，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把那时钟给扔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觉得心疼又捡了回来，钟还未坏还在走，只是钟面上有了丝丝裂纹。

他还说，在我去珠影拍戏的一年里，每次他碰到我的朋

友，也就是那位介绍人，介绍人都躲躲闪闪十分难为情，觉得非常非常地对不住他，给他介绍了这么一个不着家的老婆。

他的这些话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随着岁月的磨炼开始懂得人情冷暖才发现当初自己是多么混蛋。记得我时常看着他讲话的脸想我的台词，经常我们正在吃饭我停下筷子琢磨要拍的戏。

我早出晚归，半夜里时常爬起来写笔记，根本忘记了他的存在；我虽然身在家里，在他的旁边，可我的心不在这里，灵魂不在这里，心与灵魂在摄影棚里，在电影上面。

王立痛苦万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希望我能回心转意。可是我已陷在电影里不能自拔。每天傍晚他往摄影棚打电话问我还有几个镜头，虽然不会做饭，他亲手为我烧菜然后坐在桌旁静静地等我回来。他不了解电影是多么的随意，多么的没有时间概念，有时一个镜头只要二十分钟，有时一个镜头需要七个小时。当我总是在他过了忍耐极限的时候回家，他一见我就忍不住把桌子凳子一摔，然后大发雷霆。而刚进门仍然沉浸在戏里的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心惊胆战，但又莫名其妙。

我努力使他满意，却总是十分拙劣。他对我说每次他去听音乐会，看到别人都是成双成对衣冠楚楚，而每个人都向他问起我在什么地方，他总是回答他们我在外地，人们都当着他的面叹息。我马上说只要有机会只要不拍戏我们一定一起去听音乐会。于是有一天，我的生日，摄制组专门放我的假，我做好了一桌菜，点好了蜡烛，没有告诉他，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谁知他拿了两张音乐会的票兴冲冲进门来要我立即跟他出发。我要过生日，他要去音乐会，相持不下最终又发生一

场争吵，吵累了我软下来，吹灭蜡烛穿好衣服陪他去听音乐会。音乐会是梅纽因还是卡拉扬演奏的，是什么乐章谁的作品我已完全忘记了，由于拍戏由于争吵由于没有吃饭，我又渴又饿又困竟然在音乐厅呼呼大睡，丢尽了他这位出身于音乐世家的脸面。

我们的隔阂越来越深。我越来越不想回家了。每天总是找人替我向王立请假晚回家。家庭对我来说太局限了，远不如我自己一个人来得自由自在。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总是吵架，总是吵架。

直到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本来就有心理障碍的我此时更不能接受夫妻间的亲热，王立的满腔热情遭到我前所未有的抗拒。经过长时间的搏斗，他终于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离家出走了。

我的出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下午，总政歌剧团的领导带着王立到北影剧团来检讨认错，请求我回去，北影剧团领导把他们批评了一通。

我没有回去。

全厂的人都同情我，只有我心里同情王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母亲问过我许多次，“他为什么打你？”我从不正面回答。我不想说这些事情。家庭之间的是非有时是永远讲不清楚的。我既已出走就不想再回去了。长痛不如短痛。好马不吃回头草。

所有的东西全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要。身上只有三元七角钱。连牙膏、牙刷也没有，唯一的安慰是每个月五十元的工资。可是现在离发工资的时间还早。我认识到又面临一次

新的冲刺。

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尝到拮据的滋味。当然我也从来没有富裕过，可没有现在这样情况具体。下农村时我是月工资二十九元五角，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发工资的那天我上街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作为自己第一次挣钱的纪念。后来参军入伍，津贴是每月六元。由于是女兵，有卫生费，每月实发六元七角五分。后来提了干工资是五十六元，转业后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资是五十元。

出走的时候我已是一个电影明星。我已得过奖，上过报纸，赫赫有名。我只是还没有调到北京。

可是我没有钱。甚至没有钱吃饭。我开始不吃早饭。中饭、晚饭都去别人家蹭饭吃。王立到处打电话找我，大概是想给我送点钱或是衣物来，我让他找不着。

4

令我难堪的事层出不穷



我离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人们都津津乐道地争相议论着。"文革"以后中国电影恢复以来，还没有一个电影明星像我这样公开离婚。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许多情形我已在我写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中描述过，现在就不再重复。不过在当时，经济上的困难相对来说还是容易克服的，何况我这个人吃苦也吃惯了。只是有时想起过去的事觉得现在脸上还发烧：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日本东京参

加影片《天平之甍》的开幕式上。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在去日本时，我还是现役军人。除了军装以外，一件其他的衣服也没有，而我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见得可以买一套像样的服装。

从接到通知的瞬间到出国前的最后一分钟，我一直在为出访的服装忙碌。为了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出国任务，又不丢国家的脸，我每天奔忙于北影服装车间借服装，忙得天昏地暗。

尽管我已为此次的出国之行尽了大量的努力去准备，但在日本，还是为我的衣服伤透了脑筋。

参加开幕式是我们代表团此行最主要的活动，《天平之甍》又是日本在“文革”以后第一部到中国拍摄外景的影片，也是第一次剪彩邀请中国电影界成员出席，因此日本方面格外隆重。所有的日本女宾都穿和服，那么相应对等，我作为唯一的中国女演员应该穿旗袍。可是我只有一件从北影服装间借来的呢子旗袍。而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穿过旗袍。那件北影旗袍由于年代久远，已经破旧不堪，胸间被虫子蛀了一个洞，下摆还有另一个洞，旗袍开叉的地方撕裂了，服装师傅用线在那里挽了一个大疙瘩，背后的呢子绒毛已经脱落，显露出麻袋片似的底。

在开幕式前，代表团召集开会，为我的旗袍出谋划策。没有人想得出妥当的主意来。后来，还是我绞尽脑汁弄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胸前的洞用一朵红花缀在上面挡住，开叉的地方呢，提上皮包就看不见了，背后的麻袋片只有听天由命，寄托在希望到会的日本人都是近视眼，侥幸不往那个方向注意，而下摆那个洞……我可以紧紧地跟在代表团员身后走，

尽量笑容可掬地对所有人，吸引他们看我的脸而忽略我的衣着！

唉，那一次去日本，难堪的事情层出不穷。穿的全是借的衣服，从上到下千疮百孔，只有脚上的丝袜是自己买的。

我一共只有两双丝袜，来回倒着穿。丝袜在日本是穿一次只要破了就扔掉，而我每天在东京白天应酬回来在临睡前支撑着沉重的眼皮还得在灯下缝补丝袜。缝好后再洗好、晾干，第二天早晨再穿。丝袜是最不经用的东西，每天破，每天补。在日本十几天丝袜已伤痕累累，真不知道我那左一个疙瘩右一个疙瘩就像静脉曲张的双腿在唯美主义的日本人眼中看来作何感想？

我们每天的日程排得非常满，女演员要上午一套衣服，中午一套衣服，晚上一套衣服。每天走马灯似地把仅有的几件衣服来回倒腾，弄得我精疲力竭。

最紧张的还是晚宴，在日本，每个餐馆的门口都有服务生为你脱大衣。当我每次风度翩翩地把大衣往服务生手上一交，大衣上赫然印着的大字“北影服装”立刻跳入眼帘，而不少日本人是认识这几个中国字的，何况款待我们的日本人大多数都是中国通。我只有立刻挤出最动人、最灿烂的笑容来掩饰我的一头冷汗！

当然，我所有的服装都是借用北影服装仓库的。有一次，我穿着北影的某一套服装，怡然自得地和我们的日本陪同聊天。她给我看前一次来日本的中国电影代表团照片，我一眼看见了照片上的张金玲，她竟然和我穿的是一样的服装！原来我们借了北影同一套衣服访问日本！一时间我瞠目结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想转移那位陪同的注意力，可是晚了。她已经发现了。她对我说："看，张小姐也是同你一样的衣服，你们都喜欢这套服装，是吗?"

前一阵子翻看照片，看到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有栗原小卷、吉永小百合、中野良子等等。许多合影我们在一起，日本女演员个个花枝招展、服装考究，我们中国女演员穿得都土里土气，艰苦朴素过了头。我在当中尤其扎眼。不是我的漂亮使人扎眼，而是因为我穿的是一件自己亲手缝的相当于一些小女孩用两块大手帕前一块后一片拼起来的实际上是穿着睡觉的汗衫!

那时候，我们同海外团体交往也罢，出国也罢，都不许收对方的礼物。如果对方非要送我们礼物，价值五块钱以上的都要上交。而我们回送给对方的礼物呢，哪怕价值五百元国家都不会补贴给你。

在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日本演员栗原小卷送给我一串玻璃仿制的钻石项链，我用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即十元钱买了一个骨头雕刻的镯子回报她。日本电影代表团前脚刚离开北京，后脚上面的通知就来了："把那串项链交上来!"我当然马上交了上去。这次我去日本，厂长亲自指示："把那串项链发给她戴!"于是又发给我戴。而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呢，又收到了另一份通知："把那串项链交上来!"于是我又交了上去。

后来，我主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放映，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前往参加首映式。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老板许敦乐委托中国电影代表团带给我一架照相机。可是照相机没有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到了，要求我把那架照相机交上

去，而我知道许先生送照相机这一信息也是从通知上得来的。于是，这架送给我的照相机我连面也没有见着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在那个时候，出国访问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包袱。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参加《原野》在香港的首映式。我当然还是借衣服穿，只不过这次借的是香港长城电影公司仓库的服装。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个个都穷得要命。在香港这挥金如土的世界里我们无金可挥，我身上更是一文不名，无论是人民币还是港币，我什么币也没有，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

每当有观众送花到我们住的酒店，或是有行李服务生帮我送上来，站在那里等我给小费时，我只有假装不懂，仰着脖子哼哼着小调看天花板。

每次有朋友陪我上街，出租车一停我就拚命地朝窗外眺望，“浏览市容”，好让他去付车钱。在商店里我装模作样地东挑西捡，其实我一件也买不起。

在临回国的前一天，发给我们每人一百港元。我拿着钱立刻到香港最便宜、最低档、有身份的人绝不会来的“女人街”，想买件应酬穿的体面一点的衣服。当我正在小贩的麻袋里浑身臭汗地来回翻腾，头发、眉毛上沾满了棉花絮正同摊主寸土不让地讨价还价时，居然有许多香港观众来请我为他们签名。

尽管我时常窘态百出，但所有人都知道我“穷大方”。朋友说我是“五十元钱的工资，五千元钱的风度”！

有一件事充分证明这一点。

有一天，我拍外景回到厂里，听人家告诉我，由于我的辛苦劳动，以及在三部影片里的突出表现，厂领导一致推荐我当厂里的先进生产者。我高兴得蹦了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当过先进生产者。

我马上问："发什么纪念品？"回答说有八十元奖金。八十元！这可是一笔巨款。"请客！"反正是飞来之财，为图吉利我毫不吝啬。

我借了八十元，请朋友们去全聚德吃烤鸭。朋友问："请多少？"我说："八十元吧。"朋友说："七十元吧，给你省十元。"

我们尽情地挥霍我的"成功"，美美地打了一次"牙祭"，在饱餐了一顿之后，我又出外景去了。

当我再一次回到北影，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领我的先进生产者的奖金。

兴致勃勃地走进工会办公室，他们却告诉我，我已经被撸下来了，理由是我的表现不好，自由散漫，正在离婚，所有到会者都不举手，领导的那几票根本不管用。

我马上变成了负债累累的杨白劳。为还这笔巨款我白白地辛苦了多少个月！其悲惨情景活像莫泊桑小说《项链》里的女主人公。

唉！当年露的这类"拙"真不知有多少，我都不能再去想它了！

而更使我难以承受的，还是成为电影明星后带来的一切。

5

《我的路》多磨难



突然一天，全中国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并熟悉了我的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行动从不自由变得完全没有自由，我开始出席这种场合那种场合接待外国电影代表团与他们合影谈话，我与他们的谈话被他们的记者或是我们的记者登在报纸上，我的言行必须对祖国负责任。

就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只因为是一个爱跳爱唱的小女孩的缘故，于是去拍了电影。拍电影由于喜欢也有天

赋结果拍得很好，成了一个电影明星，开始出席各种重大场合，代表国家讲话。小女孩仍然是小女孩，和一年前没拍电影时那个小黄毛丫头没有什么不同，拍电影只使她的演技熟练并且了解电影，但不会使她在外交、政治方面有什么大的锻炼，可是社会和人们对她的要求变了。人们再也不允许她表现不好，举止不得体，不允许她脆弱，在公众场合不高兴，使性子，吵架，哭泣，不管她本人愿不愿意或者实际上她是不是，在社会上公众印象中她成了一个“女强人”。

其实这是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像这样悲惨的故事在历史上在电影界不知有多少！

电影明星加上离婚，使我陷入舆论的重重包围之中。

刚刚出道的我还是一只雏鸡，毕竟过去我从没有当过明星。

时常在报纸上看到写我的文章气得个半死。在报刊杂志上的各种渲染已把我变成了另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对此我已早就举手投降，甘作败将。我无可奈何。为扮演《武则天》、《西太后》、《赛金花》去研究中国历史，才明白其实千秋功罪谁又能准确评说？别说我一个小小的演员，就是那些政治家，什么又是他们本来的面目？

我曾悲哀地无数次想：也许到死的一天，社会以及我的观众们都不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我的全副精力都纠缠在徒劳无益的辩解、生气之中。我就像一只小虫子，被困在一张巨网里面，挣扎、呼喊，只会使那张网越缠越紧。

人们并不关心虫子是否窒息，是否喘不过气来，只是津津

乐道地欣赏并参与加厚这层层增多的桎梏。

许多情况是，假如我不嚣张，不咄咄逼人，不霸道，不口出狂言，就不是刘晓庆，大家就不认可。于是乎在拍《武则天》时，特别能理解当武则天老年退位时上官婉儿问她百年之后碑文上写些什么？武则天摇摇头说："什么也不写，就让它无字吧！"

千秋功罪，本来就不能评说。

我终于奋起反抗了。我提笔写了我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我像一只血气方刚的梅花鹿，哪怕就是被人养在圈里你也无法抓到我，我会横冲直撞将自己弄得头破血流，再不就是在去目的地的路上活活气死。

我奋笔疾书。抱着扑灯蛾一般的牺牲精神，我不顾一切。我写出我所有的悲愤，我用我的全部身心蘸着我的血泪写下"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的悲号，我豁出去一吐为快，哪怕是写完这部书就去死也在所不惜。

很快，《我的路》发表了。除了在《文汇月刊》上一次刊完以外还在《文汇报》上有删节地连载。《文汇报》发行一百多万份，当时发行不到十万份的《文汇月刊》再版两次，因此一跃而上猛增到几十万份，仿佛全中国只要识字的人都在看这本书。同时，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先后用十四种版本在全世界发行。

我收到的读者(现在我有"读者"了)来信犹如下冰雹。鼓励、支持、赞赏的话语使我热血沸腾，燃烧得我不想吃饭、睡觉。

而同时，中国大报小报用醒目标题对我展开了全面批判。

我呕心沥血、掏心掏肺对大家说的话被用为批判我的题目:“这是一面什么镜子?”因为我曾在文章的结尾酸楚而真诚地问过大家:“你们从我这面镜子中得到什么?这是我的心及我的手,让我们成为朋友吧!”

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这样的画面:我百口难辩,无法表白心境,于是伸手到自己胸中,挖出那颗血淋淋跳动的心脏,没有任何遮拦,没有任何防备,我战战兢兢颤抖着双手捧着那颗红彤彤的心送到大家的面前,却被人随手接过,两手一松,轻而易举地让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那以后,我从出国名单上消失了。虽然我曾去美国和法国办过影展,但都是属于对方执意邀请并且每次都有人陪同。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外国。也就是说,官方没有把我派出去过。

我的心受到的伤害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我是内伤,这种重创很难平复。陡然间我仿佛长大了十岁。

藏起真挚与纯洁,用谎言和虚伪做先导。我再也不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了。

三把两把揪下自己身上要作乖孩子的遮羞布,我变成了一个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成熟妇人。

经过这次《我的路》炼狱的磨难,我由生铁变成了钢。面对公众及媒介,我不再轻信,不再约束,不再循规蹈矩从而也不再悲伤,不再哭泣了。

我开始不惧怕任何困难。我不再向人袒露胸怀也就受不到致命的伤害了。

我知道了我是一个电影明星并且开始懂得做电影明星。我为自己定下了新的法则: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每一分钟

都要用来挣名或是挣利。

同时，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虽然我没有得奖，但谁也否认不了我的辉煌。我作为中国一代影星的佼佼者自成一体，我已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王国。无论个别人口头上承认与否，我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已经奠定了。

我也已经挣脱了婚姻的枷锁。现在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十几年以后我碰到许多才华横溢的同代人，他们已成为中国的栋梁，他们都告诉我说是我的读者，是看《我的路》和我的电影长大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说是《我的路》的奋斗精神鼓舞了他们，激励了他们，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这些人目前已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乃至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大大小小各个企业、各个单位的核心领导者，就像日本一家杂志对我的介绍里说："刘晓庆虽然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她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路》体现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

6

身无分文真令我窘困



从小到大,一直有人夸我“孝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明星都孝顺?

我曾几次给我妹妹晓红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能相信自己的亲人。”

在我经历的无数风浪当中,一直没有背叛我的是我的全家。

他们并不在乎我在天上还是地上,也不在乎我年老或是

年轻，无论我胖瘦美丑有钱没钱当劳模进监狱他们都仍然是我的亲人。

他们组合成我的避风港、安乐窝，使我伤痕累累有一个地方可以包扎伤口，是我唯一可以卸下虚伪和谎言的沉重盔甲天然而没有任何掩饰能得到歇息的去处。

社会是这样的荒凉。电影是这样的无情、残酷。明星们大多都孝顺父母，我想也是出于与我相同的心境吧。

细细想来，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生，我特别怕孤独。

我无数次感激父母为我生了一个妹妹，不至于我一个人在世界上太寂寞，从而心里话有地方去诉说。

我爱我的全家甚过于爱自己。

比方说，我从来就报喜不报忧；比方说，我总是勒紧裤带打肿脸充胖子往家里寄钱；比方说，四川困难时期我在北京拍电影一有时间就买猪肉自己动手炼成油有人去成都就往家带；比方说，由于想念父母我两次参加春节晚会唱的都是四川民歌；比方说，除了那两次春节晚会外无论在天涯海角无论我在做什么除夕之夜我一定会在父母身边……比方说的事太多了。

到北京工作以后，我也设想了无数个“比方说”，可是我没有能力做到。我没有房子，没有钱，连养活自己都够呛。

其时在中国，已悄悄兴起了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行为：就是名演员到全国各地演出并得到金钱的报酬。

这种现象在后来的十年中迅速发展蔓延成了一个“运动”——我把它称之为运动。人们把这项运动叫做“走穴”。

“走穴”二字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也许“走穴”是“走学”的谐音——就是走着学习的意思吧?或者是为了挣钱成天巧立名目东躲西藏感觉不正大光明而称它是“走穴”?“穴”就是洞穴,“走穴”是不是意味着钻山洞钻空子?

算了,不去研究。总而言之,我自己是从不自觉到自觉到带动大家到成了“穴头”还得了外号叫“大猫”,最后惹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偷税风波,整个卷入了这场运动当中。

我从“走穴”才开始知道“钱”是怎么回事。

“走穴”也为我带来了我人生最艰难、最危险、最坎坷曲折、最麻烦的一段黑暗时期。

可以这么说,除了工资以外,我一生的第一笔钱就是“走穴”得来,只不过那时“走穴”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我们还是叫它“演出”而已。

那是我正在拍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写《我的路》的时候。

不光是我,整个中国文化界的艺术工作者都处在贫困之中。

由于没有房子住,我住在摄制组房间的地上,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吃饭我和演东太后的陈烨只有去撕演咸丰皇帝的香港演员梁家辉的饭票,他经常吃不完把饭票扔在马桶里冲掉。我们几个大陆的演员虽然是这两部大制作影片的主演可是没有一分钱的片酬。

在拍摄现场,我们大陆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每顿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块黑咸菜。而为香港工

作人员推来的餐车上大鱼大肉、香喷喷的白米饭应有尽有。两分钟前都还一起演戏，两分钟后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是四川人，吃不惯馒头，时常在拍摄现场饿得头发昏。

有一天，我实在饿得要命，一边拍摄，一边吵吵饿，李翰祥导演看吵得厉害，提前收工让大家吃饭。

我们又是馒头、粉肠和咸菜，我一看见就没有食欲。再看看香港工作人员的餐车，有好多好多的白米饭。于是我走了过去，向他们要饭吃。

管饭的是大陆这边的剧务，给了我一碗白米饭。我看见那边有许多炒得香喷喷的肉，我便找他要肉。我喜欢吃肉，可是他不给。说是给外宾的，外宾都不够了。

本来要饭要菜就已经丢尽了脸面，再遭到拒绝，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香港的照明师和摄影助理拚命为我说情，我更羞更气更恼，把饭碗一扔，跑到旁边大哭起来。大家都来哄我。

制片主任手忙脚乱问我要吃什么？我说要吃饭吃肉。制片主任说好好好别哭别哭我马上去买，我说我一个人吃不行，要大陆所有工作人员都吃。

结果当然是我一个人吃了肉、吃了饭，而大陆的同仁仍然是“老三样”——馒头、粉肠和咸菜。

为了加强营养，我用妈妈给我寄的粮票去换了两斤鸡蛋。当我充满食欲地煮好它们，把蛋壳敲碎剥开正要塞进嘴里，突然看见鸡蛋里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原来，我换的鸡蛋里已经没有蛋清和蛋黄了，全是一些已成形的小鸡！只好把它们全扔掉了。

那时正值北京盛夏，气候炎热。

我们成天在故宫拍摄，照明师傅们还要在灯下烤，好几位师傅都中暑了。于是他们要求在开水桶里放些茶叶，免得酷暑喝白水会呕吐。

可是他们要求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茶叶，因为茶叶没有地方出帐，制片主任没有办法。

照明师傅们火了，同制片主任吵了起来，双方越吵越凶，照明组说："如果再没有茶叶，我们就不干了！"制片主任正在火头上："不干就不干，请！"没想到照明组说话算话，在二十分钟内风卷残云，把所有的照明器材收拾个一干二净。

这一下拍不成戏了。大家全傻眼了。

台湾来的导演李翰祥急了，一边问"什么事？什么事？"一边召集大家开会。

于是在故宫的养心殿外，我们坐下开会。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茶叶问题由李翰祥掏钱解决。

令李导演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茶叶一天只要几块钱，而租故宫一天要几千块钱，为什么要为几块钱的事停拍而浪费几千块钱？

我告诉他说，李导演，这你就不明白了，茶叶是福利，哪怕几分钱也没有地方出帐，而租故宫是公款，一天几万块也可以报帐，这件事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弄不懂吧？

大家都知道，《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影片我是绝对主角。这两部影片在海内外曾轰动一时。直到今天，香港人也不相信我说的没有报酬。记得在组里有一位从香港来的演员，他在我们影片里扮一位很小的配角。有一天他问我："拍这部影片你拿多少钱？"我说："没钱。"他不相信，睁大眼

睛问我："你这么大的明星会不拿钱?"我说："是没有钱嘛。"他摇头叹息，也不知道是不相信还是可怜我。

每天我顶着几十斤重的头饰拍戏，手上鞋上缀满了珠宝，因为扮演的是慈禧太后，穿服装时左一件饰物右一片挂件琳琅满目。

我留着长长的指甲，手上戴满了戒指。戒指是从别处借来的道具，几乎每一个都不合我的手指，时常在拍戏之中掉下来。那时我的耳朵也没有扎耳朵眼，所有的耳环也只有夹在上面，夹紧了疼，夹松了容易掉，我经常掉戒指掉耳环，全组都爬在地上帮我找，找到了再继续开拍。于是下决心为了拍戏方便不麻烦大家一狠心去扎了耳朵眼，那是后来的事了。

这一天，别人给了我一袋鲜枣，我把它带到现场，在拍摄间隙我大饱口福。一边吃一边把枣核扔进一堆来信的信封里。

正吃得津津有味，那边制片喊拍戏了，于是匆匆忙忙站起身跑到镜头前。因为全是拍的脸部特写一直没有注意到手，直到收工卸装时才发现有一枚戒指丢了。

由于每天戴的戒指太多我甚至不记得丢的那只戒指的长相，只模糊记得好像是一只玉的戒指。化装室里炸了锅。

大家都吓坏了。据说那只戒指值五百块钱。

所有的人都去拍摄现场找，黑灯瞎火点着打火机照着手电筒爬在地上到处乱摸。弄了个通宵还是没有找着。理所当然，这枚戒指我要赔。

我头都大了。每个月五十元的工资，成天拚死拚活地干，还得自己掏饭钱，现在丢了戒指还要我赔五百元！我上哪儿去

找这五百元钱?

我绝不赔。再说我根本不可能赔得起。虽然想是这么想,可是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想起戒指看见戒指就会心里一沉。

这件事一直到外景拍完了准备回北京才弄了个水落石出。

回北京的前一天大家都忙着收拾东西。我想把那一大堆的信件给处理了,于是点了火到外面去烧。一封一封扔进火里,突然感到有一个信封疙疙瘩瘩的,凹凸不平。心想又是观众寄来的什么小玩意儿,肯定是不喜欢才没有拿出来。

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倒空了信封:原来是一堆枣核。只是在枣核中间一道绿光一闪,出现了我丢失的那枚戒指!一定是我那天吃枣扔枣核时由于信封窄手伸进去困难,于是戒指就掉进信封里了!

至此,这场戒指的风波才告平息。

那个时候,我尝尽了没有钱的窘困。我在国内国外电影交流认识了不少朋友,当他们到北京与我联系时我绝不可能请他们吃饭;假如他们请我吃饭我也不敢轻易答应,因为我没有钱坐出租汽车,但我由于有名大家会围观也不能坐公共汽车。

我看到过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的一张照片。那是在她自己的住所。在我眼中她的住所简直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豪华、气派。索菲亚·罗兰站在大厅正中,拿着一只酒杯……

我看到这张照片时犹如灰姑娘看到了公主,觉得那是我

们这辈子不可望也不可即也许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的生活！当时的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一切。

就像是我们平日所讲的一个故事：一个乞丐又冷又饿在寒风刺骨的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心里想着："要是我现在是皇帝就好了，我可以坐在温暖的炕头上，吃宫女们端来的热稀饭。"

可是我不是乞丐。我是中国的大明星。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是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大明星。可是我的情况跟乞丐也"大哥别说二哥，彼此都差不多"。

记得那时我特别想吃鸡。可是我买不起鸡吃。导演李翰祥的太太烧得一手好菜时常叫我和陈烨去吃，可是我们不敢。

他们是香港人，与他们接触多了会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不能为了吃鸡惹出政治上的麻烦。

尽管我贫困交加，但我仍然红得发紫。在我所到之处总是受到老百姓自发性地大规模欢迎，每天为了拍戏不得不动用许许多多的警察……同时，无数的应酬、活动在邀请我。

在这当中，有许多邀请是请我去参加演出。

除了拍戏所有的应酬活动我一律拒绝。演出也不例外。没有时间，没有心境，何况……也没有衣服穿。

每次参加活动还不够我累的，总是东拼西借，花上半天时间打扮，再不就费尽心思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配出花样来。等收拾得差不多了也就快累死了。而且每次都提心吊胆生怕"漏馅"，不仅自己狼狈，周围的陪同人士也替我出汗。难怪李秀明有一次对我说："我再也不想应酬，也不想出国了，太难堪了。"

演出也是一样。我也没有演出服。再说，我是电影演员，没什么可演的。不去不去不去。全部电话一概不接。

可是，全国各地邀请我演出的电话、电报仍然络绎不绝。

7

第一次“走穴”最后感觉像小偷



一天，摄制组所在的西苑宾馆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来请我去演出的，地点是河北邯郸。我生硬地告诉他们不去，态度十分恶劣。他们没有冒火。仿佛我的反应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他们说这台晚会请了当今中国的所有名演员，接到的任务是一定要我出场。我坚决、果断地频频摇头。

他们对视了一眼，然后其中一人突然说邯郸演出可以一

场给我报酬五十元。五十元!这可是一笔大数目。

“并且四天演二十五场。”那人继续说。二十五场,每场五十元!我脑子里虽然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心里已明白这是巨额财富。

最近文艺界正风闻有演出团私下拿报酬,每个演员每场二元,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二元已经太多,没想到现在给我的价钱是每场五十元。

五十元是不少,已经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可是我演什么呢?又没有衣服穿,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再说我正在拍戏,还是大主角,摄制组肯定不会放,就是我点头答应也白搭。

“不去。算了。”我又摇了摇头。然后站起身送客。那个时候,金钱的诱惑力对我来说还没有那么巨大。“我们明天再来。”他们两人走了。

我照样拍戏。照样烦躁。照样贫困。照样想吃鸡却没有鸡吃。照样打我的地铺。

他们第二天没有来。第三天来了。一见他们,我又摆出冷若冰霜的样子。前天的谈判我已忘了。心里最初的一丝悸动已荡然无存。任性的我什么事只能趁热打铁,几天之后黄花菜全凉了。

他们继续顽强地说服我。累断了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我仍旧摇头、摇头,头晃得像一只拨浪鼓。晃得我自己的头都晕了。他们没有停歇,快速而坚定地告诉我说当地可以给我每场一百五十元,只要我同意去。我停顿了两秒钟。

在重赏之下没有人能保持沉默。我立刻点头答应了。

然后我们坐下来讨论细节。怎么去?更重要的是钱怎么发。由于每个演员都是五十元,就我一个人一百五十元,保密

工作要严而又严。最后，唯一的问题是我的假期了。哪一天可以去演出？加上来回路途一共要六天的时间。我告诉他们听我的通知。

他们走后，我躺在床上假寐了一会儿。脑子里兴奋莫名，心跳得一塌糊涂。从没有做过这种事。

这算不算是不义之财？我该不该拿呢？

可是不管怎么说，钱也好，这件事本身也好，对我都充满了刺激性。我跳下床，去找副导演。

副导演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平时我们私交很深。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最后着重强调说是“有——钱——的”，让他务必帮忙把我的时间排开。我知道这让他十分为难，可是我非去不可。在我死乞白赖的纠缠下他终于勉强答应了。

火车向前开。轰隆！轰隆！与每一次坐火车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参加演出的演员们，挤在一个个的软卧包厢里，促膝谈天，兴高采烈。许多伟大的开端都是平凡而普通的。

十几年后的今天，想起那次的邯郸之行，总觉得其实那列火车是载着我们奔向阿里巴巴装满宝藏的山洞，在邯郸的演出中我们齐声唱出的是那打开宝库的咒语：“芝麻，开门吧！”

车厢里，王洁实、谢莉斯、姜昆、李文华、唐杰忠、苏小明、吕文科……全部当时最红、最火的名演员，都在一起。

与大家打了个招呼，彼此心照不宣，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平日在文艺界以骄傲、清高出名的我，此时在演员们的眼里也不过是凡夫俗子，也为五斗米折腰，心里真是羞愧难当。

一反往常张牙舞爪的个性，文文静静地找到我的铺位坐

下，半天才回过神来。对面坐着的是谢莉斯。

谢莉斯是我的老乡，也是四川人。她与王洁实的二重唱那时正红遍大江南北。

“我演什么?”我问她。

“……你报幕好了。”想了半天，她回答说。

反正是挣钱，又不是拍电影。我心里自己给自己说。

可是报幕已经有人了。出发之前已经告诉过我。“你唱歌吧。”谢莉斯热情地提出主张。

“有你们那么多的歌唱家我还唱歌?”我喊起来。谢莉斯赶紧安慰我:“不一样嘛。大家喜欢听你唱。”

到了邯郸，已是中午。下了火车直奔剧场，离开演时间已经不远了。演员们刷牙，洗脸，梳头，化装，一通忙乱。我还得四处寻找乐队负责人跟他商量在车上想好要唱的曲目。幸好我是音乐学院附中的高材生，此时全派上了用场。找来几张纸，腿踏在凳子上，一边哼一边写乐谱，写完后再抄写几张，五个人的乐队至少得三张。刚把乐谱发给乐队，观众已经进场了。

演员们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一个跟着一个上台。剧场里热闹非凡。那种阵势使我在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时干劲恐怕就是这样的冲天吧?

大家目的明确，知道为什么而干。

该我上场了。剧场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在邯郸连电影演员也看得到，观众们喜出望外。

我行了一个礼，开始唱歌。我的歌唱生涯也就从那时刻开始。此后我的歌唱水平日臻成熟，录了五盒歌唱磁带，其中

《刘晓庆的歌》还获得了太平洋影音公司颁发的“云雀奖”。

我的歌声有点像鸡脖子被踩着了，在过门时赶紧咳嗽几声，再唱时只看见钞票在乱飞。一百五十元！一首歌一共不到十五句，一句十元钱！钱太容易挣了。

唱完歌，我又行了个礼，拐脚拐爪地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下场。虽然觉得有些丢人但立刻原谅自己说我是电影演员不是歌唱家接着很快被已挣到一百五十元的兴奋所替代。

大家都喜气洋洋。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是为什么。因为感受是共同的。

一场，二场，三场……第一天就演了四场。没有人喊累。

第二天开始演五场，连续演三天。

我每天写新的乐谱，唱新的歌。我节目获得的掌声远远没有报我的名字时热烈，我直埋怨是歌选得不好。

一台演出全是唱歌，除了两对相声外，连我这个电影演员也唱歌。乐队拉手风琴的手都拉肿了，手背上起了一个大包。可是没有人打退堂鼓。更没有人临阵脱逃。大家还都要求加场。

我们几个在后半场演出的演员更是不一般。演完后立即小车接送回宾馆休息下一次快到我们上场时再来，免得换场时被观众围观，我们都像吃了兴奋剂。

很快，最后一天到来了。

从第一场起，大家都变得比往常严肃，不苟言笑。我们都在等着那重要的时刻。当然，就是那发钱的时刻。

下午，这个时刻开始了。前台仍然走马灯似地表演着节目，后台演员们轮流走进地下层的剧场办公室。

我是最后一个被单独叫到办公室的演员。我这个阿里巴巴还没有说“芝麻，开门吧！”那厚厚的一摞人民币就到了我的手中。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就是见也没有见到过。自那以后在生意场上不知有多少钱从我的手中流过，却从没有任何钱像当年那一摞钱一样令我觉得是——钱。

就像是叫化子捡了金子，不知道把钱放在何处，从毛衣的领子里放进去，走了还没有两步就漏出来掉在地上，心慌意乱地拾起来，拍打两下绑在我的裤腰中间。

我带着我的钱演完了最后一场。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腰部，深怕没演完我的宝贝就掉到台上。挺直腰板上场，挺直腰板下场，腰上鼓鼓囊囊的一团，还以为是我的衬衣在毛衣里面没有扎好。

当天晚上连夜赶回北京，已是凌晨四时。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我的朋友家，心跳得如同刚刚作过案的小偷。

朋友老伊平时总是出差，看我没有地方便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住，一有时间我就来此处休息。

打开房门，立刻把门锁好。快走到床前再返回去拉拉门闩，检查门是否确实关严。当确定门已经锁死后，从腰间摸出那牛皮纸信封往下一倒，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纸就洒了一地。全是几毛钱、几块钱的小票。先在心里算一遍，再拿纸笔来列算式算一遍。二十四场，一百五十元一场，我的妈呀，三千六百元！我简直倒不过气来。

我开始数它们。十元钱的放一堆，五元钱的放一堆，五角钱的放一堆，一元的，一角的，五分的各放一堆。三千六百元钱布满了小小房间的各个角落。先数了一遍，少了四十元钱，

再数一遍，又多了十元钱。再数一遍，又多出二十元钱，再数，再数，再数……怎么从来就没有对的时候？数人民币的双手已经脏黑，此时天已大亮了。蓬头垢面地下楼去给小蒋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立即到我这里来一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赶紧回到屋里把自己扔回床上。

一夜没有睡浑身筋骨酸痛。眺望窗外觉得是那样的心旷神怡。心中不停地策划着这笔“巨款”的用途：冰箱，床，衣服……暗暗下决心有机会还要去挣钱。只要挣到一万块就收手不干了。好像还是不那么正大光明，总是偷偷摸摸的。

一万块我把它存在银行里，每个月利息是多少？好像是十几块钱，那么，我可以每个月取出来用，听说有一种存款方式就是可以每个月取钱的，叫做——存本取息。对，是叫存本取息。这样，我每个月的工资就不是五十元，而是六十几元了。

不过，要是存五万元就好了，我的月收入就可以上百元。上百元太够了。花不完了。下决心挣它五万！

可是取利息存钱都不能我自己去，我太有名了，招眼。每个月都去取利息，这么有钱！还不被人暗杀、绑架了才怪。传出去那还得了？

让我妈妈去？不好，我妈在四川，到北京没有房子住。总不能每个月为了取利息来一趟北京吧？路费也受不了。

大表哥？他们太远，也不方便。何况他们太正统，我怕挨他们的批判……还是小蒋吧。

小蒋是我从小的战友，我们一起调到成都军区话剧团，后来又先后调到北京，她人可靠又够姐们。可是五万元得挣一阵呢。什么时候才能挣到呢？……

有人敲门，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

“谁?”沙哑着嗓子我充满警惕性地问。

“是我。”是小蒋来了。

我把小蒋拉进屋里，又不厌其烦地去锁上门，把我去演出得了报酬是多少钱请她帮我存钱连珠炮似地说了一遍。小蒋震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我把钱塞给她，她打开要数。我说别数了。数也数不清楚。我数了八九遍还没数好呢。还是让银行数好了。

“那银行问我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怎么办呢?”

“你就说别人送的。不，你就说是卖冰棍卖的。算了，你就胡编一个理由就是了。银行不能随便问你吧?”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情况，我不自信地说。

“好吧。”小蒋走了。

好像是十年过去了，小蒋回来了。告诉我说钱存进去了。银行数了半天还详细盘问钱的来源把她吓了个半死。作贼心虚她壮着胆子把银行吼了一顿，银行也就没再问了。

存进去的第二天我又派小蒋去把钱取了出来买一个冰箱。从此我拥有了自己的存折，自己的帐号，自己的冰箱。哇——有钱太好啦!

好景不长。我们的邯郸之行很快败露了。据说是文化部下了文件点名要我们交代演出的场次、地点和收入，要写检讨并且钱要没收。

北影剧团再三追问我总是避而不见。可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团长书记几次找我谈话。

每次我都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他，可这一切伎俩都逃不

过眼明心亮的剧团领导的眼睛。我被命令写检查并且写清楚演出的地点、场次和收入。

写检讨倒不要紧,等于写了一张收钱的发票,把脸揣在兜里在报纸上抄了一段对挣钱演出的批判文章(报纸正大肆展开对后来称之为“走穴”的挣钱演出的批判)交上去就过了关。只是这场次和收入不能说。说假话怕和剧团去邯郸调查的情况对不上。

说真话我的冰箱怎么办?总不成把冰箱搬来交给国家吧?那怎么舍得?

飞快给邯郸剧场的王经理打了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开一张介绍信来。他说怎么开?我说一天二场,一场二十元。他说好。于是他亲手写了介绍信,盖上公章(这一盖章使我们成了朋友直到现在)派人把它送到北京。

拿着介绍信我再到团里去哭穷,说我们怎么被人骗了,说好是每场五十元结果是二十元,真他妈的不像话。王经理忙活了半天还让我给骂了一通当了替罪羊。

一席话赢得了团领导的同情,领导看我挣的钱太少也就没有罚我的钱。连蒙带唬,算是过了这一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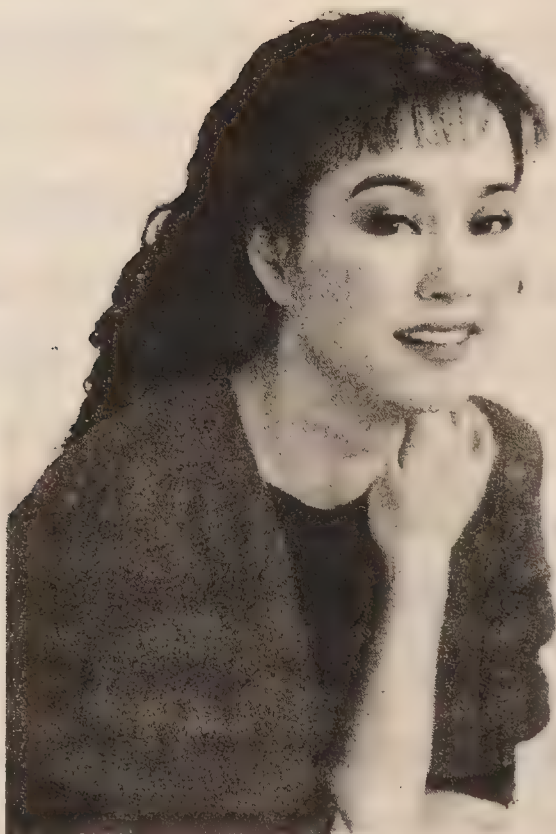
几天不在摄制组拍戏,我的突然失踪使摄制组的导演暴跳如雷。所有的过错都在副导演一人身上。李翰祥导演每每问起副导演我去了什么地方,副导演都像《红岩》里的革命志士成岗那样一言不发。再不就宁死不屈地说:“不知道。”弄得导演无可奈何,跺着脚大喊:“你要是不知道灯一灭我就死!”

洗漱完毕,整理停当,精神抖擞的我出现在拍摄现场。“西太后”终于回来了。

那天是拍故宫里的少女慈禧，就是玉兰看老石匠刻石雕的那一场。由于心情舒畅加上有歉疚心理，打扮成十六岁兰儿的我分外乖巧，拍起戏来千娇百媚，收放自如，每个镜头基本上都是一条就过，导演、制片急也急不得，恼也恼不得，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8

“走穴”太有劲干脆当“穴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走穴”这个名称开始出现，并且随着报纸连篇累牍持续不断地对它的批判而扩散开来。尝到了“走穴”的甜头，我开始变本加厉，为五万元而奋斗。我的“每一分钟都要用来不是挣名就是挣利”的新座右铭就是在那个时候正式提出来的。不光自己做还一有机会就给周围的演员们上课，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我说的不在理上。

我不仅自己要先富起来，还带动跟我“走穴”的演员们也

富起来。在那几年里，光是跟我一起演出，参加我的“穴队”成为万元户的演员不计其数。因为我的“穴队”是当时中国演出地点最广，场次最多，质量最好，票价最高从而影响也最大的代表。

每个跟我的演员都能赚到一大笔钱。我从来不亏待他们。经常仅仅是为了大家我不顾身体疲劳而加演。有时钱不够分我就拿出自己的酬劳平摊给大家。

我在长期而频繁的“走穴”演出中，挖掘出来了过去在军分区领导“乌兰牧骑”式样板宣传队的潜力，在台上吹、拉、弹、唱十八般武艺都能使出来，节目日见精湛。

我的人品、上座率、节目质量、演出态度得到了演员们乃至“走穴”界的一致公认，演员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大猫”。

“大猫”就是扑克牌里的大鬼小鬼的大鬼，也有叫大王八的，就是最大的王牌。北京人也叫“大猫小猫”，因为大鬼大王八都不好听，于是所有人都叫我“大猫”。演员们都以跟我“走穴”为荣。

我们实际上已是一个职业演出团，对专业水平的要求相当严格，我们的“穴队”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以培养新的万元户。但一切都以节目质量为准绳。如果哪位演员的节目水平不够高或是台风不正那么下一次“走穴”就自然不请他了。中途被我开回北京不受我们“穴队”欢迎的也大有人在。我们每次下去演出最初都是由于名声大后来则是由于节目好总是一再加场，每次外出“走穴”都是因为我要拍戏而不得不停止才告一段落。

我们有一次一天演了八场，清晨六点开演第一场，晚上半夜二点开演最后一场。演员们在后台一个个睡眼惺忪，可是

观众已神采奕奕地坐满了礼堂。

我总是告诫我的演员们要认真演好每一场，尤其是早场及晚场的观众更要认真对待。如果不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没有人会这么早和这么晚来看我们的演出，老百姓掏这些钱来买票是不容易的。

想想我们过去的穷日子，将心比心，我们没有理由对不起观众。如果疲劳就少演几场，既然要加演就要保质保量。

我给大家多次讲到过最早参加“走穴”的一个故事。那时我们在河北某小城市演出。

请我们演出的“穴头”没有经验，把我们的演出安排在三个不同的剧场，一天演三场，每个剧场一场。

本来演出三场倒没有什么，我们都愿意多演，出来一趟不容易，演得多挣钱也多，演员们的工作态度都好得要命。可是在时间安排上出了问题。

三场的时间分别是晚上的七点、七点一刻、七点半，就是说七点在一个剧场演，七点一刻在另一个剧场演，七点半在第三个剧场演。三场演出间隔都只有一刻钟，这本来是办不到的，但已经没有纠正的可能了，因为所有的演出票在我们到来之前已被抢购一空。于是我们开始跑场。实际上等于三个剧场同时开演却是一套人马。

我们紧张得不得了。每次在台上演出，后台都没有接我们的节目。

记得那次是我和张连文联合演出电影片断。我们俩在台上表演，后台空无一人。演员们全在别的两个剧场，我们只能顶住直到下一个演员的到来。

张连文看着后台口，我看着他的眼睛。只要他稍微点一下头，那就是后面节目的演员已经到达，我们就可以下场了，再赶去新的剧院。

我们在台上站了好久，事先准备好的节目早就演完了，无奈只有在台上编台词。台词也编完了，张连文还是没有冲我点头，我们只好给观众胡诌，讲日本电影《生死恋》的故事。

我们心里十分难受觉得对不起观众，同时大汗淋漓地企盼着救援。这件事以后十几年每当做恶梦时常做到，可见当时情况是多么紧急。

终于张连文点了一下头，忍不住回头一看，几位演员和乐队正冲进后台口，头发凌乱，领带歪在一边，气喘吁吁。我们赶紧谢幕走下场，刚一进侧幕就被人拖着拽着押上汽车，警车开道，红灯闪闪，冲向下一个演出地点。

这件事告一段落后张连文对我说："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实在太对不起观众。做人得凭良心。"我十分赞同他的说法。

这个故事给了我十分深刻的教训。直到现在我写这本书时那些观众企盼的眼睛仍然在我的眼前。

每当想起这些眼睛我就更努力地演出，我恨不得重新去那个城市，重新为那些观众再演出一次。

自那以后，每次以我自己带头演出的"穴"我总是出场两次，每次出场均不少于二十分钟。这些节目成了我后来在美国洛杉矶和旧金山开个人演唱会的精华。

就连那次创了中国最高记录的"走穴"，我们每天至少六场、七场，甚至八场，一共演了四十七天，我也坚持每场出场两次，等于一个演员每天演十二场、十四场、十六场，连续演了那

么长时间!

走马灯似地演出,演员们不可避免地疲惫不堪。我不许演员们在台上表现出困乏。尤其是乐队,处在舞台上的黑暗之中,时常忍不住悄悄打一个呵欠。

只要被我看见就罚十元钱,并且威胁他们说如果太累了就少演一场或是撤回北京,这是大家最怕的处罚。

演出一场紧接一场,演员们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无论是谁因为上厕所或是因为抽烟或是因为接电话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误了场,哪怕是晚上场一秒钟(在舞台上一秒钟显得比平时要长得多),我都要罚钱,罚来钱后去买瓜子、买水果慰劳大家。尽管又劳累,又艰苦,又被罚钱,大家仍然充满了愉快。

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我们干脆实行一个制度:在后台搭了好几张床,早、中、晚饭都送到后台,谁下台谁先吃,吃完了可以在床上休息,保存体力。演员们轮流值班,下场后叫醒隔一个节目上场的演员,依次类推。

这个制度实行起来十分有效,大家都得到了休息并且还误不了场。只是有一次我们差点出了大错:当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场演完我们收拾完东西正准备离开,突然在门口碰到许多观众进来,原来我们演昏了记错了场次,以为已经演完了,结果还有一场没有开演!大家赶紧偃旗息鼓,不敢出声地打道回后台,继续我们未完成的演出。

吸取了这次教训我们再不敢大意,每天将要演的场次倒着按顺序写好贴在墙上,演完一场撕掉一场,直到撕完为止,从此再没有错过。

回想起来,这种"走穴"在初期很像是解放前戏班子的"跑

码头”。

我们“走穴”除了辛苦、劳累以外，时常被“穴头”或是当地的组织者坑骗。

几乎每个演员都有过这样的教训。

我们经常被通知去一个地方，稀里糊涂地演了好多场，在回北京的火车上“穴头”才给我们一个信封，里面只有二十元钱。

还有的演员自己买火车票飞机票去“穴头”通知的演出场地，结果由于出票情况不好取消演出，“穴头”逃之夭夭，演员们只有自己再掏钱买票回北京。

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和陈烨以及《垂帘听政》的三位演员一起到一个单位演出，去之前说好除了我以外每个演员每场八十元。演出时人山人海，黑市票价直线上升，连续演了好几场。我们要赶回北京，“穴头”照例给我一个信封，让我发给大家。由于是当众给我，也不敢拆开看，我们只好都上了车。等车开动后把信封打开，差点没有气晕过去：信封里除了一封厚厚的感谢信外只有十元钱！连我们在车上的饭费都不够。

在那个年代许多“穴头”是很黑的。他们掌握了演员们大部分是悄悄来“走穴”，没有通过单位领导同意的心理，欺侮演员，敲诈他们的血汗钱。

许多演员担惊受怕，吃苦受累，到最后领钱时还得低三下四，看“穴头”的脸色，受“穴头”的侮辱。如果走漏了风声，回单位去写检查上交演出费还要罚款，这些都是常有的事。

所以，演员们挣的钱可以说完全是辛苦钱、血汗钱。他们又没有去偷、去抢，只是卖票演出。有观众要看，他们就演，买

票是观众自发的，是市场需求。

我们出去一天演八场也是因为有那么多观众要看，说明我们受观众的欢迎。假设我们骗他们、坑他们，那么最多凭知名度能演上一二场，后面的观众就会喊退票了！

演员实在是很可怜的。前边有“穴头”坑，后头有单位逼，好不容易挣了几十元，检讨书就写了一摞。

“穴头”往往是不演出的，他们只是联络，然后每场拿钱，经常拿得比我们最有名的演员还要多。

比方说，在每个演员两元钱一场的时候，“穴头”就可以拿到每场两百元，但演员们只要碰到某一个“穴头”说话算话最后拿得到钱不至于白跑一趟，这个“穴头”就算是好“穴头”了。

每当我们大汗淋漓，嗓音嘶哑，筋疲力尽地从台上下来，看到“穴头”坐在电扇前面风凉，喝着饮料的时候，心里就涌起了对“穴头”剥削我们劳动的愤恨。

我自己当“穴头”为演员谋福利的想法也就油然而生。

真正好的演出组织者、领导者应该产生于演员阶层。于是，我们自己开始培养，并且我自己也尝试着学习当“穴头”。

在当“穴头”期间，我经济公开，从来不误演员的钱，并且自己身先士卒，登台的时间比所有演员都多，以此严格要求大家，真正在实践中训练出来了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响当当的”基本“走穴”队伍。

我的“穴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跟着大猫，钞票摞得高；跟着老佛爷，天天在过节；跟着大锛头，吃得嘴流油。”

在山西某地，第一次我们演员自己当“穴头”就被骗了。

由于票价低，我们与剧场三七分成。就是说，演出收入剧场得百分之三十，我们得百分之七十。

演出时我们每次查票场场爆满。大伙儿都憋足了劲要在山西打个“开门红”。

那一次的伙食是我所见过和吃过的全世界最差的饭食：每天的菜里几乎一半都是苍蝇！

因为当地苍蝇实在太多，在炒菜时围着锅成群结队嗡嗡乱飞，当水一开油一滚再一揭锅盖一股热气冲上来，那些苍蝇一个个“英勇就义”被烫昏栽进了锅里。于是我们的菜就成了“苍蝇炒辣椒”或是“苍蝇烧茄子”。

尽管吃得不好睡得不足，我们仍然干劲冲天地一共演了十六场。到最后结帐时，剧场经理竟告诉我们票没有卖出去，没有钱给我们！并且算盘珠子打得山响：说我们吃了多少钱，住了多少钱，还拿出整整的几大本演出票（当然他可以印）来证明每天票都卖不出去，还回答我们说我们看见的满满的观众是他放进来的。他话还未说完我们当中的一位新“穴头”（他也是演员刚提拔上来的）当场就昏倒了。

我们与他大吵一场仍然不给钱。无奈，我及另外两个新“穴头”只有掏出自己的钱分给大家，尽管大家不要，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理想的“穴头”形象。

从那以后，我们再不与剧场分帐而是一律采取包场。不管你卖多卖少卖什么票价，哪怕是只卖了一张票，我们演出了你就得给钱。

我们牢记一条，在最后一场还未开演时去结帐，再不然就是不给钱不离开当地。我们时常威胁说不给钱就不开演最后一场。

其实他们并不怕我们的威胁，因为如果不演或是不准时开演，观众痛恨的还是我们。我们更多运用的是大队出发去下一个地方，而我留守不动，派另外一个“穴头”及几位能吵架的“鱼雷快艇”去要帐。

我们基本上都成功。再也没有上过大当。

在那个时候，挣钱被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钱并且深知钱的重要，就是不敢开诚布公地承认并且正大光明地去获取它。

我时常“教育”大家挣钱是一件好事。在现代社会，金钱和富有是一个人能力的证明。

我们不要躺在国家身上当包袱，要自己奋斗，用双手去获得财富，只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坑人、骗人，那么我们得到的钱就是天经地义的，是应该得到的。

我的收入越来越多了。突破了当初为自己定的五万元大关。

我确实像我原先计划的那样在银行里存本取息，并且每个月想办法去取出利息来支付我的日常费用。

工资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重要了。我也没有时间去领。我委托给剧团的一位姐们代劳，然后我三个月或是五个月最长的一次是一年，才到她那里去拿一次。更多的时候是有机会她给我带来。

一次我半夜回家，正在数钱母亲就醒了。这时父母已与我一起住。看到一桌子的钞票母亲的瞌睡一下子吓到了九霄云外，她以为我抢了银行。有生以来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钞票。钞票是不少，不过都是一角、一元的小票，因为是票房

拿来的现金。

母亲的表情使我想起还在成都军区话剧团的时候。有一次全团装订剧本，我负责数剧本的页数，数了一下午头昏脑胀手指甲都快翻了，于是一边数一边开玩笑地说："唉！要是数钞票也数得这么累就好了。"当然话一说完全体一起干笑一场，没有任何人当回事。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那只是天方夜谭。

时至今日我果然数钞票数得比当年数剧本还要累，一边数钱一边想起这句话，不由得从心底笑出好几声。

记得一次"走穴"我们赶场，头天在山西演完第二天晚场在陕西，于是大客车连夜载着我们转战两省。

还有一次要横跨更远的地方，新的地方票已卖出我们怎么也赶不到，急中生智竟包了一架飞机，当乘务员上飞机时大家都不约而同捂住自己的皮箱生怕检查，因为里面都装满了钱。为了赶场，演员在小汽车上化装一到剧场就冲上台唱也是常有的事。

最玄的一次演出是在大连，我先演出了两天就赶回北京办事，然后第三天再回来接着演出。我们仍然是每天四场、五场连续轰炸。当我第三天坐上飞机时大连的那场演出已经开锣，好在飞机是准点起飞而空中飞行只有一个小时，为了赶时间我只有在飞机上化装，在卫生间换好演出服，飞机一停稳我拖着大裙子跳上停在舷梯下接我的警车，警笛一路呼啸着直接开到剧场的后台！

我们的"走穴"在所到之处都成为当地的大事件。我相信看过我们演出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并成为他(她)一生记忆当中重要的一环。

有个城市的市长对我说："你这次来演出的轰动程度在

我们市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你，一次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当年来演出。”

这种话我们听到过不止一次。我们当然还去过许多梅兰芳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的轰动效应从几个故事可见一斑：

经常发生的事是剧场外人山人海，我根本进不了剧场。一次我进不去演出不了，只有找到公安局，穿着警察服混在一队男警察里面，进到老百姓家，打开他家连接剧场的天窗，从窗户里跳到剧场后台的男厕所，然后由男厕所出来再走到台上。

还有一次，演出完了，人群围在剧场外面，等到深夜一两点钟也没有散开的迹象，我只有搭上梯子从剧场的高墙翻上去，再把梯子甩到墙外从上面爬下来，才得以逃之夭夭。

我们还时常施行真假“刘晓庆”掉包计：一位女演员打扮成我，从大门进出，招摇过市，吸引观众，而我穿着男装，乔装打扮从小门进场。一次被观众信以为真，人群一层一层拥上来差点把那位女演员踩死。

还有一次在湖北演出，到了火车站前刚下汽车，观众就拿着笔记本铺天盖地而来，黑夜中抢走我的帽子撕破我的衣服，乐队一帮人挥舞着乐器一通乱砍毫不起作用，我被挤在软卧候车室门外，候车室小姐见了这情景不敢开门，于是我已经无路可逃。又急又怕又惊又恐，再加上长期劳累，当小姐终于看清是我，紧急之中放我们进去，而一扑进门口我就昏倒在候车室的地上。

我经常对我培养出来的新“穴头”说：“我只要活着回北京，不要钱都可以。不能为这几个钱把小命丢了吧！”

“走穴”由于是新事物不被大家理解，误会时有发生。

“走穴”运动刚开始不久，我去湖南长沙演出。地点是在长沙体育馆，许多名演员都参加。

北影剧团去了不少人，谢芳、葛存壮等都去了，还加上了我这个生力军。当时这么大规模的演出在长沙还是第一次，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演出一共三天，我只能演两天。由于有许多资深前辈及名演员参加，我悠哉游哉倒没有什么压力。

我演出的是“日本舞”。我的节目是倒数第二个，每场演出一个舞蹈然后就走，也没有什么不妥的现象发生。

在我离开长沙的前一天，“穴头”让我在台上讲几句我第二天要离开长沙表示对不住观众的话，我请报幕员替我说了。

报幕之后我开始跳日本舞，日本舞名字是“樱花”，时间长达五分钟。

演完了我走下台，照例身后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因为是第二天一大早的飞机，于是我立即回宾馆收拾东西。

我卸了装，东西收拾了一半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是舞台总监来接我。他说自我走后观众们就一直不停地鼓掌要我再来一个，报幕员上去几次要解释人们根本不听。最后一个节目根本上不去，于是来接我要我无论如何上台与观众再见一面不然今晚要出事。

我披头散发脸色苍白二话没说跟着他到了体育馆，体育馆里尖叫声、口号声、掌声响成一片。

我赶紧走到台上，观众发出吼声，我开口说话，观众又开始起哄。重复几次都被大家哄了回来，愤怒的观众不听我的解释。无奈何我请来乐队，因为没有准备只唱一个简单的“康定情歌”。当我不顾一切刚张嘴唱，震耳欲聋的吼声再起。我

只有硬着头皮在吼声中继续唱下去。

在舞台的强烈灯光下看到有无数的冰雹向我飞来，它们打在我头上、身上，掉到地上才看清原来是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硬币越飞越多，越飞越有力，打在我身上越来越疼，混乱中我听见有人在喊："你不是要钱吗?给你!臭不要脸的!"

我含着泪水，在"钱雨"中终于摇摇欲坠地唱完了最后一句，然后一溜烟跑回休息室。

那天晚上，体育馆人群不散直到清晨四点钟。

我被围困在里面，实在怕飞机要飞了才借了葛存壮的帽子、眼镜，鱼目混珠冲出"重围"。在我走后，这件事成了长沙的一大"丑闻"。据说在台上扫起来的"钢镚"有五百元之多!

其实恰恰那一次我不是"走穴"，是北影剧团给我下达的演出任务，可是我已百口难辩，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十年以后，当我又去湖南长沙"走穴"时，宽厚的人们已忘记了我的过去。人们对钱的观念，尤其是对演员挣钱的看法已和十年前大不相同。

在去演出之前我一直在拍摄台湾电视剧《风华绝代》，由于是长达四十集，由于我是绝对主角，由于我为了角色减肥不吃饭，由于我还给上海《新民晚报》写专栏，由于每天还要讨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剧本，我的身体抵抗力大大减低。

出发前我已患了感冒，我并没有太在意。凭我的经验，只要自己小心不用管它，过一个星期自然会好。可是下去以后一直没有好。这次演出行程也长，先是去小地方，最后一站是省会长沙。

为了怕嗓子哑我开始吃药，结果毫无作用。感冒越来越

严重，我开始打青霉素，打了几天把嗓子打好了，但感冒的症状一点也没有减轻，成天我蔫蔫的打不起精神。

这一天，台上已经开演，磨蹭了半天快到我的节目只好懒懒地挣扎起来化装。头昏昏地在演出包里摸我的眉笔，结果摸到了刀片上。削眉笔的刀片不知为何没有放好。

中指还是食指？我已经忘了，总之它冒出血来，没有药更没有医生也没有卫生棉球，那天连卫生纸也没有，于是我撕下后台窗户上的报纸往伤口上一按，仍然继续我的工作。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也忘了。我全身骨头都疼，并且周身发冷。

我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天都要行车。挣扎着到了目的地找出体温表一量，39.8℃。找了医生来看，打了一针退烧，又上台接着演出，救场如救火，票已全部售出我不能不演。

一天一天下去我的病越来越严重，每天 39.8℃、39.9℃持续高烧不退，我被烧得奄奄一息。

在后台迷迷糊糊地躺在沙发上，浑身如同放在熊熊烈火上的大锅里煎烤，昏昏沉沉中仿佛自己在要求别人拿枪对准我的胸口开一枪，并且现在还记得当时一再强调说在左胸，要对准，不要打歪了。

浑身滚烫的我来到了湖南长沙。第一天就演了两场，怎么上去的怎么下来的我全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由于高烧我吃不下饭，怕演出不动于是队里找来医生为我打点滴补充些营养，医生建议我到医院去打，条件比较好。

没想到进医院不久医生就告诉我不能再出院了，说我的病不是感冒要彻底检查。几天以来由于太难受，我也怀疑过

是否有其他的病，肝炎肾炎甚至爱滋病，我全都想过。记得当时最不能忍受的是在未查明病因前，只能在身上抹酒精退烧，我永不会忘记，当冰凉的酒精擦在滚烫的身体上，我总是立即跳起来不由得大喊出声时那种犹如在中美合作所受酷刑的感觉。

第二天医生告诉我得的是败血症，还有病毒性心肌炎。这个病好像听说过，想了一下我问，是不是白求恩那种病？医生回答说是。想起白求恩死于败血症，我马上问我会不会死？医生说有我们在你就不会死。紧接着我问会不会有后遗症？我还说如果有后遗症就请不要救我了，只要活着就要健康。我就是现在死也没有什么遗憾。

医生说只要你配合治疗就不会有后遗症。

我去过世界上一些地方，不幸也去过不少医院。可是真的，没有一家医院比得上为我治疗败血症的湖南长沙医学院。也没有哪一位医生比得上为我治病的欧阳颙教授、杨家芬教授、谢建萍大夫、汪玲大夫，还有那些每晚轮流看护我的可爱的小护士们。对中国医学的信任以及坚信“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生”的看法，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紧接着我们展开了当晚是否演出的争论。医生坚决不同意我去演出，而我执意不肯。

十年前长沙体育馆“扔钢镚”事件仍历历在目，这次演出又是我一个人挂名，如果不上场岂不是“钢镚”会扔到我的病床上？那我该会臭遍长沙了。

我知道有一次程琳随东方歌舞团去四川演出，同去的有许多名演员不是她一个人带团，结果开演之前程琳病了，不能上台，可是观众不干一直起哄。东方歌舞团怎么解释也没有

用，最后无可奈何只有把她放到担架上从医院抬到台上，程琳在担架上哭了起来，拿着话筒被医务人员扶着唱了一首歌才算了事。

不演出？借给我五个胆子也不敢。我和医生争来吵去，直到最后医生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今晚去演出你再也不会有一颗好心脏！"于是我终于鸦雀无声了。

可是不上台今天晚上的演出怎么办呢？我问。"穴队"队长说全体演员都表示了愿意义务演出，演出后观众仍然可以在售票口退票还钱。

我点点头说事已至此只好这样了。谢谢你们。多谢了。谢谢大家。

那天晚上，全队的人紧张万分。

剧场经理作好了一切准备，请来了众多的警察，怕观众砸椅子砸玻璃什么的。座无虚席的大厅在台上人员的眼里看来像爆发前的火山。

开演了。带队的队长走到台前，把我生病的情况讲了一遍，并且再三致歉。另外告诉观众全队的人免费演出一场，看完演出后演出票仍然可以在售票口退钱云云。观众席出现了一片嗡嗡的声音。

队长话音刚落，不管三七二十一乐队开始奏乐。也不管大家看不看还是哄不哄，演我们的。结果怎么着？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观众们静静地从头看到尾有秩序地退了场。而且，没有一个人去退票。

我生病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沙。每天来看望我的人络绎不绝。没有任何人对我产生误解。我心里感动万分。世道变

了。天地变了。真是换了人间。我也一天天好了起来。由于身体恢复每天与医生护士谈笑风生。

在我出院的时候，病房外围满了人群。人群自动散开，我在医生的搀扶下缓缓走着。我向大家点头示意，人们默送我。没有“钢镚”、没有谩骂、没有我担心的“活该！谁让你赚钱？”的话语，也没有人冲上来与我合影或是找我签名，只有友谊与同情。

也许是突然发觉这个世界假如没有我还是少了一些热闹吧，我心里有一股东西在翻滚，汹涌，上升，它弥漫了我的眼睛……

“走穴”，到现在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

我断断续续地参加“走穴”也有十年了。

“走穴”为我们——文艺界的一批演员们带来了财富。

过去没有钱我们一直佝偻着活着，现在有了钱我们开始舒展了筋骨。看着一大堆钱我甚至在想：“我怎么用得完它们呢？”

9 属于我的爱人 我需要一个真正



离婚以后，我一直没有过自己的爱人。

尽管追求我的男人更加成群结队：高干子弟、海外富豪、中国文艺界乃至社会各界的佼佼者，还有许许多多的男性观众……

当时的我，年轻、美貌，随着《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影片的拍摄和放映，我声名鹊起，成了海外唯一认识的大陆女演员。这两部影片在香港放映时，影院门口排起长队。台

湾观众专门坐飞机到美国、到香港、到日本去看这两部电影，因为当局不允许在台湾放映这两部在大陆拍摄由大陆演员主演的影片。

在日本，《火》、《垂》二片被剪为一集，取名为《西太后》，更是轰动了日本的大街小巷。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妇女，一遍又一遍地排队观看，我扮演的西太后形象一时布满了世界的许多角落。

我一下子变得更加热闹非凡。

有人带信给我，他的在美国的朋友请他联络，只要能与我见一面可以出一百万美元；

美国、法国的大学给我奖学金，请我去美国、法国读书；

有朋友鼓励我去海外定居；

有人提出条件，只要我能名义上是他的女朋友，每个月陪他吃几次饭，一年给我一千万港元；

我的朋友劝我时常去海外走走，只要随便走动一下富豪们会纷纷送钱给我，出去一次收几十万美金是闭着眼睛的事；

我总是收到从国外寄来的礼物：衣服、化妆品、首饰之类……

香港有报纸开玩笑说："看来刘晓庆不能随便开口说话，只要一说话就会收到她要的东西……"这是指有一次香港记者去北京访问我，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还好。只是很苦恼不能上街，有人围观。在屋里呆着没有电视，很寂寞。这篇讲话被登在报纸上。过不了多久，一台二十英寸的电视机就从香港寄到了北京。后来又有一次香港记者访问我，问我平时打不打麻将？我说正在学，兴趣很浓。几天后，收发室通知我去取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副精致的麻将牌……

对这一切我全部都是一笑了之。东西收到也不言谢，打开用就是了。我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钱和礼物不能解决的。

全国的报纸都在对《我的路》进行批判，我仍然在受到误解和攻击，除了生活作风问题外又成了“个人奋斗”的典型。

最苦恼的是，我没有房子住，成天东晃西逛我已经烦透了。总不能再说一句话登在报纸上，从香港给我寄栋房子来吧？钱也买不到房子。那时候没听说过房子还可以买。

北影厂曾给我分过房子。本来由于我对电影事业的贡献，要分给我一套房子，可全厂的人都提意见，说我就一个人，一个户口，厂里许多职工几代同堂……于是给我分了一间旧的屋子，和另一家人合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理由是这样好有人“看着我”，防止我干坏事。

就这间可以“看着我”使我“改邪归正”的房子，由于我去出外景没有及时搬进去，回来时就已经被人撬开锁住进去了。住我房子的那家人我至今没有与他们见过面，只听说是三代同堂的北影老工人。本来厂里说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我一想起自己没有房子流离失所的苦衷就说算了吧。一个人毕竟好办，人家一家几口不能到外面去喝西北风。

讨论来讨论去，厂里决定把一套一直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房子借给我住几个月。厂领导一再向我强调说只是“借”。我说：“哎。”“先暂时住几个月，等你结了婚再说。”厂领导接着安慰我。“行，结了婚再说。”我答应着。

结了婚再说？什么时候结婚？到哪里去结婚？跟谁结婚呢？

在离婚前，原以为反正追求我的人排成队，离了婚想结婚随便挑一个就是，谁知道等离了婚打起灯笼一看，才不是那么

回事。

首先，整个社会离婚率太低。离婚率低得根本谈不到选择。在那个时候，像我这样敢于离婚的简直凤毛麟角。没有结过婚的男人都是些愣头青。想要有男朋友只有在结了婚的男人中间找。

开始时我并不在乎，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不管对方结婚没结婚总之我们公平竞争。反正我不喜欢婚姻，也不想再结婚了。既然不想结婚我也不要对方离婚，在一起开心就很好。

报纸上又在开展批判家庭里第三者插足，报纸总是这么忙碌，不停地批判这批判那。赶快检查一遍自己，觉得严格说来还不算是第三者，我又不想要别人的老公。

日子一长，问题来了。我总得偷偷摸摸，在人面前要假装正派，纯洁，就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很累。另外，一到过年过节或是生病什么的重要日子，对方一定不在你的身边，而是与他的老婆孩子在一起，这根本违背了我的凡事光明磊落、我行我素的个性。我心里开始不平衡。

于是向对方提出要他们离婚的问题。

你猜怎么着?别看他们爱我爱得好像如醉如痴，含在嘴里怕化了，握在掌心里怕飞了，为了我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哪怕是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可他们就是不敢为我离婚。

没有人为我去离婚。尽管我如花似玉、柔情万种，尽管我聪慧、善解人意、年轻美貌并且有名。没有用。离婚太复杂了。他们害怕并且也会在这相当于死一条命的离婚大战中间失去声誉，失去前途，失去一切，然后再失去我。

其实我并不想结婚。我只是要他们离婚。我要一个正大光明的恋爱，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男人。

可是我没有要到。我简直想不到我——会要不到。

男人是这样的脆弱，社会是那样的强大，一切就像是一张巨大而坚实的网，我们都被困在网中间。在那个时候我拍的电影《潜网》，正是我当时心情和经历的写照。只不过我身边没有一个像影片中的那位理想的男主人公出现而已。

我狠狠地受到了打击。从来自由自在、落拓不羁、独往独来的我，开始羡慕起了平常人家男耕女织的生活。我最羡慕像我妹妹那样的家庭，妹夫挣钱，妹妹管钱，所有的钱都在我妹妹手里攥着。需要的时候发给妹夫用，妹妹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妹夫则"气管炎"式的俯首贴耳。

我开始觉得其实女人最大的幸福是当丈夫回家的时候，给他打好洗脸水，打好洗脚水，端上来一桌热腾腾的饭菜，然后坐在桌边静静地看着他吃。这个情景在我演的电影《芙蓉镇》里的一场戏中实现了。

我逐渐怕过节日。我不敢去别人家，受不了朋友夫妻间哪怕是一闪即逝会意的眼神，我受不了朋友两口子打情骂俏的动作，哪怕是他们吵架也令我羡慕：至少有一个自己的人可以吵。最怕的是去朋友的卧室，简直不能看那双人床上并排放在一起的一对枕头……

我的内心非常寂寞。岂止是寂寞？还空虚。还无聊。尽管我有男朋友，但他不是我的。虽然我在等他离婚，可是我已经明白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我对他的虚伪及懦弱开始厌恶。

这时，我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彦经过耐心而

艰苦的请求，终于把我这个电影界称之为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宝贝请到了他所领导的故事片《心灵深处》摄制组。

《心灵深处》这部影片描写一个女志愿军战士在战后担负起哺养战友遗孤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我演那位女志愿军欧阳兰。是影片的第一号女主角。还有两位男演员和我搭档。

到长春的第二天，例行公事与导演及组里的主要创作人员见面。常彦一个个把他们介绍给我，我也一一认识他们。

其中，导演介绍了一位男演员，说他叫陈国军，在影片里扮演我的第二个男朋友张森。“哦。”我答应着，伸出手去。他握了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将来你肯定知道我是对你最好的人！”这句话有些奇怪。我顺便看了看他。很平凡，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我万万不可能想到，就是这个人，会掀起我们之间的惊涛骇浪！

拍摄工作正常进行着。长影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了我。我与组里的同志们相处得都好。就是遇到一些小小困难我自己全能克服。

比方说，伙食不好。我会自己想办法在走廊里偷几棵食堂贮存在那里的大白菜，关上房门点上电炉给自己熬汤吃。

总是拍我和两个小孩的戏，或是拍欧阳兰与第一个男朋友的戏。听说扮演张森的陈国军为了拍好这部戏减肥，每天坚持跑步二十五里。二十五里！太玩命了，我的脑袋匆匆一想。

终于拍到我与陈国军的对手戏。陈国军告诉我他有些紧张。“没关系。”我和蔼可亲地说。我坚信我的笑容能消除我

们之间的生疏。我有这个本事和特长。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天都是欧阳兰和张森的戏，我发现他演得很好，眉宇之间有一股强烈的气质。他很能吃苦，可以说非常能吃苦，甚至到了自虐的程度。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可是他遇到了障碍。这一天拍两个小孩见到张森的戏。剧情规定是孩子们见到了张森，在此之前欧阳兰一直拒绝张森的爱情，可是孩子泄露了秘密，他们叫着“爸爸”一路扑喊过去。此时需要一个张森满含着泪水的特写。可是这个特写就是拍不成功。张森没有泪水，演员要求点眼药水，导演不同意。于是大家一起等着。眼看着金色的夕阳一点点落山，张森还是没有哭。导演一声令下：“撤！”全组打道回府。

在车上我注视着陈国军的侧面。我相信他心里负担一定非常沉重。作为演员此时有了一种深切的同命相怜的感觉。想起我在拍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的时候，幸好我的角色甜女没有哭的镜头。

可是演我姐姐阿螺的陈祖荣有好些哭的镜头。根据当时电影界的习惯，能不能哭是判别演员好坏的重要标准。哭得出来就是好演员，哭不出来就是坏演员，每个演员一旦第二天要拍哭的镜头，无一不是紧张万分。

陈祖荣从早晨化装起就开始想她的伤心事，眼泪不停地湿润了眼眶，化装师赶紧劝她：“别哭了，一会儿到现场哭不出来了。”她点点头可还是控制不了自己。

到了现场先拍我们打打闹闹的戏，她不敢说也不敢动，一直坐在旁边保持悲哀。好不容易拍她了，先拍不哭的镜头，她已经泪光闪闪，终于该拍她哭的特写了，灯光也打好了，位置

也走好了，机器的焦距也调好了，导演说："预备——"大家都静静地等着。

可是此时，陈祖荣的眼泪全部不翼而飞了。导演说："开始——停！"然后我们都上前去看她的眼睛，一星泪水也没有。于是又重来。如此这般反复几次，什么情绪也没有了，最后只有点上眼药水，在灯光师的一声轻蔑而恼怒的"关灯！"声中结束了当日的拍摄。事后这事被大家踩乎了好几天。

类似这样的情景我也亲身经历过。刚拍第二部影片《同志，感谢你》时，作为新演员的我演技还不成熟，根本就不会哭。从看到分镜头剧本那天起，一直在为我需要哭的镜头发愁。曾私下里练习过许多次都不行。集中精力想伤心事也不管用。也悄悄试过用清凉油、甘油抹眼睛，不好。虽然泪如泉涌可是双眼红红地睁不开无法表情，摄制组的人看得出来，一旦发现了这是作弊，更丢人。还没想出万全之策拍哭的镜头已经临近，急得夜不能寐。

拍哭的那一天来到了。我一起床就没敢说话。回忆各种各样的悲惨遭遇，心想假如此时流眼泪让人看见到现场哭不出来自己也有个退路，至少可以说我没有控制好提前把眼泪流干了。可就是没有眼泪出来。

拍别的镜头时杂念多极了，脑子里除了眼泪还是眼泪，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戏上。开拍前曾假装开玩笑似地问过导演："我哭不出来就点眼药水吧？"导演说："那哪行啊！"我不敢再吱声，心里负担更加重了。

哭的镜头开始拍了。打光、走位置、打板，周围一通忙碌，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嗡嗡乱响，只听见心脏的跳动在加速、加

重，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仿佛要从嘴里跃出来。这时候导演一声"开拍"！我的思考突然停止了。全是一片空白。我努力作出哭的表情，发出哭的声音，可是没有眼泪，连湿润也没有。"停！重来！"导演指挥道。全场鸦雀无声。我只听到我的心跳。"不要着急啊，慢慢来，慢慢来……"导演突然和风细雨地安慰我。他越安慰我越着急。"预备——"我又开始预备，心里拚命使劲，脚趾头都抓紧了。我试图想一件伤心事，可是没有。它们突然无影无踪。"开——始——"导演轻轻地、慢慢地喊。大家都屏住气。导演用低沉的声音开始给我讲那我已经知道了千百遍的本片的剧情，并且声情并茂地朗诵我这个人物此时的内心独白："妹妹！你不能这样！你怎么能轻视清洁工这个工作呢？这是一个崇高的工作！想想我们的父辈，想想革命先烈……"导演泣不成声了。听着导演的解说，我把拍戏的事全忘了。等到导演一哭，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在拍戏，而且是在拍哭的戏，赶紧开始作哭状，重新拉紧全身的肌肉，可是已经晚了。导演已经声泪俱下地喊了"停——"

在现场的效果就是我这个演员实在是太笨了，真不中用。导演都哭了她都没有哭。事实也是如此。

在摄影机停止转动以后我和导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演泪流满面，还不断地抽泣，擤鼻涕，而我站在那里无动于衷，眼睛里干巴巴的，连一丝丝哭的意思都没有。

由于有过这样切身的体会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很可怜，其实会不会哭绝不是判别一个演员好坏的唯一标准。可以说根本不是标准。难道说演员拍上墙就得真上墙，拍死就得真死

吗?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只要银幕上出来效果逼真就行了。

可是尽管我这样想,还是帮不了陈国军的忙,导演一定要他自己哭出来。于是我们每天去现场,每天架好灯等他,每天没有哭,我们再灰溜溜地回来。为了一个镜头的眼泪,我们连续去了现场四天。

我去找他,把我的体会讲给他听,并且大谈特谈我对哭的镜头的看法。在这个时候我对他没有歧视使他深受感动,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陈国军的苦难历程最终还是以在眼睛里点了眼药水而告结束。虽然在影片放映时没有任何观众看出眼泪和药水的区别,但是这个镜头的拍摄仍然成了陈国军的“耻辱柱”。全组都觉得他很糟糕,手艺很臭,时常把我拿出来和他对比。因为这时我已会哭了,并且知道能不能哭对我在长影的声望很重要,于是认认真真地表演了几次,凡是需要我哭的镜头均把大家震得心服口服。

其实他演得不错。那个哭的镜头说明不了什么,舆论不大公平。

我们一起出外景,天天在一起。我发现他看过许多书,并且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可是长影并不把他当回事。和所有电影厂一样,长影也存在着严重的远香近臭心理。

“外来和尚会念经”,搁置身边众多素质优良、富有卓越才华的长影演员在一旁,千里迢迢、费尽心思把我请了来。这种现象在当时电影界是很普遍的。

在这一点上,常彦导演是特别的。当时在厂里只有我们摄制组长影演员担任了好几个重要角色。张森就是一例。

物伤其类，“今后绝不能作电影演员一辈子”，“电影演员只是一种生涯，不能算是一项事业”等诸多想法和决定在脑海里从那时候开始逐渐成型。

我了解到陈国军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妻子也是长影演员，我看过她主演的影片，印象中非常漂亮动人。他的孩子是一个儿子，听说是两家父母的心肝宝贝。他当然知道我已离了婚，目前好像还没有什么公开的男朋友。他告诉我他在与妻子结婚以前曾和一位女明星热恋，后来女明星跟了别人，于是他与妻子闪电般结了婚。结婚后由于大家都在拍戏常常分开，一年里聚少离多，现在他的妻子又出外景好几个月了。

我表示叹息。我告诉他自己也很孤独。我们俩一个孤男，一个怨女，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一拍即合，稀里糊涂地不知怎么就好上了。当然，这在摄制组是司空见惯的事。

几乎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摄制组。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又出于必然。摄制组都是自由组合，见面之前大家彼此已有好感更多的是已经互相倾慕，走到一起天天耳濡目染，尤其是演夫妻演情人又有剧情要求及表演的真实推波助澜，再加上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不能回家，可不是得有许多故事发生？

和陈国军的故事开始以后，我并没有当回事。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前途，电影拍完故事也就结束，也许电影还没有拍完故事就结束了。再说他是有妇之夫，又是长春户口。没门没门没门。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热情交往。我们的情绪随着剧情互相感染，日渐高涨。不久，全组都知道了我们的秘密。

我们都不太在乎，尽管心里很不舒服，只要没有让人当场抓住，我们就掩耳盗铃地只当没事，照样厚脸皮地该干什么干什么。

那时我们在丹东出外景。

这天晚上，丹东市电影公司请我们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吃饭。地点在丹东市中心的一家饭店二楼，那是一顿我一生也不会忘记的晚饭。

桌上的饭菜丰盛之极。全部是海鲜。活鱼、活虾还有蛤蜊，吃得我们一个个脑满肠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不觉之中已到天黑。酒足饭饱起身告辞，无意中向窗外一看，大家不由得目瞪口呆：原来在吃饭之时我们来到的消息已悄悄走漏了出去，一传十十传百楼下已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看不到边的人群！

没有保卫，没有警察，无奈何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往外走，一群人呼拉一下子拥上来，情形突然变得有些恐怖。

人群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把我挤在中间。他们筑成人为的铜墙铁壁，我们全体人员使出吃奶的力气左冲右撞根本甭想突出重围。我只听见周围在喊我的名字，同时无数双手向我抓来……

出于本能我东躲西藏，慌忙中四下找寻，发现组里的人一个都不见了。天越来越黑，后面的人群因为看不见我仍然在向前挤，我及我周围的人开始感到窒息。我也不知道自己处在饭店门前的什么地方，只听见人群里发出一声高过一声的尖叫和大吼，在吼声之中我听见一大堆自行车倒地的声音和更加恐怖的集体惊呼，随着我也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我

只感觉人群已乱成一团，他们像橄榄球队员一个个都摞在我身上，还有一些脚从我头上踩过去，我试着往前爬，抓住的全是自行车的链条，一瞬间我闭上了眼睛，我想我要完了。

这时突然一只手把我从地上拉起，连拖带拽着向前跑。跑了不知多少距离，在震耳欲聋的喊声中我被扔进小汽车，只听见小汽车马达轰鸣车轮转动却不能前进一步，原来小汽车已被泛滥的人群抬了起来！

黑暗中突然有一只手温和地拍了拍我的头，三魂吓掉了七魄我不由得大叫一声回头一看，身边坐着的是陈国军。

几经波折当然最终我们还是平安地回到了住所。我弄清楚了陈国军是这个惊险故事的男主角。这个英雄救美人的行为在当时我的心中引起了参天的波澜。

陈国军没有受到任何赞扬，不过他也不需要任何赞扬，有我一个人的衷心感激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10

陈国军肯为我而离婚



岁月匆匆,《心灵深处》影片的拍摄工作结束了。

我回到北京。

尽管与陈国军告别时柔情缱绻,但毕竟长春离我越来越远了。

紧接着我参加了《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拍摄。在长影的一时风流逐渐在记忆中淡出。

只隐约听说陈国军在离婚,好像动静闹得不小。我开始

接二连三地收到他的信。

后来信件越来越频繁绝对是每天一封甚至是两封，信里尽管许多错别字，但字里行间的情真意切自不必说。

我也给他回信。我把他的信改正错别字寄回去再附上新的一封信。在他的信中了解到他已开始离婚并已经与他妻子摊牌。

收到他的信我非常感动。说实话心里暖融融的。我深知在那个年代离婚的艰难，尤其是在长春也就更不容易。能够坦诚地告诉他妻子我们的关系充分证明他做人的光明磊落，敢于摊牌去离婚单凭这一桩行为就足以说明他对我不惜牺牲一切的爱的真挚。

长时间看多了人世间的各种嘴脸，觉得最伟大却又最难得的只有——真情。我心里重又燃烧起感动的熊熊烈火。这时候我又接到他的信，他告诉我不久要来看我。

我正在承德“避暑山庄”拍摄外景。收到他的信给他发了个电报，我连夜赶回北京。记得过去陈国军曾经告诉过我：“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你需要我，给我发一个电报，我会立即到你的身边。”于是我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发了电报后，到北京的约定地点等着他的到来。

我要立刻向他表示我的感激。我要鼓励他，赞赏他，坚定他的信心。

我从没有这样忍受过等待的煎熬！后来也不再有！

我只记得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数着那墙上的时钟，每分每秒都竖起耳朵听那随时会响起的门铃。

可是门铃一直没有响。我接连等了三天，不吃不喝。我

在希望和失望中挣扎，数遍了那来来回回的脚步声。

直到我要回外景地的那一刻也没有等到他来！又是一个骗子！原来信上写的全都是骗人的鬼话！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贯穿全身。

我冒火极了，像一头愤怒的狮子。飞快地给他留下了一封充满恶毒谩骂的信，灰溜溜地回承德去了。

第二天照常拍戏。避暑山庄里人山人海。由于导演李翰祥是台湾的资深导演，我们的影片又是第一部中国电影合拍公司与香港合拍的电影，文化部给予了很多特殊的待遇。

我们拍摄全都是在实景拍。故宫，颐和园，慈禧当年垂帘听政的养心殿，还有西太后的陵墓东陵……全都为我们开放。

我手上拿的扇子，我屁股下的座位，脚踩的凤在上龙在下的丹墀，全都是价值连城的真品。由于是祖国的文物，制片主任时时提醒大家要分外小心。

一次我拍一个慈禧大怒拍案而起的镜头，我自己设计的动作是先拍案再说台词："我要八百里廷寄押他回京！"然后站起，走出画面。开拍前试了几次没什么问题，走位置走得准是我向来的优势。

正式开拍了。按往常的惯例，打板，导演喊："开始！"我等机器空跑两秒钟稳定转速，然后集中精力，拍案，讲话，站起，走出画……突然全场一齐大喊，我不由得站住四处乱瞧，随着我头的转动大家又一起乱叫。我吓得赶紧不动，僵立在原地。

原来是我头上的簪子挂住了宫灯的红穗子，宫灯已经摇摇欲坠，灰尘已经纷纷下落，只要我一动，那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宝就会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我站在那里，把脖子冻结。手顺着头饰一点一点地往上摸，这时跑上来场记，才帮我把那纠缠不清的红穗子解了下来，我已大汗淋漓。

现在我们在避暑山庄拍戏，仍然是同样的情况。我坐的椅子，御榻，用的扇子，茶几，全是当年皇帝们用的真品。再加上是我演慈禧，避暑山庄里每天围观的人成群结队，维持现场秩序的安定是摄制组最头疼的事情。在每个镜头开拍之前我们必须全体大喊："安静！安静！安静！"还得派出固定的人员把走进镜头范围内的人赶开，在混乱中抢拍。

这一天是个星期天。人群特别拥挤。像往常一样，组里每个人都在喊着："别说话！安静！请协助一下！"剧务们心烦意乱地赶着不停地往前拥的人群。喊了、赶了好长时间没有什么效果，要拍的镜头一直拍不成。

我努力在乱中求静，保持自己良好的心境。因为拍的是少女慈禧勾引皇上的一段戏，我必须旁若无人，把眼前的一棵树——现在也看不见树，只看得见笑嘻嘻盯着我看的眼睛，我必须把眼前的一个人当成皇帝的脸并且对他转盼流光，表演出万种风情。

灯光已打亮快十分钟，人群仍然不能散开，平均每几秒钟会冲进一两个人来站在面前，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那样看上我一阵，再哈哈大笑着回到人群里。

我的血开始往上涌，我感到我马上要失去拍戏的心情，于是恼羞成怒地回头大喊一声："安静！"我愤怒的叫喊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引起人群的哄堂大笑。在我气得头昏眼花的同时，晃过一个熟悉的身影，赶紧回头一看：是陈国

军！他正帮着维持秩序，同时冲着我一笑。

在赶快拍完这几个镜头后我到了他的身边。当然没忘了假惺惺地把他介绍给大家："这是长影演员，我们合作过《心灵深处》，现在他拍戏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马上就要走的。"接着我们立即攀谈起来。

原来是他接到电报后立即去请假，可是剧团领导由于风闻他与我的关系又在离婚对他已有了怀疑。当他终于请到假赶来时，我已经离开北京了。我问他以什么理由请的假？他说母亲病危。他父母在佳木斯，倒是一个好的借口，不过说母亲病危不大吉利，但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下午他假装离开我们去了别处。晚上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来到我的房间。在部队他是侦察兵，在这方面有特殊的才华。这个才华，在我后来与他离婚时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在约定时间他会在窗户外面吹口哨，吹的是一首我们都熟悉的歌《大坂城的姑娘》，这首歌在长影拍戏时他常常唱，尤其是其中"要是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这句歌词，每当看到我时总是一再重复。他在窗下吹口哨也吹的是这一句。于是我把左边窗户打开表示屋里没人，过十分钟他就可以进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先去化装，等我们出发以后他再想办法离开。然后在拍摄现场他假装从外面再赶来，站在那里一直陪我拍戏到天黑。

两三天过去了。在现场我们之间一颦一笑的交流已让摄制组的人看穿了秘密。顺藤摸瓜当然他们开始想到其实那个每天陪我拍戏的"小胡子"（因他留着胡子，大家都叫他"小胡子"）每晚是住在我的房间。

本来我是戏里的绝对主角，又是女演员，又是单身，已分外招眼，这种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本来就惹人议论，并且人们议论起来乐此不疲还正好点缀了摄制组单调的生活。

我的房间开始不停地有人来。有时要拿东西有时与我聊天找各种借口进来看看。经常在我这里上厕所看看有没有人藏在里面，来来去去人次多了，索性我把厕所门打开让他们一览无遗。

不过我心里还是紧张。不是紧张别的，而是紧张陈国军还是别人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儿子的父亲。

为了事情的进展顺利绝对不能公开我们的事。一旦传出去传回长影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这只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但我们还是费尽了心机，陈国军为此也吃尽了苦头。几次他正在房间里就响起了敲门声，陈国军只有立即藏起来只不过不是藏在卫生间而是藏在大衣橱里。记得有一次制片主任进来东看西看，我一直为柜子里不时发出的轻微嘎嘎声汗如雨下，我看得出主任明显感觉到柜子有问题，只不过不好意思当我面打开，只好悻悻而去。

好不容易等他走后我们立即改变方针，下一次来了人我故意把柜橱打开拿衣服，而实际上人是爬在墙上小窗口里修理下水道的梯子上。

我们开始探讨他离婚的策略及可能性。我了解到最大的困难是他的儿子。

11

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陈国军是东北人。东北人的重男轻女全国闻名。他们讨厌女儿，不要女儿，“一个闺女半个贼”这句话就是东北的俗语。而东北的女儿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出嫁前出嫁后在思想里都以夫家为家，一心向着婆婆，时常将娘家的东西搬到夫家确实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说东北有全世界最好的媳妇就是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得来的。

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节目叫“双回门”，是写夫妻

在春节大年初一双双回门的风俗，我一直看不懂。后来才弄清楚东北的闺女出嫁以后按规矩大年三十不许回去，只有初一才可以回娘家。恐怕是图个吉利，怕女儿离婚吧。

在东北的家庭里，假如一个母亲生了几个儿子那这个母亲就十分自豪，单凭这一点足可以立于左邻右舍之林而趾高气扬。假如生的全是女儿则不好意思抬头，见人矮三分。产妇生产，生了儿子放鞭炮告知大家，贺喜的、讨红蛋吃的门庭若市。要是生的是女儿则偃旗息鼓，不敢声张，婆婆公公给脸子瞧，产妇要哭也不能哭出声。

有一次在火车上我就亲眼见过一桩事：一个东北农村的媳妇，因为头胎生了女儿，在公婆丈夫的压力及自己的强烈意愿下怀了第二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只许生一个不许生第二个，怕公社不让生，于是偷偷回娘家石家庄去生。

那一天是冬季，窗外大雪纷飞，媳妇由婆婆陪着，上车时已大腹便便。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婆媳俩都挺着。

车快到石家庄突然阵痛发作，孩子已经等不及生了出来。产妇抱着孩子，脐带还在肚子里硬从四车厢走到有广播室的十一车厢，红腥腥的鲜血流了一路。列车员一边广播、一边采取措施，等医生到来剪断了脐带简单作了处理，列车上再为她们安排了一个卧铺。

我看见那位媳妇脸色苍白眼含泪水躺在卧铺上，由于生的还是女儿那位婆婆铁青着脸。不多时到了石家庄车站，婆媳俩冒着大雪抱着新生儿走出了大门……

这个故事直到我现在写这件事时仍然激动得心里发颤。也就是它使我当初深深理解了陈国军的儿子在他父母心目中的分量。

陈国军的母亲生了五个儿子，几个媳妇生的都是女儿，只有老大生了一个儿子。后来陈国军有了儿子，父母亲及全家欣喜若狂，于是这个儿子从满月起就由爷爷奶奶亲手带大，是两位老人的命根子。母以子贵，陈国军的爱人赵雅珉受到全家的爱戴，一离婚赵雅珉作为母亲当然要孩子，那就等于要了陈国军父母的半条命。过去在长春如果赵雅珉出外景，儿子就去爷爷奶奶家，赵雅珉回来，爷爷奶奶哥哥嫂嫂便集体将儿子送过来，并陪吃陪住带孙子直到赵雅珉再外出。两位老人家实际上是为这个孙子活着。现在听说要离婚有可能失去孙子，已经天天哭得死去活来了。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完全能体会到陈国军父母的心情。陈国军是个孝子，这也是我对他的钦佩之处。“不孝顺的人不可交”，这是我与人往来的信条。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赵雅珉本人也不愿意离婚。再加上长影全厂的反对，当时正值严打第三者、重惩陈世美的运动，报纸上一再发表这些批判文章甚至社论，严重的还要判刑，这门那门全都占全了，还正好在风口浪尖上。先不说我，陈国军面临的前景是一条死路。

算了吧。我不甘愿地劝他说。越有压力我反叛的心理越强，这是我的个性。可这主要是他的事情，我只好压抑住自己劝他。

“你别管了，好好拍你的戏吧。”他说。

我也只好就杆下地撒手不管。我也管不了。我根本就不能出面，我越出面越麻烦。本来就够乱的了。

陈国军回去了。他回到了“战场”。他从此陷入了不是与妻子，而是与单位领导及周围人群的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

每一个人都去管他。尽管当事人——赵雅珉一言未发。

陈国军把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打电话，或是想方设法请假到北京来看我。我那时也一文不名，不可能资助他。

除了每次给我打电话必须偷偷摸摸外，每次要来看我也是一场斗争：先告诉赵雅珉要去北京——他从来不瞒她。然后去请假，照例又是母亲病危或是送儿子回佳木斯之类，接着再打电话给父母统一口径，或是先送儿子回佳木斯再从佳木斯到北京。

陈国军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罕见的。一般来说男人刚而易脆，像陈国军那样有毅力的男人真的不多。没有钱买卧铺就全部坐硬座，车太拥挤就站着，差不多每次他都是不吃不喝站到北京！

组织上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他的行为，左查右查没有结果，就从赵雅珉身上找突破口，正经受深切苦痛的赵雅珉自始至终对此事不说一个字。

赵雅珉，是我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敬重、最佩服的女人之一。不管周围怎么对她寄予同情循循善诱，逼急了她会说一句：“这是我们两口子自己的事，你们甭管了！”须知在那个年代，一个心灵受到创伤的妻子对伸出双手帮助她、拯救她的“组织”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多么高尚的情操。

后来，全中国报纸都登载了陈国军离婚与我相好的消息，甚至再往后我们结婚又离婚时记者无数次访问过她，她也从未说过任何一句话。

如果在陈国军离婚的当时赵雅珉开口说话并提供“炮弹”，那么情况就一定会和现在大不相同。我不敢说他们还能维持他们的婚姻，但是陈国军和我其中有一个进监狱或是上法院是完全可能的。

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斗争会”。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之多！会议内容是解决他与赵雅珉的婚姻问题，同时要查清陈国军不在长影时去了什么地方。

由于去北京次数太多时间过长不能总说回佳木斯，同时组织也调查到陈国军的母亲神采奕奕根本没有“病危”，陈国军只有改口说去了北京朋友陈征的家里，因为陈征在帮忙为他联系上一部电影的事，由于电影还没有谈成所以不想告诉别人。

陈征是我在部队的一位战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蒋的丈夫，他们两人是我从小的至交，我和陈国军的事当时只有他们知道。

每次“斗争会”开完以后陈国军总要立即打电话给陈征，让他牢记一个时间表，如果长春来调查让他照这个时间表答复。陈征接到电话后便赶紧背诵：“十月一日在北京三天，见×××导演，十一月×日在北京×天，见×××编剧……”

那些导演和编剧都要是熟人，最好是名不见经传，这样不好查也查不到。如果有他们可能知道的编剧、导演也找我们要好的朋友，也让他们背诵一个时间表以便查询，至于为什么不许问，我们也守口如瓶。

常常是一个时间表没有背好电话又来了——又换了新的时间表。于是陈征又赶紧照陈国军在长春“斗争会”上重新

交待的情况再背一遍。我还时不时打电话过去嘱咐他千万别背错了!既不能背错了还不能太熟练,免得演得不像。好在陈征是个好演员,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长春的电话也一直没有打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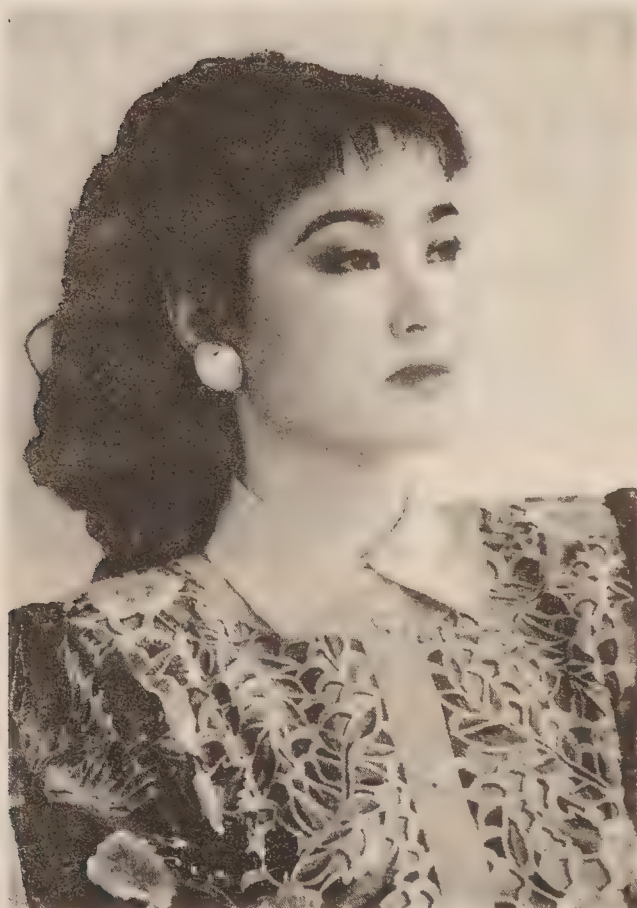
此时在陈国军的家中,一场争夺儿子孙子的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为防备爷爷奶奶不放孙子,赵雅珉带儿子去自己父母家,在火车站交接时的场景实在是惨不忍睹:全家人送孙子到车厢门口,火车汽笛已鸣响车轮已起动,爷爷奶奶抱着孩子死不松手,无奈何抢过儿子往车厢门口一站,孙子大声哭叫"爷爷,奶奶"的声音与两位老人撕心揪肺的喊声融成一片,火车徐徐向前,在全家的搀扶下爷爷奶奶跌跌撞撞地跟着车跑,直到筋疲力尽,直到火车无影无踪,老人嗓子哭哑了再也走不动路才瘫软在地上。

失去了孙子的爷爷奶奶从此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失魂落魄。在后来我与陈国军离婚的两年中两位老人相继去世,母亲五十岁父亲五十六岁。虽然母亲是死于肝癌,父亲是死于心脏病,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与陈国军离婚失去孙子有关。对此我心里怀有深深的歉疚。尽管我不是直接犯罪,但我自认是间接犯罪,我不是主犯但我知道是从犯。也许我就是主犯。

我一直有机会就为他们祈祷。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平安。在写本书的此时,我停下笔,再一次为他们的灵魂祈祷。两位老人家安息吧。

12

大年三十夜一件无头案



身在外地拍摄影片《北国红豆》看起来是局外人的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长春的情况天天传来，使我处在各种情绪交织的漩涡之中。

我失去了一切是非。我不能判断任何事物。我苦恼之极。我谢绝一切追求者，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也没有人照料。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的首映式，电影局根本

就没有让我去参加，每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肚子的心事不敢也不能找人去诉说，顾虑重重压力重重苦恼重重，突然一天，在老乡家里吃饭我虚脱在地……

醒来时看见的是满屋子的人。我看见了在戏里演我婆婆的北京军区话剧团政委林韦。林韦阿姨是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夫人，正因为她是政委又是厂长的夫人，我最怕她。

听说过她慈祥、宽厚从不插手丈夫的事，我还是将信将疑从不敢放松我的警惕。一直是她与我同住一屋，我什么也不敢说，把我憋得够呛，今天她在我的床边端茶倒水摸我额头，像我的母亲来到了身边。

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她坐在我床头一面为我掖被子，一面轻轻地说："孩子，你的心思太重了。这样不好……"如同打开了闸门，我的眼泪不断线地滚落下来，我放声大哭。

她接着说："我什么都知道。你这么憋着要憋坏的。"这时候我的心里话像决了堤的洪水，终于忍不住一古脑儿全都倒给了她。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韦阿姨竟然会是在好朋友陈征、小蒋之后第一个理解我这些大逆不道行为的人。

她，那么高的职位！那么德高望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太感情用事了。唉，人是感情动物嘛。"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并且一直为我保守着秘密。连汪洋厂长在内！

那一年的春节前，我们《北国红豆》摄制组回到了北京。把话都说出来，而且是说给了林韦阿姨，等于告诉了汪洋厂长，直到现在也没有受到批评，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这个时候又收到妹妹的信说，她今年春节要到北京旅行结婚。

终于有一件喜事临门，我不由得精神格外爽。就像是哪本外国书里写的一句话？哦，是苏联的一本书。在其中一章的“章首”里这么写着：“在炎热的日子里，哪怕是浮云一朵，也会给人们带来喜悦。”

这句话正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况且这件事岂止是浮云一朵，是一大片的云！满天的云！

我只有一个妹妹，当然只有一个妹夫。她一辈子只结一次婚。总不能还没有结婚就咒她像我这个不争气的姐姐那样离婚吧？

我们姐妹俩一直感情特别好。好得就像“同性恋”。

可以说，是妈妈把她生下来，是我把她带大。考大学、读大学、让她学扬琴，到后来送她去法国念书，都是我的主意，就连她谈的这个恋爱，也是通过我的同学认识，最后由我拍板才决定的。

妹妹的人生路线基本上是由我描画。她对我言听计从。到今天的一切证明我决策的英明。

我一边拍《北国红豆》的内景，一边打扫房间，抓紧时间筹备一下。比方说床啦、碗筷什么的。每天都不忘了偷点拍戏的道具，例如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大蒜、干辣椒之类的回家存起来，道具组的师傅由于跟我关系好看见了只是对我一笑。

好在我每回偷的也不算多，他的道具仓库里也还有存货。一次拍一场戏我专门设计了一个一边吵架一边斩鸡的动作，拍完这场戏我就向道具要了这只鸡回家，放在我“走穴”挣来的冰箱里。

那时我刚买了冰箱，离我的“走穴”目标还远。

妹妹、妹夫来了，陈国军也到了北京。我仍然继续从摄影棚偷能吃的东西，妹妹、妹夫上街办东西准备过年，像三只老鼠贮备粮食准备过冬。陈国军是“地下党”不能出门，于是整天在家打杂。

妹夫拍胸脯说他烧得一手好菜，我们于是把大年三十做年夜饭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还请了我一位朋友小郭与她的父亲作客，因为她的母亲出差去外地，剩下他俩太冷清，我便热情万丈地邀请他们说不如跟我们一起过年算了。

大年三十吃了午饭我们就开始忙碌，有的摘菜有的洗菜像几个来回乱转的“绿头苍蝇”。过不了多久小郭和她的父亲也一起来到，屋子里更加热闹非凡。

突然来了几个人要找“靖军”。靖军是我妹夫的名字。

真是稀罕，在北京会有人找靖军。“靖军——”我喊，“有人找!”

靖军系着围裙，脸上带着面粉，手上全是油污，一边问：“有人找我?”一边从厨房出来。

一看，不认识。“请你出来一趟。”靖军愣了一下。“我洗洗手。”他进厨房去洗手。

解了围裙出来，跟他们到了门外。妹妹一看来客人了，也跟他们去了门外。

我们没当回事，照样忙我们的。过了一会，有三个人回来了，靖军和妹妹没有回来，那三个人说，他们是公安局的，要找靖军问话，今晚他不能回来了，你妹妹也一起去，你们先吃吧。

我赶上去问：“为什么?明天再问不行吗?”他们不回答，一个人走了出去，两个人坐了下来，开始盘问陈国军。

“你姓什么?”

“我，我姓张。”陈国军作贼心虚。

“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问。

“我们是亲戚。”一提到“关系”这个敏感问题陈国军开始乱编。其实我们家根本没有姓张的。

陈国军接着画蛇添足地说他是今天刚到北京，坐的是成都到北京的×次火车等等，越说越让公安局觉得可疑，公安局不耐烦地打断他：“走，跟我们去一趟。”

我们全傻了。

眼睁睁看着公安局把他带走我们在一旁干着急，也不能解释说他叫陈国军，是长影演员，也不敢说他姓张是我的亲戚，只有什么都不说。最后公安局留下一个人在我的屋里当不受欢迎、不请自来的“客人”。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那个公安局的什么都不回答。正好这时来了一位女朋友，她是外国籍，刚从国外回来，本来我们约好吃了饭去马克西姆餐厅玩，我气冲冲地告诉她我不能去了，因为我的妹夫被抓没有心思，我没有说被带走的还有陈国军。那位朋友立刻站在我一边破口大骂公安局，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应该不应该告诉她我身旁的这一位黑脸冻嘴的男人就是公安局留在这里的“坐探”。

那位女朋友继续骂公安局无能，乱抓好人，并且拍着胸脯说：“是谁抓的?我们想办法救他!嗨，中国反正没有法律，人快枪毙了都救得出来!”看我一直不搭话，我也不敢搭话，她只好站起身花枝招展地走了。

只剩下我和小郭、小郭父亲三个人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地吃年夜饭，过节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小郭的父亲说：“真倒霉。”我内疚地看看他，说不出什么话来。一年一度好不容

易就这么一个春节让这件事给搅了。小郭的父亲也跟着我们不走运，真是太对不起人家了。

我们三人沉默着。没有多余的话说，他们也不好意思离开。我又没有电话，无法与人联络。就是有电话也不知怎么联络。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打开门一看，是北影剧团的书记于素琴。

于素琴是我们剧团里威信颇高的一位领导，为人正直又和蔼可亲。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已知道这里出了事，公安局在来我家之前已和北影保卫科打过招呼，并且汪洋厂长也知道。现在她代表汪洋来看我，汪洋厂长在十分钟前打过电话给她，让我安心，好好过节。我问这是件什么事，她说是件大案，与持枪潜逃有联系。我吓了一跳，赶紧问详情谁清楚?她说可能只有保卫科清楚。我立即奔出门去找保卫科。

保卫科科长和我熟识，是一位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的好人。找不到他家具体在哪一间屋，急得我不顾三七二十一放声大叫。我已管不了别人家都在吃团圆饭，人一着急就变得自私。突然看到一扇门打开，在洒出来的灯光中出现了保卫科长的人影。我冲上去连珠炮似地一通乱问，他慢条斯理地为我解答。

原来是成都铁路公安局有一个警员劫了枪打死了人，畏罪潜逃了。在那个人的宿舍里找到了他的通讯簿，在簿上有靖军的名字，成都公安局委托北京公安局追捕靖军，一方面怀疑靖军是那个人的同伙，另外看看是不是劫枪犯要暗杀中央领导逃到北京找靖军来了。“要不要紧啊?”听完后我马上问。“不知道。”保卫科长说。然后安慰了我半天，我只好怏怏地

回去了。

回到屋里，妹妹和陈国军都回来了，小郭和她父亲已经走了。公安局的人也不在了。想必也已经走了，或是守在楼下也未可知？不管他在楼上或是楼下，我们已是犯人家属，先不考虑这个，立刻问情况。

妹妹说不知道去的是什么地方，一进门就被隔离审问。她被问了好多问题，比如说什么时候认识靖军的，靖军平日出不出门等等。妹妹回答说最讨厌的就是他怕冷，从不出门。问到最后公安局的人要她提高警惕，保护好姐姐，不要出其他的事。妹妹问是什么事？公安局说不能说，持枪潜逃的“二王”你知道吧？妹妹说知道。正好此时等到陈国军出来，他们一起就回来了。

陈国军和靖军则一进门便听见周围子弹上膛的声音。同样也开始单独审问。由于屁股上有屎陈国军顾左右而言他，前言不搭后语，公安局的人越看他越像坏人。还是后来陈国军自己定了定神，发现公安局其实对“生活作风”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才开始正式地、老实地交待了本来的情况。

“那公安局知道你是长影的陈国军了？”我问他。

“全知道了，我一切都说了。不说我出不来。”

“那怎么办呢？”我急得直跺脚，“公安局把你从我家押出去，长影立刻就会知道，说不定公安局还会通知长影呢，这一下全都露馅了！”

“那怎么办？总不能当劫枪犯同伙吧！”陈国军说。

正在纠缠不休，妹妹又在旁边哭起来了，我又赶紧去劝她，我简直是一支救火队。妹妹哭得很伤心。定神一想，可不是嘛，刚结婚就遇到这样的事，谁不心烦呢？万一靖军真是有

事那怎么办?万一靖军有事妹妹又怀孕了怎么办?我都不敢往下想。

“不行就离婚算了。”只听陈国军说。

“狗屁!”我马上义正词严地指责他,“是不是你离婚离上瘾了?一个人离婚还不够吗?靖军现在生死不明,这样想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我像连珠炮似地把话一古脑地甩过去,新怨旧怨,长痛短痛一起发泄出来。

我们谁也没睡觉。有消息说,北影厂已闹翻天了。大家都奔走相告:“刘晓庆的妹夫被抓起来了!”“听说是反革命!”更有甚者说:“陈国军和她妹夫都是从刘晓庆的床上被抓起来的!”……

又有人敲门。公安局的人又来了。是拿靖军的牙刷、换洗衣服之类,说今晚不能回来了,我冲着他们歇斯底里大喊一通,他们根本不理我的茬,拿上东西,走了!

我赶快打发陈国军第二天一早就回东北。免得别人再发现他,事态又扩大。接着安排妹妹也赶快回成都去陪妈妈。母亲是最争强好胜的人,有这件事,在成都肯定会立即传遍,她老人家还活得了!

13

真是一场恶梦



又剩下我一个人了。真可谓“孤灯挑尽未成眠”。

胡思乱想了好几天，整个春节都让这件事给糟踏了。天天去保卫科打听，说是靖军已押送回成都了。

想想妹妹，想想靖军，想想陈国军，想想自己，突然开始怀疑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来，像我这样等着别人离婚是不是不道德？陈国军究竟离不离得了婚？我是需要他还是爱他？我是不是一定跟他结婚呢？会不会到他离婚的那一天我已经老

了，一切都失去意义了？……

突然之间心灰意冷，觉得自己这条路是走错了。原以为世界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扯蛋！根本谈不到。每个人都在管你，处处都是束缚，结婚只能靠“蒙”，好的坏的都得撞大运，撞到什么是什么。也许认命还好一些，不认命吧？就像我这样，弄个遍体鳞伤还没结果，就是有结果了也没劲了。

想到几年来自己过的寒冷孤独凄清的日子实在是不堪回首。我感到自己的承受力已到极限，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穿过人们的指指点点，走在北影厂内，我开始玩世不恭。不想对任何人负责任，只企望任何人也别跟我太认真。

我开始与别的男性交往，可是我不想结婚。我发现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男人都是有妇之夫，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是“维持会”。他们只是因为这个那个不得已的原因不能离婚或是不敢离婚，我对这个社会在道貌岸然的面纱下的虚伪、肮脏感到厌恶。

你可以有第三者，你可以有婚外恋，可是你不可以正大光明地离婚。你偷偷摸摸人们管不着，只要你离婚全体都要来制约你。

我有一位朋友，他与妻子感情不好，几十年来一直在打离婚，后来终于双方同意了，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妇联出来干涉，她们不同意。

还有好多两口子，经过长时间的马拉松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双方都要离婚，可是单位领导不同意，不给开离婚介绍信。结果最终也没有离成，痛苦一辈子。

我给陈国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谢谢他的真心，只是我觉得这件事太难了，况且我们也不合适之类，让他别再来找

我，千万别再离婚了，我们的事情就到此为止。把信发出去以后，就好像已经把陈国军这一页翻过去了，心里倒确实是轻松了好多。

接到信第二天陈国军就到了北京。我们又去约好的地点谈话，他表现得很平静。我把我的观点、想法全都谈了出来，我坚决地告诉他别再费劲了，尽管我们有过历尽坎坷现在仍然不失美好的过去。陈国军问我是不是有了别的男朋友？我说没有。不是我撒谎，而是我确实不算有男朋友，我根本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告诉他再惹别的风波。更主要的是，我不是为他和陈国军断绝来往的。

陈国军走了。眼看着他的身影一步步消失在视野之外，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只是对他的平静我很惊讶。原本以为他会大闹一场，没想到如此顺利，那就好那就好。真是谢天谢地。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当天晚上“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那天深夜，我和我的新男友正在屋里说话。突然听见门钥匙响，随着一只皮靴将二道门踢开，狂怒的陈国军拿着皮带走进了屋子。

我一生绝不能忘怀那令我丧魂失魄的一瞬，我到现在都能清晰地听到门钥匙的响声、踢门的声音，还有那惊天动地的皮带抽在桌上同时伴随的一声断喝：“起来！”

再不会有比那天更恐怖的夜晚了。陈国军一脚踢在新男友的额角，额角立刻肿了起来，紧接着他命令他爬出去，于是他当着我的面爬出门外。

陈国军的脸孔扭曲，没有丝毫的血色，从厨房搬来了煤气

罐，放在我和他的中间。他用皮带指着我的脸声泪俱下地控诉我没有良心，背信弃义等等一系列的罪行，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活在世上，反正他也不想活，不如跟我同归于尽……说完后他点着了火柴，开始打开煤气罐的开关……

突然之间我对生命有了无限的眷恋，想到自己这么成功这么年轻这么花容月貌就要死去是多么地遗憾，为一些谈情说爱的小事居然要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真不值得，在千万般的后悔之中我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恳求他不要杀我，我错了。我跟你好。再也不变心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再不能记忆。我不能，也不愿意记忆。那是一个最恶的恶梦。在这场恶梦当中我心胆俱裂。只记得这场恶梦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怎么度过我经历了些什么我绝不想说。只记得第二天晚上陈国军带我去了景山，就是当年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地方，他百般温存地把已没有丝毫力气的我背上山顶的一间小亭子，坐在亭子的栏杆上我对皎洁的月亮发了誓不变心后他原谅了我。

如同刚从杀场回来，我一直筛糠不止。我感谢他对我的谅解，想到他居然那么心宽证明他拥有多么博大的胸怀。同时我也再不需要陈国军对我说怎么爱我了，一个人能为你牺牲生命还能有什么怀疑?

当然我从心底也知道，除了陈国军以外我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了。我已明白生命原来竟是那样的脆弱。

不过我也不会有别的选择，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哩。

时间一天天过去，第四个年头又到来了。我的妹夫靖军在被抓走的第十五天平安回家，公安局登门口头道歉承认抓

错了，是一场误会。

原来是为了过春节找到那位在铁路局工作的劫枪犯的朋友给我往北京带蔬菜才惹出的这场风波。我要求带的“窝笋十五斤，豌豆角两斤”被怀疑是子弹两千发、枪十五支，为此调查了靖军好长时间。

幸亏这个案子很快破了，劫枪犯已经被捉拿归案，要是真凶继续在逃，靖军还不知道要关在里面多长时间？

当公安局口头道歉时靖军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他不接受口头的道歉，要一份书面的通知。公安局说没有。他问这十几天怎么跟单位交待？公安局说算是出差好了。

靖军出来后好长时间没有去单位上班，不知道怎么跟单位说。单位也没有催他。后来终于忍不住去单位报到，单位上居然放鞭炮向他表示欢迎，坚持了一段时间靖军调往深圳工作，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陈国军仍然在与单位组织上作殊死的斗争。

14 离婚“持久战”终告结束



单位组织对陈国军的调查日益抓紧，大有将他送上法庭之势。上级已完全停止了陈国军的工作，外边也没戏找他演。我四处为他奔波，但是一无所获。每天他的工作就是离婚。

在这种形势下拿陈国军的话来说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每次开他的“斗争会”他都拿一个本子，大家一边说他一边作记录。长时期战火的考验他已变成了“沙场老将”，对这些情况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而我看过那些记录后怒火万丈，

一而再、再而三的压力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我偏要和他好,看你们怎么样?

在此期间赵雅珉到北京找过我一次。我们之间令人惊讶地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交谈。当我打开门看到她时,觉得她实在是很漂亮,而且相当年轻。我们相互都坦诚,开门见山。"陈国军对我说过他很爱你。"赵雅珉说。避开她的问题,我问她:"是不是陈国军这个人很风流?"她说:"不。正因为他很正派,我才重视这个问题。"

赵雅珉在我那里住了两天。就是在那两天之中,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女性的伟大。"他们把陈国军整得太惨了。"她说。她还问到我会不会真心对陈国军好?她希望不要离婚。为了他们的儿子。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不可能说得清楚我的苦衷。最后,我答应劝说陈国军回心转意,尽我的能力作工作。

赵雅珉走了之后,我立即坐下来给陈国军写信。我写了对赵雅珉的印象,我惊讶有这么好的妻子为什么还会与她离婚。接下来我写到不过我认为闹到现在已没有什么前途,如果再回到赵雅珉身边整个事件会变成一个滑稽剧。社会怎么看你,赵雅珉怎么看你,你们双方又怎么消除得了我的痕迹?剧团把你弄得这么惨你又怎么能甘心?本来我想劝陈国军放弃离婚,不知怎么搞的话题又转到了相反的立场上来。一边这样写信我一边觉得对不起赵雅珉,出尔反尔未免有些不大仗义。于是在信尾我反复叮嘱这封信千万不可给赵雅珉看见,要立即销毁云云。

怕什么偏就来什么,这封信正好落在赵雅珉的手中。赵雅珉在看完了之后静静地把信还给了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的

陈国军(假如这封信交到单位再交到法院后果将不堪设想)。

“她说得对。”赵雅珉说。

这一天,单位仍然召开批判陈国军的大会。像往常一样,陈国军拿着笔记本走进会场,在角落里悄悄坐下。大会在继续,仍然是纠缠那些没完没了其实纯粹是属于陈国军和赵雅珉两个人的“家庭问题”。

一位同事来晚了只好坐到陈国军的旁边,应酬似地向他打招呼:“怎么样了?你和赵雅珉?”

“离婚了。”陈国军平静地说。

“离婚了?什么时候?办完了吗?”那位同事不由得提高了嗓音。人们纷纷回过头来。

“办完了。前天上午办完的。”

两天前,赵雅珉主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只要求儿子由她抚养。法院很快批准了赵雅珉的请求。

自此,陈国军长达四年的离婚战争终告结束。

奇怪的是,几年来陈国军一直在与组织、领导、周围的人作斗争,而没有当事人什么事。社会不给当事人作主的权利,不考虑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强行给陈国军施加各种压力甚至形成了迫害,反而帮了陈国军的大忙。

在长期的外在压力之中,我们当事人三方不知不觉间结成了统一战线。不想让别人干涉我们的事。不想给别人当枪使。不想让其他局外人得逞。

说实话,这种艰苦卓绝的马拉松式离婚大战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社会的强大,舆论的厉害,我们已经深深地亲身领会到。尽管这一次离婚不管多么坎坷曲折总之还是以陈

国军的胜利宣告了结束。

可是人们并没有原谅他。

几年后社会和舆论反扑过来一举摧毁了陈国军用心血换来的第二次婚姻——也就是与我的婚姻。

15 又一场新的『马拉松』



刚认识陈国军的时候，我没有一分钱。陈国军离婚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钱。给陈国军儿子的抚养费使我囊空如洗并且负债累累。

为找一个房子住我吃尽了千辛万苦。厂里借给我的房子突然有一天分给了北影的一位导演，那位导演的儿子天天赶我走并扬言再不搬就封我的门。

可是我到哪里去住？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竟不能有我

一张可以歇息的小床和一张安静的书桌?

我一边抵抗着不搬家,一边联系过渡的房子,一边给陈国军找工作,调动户口。

离婚以后,陈国军在单位已无法再呆下去。

他已为离婚丧失了一切:家庭、儿子、工作、名誉、前途、父母亲的健康……

他本来没有钱,现在就更没有钱了。他在长春已臭不可闻。

没有什么人理他。人们都把他当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与此相反,赵雅珉在单位里获得最崇高的敬重,尽管她从来没有说过话,人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她怎么想。

陈国军整天无所事事,在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他那时只有二十九岁。

在陈国军离婚的四年中,我仍然是新闻的中心。除了各种难听之极的议论以外我忍受了无数的凄清、孤独和寂寞,抵御了来自各方面的诱惑。

我本来可以嫁钱,只要嫁一个有钱的老公我就可以不愁吃喝,享用不尽;

我还可以嫁权,在我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只要是嫁一个高干子弟马上就有大而舒适的房子,还不会再受批判;

我可以嫁一个没有结婚的,没有那么麻烦的家庭问题的,没有孩子的,最少最少我可以嫁一个北京户口的……

四年的日日月月不是一瞬即逝,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是领袖有一句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在四年里这

句话几乎天天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

我没有结婚，我是自由的。

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前途、我的选择。

我曾经动摇过很多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坚持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社会和舆论的压力总是在我动摇的时候推波助澜，从另一个方向鼓舞我、激励我，它们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事情本身的质量如何，是否出于自己的要求愿望，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一点都不重要了。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对任何男人都视而不见。不管他们多么优秀，不管他们多么温情脉脉，在我的脑袋里只有长春。

在陈国军离婚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在电影圈内部公开，一直以为我只是由于生活作风不正派与陈国军玩闹一场的人们接受不了我们开始认真在一起的这个事实。

我对陈国军为我敢于抛弃一切的真情抱有极大的感恩心理。

要还给他一切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事隔多年以后我反应过来，其实那些年里，我只是为社会和舆论活着，可是我当时想不到这些。

陈国军离婚只是我们和社会斗争胜利的一个起点。只有还给他一切，让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个圈才能画圆。

所有的舆论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都不认可。对我为什么会找他众说纷纭，至今不能使我忘记的是人们最后盖棺论定的一句话："因为陈国军的床上功夫尤其出色。"

我根本没有任何判断力。在我有主张、叛逆的后面实际

上是舆论的俘虏。

我天天收集、了解、捕捉、记忆这些舆论，并且针对它们反其道而行之。

我向社会宣战。我为这些而生存。

首先要解决住房的问题，然后调动陈国军的工作，接着再调他的户口，户口一定要在北京，以后他的儿子户口也可以一起到北京。

还有，他一定要拍一部最棒最棒的戏。

刚离婚时的喜悦早已过去，整天游手好闲使陈国军焦躁不安。

我们仍然不能在一起。他到北京还得跟单位请假，单位仍然不准假。情况除了“斗争会”停止免去我们进监狱之忧外，其余没有任何变化。

我成天东跑西窜，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想办法。可是不灵。只要听说是陈国军的事，这些关系就变得不管用。无论我把他吹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听。没有单位肯出面借调他。

无奈何只好找到我一个朋友，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什么“影视中心”，说清楚他给出借调函我们自己掏借调费，他终于答应，我赶紧点头哈腰再三感谢。

一个单位借调另一个单位的人员要付给单位劳务费，这是历来的规矩。一般最低金额是被借调人员工资的百分之四百。

这就是说，为了陈国军能到北京，我自己每个月要掏四倍陈国军工资的钱付给长影剧团。幸好那时由于“走穴”我已有了小小的积蓄，尽管舍不得，觉得不公平，也只有这样做。

一定要跨出长春。这是第一步。

借调函有了。钱也解决了。还得找一个人扮演影视中心的工作人员,去长影办借调手续。

陈国军由于离婚属于内控分子,一般的戏来找都不外借,必须有人去,得是知根知底的人。还要找一个大的幌子,比方说这是中央××单位拍的××重点片等等,不然肯定借不出来。

找谁去呢?谁这么够哥们肯去长春一趟,同时还具备能说会道再加上出色的表演天赋呢?

把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想了一遍。同时也找了几个人,有的确实没有时间,有的找借口婉言拒绝了。

最后想到北影的一位青年导演,他一直与我关系甚好,人也仗义,够哥们,也兼备能说会道及表演多种才华。最理想的人选!早就应该去找他!

我把我的想法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跟他一说,果真我没有看错人,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而且他也正好有时间。我们坐下来具体商量此次去长春之行的方针、政策及可能发生的和不可预计的情况,讨论了好长时间。

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尽可能细地介绍给他,并且千叮咛万嘱咐切切不可泄露与我的关系或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尤其是见到陈国军千万不可打招呼要装作不认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们还说好在长春期间不可与我通话,假如实在要通电话必须到街上远离陈国军单位的电话局去打,并且务必看清身边的人,记住切不可说出我的名字。

两天以后,朋友出发。我在北京坐镇,一面关心长春的情

况，一面继续跑房子的问题。

陈国军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被人点穴武功尽失，只有坐等我的救援，他只是离了一下婚就到了这个地步。

这时候，天无绝人之路，我突然得到了一套房子。北京流量计厂的厂长在一次我为他们厂的演出中得知我的情况，实在看不过去，伸出了同情之手。

后来这位厂长成为我们全家的朋友直到现今。他不管我和陈国军之间相不相配，也不管陈国军是否刚离婚，只知道我对电影事业有过贡献，只知道我是人，就应该有个安身之所。

他派车并且亲自陪我去给陈国军跑北京户口，尽管没有跑成。与他在一起我想起北影一位演员对我说过的话："我的朋友都是工人。与他们相交放心，比跟文艺界来往好得多。"

好人还是有。世界毕竟还是有光明。北影剧团的团长陈强，在我与他聊天时谈到陈国军还在长春及我与他的关系时干脆地说："把他调到北影来。我们总是要把女婿娶进来，不能把我们的闺女嫁出去。"我不会忘记这件事。

北影也突然通知我在一个旧楼有一套小房子，可以分给我住。

过去总是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原来福也会双至。

长春方面的朋友来电话说，目前一切进展顺利，如果不出意外情况，陈国军不日可到北京。

在陈国军还未到北京之前，他的母亲连同哥哥弟弟先到了我家，因为他母亲病重需要到北京治疗。

汪洋厂长又一次出来对我进行了关键性的关怀，由北影

专车每天接送他母亲去医院检查。

于是我一面打扫新房子，一面收拾旧房子，一边陪陈国军的妈妈去看病，一边拍戏，每天按东北习惯给大家做饭，老人家又有肝炎又有糖尿病，既不能吃甜的又要吃好的，使不会做饭的我费尽了心思，还忙陈国军的调动，忙自己的杂七杂八，忙得不亦乐乎。

诊断的结果他母亲已患了晚期肝癌，医生当面告诉她最多活不过十年。眼看着老人家泪水汩汩流出，我的脚后跟都软了，赶紧忙着安慰她，一边联系住院治疗。肝癌病人已是晚期没有医院肯收，跑断了双腿，磨破了嘴皮，才开后门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几经周折陈国军终于到了北京。每天拍完戏我和陈国军出门去医院看望他母亲成为北影院里的一“景”。不想受人们的指指点点我们从来分开走路，一个先走一个后走免得太招眼。

由于陈国军母亲病重，他的父亲及另外几个兄弟都来到我处，又拍戏又做饭我终于病倒了。可是即便是病倒了也不敢与人去说，因为北影厂知道他们来，个别人看到我做饭，传出去已群情激奋为我“不平”。大家摩拳擦掌气愤填膺，各种话听得太多不能说完全对我没有影响。

两个月后，陈国军母亲的病稍许有些稳定。于是我们又忙着送他母亲回家，忙着从借住的已分给某导演的房子搬到属于自己的小屋。

屈指一算，我到北京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在这么多的岁月里我特别特别想父母亲，特别特别地想家。最特别尤其特别想把他们接到北京来。过去我没有条件，想也是白想。

现在有一点可能了，于是乎我天天想。

天天想天天念天天筹划，终于这一天他们来到了我的身边。

在我头脑中一直有一个观念，没有老人没有孩子的家不成其为家。现在，我终于有一个家了。唉！多么多么地不容易啊！

日历一张张翻过，陈国军开始变得烦躁起来。

一个大男人成天无所事事受人家的白眼让人看不起，使他肚子里窝火。他变得易怒、敏感、不自信。

一种潜意识使我从来不在任何场合公开承认与他的关系，借口是怕失去观众，担心爱我的观众会觉得我再没有吸引力。这个道理也说得通，况且我许多海外的电影演员朋友也这样做。

我也从不与他一起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我自己也不明白出于什么动机。

我每天拍戏，要不就出去"走穴"，来回奔忙对陈国军的刺激越来越大。他的心理逐渐失去平衡。

我们之间时常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小事发生口角以至争吵，这种争吵日益升级，使父母和我们双方都苦恼万分。我仿佛觉得过去认识的那个勤奋、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与温存的陈国军死了，不见了，身边的这个是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四处为他活动上片子找事干，可实在是不容易。无奈何我找到《垂帘听政》的导演李翰祥，求求他能否让陈国军在我与他合作拍摄的影片《西太后》(后来改名为《一代妖后》)摄制组里作副导演。

李导演立刻拒绝了我。并且让我坐下来安静一些，他整整教育了我四十分钟。

他劝我不要结婚，千万不能结婚，不要把男人太当一回事。你现在一叶障目，觉得他就是你的天地，过一段时间不好了，再回过去一看，就会懊悔，发觉那人其实不值一提，心想："咳！我当初怎么会跟他！"

李导演从来没有单独跟我说过那么多的话，像一个慈祥的叔叔，并且我相信他说的是肺腑之言。

我眨着眼睛尽力去想他话里的道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见多识广，可是我想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只是在想着一个问题：陈国军怎么办？

心里实在是为陈国军叫屈。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有才华并且有抱负的人。可是没有人了解他。

他看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我也看过一些书。可是我看过一些书却人人皆知，他看过许多书却没有人相信。

我认为他做演员太屈才并且也不能发挥，我觉得他应该做导演。

我跟朋友说陈国军这辈子到死做演员最多是个三流演员，每个人都同意，可是我说如果他做导演会成为一个好导演却没有人理我的茬，我的话根本没有说服力。为此时常与人翻脸磨破了我的口舌。

我跟每个人说，如果你们想对我好就去帮助陈国军，这比帮助我更有用，我会感谢你们的。可是一点作用都不起。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三人成虎，把他盖棺论定了。

我带他出去"走穴"，我让他当"穴头"，并且跟我一起二重唱。在台上他比我唱得好，并且显示出他的管理才华，可是这

对电影界丝毫没有影响。

“走穴”界是另一个天地，是社会的暗流。电影界仍然对他不承认甚至抱有敌视，准确地说是蔑视。

人们听了我对陈国军的评语莫不一撇嘴唇，觉得我言过其实。他们的态度掩饰不住当然也没有掩饰，清清楚楚写在脸上。这就是陈国军的悲剧。这就是社会的悲剧。

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自始至终，社会和舆论没有忘记他。更没有原谅他。他为他的离婚，准确地说是为了爱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天我突然想到，何不现在就做导演？

对，拍一个好电影让大家看看！我把这个主意给陈国军一说，他马上就同意了，长时期窝在屋里他早已没有了自己的主张。我知道他能作导演，他也相信自己能作导演，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我马上提出我喜欢的一个剧本《无情的情人》，建议我们就拍这部影片作为开头。

我来主演。肯定有票房！

我马上去找钱。陈国军立即着手准备，新的马拉松又开始了。当然，我自己还有一大堆事要干。不管它，先把所有的事放在一边，只为这一件事努力。

我碰到人就说这件事，碰到人就说投资的事，所有的话都重复了上百遍，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在香港、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在新加坡……

那时，我作为第一个被海外观众所认识并接受的大陆演员，在大陆以外的地区十分红火。我的朋友说我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只要我出外访问总是受到最隆重的接待，我可以在前面买东西后面有的是人为我付帐，我出去时两手空空，回来时二十几个大皮箱。

于是我时常出现一个怪现象：身上穿着名牌时装，貂皮大衣，挎着名贵手袋，却囊空如洗，兜里甚至没有“打的”的钱。

从来不趋炎附势不惧权贵的我，开始一看见谁像是有钱人，就马上笑容可掬地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条件是陈国军作导演。我的条件和我一根筋似地执著，不知吓退了多少对我有爱慕之心的人。

时常是那些追求者开着车陪我逛马路，为我付钱买东西，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却在车上大谈特谈陈国军以及陈国军要拍的电影，为陈国军买东西让那些追求者付帐，伤透了他们的心。

直到最后我碰到了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在香港新华社举行的一个酒会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

他个子很高，像一座山。我仰脸看着他，脖子有些发酸。见面的第一句话我就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他第一句话就说：“可以，在五百万以内。”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只要一百五十万！”踮起脚尖举起手我与他拉了勾，表示这件事已一言为定。

我不敢松懈，继续联络。我联络了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总经理许敦乐，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总经理孙长城，还有深圳蛇口都乐影视公司的董事长、我所敬重的电影界老前辈黄宗英，他们都表示要支持我。一个月后，我作独立制片人拍摄影片《无情的情人》的合约书，在深圳蛇口签定。这件事初战告捷。

十年以后有朋友说："哇，晓庆，原来解放后第一个做独立制片人的是你！"我马上制止他，我根本不想当什么独立制片人，甚至我都不想主演这部影片。我只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只是为了陈国军作导演。别说做这么点小事，我当时的心情简直恨不得哪怕是用我过去所有的辉煌来换取陈国军的成功都是愿意的！

16

“无情”的“情人”



可以这么说,《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是我一生所拍影片中最艰苦的一部。它的艰苦程度超过我拍所有其他影片的总和。

也可以这么说,做《无情的情人》的制片人,使我在经营、管理、与人相处、协调各个不同部门,保证拍摄正常运转,独立承受资金风险及保证投资的回收等各方面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是日后我办企业当老板的第一所也是最有效的实践大学。

但在当时,我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些。在这次的台球桌上,我要打的是另一只球。一个人假设他经历了一桩重大的事件,克服了一个巨大的困难,他就会在心理上思想上成熟许多。

《无情的情人》影片从开始设想到最后枪毙不让放映,我自己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好比是当年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扔进炼丹炉,多酷烤一天便多凝炼一层,直到最后成了钢筋铁骨,火眼金睛。

我曾经很爱掉眼泪。在小的时候屁大一点事情便眼泪汪汪,待积少成多后再眯缝着眼睛一眨,大颗大颗的泪珠就像珍珠断了线滚落下来,惹得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怜爱不已。

后来大了一些偶尔掉眼泪,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场合也能起到惊人的效果。

再后来随着环境的改变,眼泪只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吝啬,不说眼泪往肚里流,至少已是"女儿有泪不轻弹了"。

现在一天之内我由被人宠惯了的明星摇身一变为独立制片人,成了大家的阿姨、领导、中心、决策者,可以说再也没有掉眼泪的资格了。

不是说你不能掉眼泪,法律也没有禁止你,可是掉眼泪没有一点用处这是肯定的。相反会让别人笑话,使周围的人对跟你干事、受你领导没有信心。你得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乐观主义的风格去鼓动别人、激励周围。

《无情的情人》是徐怀中在一九五七年创作的剧本。一九五九年发表在北影刊物《电影创作》上,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导演都想拍摄它。

十年以前，北影导演李文化曾组织过摄制组要拍摄这部影片，由我和张连文担纲主演，分镜头剧本都写好了，又不知为了什么下马了。正是那时使我得以知道这个剧本，并且喜欢上了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是个敏感的题材，回想起来，当初选这个剧本作为陈国军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有些轻率、盲动了。

在热血冲昏了头脑的当时，我们想不到这么多，年轻的我仍然存在着几分纯真的心理。艺术至上的观点一直占了主流，我相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

我不可能认识到在中国做任何事都不能脱离政治，你想远离它，它会来找你，这是我后来得知的血的教训，可是一切已经晚了。我已经交付了昂贵的学费。

不过，我还是明白事情得悄悄地进行。如果还没拍好就闹得满城风雨，那么这部影片就肯定拍不成了。首先得让它成活。我们找到了剧本的编剧徐怀中，很顺利地得到了他的支持。

然后开始改编剧本。改掉原剧本中敏感的部分，使它变成一个简单的、家族复仇的题材。这当然非常非常可惜，可是没有办法。

陈国军开始发挥他的才华。他把剧本改得很精彩并且惊心动魄。我忙着组建摄制组，做好后勤工作。

摄制组的班子来自五湖四海，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影厂各个车间。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厂中北影是当然的“老大”，厂里的职工都是全国各地抽来的精华。谁都知道，在北影当导演是最不容易的。

别说是第一部上戏的小导演，就是凌子风、谢铁骊、张水

华这样的大导演，对摄影、美术、道具、服装各部门都得客客气气、商商量量，绝不能颐指气使。据说，北影一位女导演第一次拍戏，师傅们都不听她的，动不动就给她脸子瞧使拍摄困难重重，最后这位女导演当众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我干什么要来当这个导演！"

陈国军当导演就更不消说。他来自长影，又是年轻人，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基础，虽然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与他在一起合作，可是骨子里不可能服气。组里的进展及安定团结全靠我一个人来维持。

只要陈国军讲话有一丁点不准确就有人当场顶撞他，每到此时总是我堆满了笑容藏起我的"骄娇"二气出来打圆场。差不多每次总是以陈国军的忍让为结束，我开始体会到作导演其实很可怜。

为了联络感情我用宝贵的"日理万机"时间来陪师傅们打麻将，连撒娇带哄十八般武艺用上拖着摄制组转动。

往日心高气傲、咄咄逼人的刘晓庆无影无踪。不消说我从心里感谢大家能够来帮陈国军的忙。在电影界多年我从来没有因为电影拿到过一分钱的报酬，由于对这一点深恶痛绝，我决定改革，在组里实行片酬制。

我自行拟定合同，条款全是自己心想而成。合同里写上报酬多少，补助多少，工作多少天以及惩罚条例等等。我知道这种做法在中国电影界还是第一次，于是在合同里写上要严格保密，并要求每人签字，我签字，盖上摄制组的章，再妥善保存。

可是事实证明我这样做似乎早了些。我没有想到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气候、土壤，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电影人还

没有这样做的心理准备。

我们的外景地是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那是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集居地。我在音乐学院的同班同学有许多都分配在这里的州文工团。

这里是高原，开水只能到六十度，米饭也煮不熟，高山反应是很厉害的。在我们刚翻过雀儿山进入阿坝州时，停车下来活动活动双腿，当场就有好几个人由于缺氧昏倒了。

平日在其他摄制组里发生这样的事，最多我只是看看热闹问候一下以示关心就可以了，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全得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来回张罗。我只有一边张着大嘴哈气，一边下达命令，像一条挣扎在河滩上干渴的鱼。

过去是一切事情别人都替我安排好，现在是一切事情我替别人安排好，全部的秩序都倒过来了。

第一次拍电影给酬劳使大家觉得有了摇钱树。有钱赚不赚白不赚，当然是多多益善。过去是由国家控制反正没钱，现在是由我个人管理不能让钱都进了我自己的腰包。人们完全不能理解我恨不得掏出自己的钱来拍片的心情。事实上我从头到尾没有拿过一分钱酬劳，可是没有人相信。私欲和贪婪像决了堤的洪水开始泛滥。

组里三天两头罢工。不是说饮食不好，就是要求增加误餐补助。无奈何只有安排每隔三天全组大吃一顿，每天除了合同规定的酬劳外夜餐再加钱。

就这样还是不行，于是每月再增发奖金五十元。

过几天又喊奖金太少，每天组里又发罐头。

罐头从每人一听增加到每人三听，仍然有人叫“这种饮食

只是维持生命而已”。

情急之下我个人花钱拉了一头羊来，剥了皮烧好了请大家吃烤全羊。吃过之后仍然怏怏懒懒地不想干活，每天拍着大家哄着大家惨淡尽了我的花容。

这一天拍夜景。从下午起我就开始化装。头上的一百多根小辫子费去三个化装师足足四个小时，化装完后立即站起身叫大家出发，请大家出发。颠颠簸簸到了外景场地，刚刚顶着寒风拍了两三个镜头突然全部停电关灯。

“怎么啦？”从戏的情景里跳出来，我问。“不知道。据说是今天晚饭吃得不好。”有人回答。“怎么不好？”没有人应声。只好黑灯瞎火全组往回撤，我感到太阳穴有一颗心在“嗵嗵”地跳，全身所有的血都聚集在头顶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了。

第二天，我给一批人员算了帐，硬着心肠打发他们回家。一下子组里安静了好多。

好景不长。过了几天，故伎又开始重演。又三天两头地不舒服，磨洋工。我又开始涨工资，求着大家拍。刚好了一段，又开始罢工，从小罢工到大罢工，最后是男主演带着大家罢工。

拍摄工作根本无法顺利进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使大家舒服。拍摄已失去了艺术创作的全部意义。

我的坚强个性开始抬头。没有人能使我屈服。他们不大了解我从来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

我又第二次大动干戈。我换了男主演以及摄影师还有大大小小七个主要创作人员。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拍摄的一百多个镜头要全部作废，也意味着全组人员近两个月的辛劳付之

东流。可是当时我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心都有。

我打发他们回家，我们所住的院子里乱成一团。要走的几个人在外面大声叫骂，我屏息静气坐在屋子当中。全组的人都发现我原来如此地“心狠手辣”，有人背后骂我是“暴君”，是“西太后”，说我“走马灯似地换人叫大家寒心”，可是我不再在乎。我开始真正理解西太后当年杀八大臣杀端王杀肃顺是那么迫不得已，如果我现在再演慈禧肯定会“入木三分”。

我不再跟大家嬉皮笑脸。我开始变成一个铁女人。这件事以后，大家噤若寒蝉。

全组静静地蹲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青藏高原，等着我们重新选演员，重新组班子，等着新班子到来的一天再重整旗鼓另开张。

此时我们送到香港去洗印的第一批样片几经周折历时将近一月到了珠影厂。在我们发去长长的实际上是一篇文章的电报到达珠影时，老板们对样片的意见也被邮递员送到了我们手中。争先恐后传阅电报的我们，犹如万丈冰水从头泼到脚。全篇电报都是样片的不足：焦点虚，曝光不准确，人物不突出……

这个重重的打击使我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我觉得快要倒下了。撑起自己的躯壳，我春风满面地对大家说：“没关系！主演、摄影我们都换了！我们重新开始！新的主演、摄影马上就来了！”

新的主演、摄影在哪里呢？根本八字还没有一撇。我们每天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坝邮电局的电话间里扯着喉咙大喊大

叫，终于在近一个月后的一天，把新的主演和新的摄影喊叫到了阿坝州。

陈国军整天埋头于创作。跑牧区，去藏民家，选外景，体验生活。强烈的高原紫外线使他成了一个纯粹的“煤球”。我承认我曾为他铺平道路，可是我从没有参与过艺术创作。我根本没有精力，也完全没有时间去管艺术，杂七杂八的烦心事已大大超过我的负荷了。

可是几个月后在北京影协放映间，在看完影片后的座谈会上，人们就是不相信这一切。大家硬说这是我的作品，把好的归功于我，把坏的归咎于陈国军，完全彻底地和我们拍这部影片的初衷背道而驰。

陈国军继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组里的人不相信他的能力，也不相信我的介绍，在现场常常不服从他的指挥。而我们现在毕竟还看不到完成片，镜头毕竟是一个一个地拍出来的，无法感觉到导演的才华。

摄制组根本不存在什么“导演中心论”。每一个人都是中心，时常在现场吵得一塌糊涂。烦躁不堪的陈国军找不着人出气，只有把我大骂一通。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为了维护他的威信，我一直隐着，忍着。可是这种当众对我大发雷霆逐渐频繁，逐步升级，以至于有一天为了请求他不要再当众发脾气，我整整哭了七个小时。我一生当中只有两次这样长时间地哭过：一次是在阿坝，还有一次是我与陈国军离婚。我唯愿在今后再不会有这样的哭泣。

在哭过七小时之后的第二天，双眼肿得像水蜜桃，用热毛

巾狠狠敷了一阵，然后继续拍戏，可是陈国军没过十分钟又为一件小事当着全组对我破口大骂，伤透了我的心。尽管我一再告诉自己，要原谅他处境不顺利，心情不好，不对我发脾气还能对谁发脾气？尽管在后来全组都了解了他的才华，也开始对他信服了，可是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深深的、不能弥补的裂痕。

摄制进度不管怎么说在阿坝州拖着拽着倒是一直在向前爬行。阿坝州气候一天十八变，弄得我们速度是慢得不能再慢了。看着蓝天白云，宽阔的草原开满了野花，我们架好了机器，打好了灯光，突然来一场瓢泼大雨。瓢泼大雨过后又是雷电交加，雷电交加之后往往天空出现彩虹。眼看着彩虹一节一节地消失，再接着下冰雹。天气变化之迅速无穷使我觉得最难的工作就是阿坝州的气象员。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是我正在做的工作。

摄制组刚刚有一点走入正轨，香港方面突然停止了给我们的投资。大概是看我们总是出故障，锣齐鼓不齐，一夜之间对影片丧失了信心。摄制组困在藏族地区的高山上弹尽粮绝。没有钱借钱，再不就欠钱，每天向香港要钱，打电话把电话机都快打烂了。电报发得之多之长足以装订成一本小说。尽管拍摄进度每天似蜗牛，但凡事总有尽头，磨来蹭去我们终于到了停机的一天。

但是，我们在当地负债累累，根本就不敢离开阿坝，全组在等着香港方面寄钱来。

所有的人都在煎熬。这种煎熬是最难以忍受的。就像小时候游泳，计划要游到对岸，匀着力气向前游，估摸着到岸了，

于是手往前一伸，等扑了个空时再抬头一看，离岸还远着呢，突然之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再也游不动了，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

没有钱吃停机饭，我根本没脸好意思与大家庆祝我们外景拍摄工作的结束。我每天躲躲藏藏夹着尾巴做人，我内外交困。

好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是哪一天？真是记不清了。管它哪一天，总而言之我们终于得到了答复，几位老板从其他地方调了款给我们，电报收到了，可是钱还在路上。我决定大队立即出发，把制片主任留下来当人质。所有人立即风卷残云收拾行李，一个个跳上车，如同国民党军队撤退，虽然匆忙杂乱，但仍然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阿坝藏族自治区。

紧接着又是拍内景，同时后期制作剪辑、混录，由于倾心投入，着急上火，陈国军的眼睛开始出血。

如同再深重的苦难也会有结果一样，影片终告全部完成。

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试映的那一天，全厂座无虚席，影片放完后全场震动不已。珠影人人都欢腾鼓舞，我们更是欣喜若狂。公司副总经理王进说："明年的'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肯定是咱们的了！"

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将影片送交上级部门审查。那种心情无异于一群老农民，披星戴月，餐风宿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辛苦备尝地种出了一个大南瓜，喜不自胜却又提心吊胆地给不种南瓜专门吃南瓜的人品尝评价。

我简直不能在放映间里陪同看影片到最后。那种情形太像囚犯等待宣判。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系于这两个小时之

间，我已缓不过气仿佛要虚脱。勉强看看陈国军和摄影师李月斌，跟我差不多。陈国军看我一眼强自镇定，李月斌脸色苍白，他的妻子一直握住他的手在安慰他。

影片结束。放映间里立刻灯火通明。宣判的时刻到来了。为此想到我一定能演好一个囚犯，因为我自认已经历过这种时刻。

“影片不错。”领导慢吞吞地说。我们不敢松气，等着下文。

“外国人会喜欢。”领导接着说，“可是外国人喜欢不一定是好事。”

我的头开始眩晕，他的声音开始变远。

“这部影片国外就不要放了。在国内放一放吧。”判决结果出来了。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回到家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等缓过神来后一想，国外不放就不放吧，先在国内打响了也好。于是振作精神赶紧一边印拷贝，一边去各单位放影片答谢，再请专家看，提意见。

专家们对这部影片反映不错，说了许多赞誉之词。可是差不多每个人都冲着我说，好像我是影片的导演，尽管陈国军在场并且坐在当中。这一点令我很不舒服。

忍不住只有亲自杀出来，我开始介绍导演的刻苦以及他怎么创作等等，可是不大管用。人们改变了方式，在谈话的开头对着他，可是说着说着又冲着我。我看出来，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认定这部影片是我的作品，陈国军只是傀儡。

我十分沮丧。没想到我帮忙帮忙帮了倒忙。这个时候，我得到电影局的通知，夏衍要跟我谈话。

夏衍是电影界的元老，是资格最老、成就最大的艺术家，对我来说，是我的老老前辈了。他以爱才出名，一直关心我扶持我。他看完影片《原野》后说："刘晓庆演得很好，'金鸡奖'评选我首先要投她一票！"可是不久《原野》这部影片就禁演了。《我的路》发表后，全国上下众说纷纭，夏老说："中国作家协会又要有一个新会员了。"几年以后，我因为《我的路》、《我这八年》两本书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新会员。再后来我要拍摄影片《红楼梦》时，已经九旬高龄的夏老专门找我谈话，可以说，我是电影界夏老最关心、最特别扶持的演员。

此次夏老找我，有什么事？我立即赶到电影局。

那一天大雪纷飞。

夏老这么大冷天还出来，真是不好意思。正在想着夏老被人扶着已经进了门口。

"《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拍得不错。"夏老一坐下就说。我心里泛起一阵喜悦。得到老老前辈的夸奖，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部影片不能放映了。"夏老说。

"为什么？"我不顾体统，立刻从椅上跳了起来。

"坐下坐下。影片牵涉到少数民族的某些民情风俗问题。有关部门专门请我来做做工作。我在大雪天出门找你，就是怕你想不通。"

我当然想不通。我不可能想得通。我绝对不会明白一部电影怎么会对一个国家有那么重大的影响。我开始喋喋不休地对夏老说，您知道吗现在电影院场场爆满。您知道吗观众反映是多么强烈。您知道不知道这是自《农奴》以后第一部描写藏族同时又拍得那么美叫观众喜欢认可的片子……

可是一切已成定局。全国各地的电影公司都收到了通知,《无情的情人》即日停映,拷贝全部回收。

将近二百个《无情的情人》影片拷贝直到我写本书的这一分钟还静静地躺在仓库里,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就这样被泡了汤。

《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就像一个新生儿,母亲十月怀胎又碰到难产九死一生刚来到这个世界,活蹦乱跳充满了生命力,可是还没有等人看清楚它长得什么模样就夭折了。

我是一个倒霉蛋。在我的电影生涯中,倒霉的事情层出不穷,实在可以称为是电影界之"最"。

我参加拍摄并主演的电影枪毙过的就有三部,无数的影片不能参加评奖于是也就没有得奖的资格:

《原野》被禁演了八年;

《无情的情人》被枪毙了;

《芙蓉镇》在拍完一年之后才公映;

与台湾合作的电视剧《风华绝代》也被台湾新闻局判了死刑……

就连我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也只是在当时全国为数甚少的电视机里面放映过一次。

另外,我主演的影片《神秘的大佛》不能参加评奖;

《潜网》不能参加评奖;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不能参加评奖;

《一代妖后》不能参加评奖;

《大太监李莲英》不能参加评奖……

还有,我写的《我的路》受批判;

连我主持的电视节目《世界电影之林》也受批判……

只有一个妹妹就结一次婚，大年三十新郎官还被错抓到公安局……

就连北影剧团一次去工厂慰问，前后的节目都好好的，演到我的节目就停电，有人说我是“喝凉水都塞牙”。

17

我的第二次结婚——已有裂痕的婚姻



《无情的情人》夭折以后，我们像霜打了的庄稼，成天蔫蔫地抬不起头来。好在影片已经卖给中影公司，在投资成本回笼之后还赚了一点钱，总算对得起投资方。只是我们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一切又回到原处。《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从开始拍摄到最后夭折，就像是一潭死水扔进了一颗石子，尽管泛起过层层涟漪甚至还有过小小浪花，可是当一切过后又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也就像那黑沉沉的天空划过了一道闪电，尽管它曾照亮过一瞬，可是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仍然是原来的天空。

陈国军仍然无所事事。我照旧片约不断。

时不时地有人来检查我是否与陈国军同居。我母亲从未经历过这些事，一直暗地里为我担心，总是催我结婚。可是我不想结婚。我当然不能告诉母亲我们之间已有了裂痕。

此时上影厂谢晋导演在筹拍上下集影片《芙蓉镇》，北影厂导演谢铁骊在筹拍六部八集影片《红楼梦》。谢晋和谢铁骊都是卓有成就的大导演，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雄踞中国影坛，电影圈里称他们为“南谢北谢”。

这一年“南谢北谢”同时请我。谢晋邀请我扮演《芙蓉镇》的女主角胡玉音，谢铁骊邀请我演大观园里的二奶奶王熙凤。两位都是好导演，这一点不用多说，两个角色从内心来讲我喜欢胡玉音。

《芙蓉镇》这部影片过去广西厂长影厂包括北影厂都曾经要拍，几个导演“英雄所见略同”，全是请我扮演女主角。这一次谢晋导演也来请我，我心里早已认定这个角色非我莫属，越看小说越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为我而写的。

王熙凤过去已有别人演过，刚刚拍完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即将放映，并且他们都演得不错，再演一次我没有什么新鲜感了。这个人物既难演又不讨好，三年的时间花在《红楼梦》当中，太长太长了，不值得。

连续拒绝了几次，北影动用了老厂长汪洋。

此时，汪洋厂长已因为中央“一刀切”的政策而离休，厂里已换了新的厂长。

了解我为人重感情的个性，北影请汪洋厂长出山来说服我。

几次亲临我家仍然没有回音，汪洋厂长急得高血压都犯了。心一软我灵机一动，提出除非把陈国军调到北京作为交换条件才肯扮演王熙凤。

第二天厂领导就同意了我的条件，于是我也立即去《红楼梦》组报了到，同时北影也同意把我出借给上影主演《芙蓉镇》，我也开始了拍摄前的案头工作。

我很高兴。陈国军的调动总算解决有望了。

一年多以来，陈国军一直没有回过长春。回去也没法呆。能调到北影当然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当我向厂领导提出希望陈国军调到导演室也得到同意的时候，第一次像大热天吃了冰棍那样舒服。

几天以后，人事部门来了电话，要了解我与陈国军的关系。我厚着脸皮说是夫妻关系。电话挂了。过了几天又来了电话，说是要看我们的结婚证，让我尽快把结婚证送到人事处。

这下子卡了壳了。一直以来陈国军都在向我提出结婚的问题，我推三推四没有正面答复，父母亲暗地里催过多次我也迟迟不表态。现在厂里要看结婚证，如果没有结婚证他们肯定不调陈国军到北影，此事叫我费尽了踌躇。

全家都给我施加压力。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我不想结婚。结过一次婚，离过一次婚，心已经伤透了。婚姻只是一张纸，它说明不了什么。

可是面临到陈国军的调动问题……这是他一生中的大

事。想起他为了离婚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为了爱我不惜牺牲一切……难道我连这点事都不能回报他么？

抬起头来，我开玩笑地说："结婚可以。但有三个条件。"

陈国军说："你说吧！"

"第一，不要跟我发脾气。"

"可以。"

"第二，如果有一天我提出离婚你要同意，不要设置障碍。"我接着说。

"当然可以。"陈国军答应着。

"第三，谁挣的钱归谁所有，离婚时不能为钱发生争执。"

"我都同意。"陈国军十分爽快。

还没有结婚便谈离婚，未免有些不吉利。况且谈的全是钱什么的事，虽然是开玩笑，我心里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卑鄙，多多少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尤其是陈国军毫不迟疑地满口答应更对比得我心地太肮脏、太不纯洁了。尽管在两年以后我为当时没有把这些协定写下来而懊悔不已，尽管一切均被我开玩笑却不幸而言中，可在当时，我刚刚说完这些话后便脸红耳赤，同时感到深深的内疚。

虽然离婚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结婚却只需要十分钟。

当天下午，不到十分钟我们便领出了结婚证，晚上在一个小饭庄请了不到五个亲朋好友，一辈子的大事就这样了结了。无论我心里怎么想，事实上形式上我都已经是陈国军的老婆了。

我当然不会想到为了解除这个不到十分钟就缔结的婚约

花了整整四年多的时间。我当然更不会预料到为了两张薄薄的纸片会掀起惊涛骇浪。人要是能预计到将来就好了。可是生活不会倒转。我又一次为自己的仓促、草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表面上舆论上我和陈国军仍是朋友。我们说好结婚这件事秘而不宣。把结婚证交给了人事处后我就去了上影拍摄《芙蓉镇》。

在陈国军的调动工作中我结识了广电部人事处的张满堂。他把陈国军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效率之高之快绝对是迅雷不及掩耳,看见他我仿佛看到了雷锋再生。

在“再生雷锋”的帮助下陈国军的户口很快到了北京,并且分配在北影导演室,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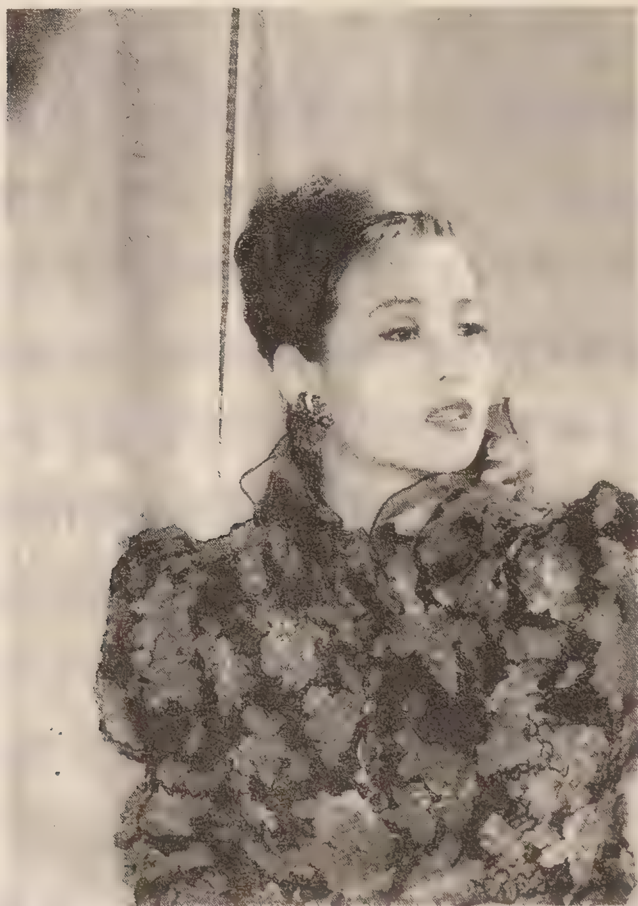
这个章节有了句号。新的章节开始酝酿。

只是具有特别意味的是:我为了调陈国军而去拍的六部八集巨片《红楼梦》历经我们结婚、陈国军调动并且调成功、陈国军还拍了另一部戏、我们又开始离婚,这部影片才拍完。

直到现在我都不能也不敢看,也没有看这部影片。只因为在那些精美绝伦的画面背后,一页页记录着的是我第二次婚姻的兴亡,在王熙凤嬉笑怒骂的心底,饱含着表演者所有的辛酸!

18

为钱奔走，为钱发愁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发愁过钱怎么能用得完。就像是叫化子突然捡了金子，不知道把这些金子派什么用场。

彩电、冰箱很快置办齐全，在商品经济还没有开始发展的中国，除了吃饭就没有太多的地方消费了。

也曾有过一段时间，由于办个人影展或是主持演唱会我频频出国，在外出期间受到当地华侨热情的接待。他们送给我所想要的一切东西，有的是人为我付帐、签单。

每次我都买了所有能带得走的衣物、首饰，还买许多东西送给朋友，在一次随东方歌舞团出访，我送给了女演员们几乎每人一套美丽的衣服。

我逐渐开始奢侈，连内衣、内裤、长袜、短袜、钥匙链、钢笔套全是最贵的名牌。每一次出国我都疯狂购物，以至于一次从香港过罗湖海关，由于箱子太多又没有足够的人手，我竟然虚脱在途中。

我就像穷极了的人突然见到了金山银山，敞开了所有的衣袋拚命往兜里装。直到有一天我照例买了无数的东西，实在是拿不动坐在路边等车，看着重重叠叠堆积如同小丘陵般的大包小裹突然觉得兴味索然，心里空荡荡的没有根底。在那一瞬间我翻然醒悟，我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金钱买不来的。物质生活其实很容易满足，就像好吃的菜吃伤了胃口反而会产生厌恶一样，世界上凡是用钱能买到的都是廉价的。

那一瞬间成了我后来生活、工作的转折点。每当在钱与欲的关键时刻，我就会想起这一次的切身体会，它总是提醒我明白并且想清楚什么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最宝贵、最重要的是什么?爱心。想起自己走过的艰难道路，想起过去的风风雨雨，我一天比一天深切认识到今天得来得不容易，认识到天下有许多比我有才华，比我智商高的人由于得不到机会发挥，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无声无息地自生自灭了。

我实在是太偶然的一个，太幸运的一个。

这问题我曾经天天想、日日想，在不短的一段时间里。然后，我开始抱着感激的心情生活。我感激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我热爱周围的一切。我开始潜移默化地转变，秉行“宁可天下

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信条。许多事我为自己做不到，可是为了别人、父母、朋友我可以做到。

我去过了世界上许多地方，也见过了许多天下奇观，吃过了许多山珍海味，见过了不少大小世面，每当享受这些时刻的同时，我都深深地遗憾：我的父母、外祖母、我的家人，他们不能与我一起分享这些快乐。

我得到过的，也要让他们感受到。

十几年后的今天，许多人都问我："是什么原因触发你当初做生意赚钱的动机？你是怎么开始的？"

啊，说起来太久远了。追根寻源理着线头返回去，最早最初的挣钱意识只是出于我对父母、家人的一片深情。

在筹拍影片《无情的情人》的时候，我们在深圳蛇口改编剧本，作各种案头工作。我们住在海边一群别墅中的一幢小别墅里，每天晚饭出门散步看着那朦胧夜色中的美丽房屋总是突发奇想："唉！这辈子要能买这么一幢别墅，让外婆、父母来住就好了。"这句话每当我看到这个别墅就说，不知说了多少次。当时觉得也就不过是那么顺嘴一讲，哪有这个可能？

可是须知我的话确实是不能随便说的。了解我历史的人会发现我许多年前的胡言乱语差不多都在以后变成了现实。

比方说，在小学的时候我写作文，长大了要当一名文艺工作者，赢得无数的掌声和鲜花。作文写完被老师当作典型全班批评了一通，可是在几年之后我就考进了音乐学院附中，干起了文艺专业。在音乐学院许多单眼皮女同学想方设法去动手术作双眼皮为了将来在舞台上更美丽动人，我虽然那时两只眼睛一只单一只双我也不打算去做手术，并且告诉大家我

要做电影演员。这句话的结果尽人皆知，我成了一个电影演员，并且成绩还不算差。

在农村挖地的时候大家开玩笑，当玩笑开得过火的时候我总是戏谑地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得罪我哦，我这个人是注定要全国闻名的，等我出了名再拍我的马屁就来不及了……"我现在确实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明星。

前面我已经写到过，在军区话剧团我数剧本时说如果数钱这么累就好了。不出十年的一天我数钱就比我当初数剧本还要累得多。

我也曾说过一句"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引起轩然大波，可是几年后人们叫我"中国影后"，并且在那几年又有至少上十次的民意测验"最喜爱的女演员"中我以绝对领先的票数获得第一名。

这次关于蛇口的别墅我又说了好几句话，一年半以后直到现在，最美最好的一幢离海边最近的别墅成了我的家。

我借钱买了它。可是我晚了一些。我说这句话时别墅价值才六十万港币，在我买的时候它已变成一百十五万元。可是我没有办法，在它价值六十万的时候没有人肯借钱给我，现在有人借钱给我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

我到现在还在惊讶自己当初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一百十五万！简直是天文数字。我的所有积蓄在办理房屋手续及简单的装修中已花得一干二净。也许是太爱自己的家人？也许是热血冲昏了头脑？也许是因为"走穴"认为有能还上的那一天？不管是哪一个"也许"，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我为买这幢房子负债累累。

我从来没有过买房子的经验。事先我绝对没有想到养房

子还要花许多的钱。原以为买了房子往那儿一放,一劳永逸,打开门进去住就是了。谁知道我简直错了。管理费、花园维修费、花工费、空调费、保安费、电话安装费……连电费、自来水费都是采用的香港标准,都比大陆水平高出许多。而且一律还得以外汇结帐。我到哪里去弄这些钱?

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到现在,从没有为钱这么着急过。虽然曾经几次一贫如洗,可一直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且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我现在是负债经营,尽管借钱给我的朋友并不要求我还钱,但是我一定要还他的钱。用别人的钱心里不舒服,我最负不了的是人情债。再说世界上本来也没有什么白来的事。

一咬牙一跺脚我开始了全中国的"走穴"。

不管是"大穴""小穴",不管是城市农村,不管冬夏寒暑,一有时间我就去"跑码头"。大钱也要小钱也挣,一挣到钱就存起来,然后再想办法换外汇。

这期间拍摄《无情的情人》花去了我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中我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我这位"独立制片人"没有为自己分配片酬。

"走穴"对我来说是唯一挣钱的渠道。我们上山下乡,餐风宿露,备尝辛苦,每一分钱都浸透了血汗。

我们白天演出一天,晚上行车一夜。时常是车刚到观众已坐满剧场,我们冲上台就开始演出。

什么样的舞台我们都演过。由于人太多太拥挤,观众常常是密密麻麻站满了舞台周围,把下巴搭在台上看我们的演出。每次表演舞蹈都得特别小心,向后退一步踢到乐队,向前

多一步就踹到观众的脸上了。

大热天闷在剧场里密不透风，上台一次下来演出服被汗水湿得一拧就能出水，架上电风扇猛吹一阵才能勉强穿上身继续下一场的演出。汗水时常掉进眼里、嘴里，睁不开眼睛唱不出声来，满头满脸水淋淋地像刚从河里捞上来似的。每次演出告一段落我都累得像是大病了一场。回到北京后昏昏沉沉至少要睡一个星期才能恢复正常。

演出日益频繁丰厚了演员们的钱包，大家无不欢天喜地，只有我越数钱越发愁。这点钱维持日常生活自然是绰绰有余，可是别说还债就是养蛇口的房子都是杯水车薪。隐隐约约听说国家已公布了税法，个人所得税最高可达所得额的百分之六十。正在普查演员“走穴”的税，假使这点钱再交税那还得了？

愁眉苦脸的我整日价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突然一天接到“穴头”的电话，他告诉我税务局已来过了，然后挂上电话在四十分钟后到了我家。他接着说，税务局把我们的情况全都查了个一清二楚，每个演员都交了钱，现在就剩你的了。我问他能不能不交钱或少交？他说那哪行啊？别人不交也许可以，你不交树大招风还过得去嘛？听说不交税要进监狱可吓死人了。咱们可别撞在这枪口上。我一听二话没说进屋去开始数钱，交钱给他如同交我的心我的肝，疼得不行。他走后我捶胸顿足发泄了一通，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意识到往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了。唉，这样下去怎么活啊？

蛇口的房子一直空在那里。我根本不敢让全家去住。也许我去找蛇口的老板袁庚说情可以答应尽量给我优惠，可即便优惠我仍然不胜重负。这次一交税再加上开支，我又变得

两手空空。我有过多少次两手空空了?

一扭头只有再去“走穴”,疯狂“走穴”。可是,我要开拍《芙蓉镇》和《红楼梦》了。蛇口那幢美丽的别墅成了我的负担,如同一只沉重的蜗牛,我背着我的屋子到了《芙蓉镇》摄制组。

此时,我又接到通知,上级已批准我去美国举办“刘晓庆个人电影展”,即日就要成行。我知道美国方面一直在邀请我去美国举办个人电影展,只是觉得根本没有希望也就没有努过力,尽管我从没有去过美国当然也希望能去一次美国。可是世上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在过了漫长的时间之后我去美国的事竟然被批准了。

既然批准了我就去。不去白不去。先把我美丽的房子扔在一边。《芙蓉镇》摄制组已出发去湖南体验生活,等我回来。

匆匆忙忙赶回北京,匆匆忙忙收拾行装,匆匆忙忙上了飞机,云里雾里我到了美国。

19 可怜巴巴在美国办个人影展



啊美国！无数中国人朝思暮想的地方！

冒险家的乐园！淘金者的天堂！

神秘东方大国的电影界代表来了，你一定会隆重欢迎她吧？

精心地打扮一番下了飞机。奇怪，机场外没有拍电视的，没有记者，没有欢迎仪式，远远地只有零星几个华人衣冠楚楚站在那里。他们不会是来迎接我的吧？

一个小姑娘从他们当中跑过来，献给我一束鲜花，果然被我猜中那就是迎接我的队伍。

掩饰住些许失望上了汽车，车开到了旧金山中国领事馆。与我在电影上看到的繁华、喧闹、枪弹横飞的美国大不相同，旧金山干净、整齐、静幽幽的。

到了美国一直都觉得冷冷清清。也许是不大习惯吧，我心里这样想。

中午去了一个小小的中国餐馆吃饭，才弄清楚了大部分的情形。

请我来美国的并不是我过去想象的那样，是美国文化部或是华侨团体什么的组织，而是一位开杂货铺的老板林先生。

林先生来自中国大陆，看过我的电影，是我的影迷，一直对我推崇备至，于是向中国文化部频频发出邀请并采用了各种方法，终于请到我今天隆重抵达旧金山。

我也知道了大概的日程。在美国的电影展几经与中国有关方面交涉，只批准我们带了几部影片：《北国红豆》、《潜网》、《神秘的大佛》、《小花》。我的其他作品，比如《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原野》、《无情的情人》等，都不允许我们带。

虽然是个人电影展，可展出放映的都不是我的代表作。美国人及美国的华人看得懂吗？会喜欢吗？我心里充满了疑惑。

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一直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尽管后来中美关系大大改善，可是中国——尤其是大陆与美国的文化交流还没有展开，可以说是一个空白。这次我在美国办个人影展，在大陆演员当中自建国以来还是头一回。

虽然气氛有些惨淡但还是想镇住他们，这是人之常情。

可是我带来的影片根本不能起到我想起的作用，我不由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的影片在旧金山一家小影院放映。每天轮换放一二场。前来祝贺捧场的嘉宾有我的老朋友陈冲、陈烨等。在旧金山我们被安排每场都要上台和观众见面，然后再去洛杉矶照本宣科。

我压抑住心里的不舒服。虽然在中国也有过影片放映之前与观众见面的情况，可那只是一次，而这里安排我们每场一次！是不是有些掉价？

看到我脸色不大好看，林先生的助手只好说实话，因为电影票卖得实在不好，只有请我们几位辛苦一些。

我无可奈何只有表示同意。到哪座山唱哪支歌，不然怎么办呢？

影展定在第二天早晨剪彩仪式后正式开始。

一大早我就起来打扮。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美国不就为的是今天这一锤子买卖吗？

我的香港朋友郑明明小姐专程赶到旧金山。她是著名的美容美发专家，不仅为我带了一大堆衣服，还带来了最好的发型师和化妆师。

我们一通忙碌：洗脸、擦油、打底、上粉、画眉，眼影、嘴唇、腮红、睫毛膏，还有洗头、吹头、做头、定型，头饰、首饰，试服装、改服装、穿服装、配鞋……

一边任他们摆布一边我在想，林先生有没有请保卫呢？要是人山人海生命发生危险怎么办呢？听说是在大街上剪彩，那还得了！在中国别说是在大街上，就是在电影院少于五十个警

察都够呛。

我选了一套亮闪闪比较夸张的红色礼服，在这样以我为中心的大场面里要抢眼一些，观众人山人海也容易找到我。

不过今天的礼服裙摆有些窄，恐怕退场的时候走不快，我试着把裙摆往上拎了拎走了几步，好了一些。对，结束了离开就拎着裙子走。那个时候人群一拥挤，根本看不到我的动作。

正在胡思乱想有人来叫抓紧些，说是人们已等了好长时间了。“快点！快点！”我拚命催着他们，自己赶快往外走。折腾了差不多四个小时还没有收拾妥当，千万别起个大早赶了晚集。一边走一边提鞋，化装师服装师跟在后面做最后的整理工作，哗拉拉我们一大群前呼后拥到了现场。

是在这里剪彩吗？放慢了脚步我看看大家。好像是的。一根红绸放在那里，十来个人围在旁边。都是我见过的人，好像也没有看见记者。有几个拿着照相机的都是林先生的助手和朋友。

原来仪式是在电影院门前。我走到当中，面向大街。我身后的大幅标语“中国影后刘晓庆电影展”与屈指可数的开幕式参加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街上没有什么行人。偶尔有一两个行人走过也没有往我们这边看一眼。

简短的发言过后，我、陈冲、陈烨剪彩。拿起剪刀就是一刀，一秒钟结束了一上午忙碌杂乱而精心设计的工作。

紧接着放我的电影。我们上台与观众见面。主办人、祝贺宾客还有我们几个影星轮流讲话。电影院非常小，一览无余。下面坐的都是刚才参加开幕式的人。尽管影院不大仍然白花花的有许多空座位。我不免脸上有些发烧。

从台上下来之后，电影开始放映。我们坐在休息室等着

第二场上台。我不敢想象那放电影时的场面，更不敢问周围的人对影片的感受。尤其是跑到旧金山来放《神秘的大佛》，想起自己那几脚几爪拙劣的功夫，还美其名曰是堂堂的“中国影后”，哇——惭愧惭愧！

好不容易熬到第一场电影结束，第二场硬着头皮我又上台，照例是我走前面，陈冲、陈烨陪我，再加上主办人及其他成员，在台上长长的一排。往台下一看，乍一眼没有看见人。再定神仔细一瞧：好像有那么三五个人缩在椅子中间。我简直在台上有些站不住了。往左右一瞅，陈冲、陈烨倒安然若素。也许不是放她们的电影？也许是见惯了这样的场面？

我们照样气势磅礴地讲话，表决心，对着那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像一出活报剧。

我开始拒绝上台。可是广告已经登出我们要上台与观众亲自见面。说不定那三五个观众就是为了见面才来到影院的。而且主办人已亏本很多。尽管我住的是中国领事馆，又省钱又勉强有了面子，但其他费用仍然不少。于是林先生提出办一场演唱会，在“中国城”，台湾人集居的地方。

现在只能这样。总不能没有机票钱回北京吧？

要办就赶快。可是来之前我根本没有作任何开演唱会的准备，临时抱佛脚，闭上眼睛赶紧冥思苦想。

“走穴”的节目一个个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写曲谱，“走穴”练就的功夫今天在美国派上了用场。

紧接着开始合乐。乐队是台湾的乐队。合了好多遍都疙疙瘩瘩的，我的嗓子都哑了。到后来乐队不耐烦了，停下来不动。我问他们怎么啦？他们说不会弹，太复杂。我说很简单。

他们说大陆的歌他们不会，这个♭E 调也太难。

一股火冲上心头，我说我弹给你看！放上曲谱，摆开架势，我把♭E 调、D 调、F 调从头到尾行云流水地演奏了几遍，然后到爵士鼓边拿起鼓槌飘逸潇洒地打了一回，所有人不出声了。震得心服口服。

哼，他们哪里知道我本来就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扬琴是我的专业，钢琴是我的副科，我是学院的尖子、佼佼者，这点曲子，小菜！

扔了鼓槌，我走下鼓台，命令他们照着弹！

全老实了。没有人想到一个电影演员还会这一手。我合了歌，合了扬琴独奏，还合了独舞。说实话演奏乐器我比他们强多了。

排练以后一直在场偷看的一位记者佩服地问我："刘小姐，像你这样全才的电影演员在中国就你一个吧？"我告诉她："多得很！一抓几大把！中国有十一亿人口，比我棒的、比我优秀的数都数不过来！"那位记者想了想，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

我的"个人演唱会"仓促上阵，隆重推出。结果是在一个餐馆表演。周围都是饭桌，中间一个小圆台。客人一边吃一边看我跳舞听我唱歌，好像是个夜总会？不过我到美国已有几天，不属于初来乍到，干什么我都不会惊奇，眼睛一闭把这里当作中国几千几万人的大体育馆，设想下面是人山人海黑压压拥挤的观众，眼睛一睁放开喉咙就开始唱。

演出以后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我表面上假装点头微笑，心里想其实这算什么，简直是雕虫小技。有机会到中国去看看，那才震你们呢！因为电影在这里没打响，只有另要几把拳脚展示一下，堤内损失堤外补吧。

吃饭中间我又与别人吵了起来。应该说是辩论。不，是争论。其实还是吵架。原因是我总听见有人说中国大陆不好，扪心自问好多地方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啦什么的，在国内我发的牢骚比他们还多得多呢。可是在这里就不行。他们说就不行。一说大陆不好我就跳起来和他们吵，一定要争赢了才停嘴。台湾人，香港人，美国华人都背后议论说我是共产党派出来专门搞宣传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当时在国内正在挨批判，受批评，是“内控分子”，批准我这次来美国那才叫难呢。

然后我们去洛杉矶。老一套。上台和观众见面，在电影院。照样没有几个人欣赏。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多。我的脸皮已练出来了，使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一套“当众孤独”。吸取旧金山的经验，在洛杉矶主办者要举办一场大型的个人演唱会“刘晓庆之夜”。

卖票照旧是非常困难。演唱会在伊丽莎白剧院举行，很正式，很大，不是旧金山的那种餐馆。为了够份，票价也不便宜。要推销演唱会的票，主办人要求和我步行去报社介绍情况。

想起在国内自己经常对记者带搭不理的傲慢态度，居然在这里亲自上门去请人宣传，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存在决定意识。心一横把脸揣到兜里，跟着主办人招摇过市，四处送票，像一只笨拙的不会搔首弄姿的花公鸡。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当我在前面高跟鞋咯咯乱响昂首走过，主办人便将一叠子演唱会的票放到刚刚与我点头微笑作自我介绍的那位先生手里，我斜眼一瞟，正好看见那位先生做的那个鬼脸。

我的面皮已经比城墙拐弯还厚，该干什么我就吆喝什么。

开演的那一天，不敢往台下看，听人说剧场里竟座无虚席。也许都是送的票吧。我想。

站在台上居然有些心跳不匀，想起在国内有近千场的"走穴"经验还会紧张，自己也有些不理解。

脚下的干冰在我华丽的晚礼服周围弥漫，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庄严的情感。我突然意识到当幕一拉开，在观众面前出现的不是平日在国内自由散漫惯了的刘晓庆个人，而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管我自己是不是或是愿不愿意，今天对他们来说我就是大陆，我就是新中国。这时我清晰地感到万里长城就在我的背后，十一亿的中国人民就在我的背后，我一点也不孤单了。

晚会比我预想的还要成功。记者们争先恐后向我提问题，来自中国大陆的电影演员使他们十分好奇。想不到在国内"走穴"练就的本事还有这么大的效果。

我对答如流地与记者讲话，渗透了我对遥远北京说不尽的切切深情，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思念中国啊。连我自己都觉得像共产党派出来的宣传员。

在旧金山、洛杉矶，好些人问我要不要留在美国，他们可以为我提供高额的奖学金。我想过之后说："不。我的艺术在中国，离开中国这个土壤我将一钱不值。"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说话越来越像喊口号。

这些讲话很快就发表在国内的报纸上，并且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回国之后，无数的人对我讲的这些话赞不绝口，认为我是爱国的榜样。许多记者都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你知不知道由于这些话许多人改变了对你的看法？我说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爱国只是我自己的情感，我不想以此去获得什

么。

其实在当时我说这几句话时纯粹是个人发泄，根本就没想到会被登在报纸上。这几句话没有丝毫的了不起，只是我内心的真实看法。

在中国人人都会像我这样做并且做得比我更好。我心里想，要是知道会登在报纸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还可以把语言组织得更精彩，更响亮，更豪迈些。

无数的记者要我描述在美国影展的“盛况”。我说没有什么盛况。

那么谈谈你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我说不成功。影片带得不多不好，不怎么受欢迎。

然后问到演唱会。我说都差不多，可能效果要好一些，马马虎虎。可是没有人信我的话。

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变谦虚了”。报纸上仍然连篇累牍地登载我在美国的“轰动”，我的“良好表现”等等，等等。

世上的好多事就是这样地让人弄不明白。在美国我还遇到一位朋友，她在美国很吃得开。她说她可以帮我拿一个奖。我说什么奖？奖还有拿的？她说可以。

她可以做到。为我弄一个文化交流杰出贡献奖，这事交给她办，我就别管了。于是在回中国之前我拿到了这个奖。没有仪式，也没有鲜花，奖状就到了我手中。这件事中国报纸也刊载了一通。

据说在国外各种名目的奖特别多。我想，只要是谁去了外国，只要有心，都可能弄它一两个不同名称的奖吧！

在回中国的飞机上，我疲惫不堪，就像刚从战场上回来的

士兵。

离开了“外患”，那深深的内忧又回到我的心中。

想起我的房子、我的债务，心就像装了一个大铅块那样沉重。不想与人寒暄，不想给人签名，戴上眼罩放低椅子我假装睡觉，头脑里在思考着一桩重大的决定：要不要接受朋友的建议把我那美丽的房屋抵押出去在香港买楼花炒楼？

香港楼价一直飞涨。一帮香港“太太团”闲来无事，拿出私房钱来“炒楼”。

何谓“炒楼”？过了好久我才弄明白。许多房地产公司为了集资，在刚画好图纸后就开始出售那尚未动工或刚刚破土的房屋，这时候的房价最低。这就叫“楼花”。

随着大楼的兴建，还会出售第二期楼花，第三期楼花，价值一直往上升，到房屋完工可以进住时不仅价格已今非昔比，也已全部告罄，根本买不到了。

香港的“太太团”们有的是闲钱，成天用来买卖楼花。

用较便宜的价格买一批楼花，在价格高时抛出去，中间的差价十分可观。

我好多香港朋友都炒楼赚了大钱。好些紧俏的楼花还要排队拿号，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有朋友建议我买楼花，我说没有钱。她说你不是有房子吗？我说有房子怎么啦？她说傻东西，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就是了。

我不敢。我心想要是炒楼花再亏了本，旧债加上新债，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可不像朋友她们那样有的是本钱。我输不起。不，根本就不能输。

可是我到哪里去弄钱？不说还债，就是我父母、外婆到那别墅去住也得要钱。我总不能去抢银行吧？君子爱财还得取之有道呢。

不过，穷只有思变。必须思变。先别走极端，我来细细地想一想买楼花炒楼这条路能不能走通。

假如我把蛇口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出一部分钱来……假如我用这笔钱买一批楼花……假如我卖出其中一部分楼花，赚了 X 万块钱……假如我用这 X 万块钱还了买房子的钱，另外一批楼花让它升值……假如我再卖出那升值的楼花……我就可以还银行的钱了。我的血开始往上冲。

先别往上冲。我警告自己。这件事非同小可。再想再想。假如我贷不出钱来……假如我买的楼花卖不出去……假如我过了期限拿不出钱来付第二期的“楼款”被房产公司没收……假如卖价不好……假如钱全赔了……我不敢往下想。停止。此路不通。还是回过头来想。

想赌一下的心态还是占上风。

我再把我所了解的香港房屋行情回忆一遍。好像还是值得赌。赌一下也许不至于全军覆没，不赌反正也是个白丁。

我把自己的思想交给感觉，看它让我去何处。我发现它强烈地要求去贷款，去买楼花，去拚搏、尝试一下。我的感觉从来没有骗过我。它一直引导我走向一个个的成功。现在又仿佛有声音在告诉我就这样做，有一只手推我去向南方。去南方！

在去《芙蓉镇》外景地之前我去了一趟深圳。回来时我深信已是中国文化界最大的“债主”了。

贷款进行得很顺利。有房子，有名，也就有了信誉。其他的诸如楼花什么的事情也悄悄办妥。

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哼着歌迈着轻快的步伐，横竖就是那么区区一条小命，反正已经把它豁出去了。

事情就是那么回事。豁出去也是死，豁不出去也是死。还不如豁出去杀出一条血路来，或许还有转机。总之我不能坐以待毙。在绝境中求生存这种事我过去干过并且成功了好几桩了。

20 『芙蓉镇』——我和姜文



呵!《芙蓉镇》,“芙蓉镇”。现在的芙蓉镇已名闻遐迩。

想当初是只有一条街,与世隔绝,没有书报、没有电视的一个封闭的小镇——王村。

是我们在那条街上搭起了胡玉音的新屋,搭起了王秋赦的小楼,我们在那条街洒上人工雪扫街,在那没有人知道的小镇上诞生了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卡罗维发利大奖、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女

配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美工师……一连串中国电影工作的佼佼者相继从那条小街走到领奖台上，王村随之也变成了“芙蓉镇”，原来的名字已渐渐不大提起，被人遗忘了。

芙蓉镇，现在已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地点了。王村——还是叫这个名字比较亲切，现在的王村大约开了至少二十家“刘晓庆米豆腐店”吧？

每一个店都标榜它的正宗。不知这个正宗是出于什么？是出于我的首肯？还是出于我的手艺？还是我想不出来或是想不到的其他？

在我“卖”过米豆腐的屋檐下，在我“扫过街”的路旁边，在我“挨过斗”的胡同里，都贴上了招牌，王村人在心里刻下了当年我们创作的痕迹。

好多朋友都开玩笑地说：“嘿，晓庆，你该去收名誉费了，他们到处都在用你的名字赚钱！”

我总是笑笑不作回答。假设我的名字还能对王村人有一点用处，假使能因为我给王村带来富裕和繁荣，那就算我对王村的一点心意吧。这或许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哩。

在去《芙蓉镇》组的火车上，我和谢晋导演坐在一个软卧包厢。我问他：“谁演男主角秦书田？”

谢导演说：“姜文。”“谁是姜文？”我诧异地问。

秦书田这个角色很难演，在戏里举足轻重，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和我的对手戏，这个角色直接关系到我的角色的成败。

过去每到一个新的摄制组，男主角的扮演者大都是当红影星。这个姜文，好像还没有听说过。

“姜文是戏剧学院的尖子，是五分当中的五分。”打断我

的思绪，谢晋介绍说。

后来在拍摄中，“五分当中的五分”是谢晋经常用来夸奖姜文的话，为此我时常跟姜文开玩笑，见他就叫“五分的五分！”

“姜文多大了？”我问导演。“二十二岁。”“二十二岁！”我一下子惊呼，“那我怎么演啊？”

“你看看就知道了。”谢导说。

扭头看着窗外，心里一阵阵犯愁。小说里和我想象中的秦书田应该是四十岁出头的人，因为剧情规定我扮演的胡玉音要比他小得多，这下子弄了个小孩来，那还有什么劲？我肯定找不到感觉。

突然一下我都不想拍这部戏了。想起过去拍摄影片《原野》，本来自己年轻就不大懂，开始扮演影片男主角仇虎的也是一个年轻演员，拍了一百多个镜头，我们两个楞头青放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演，他也不知道怎么演，结果越演越糟糕，演得我们都没有了信心。后来换了杨在葆，情形就大不相同。杨在葆成熟，阅历深厚，经验丰富，给我许多帮助。可以说我的角色金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他有关。

我是学音乐出身，拍电影搞表演是半路出家，在实践中我深深认识到，表演是学不来的。一是靠天赋，二是靠理解。表演技巧其实是可以掌握，可以练习提高的东西。而真正表演水平的高低及角色的深浅来自于对人物理解的透彻与否。

就像是写文章，中国字也就那么些，并不是会写字就可以成为好作家，而是在于怎么运用这些大家都认识、都会写的文字组织出一篇有深度、有观点、有主张、有个性的文章来。在这其中，创作者本身的经历阅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当你碰到好剧本的时候，由于年轻，生活不丰富，不能深刻理解你所扮演的人物内心世界，也就刻画不好你的角色，而当你思想成熟了，翅膀长硬了的时候，又失去创作的机会了。

我自己的许多影片都是如此。想起前些天陪朋友看《原野》，朋友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我则是一边看一边捶胸顿足，痛不欲生。记得当时拍摄时由于自己年轻，许多戏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演，只是懵懵懂懂地弄了个大概。现在越看自己的表演越觉得那么浮浅，那么表皮，那么不精彩，真恨不得重拍一次。但是，花金子这个银幕形象对于我是不会再来了，换句话说，再来一次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现在，二十二岁的姜文要演一个老右派！怎么可能！我还得在电影里一口一声叫他"书田哥"，肉麻不肉麻？别说演，我一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真是给我的一个"下马威"。不大有劲吧？

到了摄制组，大家都欢呼雀跃。因为我去美国办影展，全组一直在等我，今天女主角终于"千呼万唤始到来"，怎么不高兴呢？

照例是与大家一个个见面。演员们一个个"出场"。我像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里的卫队长，每跟一个演员握手就盯着他的脸看，和我脑海里的戏中人物相对照。

嗯，这个胖了点；哎呀，这个瘦了些；这一个，简直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突然听见谢晋在说："这是姜文。"我赶快定睛一瞧：哇——一个中年人！

找不出二十二岁的痕迹，头发乱七八糟，留着几根鼠须，

瘦尖脸、小眼睛，乍一眼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整个一个“自来旧”。看他那模样，别说演“书田哥”，演“书田叔”也行。

我心里一下子放心了许多。心里说姜文烂眉烂眼的，倒和我想象中的秦书田差不多。

接下来演员们做小品，我坐在谢导旁边看。别看他们名不见经传，可一个个都相当有才华，我暗暗告诫自己可不能掉以轻心。这时候好比是棋逢对手，喜欢挑战的我，一下子精神抖擞。

我和演员们开始相熟起来。

组里一共八个演员，每个角色都独立成章。

刚开始不拍我的戏，谢晋说我刚从美国回来，怕我带了一身的“OK”味。

于是我每天穿着胡玉音的衣服在小街小巷里东游西逛体验生活，而《芙蓉镇》的剧本及小说我是时时看夜夜看天天看，差不多背熟了。

谢晋十分爱才。看得出来他非常欣赏姜文。此外对我和演李国香的演员徐松子也很好。演员们暗地里都叫我们“大宠”、“中宠”、“小宠”。姜文是“小宠”，我和徐松子是“大宠”、“中宠”。

两个月以后，我的戏开始慢慢进入。我的感觉一直在告诉我，我们是在创作一部伟大的作品。

此时，陈国军翻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了王村。

他正在构思一个剧本，要找我商量。这个剧本就是后来的影片《大清炮队》。

我一边演我的胡玉音，一边进行《大清炮队》的剧本讨论

工作。

可是，沉湎于胡玉音创作中的我一时难以自拔，这个角色使我入迷。

神情恍惚的我居然在一天把陈国军叫做“姜文”，让陈国军提高警惕了好一段时间。

从接到《芙蓉镇》的剧本开始，我就为影片中的接吻镜头紧张。在此以前，虽然社会上盛传我在《原野》中有裸体的床上镜头，事实上根本没有。

我不仅没有拍过床上戏、裸体戏，连接吻的戏也从未拍过，尽管我一直被人认为是擅长演爱情戏的演员，香港在《原野》放过之后曾叫我“性感小猫”。

想来想去，《原野》里只有一个金子亲吻仇虎的镜头，不过那严格地说不能算是“亲吻”只能说是“鸡啄米”，在脸上啄了几下之后有一下啄在了嘴上——那是因为机器不停无处下嘴而造成的“事故”。这个镜头只拍了一条，全片也只有这一处。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性感并不在于脱或暴露，也不在于在影片上表现些什么大胆的性行为，而是一种感觉。我时常夸口说不脱衣服连领口都不敞开就能演出性感是我的特长。

可是《芙蓉镇》的情况不同。把剧本看来看去，随着角色的脉络想来想去，接吻镜头还非要不可，非有不可。不仅非要非有，还得演到家。

随着拍摄工作的进展，接吻戏越来越近了。每天都有拍这场戏的可能。我向导演要求能否提前通知，我好有精神准备，我不知道姜文怎么想。在我们的合作当中，我们之间已完全消除了年龄差距的痕迹，可以这么说，他是唯一时常令我惊

讶的男演员。

我和姜文时常讨论戏。只是偶尔谈到接吻的戏。私下里我们约定要求对方拍这种戏时谁也不许笑场。一笑就再也拍不了了。要不就不拍,要拍就把它拍好,我们在口头上达成了协议。

这一天终于来了。首先肯定,姜文是我愿意与他拍这种镜头的演员。也许是他的优秀?也许是剧情的原因?也许与别的演员拍这种镜头我会坚决拒绝?说不准。

我摩拳擦掌,掩饰我的紧张心情,看起来好像在拍武打片。机器开始转动。我们俩谁都不动。一英尺、二英尺、三英尺……胶片在机器里跑得飞快。周围鸦雀无声。可能大家都在为我们紧张?一咬牙一跺脚我说:“来。”今儿个就死在战场上了。

我们开始接吻。满脑子杂念乱想:我的角度对不对?机器在什么地方?我是不是应该头偏一点?对,偏一点,刚才左侧太多,现在要转一下,手要放在他脖子上,这样看起来更投入。是不是导演在喊“停”?是吧?……突然听到一声大叫:“停!”我们停下了。

嗨!导演已经喊了第二声“停”了我们才停下来。我有些狼狈。假装松弛用余光看看大家,没有什么异常。谁都知道这是艺术创作,是在拍戏,不可能有什么大惊小怪。再想想自己有没有那种感觉?没有。才发现拍戏和实际是不一样的。记得过去问过一位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与女演员接吻怎么样?他就说过没有什么感觉,总是在注意姿势、剧情,在表演。不同。当时他说这话我不信。现在我信了。想问问周围我们刚才接吻的镜头演得怎么样?话到嘴边几次不好意思问。

有了开头，后面的戏就顺了。随着接吻，拥抱啦、上床啦、摸肚子啦各种花样我们都演了出来。接吻也接出了不同的方式，组里的人都说，胡玉音和秦书田的戏越拍越精彩了！

我和姜文的关系开始在变化。总之和一般人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说不出。就是比跟别的人特殊些、亲近些。简直想不到我这个大明星竟会与一个戏剧学院刚毕业的学生棋逢对手，相得益彰，还时不时比我出色，我们的创作自然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在那个时候，我一直自认为是中国顶尖的演员。清高自傲，觉得已无敌于天下。时常口出狂言，感叹过多少次"无敌最寂寞"。心里常常想："只要出现一个比我强的演员就不拍戏了。"

在此之前，由于近十年马不停蹄的电影生涯，我对这一行已产生了强烈的腻烦。我讨厌电影明星的一切：讨厌应酬，讨厌记者，讨厌拍照，讨厌人群。讨厌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讨厌眼睛盯着我的脸看，讨厌签名，讨厌摄影机摄像机……我其实也讨厌拍戏。

我几乎和每一个记者吵架。只要听说是访问，对方一掏出记者证，我的脸立刻拉了一尺多长。记者们不明就里热脸蛋贴了冷屁股当然会跳起八丈高，骂我一个狗血喷头。狗血喷头之后的我又变本加厉，对他们的态度更加恶劣，形成一个恶得不能再恶的恶性循环。

在香港，我也和记者吵架。一视同仁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的对外政策。

那一次我们专门去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事前我给自己

打了不知道多少预防针，干什么得吆喝什么，千万要忍住烦躁，把这个记者见面平安完成，既然当了明星就得遵守这些“游戏规则”。

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坐在一桌。我摆出平和的面孔一边看报纸，一边等着记者提问，等了好久没有人讲话，我抬起头诧异地问：“你们怎么不提问题?”一个会国语的记者说：“我们在等你看报纸啊。”我一听二话没说，拿起刚放下的报纸从头到尾看了一个溜够，然后才放下报纸说：“开始吧。”

最后记者要求和我拍照。在大陆我最烦有人要与我拍照。可这是在香港。我皮笑肉不笑地答应了。在坐下之前还是那位记者说：“刘晓庆，我们是看得起你才跟你拍照。”镁光灯一闪我立刻说：“是你要跟我拍照不是我要跟你拍照!”说完站起身气冲冲地径直走向卫生间。在卫生间我锁上门自我调解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

我想第二天全香港的报纸都会骂我了。我已把头皮绷紧以抵抗那舆论的攻击。走过报摊偷眼一瞧，咦，没有。结果我们不打不成交。那位记者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在自贡，我和另一位香港记者又大吵了一架。差点没有打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当然这是后话。

几年以后，我从法国回来。对当时我用恶劣态度对待过的记者们甚至抱有感激之情。他们都成了中国当今的大记者，许多还担任了主编。他们已是中国新闻界的栋梁。回想起他们当初居然能够忍受，我实在是佩服不已。不过除了那位自贡记者以外。

说实话，和我正面交过锋的记者已不计其数。我对拍电影的厌烦，更主要的是对当电影明星的厌烦已到了极限。假

如不是谢晋导演，假如不是《芙蓉镇》，假如不是姜文这些好对手，我不可能有澎湃汹涌的艺术激情，也不可能有新鲜的好的创作心态。

我觉得已经到顶了。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了。我觉得已拥有了太辉煌太丰富的人生。直到姜文有一天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我又开始和他吵架。吵得不亦乐乎。最令我震惊不已的是他坚定而自信地反复说："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从没有听见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况且也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来。我的地位稳固得很。改朝换代在导演界也许有。在表演界不存在。可是，我的感觉又在告诉我：要注意他的话。

想了半天想不明白。他说："你们电影演员好比是开了一辆好车。可是驾驶技术不怎么高明。"狗屁。你们话剧才是戏班子，票友，不思变革，路越走越窄。我反驳他。有好车为什么不开好车？偏要去开老爷车？那不是笨蛋是什么？

他说我的作品也就那么回事。我说你的作品呢？除了《末代皇后》谁知道？还不是电影好。他给我大谈北京人艺，大谈人艺的演员于是之、林连昆，气得我说你怎么不去跟于是之结婚？

吵来吵去我们双方都在向对方靠拢。他为我敲响了警钟，使我重新思考，我使他纠正了偏颇，为他后来热爱电影甚至以电影为生命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时常吵得不能拍戏。经常是一边试戏一边走位置一边辩论。等到光打好，板打过后，导演喊："开始——"我们不约而同地喊："等一会儿！"然后气咻咻地赶紧调整情绪，以适应戏里谈情说爱的气氛。

组里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我们越来越默契，越来越融洽，越来越磋商表演，相互之间也越来越亲密，越来越随便了。没有人管我们。

在王村，影片质量是第一位的，男女主角关系好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

陈国军当然有所觉察。不过他仍然是我的中心。他是最重要的。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的心中有一个位置，总是有人占着。无论是谁只要他占了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主人，我就会任劳任怨，竭尽全力为他服务。这一点陈国军非常明白。他曾经下评论说，对付我这个人是"近者胜"。

我仍然玩命地联络、组织拍摄陈国军的新影片《大清炮队》。

《芙蓉镇》的外景工作刚一结束，我就与陈国军去了广州。

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总经理孙长城又一次帮助了我。他很快通过了《大清炮队》的剧本，下达了生产命令。

我们立即扭头直奔北京，开始组建制作班子。选演员、分镜头、美工设计、服装设计，整天忙碌，《芙蓉镇》又远了。

一反胡玉音温柔内向的个性，又变成了心狠手辣的女制片人。吸取《无情的情人》的教训，凡事冷静、果敢，三思而后行。直到一天无意中看到新来的《大众电影》，上面整整一页是《芙蓉镇》影片的剧照及工作照，才猛然想起我正在拍摄的巨片及组里的朋友们，看着照片我足足愣神了十几分钟。

二十多天以后，我回到了《芙蓉镇》。全组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集中，拍摄内景。小别重逢，大家都高兴异常。握手言欢，畅叙别情，秦书田、李国香、黎桂桂、黎满庚、五爪辣、谷燕山……一个个《芙蓉镇》里的人物走了出来重现在眼前。我却

恍如隔世。就好比他们是“洞中才数月”，我是“世上已千年”。《芙蓉镇》外景时还在酝酿、构思的《大清炮队》，在《芙蓉镇》内景还没有开拍时已经正式建组了。一部新的影片又在开始制作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找回了胡玉音。

倒下身上竖起的刺，收起伸出的利爪，重新把自己裹进胡玉音与秦书田苦涩但却甜蜜的温柔乡中。

每天都有无数表演上的精彩段落出现。每个镜头拍完都惊叹自己竟有如此收放自如的才华，我陶醉在创作的自由王国里……

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我的沉睡。“喂?”睡意朦胧，我的声音充满了被窝味。是姜文。

他的声音冷酷，充满了愤怒：“你结婚了!”我没有回答。

“说——实——话。你是不是结婚了?”我醒了。心里嗵嗵地跳。

“关你什么事?”好半天后我说。

“你为什么骗人?”姜文喊起来。

“谁骗你了?你问过我吗?”我也大喊起来。

“我马上过来。”他说。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场。吵得嗓子都哑了。第二天早晨在拍摄现场，胡玉音与秦书田充满了柔情蜜意，“演英雄学英雄”，我们已经把扮演的人物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了。

戏怎么可能拍得不好?秦书田和胡玉音怎么会不双双得奖?不得奖才是怪事。

心明眼亮的谢晋导演利用了这一点。在现场对演员的启发准确而又有深刻的寓意。比方说我要拍一个含情脉脉的特写，当光打好一切准备好要开拍之时，他会悄悄叫人把姜文找来坐在我的视觉范围内，那么这个镜头一定会拍得相当出色。在配音时我不在，姜文要单独配一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画外音，谢晋会在姜文耳边轻轻说：“想想晓庆，想想她平时的样子！”众所周知的结果是这句话配得非常动人心弦。

我和姜文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在那之后我们又合作了影片《春桃》、《大太监李莲英》。

《芙蓉镇》、《春桃》我和姜文都双双两次获得“百花奖”最佳男女主角奖。《大太监李莲英》获得柏林电影节特别奖，三部戏三种不同的人物关系，三部影片上了三个不同层次的台阶。

我开始给他讲陈国军。讲陈国军要拍摄的《大清炮队》。我请姜文去看《无情的情人》，我告诉他陈国军其实是多么有才华又多么不容易。

《芙蓉镇》很快就拍完了。当然，我立即去了珠影。然后跟随《大清炮队》摄制组去了营口。这时，《红楼梦》又开拍了。在《大清炮队》和《红楼梦》之间，我还在中央电视台主持系列电视片《世界电影之林》。同时大导演凌子风在找我，他要拍摄影片《春桃》，请我扮演主人公春桃。李翰祥又在筹拍《西太后》，后来改为《一代妖后》，请我第三度扮演慈禧。

我时常没有时间睡觉，穿梭于几个摄制组之间。《红楼梦》、《大清炮队》两部影片我都是为陈国军而拍。在此期间，

我绝对还想方设法抽空去“走穴”，我的神经高度警惕，它不可能忘记挣钱还债的这个重大使命。后来我又上了《春桃》和《西太后》两部戏，我快被分成八瓣了。

21

姜文会出现在我所在的任何地方



《红楼梦》。

我的精力一直为《红楼梦》里面的一帮姐妹们所叹服。她们说我身体好得像一个“牛犊”，演尤氏的陈祖荣还把这个称呼及形容写在她后来写的《刘晓庆——不为人知的女人》这本书里面。“姐们”还时常惊呼我是“天生干电影演员的”。因为我往往是连夜赶到组里，放下东西就开始化装拍戏。在几个摄制组辗转奔波，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是常有的事。可是

我站在摄影机前仍然是神采奕奕，一点也看不出疲劳的样子，用大家的话来说我"一点儿都不挂相"。

要知道我的那些演员"姐们"第二天要拍戏，头一天晚上八点钟就得上床，不敢喝水，不敢把晚饭吃多了，怕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只要一睡得不够，早晨起来准出眼袋，皮肤不光滑，眼睛不清澈，拍出来效果就好不了。

而我不存在这个问题。睡多睡少，睡和不睡，都一个样子，也许我睡多了反而眼睛肿，睡少了还显得清瘦些？不知道。我没有试过。

拍摄间歇时我也不闲着，从不听大家的劝告"闭目养神"，召集演员们过来给"姐们"、"妹们""上课"，讲天讲地讲那些离经叛道的我的"哲学"。什么"不要荒废人生"啦，"要享受生活"啦，"没有爱情婚姻就不存在"啦，"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挣利"啦，还大谈养生之道。大家总是围坐在一起，把"兰花手"放在下巴上，老祖宗、小祖宗、宝玉、黛玉、薛姨妈、王夫人……大观园里的各类人等都静静地、纯纯地听我高谈阔论，胡侃乱侃，像一群可爱的"乖孩子"。

"姐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风筝"。因为我成天像风筝在天上飞。可是我一来就给组里带来笑声。

一次我得意洋洋地跟大家说："哼，哪里有我，哪里就有欢乐。"

另一位也是闹闹喳喳的演员也说："哪里有我，哪里就有节日。"

我立即还嘴："欢乐是永恒的，你那节日是鬼节，清明节，有什么好？"

她跳起来大叫着掐我。

我除了给大家“上课”外，每天还带着她们做操、散步、锻炼身体。时常有我的追求者请我吃饭，只要有这样的情况我就把大家都带去“搓一顿”，打牙祭改善生活。我给“夫人”们每人买了一件鲜艳的衬衣，强迫她们穿上，花枝招展地进饭堂。我们时常开联欢会，每人都出节目，“刘姥姥”赵丽蓉的节目让我们笑破肚皮。

我还给大家分析“百花奖”“金鸡奖”的形势，预测我们之间谁能得奖。还约好假设被我猜中，得奖者要请我吃饭。结果我预测的命中率是百分之百，可是这些鬼东西一个也没有请我吃饭，不过我也不怪她们，因为那时我不在中国，在巴黎。

我还突发奇想要在演员组举行“最光滑皮肤比赛”，在拍摄大场面时分年龄组评比，每人到当中走一圈，评出“最光滑皮肤皇后”，可是这件事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没有得逞。

我上窜下跳，带动大家，组织大家，活脱脱是一个“王熙凤”。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般来说，在摄制组，女演员之间是最难相处的。差不多组里的矛盾都是由几个女演员引起。可是《红楼梦》剧组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女演员，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漫长的三年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拍摄转点，组里暂时停顿，演员们各自回家要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恋恋不舍甚至掉眼泪。

在《红楼梦》放映之后我遭到了许多批评，只要组里的“姐们”、“妹们”一知道，都会奋不顾身跳起来为我辩护。

当然我给大家惹的麻烦也不计其数，“姐们”对我的帮助、掩护、救援的故事，无不可歌可泣。这些我将在后面写到。

我和姜文几乎天天联络。拍完《芙蓉镇》后姜文主演了法国影片《花轿泪》，后去了《红高粱》摄制组。后一部影片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大奖，开创了中国电影在国际重要电影节上获奖的先河。凌子风导演也请他扮演《春桃》里的男主角刘向高，我们已定好等《大清炮队》和《红高粱》拍完后再度合作。

姜文会出现在我所在的任何场合：《红楼梦》外景地，“走穴”的地点，《世界电影之林》制作室，甚至送我去营口《大清炮队》拍摄的地方。

常常是坐火车一起出发，到营口车站他再下车坐另一趟车回北京。

我们经常通长途电话。有一次我们长途电话打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姜文在电话那边睡着了。

全部《红高粱》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姜文有一个“相好的”，只是那位“相好的”不懂电影也没有文化，他只有连续不断地去看她、安抚她，才能“后院不起火安心拍戏”。

姜文的频频离组使张艺谋头疼不堪，直担心由于他的耽搁，高粱秆长老了长硬了不能如他所要求的那样“飘逸地摇摆”。

组里对姜文这个目不识丁的“相好的”简直冒火透了。直到有一天摄影助理去北京洗印厂取样片，才揭穿了姜文那不亚于一万吨 TNT 炸药的地下情秘密。

那个“相好的”原来是正在当今影坛张牙舞爪、龇牙咧嘴的“西太后”。

在这当中，我获得了《文汇报》举办的“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在这次评奖举办之前，《文汇报》的老朋友余之就告诉过我这个消息。

余之是我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的发起者，写《我的路》时我自己并不相信我的写作能力，是他给我不少鼓励。同时由于我在拍戏没有时间写，他住在西苑饭店天天催稿得以使《我的路》早日诞生。于是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世仁”，意思是他催稿就像黄世仁逼债，我当然是那红五类杨白劳或是喜儿。

当余之告诉我《文汇报》正在酝酿举办“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评选活动时我就立刻说：“好哇，我又可以得电影大奖了。第一名肯定是我。”他没有反驳，我想他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果然不久结果出来，我又以遥遥领先的票数获得第一名。同时，我还获得济南的×杂志举办的最受欢迎的女演员第一名。

为领“十大影星”奖我去了姜文所在的上海。他当时正在拍摄法国导演多夫曼制作的法国影片《花轿泪》。他是男主角。他的女朋友也在同一摄制组。

下飞机后我立刻去他住的虹桥宾馆，我让司机上去叫他，我在车里等着。

过一会儿姜文端着碗踏着拖鞋出来，原来他和女朋友今天要招待几个客人，他正在厨房里向师傅要辣椒。二话没说，我把他拉上车，穿着拖鞋的姜文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到住处。

在上海领奖期间，姜文的女朋友来找过我。这种情况仿佛是当年赵雅珉来找我的情景重现。当她来找我的时候姜文正在我那里，他的女朋友请姜文回避一下，说要单独和我谈谈。姜文说我们俩别在屋里搞什么“慕尼黑阴谋”，最终联合起来把他给出卖了。结果我和他的女朋友越谈越热火，我们双方的开诚布公都博得了对方的好感。她也是我所认识的女

性佼佼者之一。

在登载我获得“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消息的许多报纸上，同时也登载了关于我主持的四十集电视系列片《世界电影之林》的批评。《北京日报》用大字标题："刘晓庆，绷着点儿！"发表批评我主持这个电影系列片的文章。用这么大的字写一个人的名字，指着那个名字批评，我过去只是在“文革”当中的报纸上见到过。我记得批判周扬“黑线”或是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黑店”时，才用过这样醒目的标题和重要版面。我的“规格”和“待遇”已逐步升级，“档次”也高了许多。

其时我刚在四川自贡灯会上与一个“香港记者”大吵了一场不久，那个吵架的消息登载得满天飞。当时李翰祥就告诫过我，不要和记者吵架。这样你会得罪所有记者。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我一直觉得和我吵架的那两位是记者群中的例外。可是情况正向李导演所预言的方向发展，记者们对我大加反感，开始群起而攻之。

《世界电影之林》是我主持的第一套电视节目，节目内容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题材。这套节目一共四十集，每集二十分钟，内容是介绍全世界的电影。当时中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还处于封闭状态，有这么一个电视节目系统地向大家介绍世界电影是十分难得的事。

节目开播后大受欢迎。由于这套电视节目是每星期六播放，往往时间都排在夜间甚至深夜十二点，或者凌晨一点钟，就这样观众不睡觉也要等着看。

可是我一直受到指责，理由是我“不朴实”，每一集都换一

个发型，换一套服装，一边走一边解说，不端庄，不严肃。直到今天我还是没弄明白我怎么惹着他们了。

我怎么不对了?我只是觉得中国大陆衣着千篇一律、发型单一的现象应该打破，于是每集出场都换发式，换服装，希望给人们以指南，创造一个样板，企图领导一下新潮流。

我一直反对电视台主持人呆板，总是坐在那里像雕塑一样只是嘴在说话的主持模式，我愿意把节目搞得生动、活泼、多种多样，可是我没有行得通。

把我批过来评过去，《世界电影之林》放到大约快三十集的时候就停拍，当然也就停播了。不过不是因为我主持得糟糕，而是因为版权问题发生了纠纷。

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只是觉得我这个人就是那么个倒霉蛋。别说拍电影、写书，就是第一次拍电视都要夭折。什么时候我才能倒霉倒到家，往相反的方向转化?

在此期间，我当然不会忘了见缝插针地“走穴”。

为拍《红楼梦》调陈国军到北京及拍陈国军导演的《大清炮队》，使我失去了无数“走穴”的时间。

为给姜文打电话及去见姜文，消耗掉我许多“走穴”所得。

香港的“楼花”至今没有抛出，我离还清债务的那一天越来越远了。

好像听说税务局又找过我几次，由于我不在北京，后来都没有了下文。据说来头很大。北京“走穴”界已“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心跳过好多回，静下来想想，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一是有过一次上税的经验教训，我们已学乖多了。再者上税对我来说已列入“议事日程”，每到一地都谆谆叮嘱以至亲自落实税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走穴界”这样人心惶惶未免有点太沉不住气。事态哪有这么严重，还不是一阵风就过去了？

自“走穴”运动开展以来，经历过多少风浪？恐怕是数不清了。开始是每个单位调查、交待，没收“走穴”款，然后又是要演出证，验明确属正规演出团体才可以演出，再接着又是不许取现金，全部要支票转帐……一切手段都是为了防止演员们自己拿钱。

每当有一个新的手段公布，“走穴”浪潮就平息一些，过一段时间“走穴”队想出了对付这个手段的新招，于是“走穴”队又开始蓬勃兴旺。真可以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拿“穴队”的话来说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这些手段当中，“穴员”们觉得限制“走穴”最行之有效的就是“税法”的公布。

听说有税法下达了。只是听说，没有向我们宣布，也没有号召大家学习。好像是税法的规定，凡是月收入加上工资超过四百元的就要上税，最高可到达所得额的百分之六十！

别的一些国家也有较高的税率，有的是百分之四十五，也有的是百分之五十，可是他们上税的基数很高，都是二十万三十万以上才如此收税。没听说底限只有四百元人民币、税率百分之六十的。总是要使纳税人保持一定富裕的生活水平，况且还要扣除纳税人每月的日常费用，比方说车马费、服装费、生活费及各种这费那费之后的纯利润才交税。

而我们是只要有钱超过八百元每一百元就要交六十元。

另外我们去挣钱所花的费用还得自己负担。

我们算过一笔帐：假使一个演员每场一百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中腕”，就是中等明星的价格，那些小明星或不是明星的演员还不算在内，“腕”是刚发明出来的“走穴”界新名词，是明星的代称。

一个“中腕”每场一百元，交税要交去六十元，剩下四十元，单位每场要交五十元，这就要每场自己掏十元。还要买化妆品，录伴奏带(录伴奏带很贵)，买演出服(至少一套要几千元)，加上鞋、装饰、耳环、项链、杂七杂八东西，乐队演奏员还得租乐器，舞蹈演员还得租演出服……等等等等，绝对是入不敷出，就算是单位不交钱也得倒贴，谁还敢演出呢?

这还是“中明星”。要是小明星呢?没有名的演员呢?就更别提了。

就是像我这样的“大腕”，也绝对不堪负荷。“大腕”更需要好服装、好乐队、好伴舞，都得花钱。

总之，一上了税，根本就甭想赚钱。不掏钱就是好事。一时间，“走穴”界乃至文艺界怨声载道。不偷税漏税根本没法赚钱。不为赚钱，谁肯早起?演员们都不敢演出了。怕碰到风口浪尖上划不来。我也老实了好多。就是偶尔有“穴”走，也小心翼翼，尽量把手脚做干净些。

我的“后院”也起了火。

22

再和姜文搭档共演北京戏《春桃》



一封匿名信飞越千山万水，到了正在营口拍戏的陈国军手中。信纸上寥寥数语揭露了我和姜文的秘密，写信人让他查清楚这个问题。陈国军看完脸色铁青地把信扔给了我，这封信看得我手脚冰凉。

从心里说我没有打算过有什么大的变革。所以才手脚冰凉。我什么话都不说。还没到要我说的时候，组里又出了问题。《大清炮队》组总是出问题，陈国军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

就又去了别的地方。

此时，我已把全家搬到酒仙桥流量计厂一套三居室的宿舍里。我的那位朋友流量计厂的厂长住在我们楼上。他说话算话果然把他们厂刚盖好的新楼给了一套我住。他很少来，钥匙放在我们这里，于是楼上时常也是我们活动的场所。

为了照顾父母、外婆还有小丹丹，我请了一位小阿姨。那位小阿姨来自兰州农村，刚来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我从来没有过小阿姨帮我做事，把这个小姑娘当成宝贝。她的名字叫小兰。

她和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半年后回去探亲有五大麻袋行李。

我送给她各种各样的礼物，甚至还有名牌的化妆品与时装。就连香港、台湾朋友请我去“长城饭店”“王府饭店”“马克西姆餐厅”吃饭，我都带她去。请我吃饭的朋友以为她是我的亲妹妹，当我介绍说她是我家的小保姆，在香港、台湾称之为“工人”时，朋友心里肯定都认为我简直是个神经病，觉得对他们是个污辱。

因为在香港、台湾乃至法国、英国、美国，“工人”也就是“佣人”，即使在家里也是不可以和主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

我对小兰就像对自己的亲妹妹。不，在那个时候，比对我亲妹妹还好。因为晓红已去了法国读书，法国方面给了她优厚的奖学金。本来我希望陈国军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法国方面根本没有理我这个茬。

晓红去法国之后不久，靖军又去了深圳工作，于是家里一切都由我来承担。我们一家五口占尽了老弱病残四个字。外婆，父母，我，加上丹丹是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我是绝对

唯一的“中流砥柱”。只要我在家，家务事总是我和小兰分担，她年龄小，我怕她太累了。

小兰豆蔻年华，情窦初开。虽然不漂亮，但随着在我家熏陶，一天天变得灵活乖巧。她的父母在张罗着给她找对象，她自己也急着结婚，我时常劝她，年龄那么小结什么婚？她说农村结婚都早，要是不早结就找不着好的了。我一想也有理就没再管她。我有许多录影带，都是外国名片，其中一部外国片有许多暴露镜头，放这部影片时我父母、外婆都躲得远远的，唯独小兰靠在门边津津有味地看。我怕对她不好，赶快叫她离开，结果第二天下班回来发现录像机坏了，带子卡在里面出不来。问小兰是不是看了录像？她支支吾吾说看了一下。再问她是什么带子？她说没看见不知道。于是立刻把录像机拿到修理铺打开取出，就是那盘“黄色”录像带。原来小兰趁我们不在家悄悄想看那部影片，结果不会用录像机把带子卡在里面了。

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只有陈国军一个壮年男人。小兰对陈国军特别好。那份周到关心，不辞辛苦，实在令人感动。外婆眼睛不好，可绝对是心亮肚明，她早就对母亲说：“要是在旧社会，干脆收成二房算了。”

有时姜文也来我家。来了几次后外婆就跟我说：“那个老司机（她以为姜文是个司机）叫什么？你坐他的车要小心啊，他看你的眼神不正派。”从此我叫姜文“老司机”。可是小兰，她知道姜文不是“老司机”，而且她清楚他是谁。

陈国军先在营口，后来到了珠影，仍然在浴血奋战。每当我和姜文在一起，我都对陈国军怀有深深的内疚。我继续大谈特谈陈国军的各种好处，并且告诉他我不能也不会离婚。

我的“执著”时常把姜文气得半死，他说我这种人不能跟我讲道理，是死脑袋，对付我这种人只有“抢过来”。有一次我甚至拿出我的钱包给姜文看，里面放了陈国军的照片，我指着照片一往情深地对姜文说，陈国军当年怎么为我失去了一切，我是多么地感激他，直到把姜文气了个头晕脑胀，站起身出了房门冒着大雪——那天下着鹅毛大雪，从朝阳区酒仙桥一直走回东城区内务部街他父母的家。走到家里已是天明，眉毛白了，头发白了，他成了一个“圣诞老爷爷”。

这一切仍然没有妨碍我们继续在一起合作拍戏。《春桃》摄制组已经组建并且已拍了零星几个镜头。

《春桃》是一部纯粹的地地道道的北京戏。从没有演过北京戏，北京话也说不好的我，怕演砸了锅，在最初决定上不上这部戏时，颇费了些踌躇。热爱北京，热爱北京人艺，也热爱北京戏的姜文，给了我不少鼓励。

早在我们争执“话剧好还是电影好”期间，为了强有力地证明他的观点，他要求我一定要去看看“最好的话剧”。他奔跑几次去北京人艺要票，然后又去接我几乎相当于是“押送”我去首都剧场。看完后还要我谈观感，谈得不对还要争论，简直是一个疯狂的“法西斯”。

我对他的这种执著可以说是服得透透的了。我想在那个阶段，于是之的耳朵是不是常常发烧？要知道差不多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为他吵架呢。

我时常讽刺地问，他这种单相思，北京人艺以及于是之、林连昆等领不领情？他说不知道，这不是最重要的。结果是北京人艺出的小报《人艺之友》期期给我寄，从不给他寄任何一

次，连我们的司机朋友小李都说，姜文"真没劲真没劲"。

这些情景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难怪有一次看《大众电影》，上面有一篇关于姜文的介绍，一位朋友说："看《茶馆》看了十七遍！吹牛吧？"我当时就告诉他这是真的。别说十七遍，就是二十七遍也有。最近我还和姜文又去看了一次《茶馆》。

姜文说我应该演北京戏，至少是演一部过过瘾。我想了想倒也是，况且有姜文搭档，肯定会水涨船高，于是就答应下来。

"春桃"是一个垃圾婆的名字。我就演那个垃圾婆。

刚到凌子风导演家，进门就看到各种破烂草帽挂了一大片。为了选春桃戴的那顶破草帽，凌导演亲自动手去垃圾堆里刨捡，然后洗好晾干，准备拍戏用。那时候凌子风导演和夫人韩兰芳新婚不久，老两口还是小两口？至少是新两口，成天眉来眼去，好不甜蜜。

《春桃》这部影片是韩兰芳编剧，凌子风导演，十足的一个"夫妻店"。

我去摄制组之前有人警告我当心韩兰芳这位新"导太"，说她又凶又恶很不好合作。于是我先小人后君子，提出讨论剧本时韩兰芳最好不要在场。结果第一次讨论剧本时她果然没有在场。

一部戏合作下来我们成了朋友，在长期的相处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韩兰芳"又凶又恶"的痕迹。想起自己的相同命运，觉得那些无事生非、颠倒黑白的人实在是可怕，在大多数人的心目里我还不是整个一个"母夜叉"？

凌导演在我们北影是"四大名导"，又人称"四大帅"之一。

他七十高龄，花白胡子，花白头发，慈眉善目，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像小朋友们熟悉的“动脑筋爷爷”。对了，他也戴眼镜。

他开朗，乐观，随和，不拘小节，热爱生活，北影人戏称他“疯子导演”，有时当面这样叫他，他也无所谓。

相比之下，韩兰芳年轻得多，且温柔娴淑，大家闺秀，一副学者“导太”的风范。

在表演上凌子风导演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不敢“乍刺”，一见面就说：“导演，我是四川耗子，不会演北京戏，您可得多帮忙，演得不好多多担待。”刚说了这几句话就被纠正了好几个音。

第一课是练习“钩垃圾”。“钩垃圾”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名词，实际上北京话叫什么我忘了。不是我忘了是根本我就没问。姜文总说我是“第一个交卷”，是指我虽然聪明过人但不肯用功过深。总之这个动作是无论垃圾婆还是垃圾爷，只要是捡垃圾，在北京就得用的基本功。

一根竹竿，上面有一个钩，我背着大筐一边走一边把脚下的树叶或是纸张或是什么污七八糟的脏破东西拿钩子那么一戳，再往背上的筐子里一抖，那戳上的东西就弹进筐里去了。

我练了好长时间仍然长进不大。在实拍时只要机器一转动，我的钩子要不就戳不上树叶或是纸片，再不就是戳上了扔不进硕大的筐子里而总是被弹在筐子以外。

可是有时我故意要弹在筐子外却偏被弹进筐里。

好多人看影片《春桃》时都夸我的动作干净利落：“嗨！就那么一抖就进去了！真他妈准！练了好长时间吧？”我赶快点头说是。

当然我不会说那是拍了无数遍戳了几十次才选的那么一

两次。让他们觉得我棒多好啊，我才不那么傻呢。

接着要练习的是那著名的贯穿全片的吆喝：“换——洋取灯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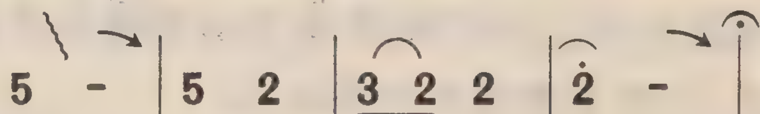
什么是“洋取灯儿”我都不懂。导演又给我解释，说“洋取灯儿”就是火柴。“换洋取灯儿”就是“换火柴”。

“那什么是‘换大肥头子儿’？”我接着问。因为这两句我要老喊，不得不弄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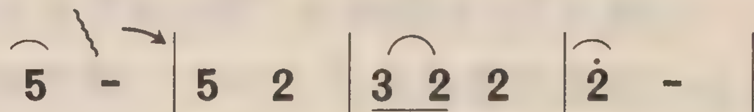
问了半天知道了。“大肥头子儿”是肥皂用后没用尽的那一小块残余。谁知道对不对反正我也忘了大概是这之类的东西。

我成天喊成天练总是喊不准。我怎么总是觉得这音调像是在唱歌？于是发挥我的音乐天才来帮忙，干脆把音符记下来。

写出来后的谱子是这样的：



唱起来就是：



这么一记，就好多了。喊的时候只要头脑里一出现曲谱，绝对准确无误。

“换大肥头子儿！”这句话没有音律，无法写谱，只有死记硬背，花了我不少功夫。

《春桃》刚开拍时姜文不在。《红高粱》还有一些扫尾镜头他来不及赶回来。我们拍了一些零散的不重要的镜头然后等他。

《春桃》是在初春开拍，可是拍的是夏天的戏。每天早晨，

我得四点钟起床，穿上单衣，套上单裤，打好裹腿，穿一双单鞋，化装师再为我梳光了头发，因为是演垃圾婆脸上不必化装，在凛烈的寒风里瑟瑟打抖等着开拍。

我现在想到那情景都觉得浑身发冷。每天早晨从好不容易睡暖和的被窝里挣扎着起来的时候都发誓不再拍电影了，我不愿意起来，不愿意出门，更不愿意有些温热的身体穿上那冰凉的衣服，就如死囚犯不愿意上杀场。

接着姜文来到了组里。"嗖嗖嗖"几个镜头一拍，大家马上感觉到，北京戏他演起来确实如鱼得水。

姜文是这样的一个演员：假如你够劲能和他打对手，会觉得过瘾，会水涨船高，假使你自己功力不足或是底子虚，会在他的面前感到绝望。

我时常和姜文开玩笑说他是科班出身，是"在朝党"，我是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我是"在野党"。

我们互相取长补短，同样存在着较量。《春桃》我是用短处在演戏，他倒是发挥了所长。他给了我不少的帮助，最令我难堪及冒火不得的是，当一个镜头我演了一遍，他又再演了不同的一遍，而他的又比我的招高我不得不照他那样演的时候，这种过去我从未遇到过的情景，使我十分狼狈。而我是响当当的大明星。这种情景不时出现，我的自信心大受挫折。

有一次我们拍摄这样一个镜头：春桃在屋里剪脚趾甲，喊刘向高(姜文扮演)问鞋呢?刘向高从窗外扔鞋进来，春桃捡起穿在脚上。当正式拍的时候，我拿起鞋一看，左脚鞋心里写了"不要慌"，右脚鞋心里写了"慢慢演"，一下子所有的情绪不翼而飞，气得我把鞋一摔，和他大吼了一顿。

《春桃》配音的时候更够呛：左边一个凌子风，右边一个

姜文，对我的四川北京话不停地“哼哼”教导，常常是配一句话我要配上半天，就像是一个大舌头。姜文站累了就躺在地上，我一个人补我说得不好的台词。要是说得不准，就会从地上传来一声：“不对！”于是我又重来。

到影片摄制后期时，我们的表演已如鱼得水，我也越来越像垃圾婆了。尤其是到老北京人的家里去生活了一段时间，逐渐开始从心里往外变化。

凌子风导演有时累了或是高血压犯了，就由我们自己拍。我们先喊“开始”，然后表演，演完了再喊“停”，不好就再来一遍，感觉良好这个镜头就过了，再拍下一个。

《春桃》拍完上映后，一次我和姜文去“马克西姆”餐厅吃饭，碰到一位多年的朋友，对我的表演赞不绝口，席间他对姜文说：“这个片子晓庆可是比你演得好。”

姜文眨着小眼睛使劲说：“对，对！”我笑而不答。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

《春桃》刚开拍不久，陈国军回到了北京。

23 风雨开始来临 有了第三者暴



一直以来我总在担心着一件什么事,我发现就是这件事。在回来之前,陈国军打过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压抑着的暴怒的声调,使我心惊肉跳。

和我预料的一样,暴风雨开始来临。他把我叫到楼上流量计厂厂长的房间,说要与我谈谈。

陈国军咆哮着追问我与姜文的关系。我矢口否认:没有什么关系。激愤之中他把一本书撕成像小指甲盖那么大的碎

片。

那是一本写温莎公爵“不要江山要美人”那令世界震惊的爱情的书，是姜文带给我的，书上并没有任何笔迹，我不知道陈国军怎么会发觉。陈国军在部队一定是最优秀的侦察兵，这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我都一次次认识到并且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后，他拿出了一把刀子来，要跟我同归于尽。我生平最怕这些东西，一下子脚跟又软了。在惊恐之中我赶紧回答了他的问题，承认了所有的一切。说完之后我闭上眼睛，眼泪成两条线行行滚落下来，就在那一瞬间我心里想到这下子我们算是完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杂乱，没有章法。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走到今天有了丈夫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又想到了这一步。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也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

陈国军以后怎么活？我们之间又怎么相处？为什么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我为什么偏要承认？这一承认我就成了残花败柳，纵然陈国军会原谅我也不会原谅自己了。

歉疚，负罪，后悔，慌张，恐惧，五花八门，千头万绪一起涌上心头，酸、苦、辣、咸全堆在一处。我没有回答陈国军要我不再拍摄《春桃》的请求。

一夜没有睡。第二天照样去摄影棚拍戏。我什么也没有流露出来。工作照常进行。

傍晚，脚步蹒跚地回到家里，推开门陈国军不在。父母、外婆全都围了上来。告诉我陈国军在我走了之后吃了安眠药，送到医院抢救还没有回家。是母亲发现快中午了他也没

起来吃饭，喊了好久没有声音，于是往窗户里一看，陈国军躺在床上，被子上摆满了我的照片。等了一会儿觉得不对，拿来钥匙开了门进去，才发现他吃了安眠药，全家人吓得魂飞天外，打电话向流量计厂厂长报警，他赶了来才七手八脚地抬到医院去抢救治疗。

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转身就往楼下飞奔。刚跑到楼下就看见小兰扶着陈国军慢慢在往上爬。看到他衰弱的样子和苍白的脸色那一瞬间，我的肠子都悔清了。

我在床前端茶，送水，转来转去像个陀螺。我们谈了好久。双方都避开昨天的事。什么我都可以做到，只是做不到立即退出《春桃》摄制组。谈话又成了僵局。

接连几天，我没有去组里上班。想到组里一定为我停止了工作，心像猫爪子在挠。后来，电话响了，导演和韩兰芳都打了电话来，问我是不是病了，表示问候，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要回去拍戏的冲动。

我要回去拍戏，我不顾一切，管它什么后果，这辈子我就豁出去了。

《春桃》的机器又开始转动了，陈国军愈加对我体贴入微。每天冒着严寒一进屋里，总是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为我准备好；无论多晚回家，陈国军都在门前大街的路灯下等着我，右胳膊直绷绷的，在他那件棕色羽绒衣的袖子里面有一把一尺多长的刀子，说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我完全失去了陈国军对我的信任。几天以后，除了在摄影棚拍戏，我去哪儿他去哪儿。当我告诉他或是与他商量去某一个地方时，他表示同意或是不吱声，只要一上车刚发动他

会突然跳上来非要与我同行。如果碰巧他不在我去了别处办其他的事，他绝对会忍不住来一场狂风暴雨。

他对我的警惕性处处可见。有一次他告诉我要上街去买点东西马上回来，闲极无聊我给一位女友打电话，电话中谈到陈国军最近脾气异常暴躁，那位女朋友随嘴说了一句：跟他离婚算了！

刚放下电话没有两分钟，陈国军就黑着脸拿着录音机从楼上走下来，录音机里播放的正是刚才我和那位女朋友的对话，扔下录音机推开我，他抓起电话雷霆万钧地把我那位女朋友骂了一通。我家的电话和楼上的电话是一条线，他假装出门悄悄到楼上去，正好把我的行为弄了个一清二楚。

一次我在北京万体馆参加演出，开演之前我和一位女朋友去了《人民日报》，当我到达体育馆演员休息室，陈国军已等在那里，我还没有来得及解释，他就把我手中的一条烟，其实是一位朋友交我带给他的烟，拧成粉末，同时抓起桌上的镜子当着屋里所有演员的面向我飞过来，我头一闪，镜子在我脑袋后面的墙上摔成八瓣……

陈国军料事如神的本领一次次让我叹服。直到现在，我绝对坚信假如在战争年代他一定是侦察英雄，他确实具有出众的才华。他的神机妙算使我的小诡计处处落空，他的能力对付我这个大大咧咧的笨蛋确实是绰绰有余。

有一次也是万体馆举办活动，有姜文等一批演员参加。《春桃》组都有票，约好当天晚上大家去看。拍完戏我和几位朋友直接去了体育馆。事先当然没有给陈国军打招呼，摄制组那天也提前收工，为的是我回家的时间能对得上。

当我们兴致勃勃看完演出随便找了一个大门出场，一边

走一边正在暗自庆幸今日平安之时，陈国军已经站在台阶下等我。要知道万体馆至少有四个出口！况且人山人海！陈国军这方面的惊人智慧在以后的许多事件中越发精彩地展露出来。

尽管陈国军对我如此严格管教，我丝毫没有怨他，也没有恨他。我心里满怀着歉疚，我也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把一切都归咎于我自己的错误，虽然我已经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恐惧，每当一看到他，或是听到他的名字、他的声音，我就会控制不住腿肚子打抖，但仍然从心里觉得一切是我应该受的。

陈国军的怒火越来越频繁，怀疑心也越来越重。过分的管理，我开始反抗、辩解、申诉我的委屈，陈国军就更加爆发，家里几乎天天燃起战火，甚至当着我父母的面。

外婆九十高龄，父母也七十有余，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和冠心病。从小到大一家人从来是和睦相处，哪见过这种阵势？又心疼女儿、外孙女，又不敢劝，看见梳子、镜子等各类东西在我头上飞来飞去，吓得心脏病都发了，成天吃各种药压惊。尤其是天天看到刀子上下晃动，全家大小犹如处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早已魂飞魄散。

在这样的惊险时刻，小兰，我倾心对待的小保姆小兰挺身而出推波助澜。她向陈国军汇报了他不在时姜文到我家来过的一切情况，结果那天狂怒的陈国军当着全家的面把我和他一起关在厕所里，用铁丝在墙上挽了个圈，要和我一同自尽。这场风波持续了三个小时，父母在门外哀求他手下留情也三个小时，不敢打电话报警，怕他更加激怒，直到那位流量计厂的厂长偶然路过进来看看才救了我出来。

呵，在那段时期我给父母增添了多少惊恐？

父母亲生性平和，平日我们在一起从没有红过脸，不知道这些场景带给他们多大的伤害？

每当在这种时刻看到他们受的惊吓而我又“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不心如刀割。

什么叫“歉疚”？什么叫“恐怖”？什么是“魂飞魄散”？什么是“心如刀割”？这些中文形容词的深刻含义我全在那时候体会出来。

姜文一直在找我。只身一人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我开始与他联络。

我知道开始这种联络意味着什么。也许需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当然最后我并没有付出生命作代价，陈国军也没有真正打到过我，但在当时我百分之百认为他会那样做。同时，物极必反，我第一次认真想到了离婚。

我和陈国军的关系已经没有前途。几乎我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亲人都知道我们关系恶化，并且看到过也经历过这些丑陋且极不光彩的场面，已经亲眼目睹了我受到的污辱。

没有人会忘记这一切。我们怎么可能有一天再甜甜蜜蜜、花前月下出现在众人面前？我们怎么好意思有这个脸再去表演一对美满的好夫妻？

可是我不敢离婚。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跟陈国军离婚。我曾经体会过生命的脆弱，我已经明白得不能再明白首先得活着，离婚才有意义。我深知自己这颗本来就经不起风浪的心不能再承受更猛烈的大起大落。

陈国军每当在风暴之后总是对我百倍的体贴，千倍的温

存，可是我总觉得像老虎吃食之前对那即将被吃掉的小动物的抚弄，我不仅感受不到任何关心及安慰，反而比风暴来临时更加恐惧。

无奈何我只有再去“走穴”。陈国军跟着我去。这样也好。免得父母、外婆揪心。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一个人怎么都好说。

反正只有一条命。怕也是死，不怕也是死，还不如视死如归。脑袋掉了还不是碗大个疤？

可是求生是人的本能。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去寻求慰藉。陈国军三下两下一次比一次猛烈地把我推向姜文。与此同时，他不时打电话给姜文进行威胁。并且有一天他和他的几位兄弟把姜文押到一个房间进行审讯。

他用他的所作所为亲手把我和姜文的心绑在了一处。姜文和女朋友也断绝了往来。

在“走穴”队，在那些以我为中心、叫我“大猫”、我享有无限崇高和尊敬的“走穴”队，我更是丢尽了脸面。

我时常被陈国军当众审问，并且勒令我们停止演出，假如我反抗就是捆也要把我捆回北京。

时常是我在台上演完最后一个节目，在观众如雷的掌声中笑模笑样地鞠躬谢幕，幕布刚徐徐拉上，陈国军就会冲上台来，当着乐队、演员、当地演出公司及台上的观众，一把就将我拽到后台，在所有人的面前，咆哮着训斥我、谩骂我，并且把此时上来劝阻的人推搡得人仰马翻。

不让我睡觉，痛骂我，是常有的事。不管有没有人在场，不管在什么地方，各种污蔑性的语言声震屋宇。说句实话，每当在这些时刻杀他的心都有。看着他激怒的脸和不停吐出恶

毒字眼的嘴唇，我时常后悔，为什么在拍《神秘的大佛》时没有好好学武功？不然我现在就可以打他或是反抗他。省得总是丢人现眼任人宰割还不如死了算了。

可是，每当这一切过后风平浪静，我心里的歉疚又卷土重来。由于又开始了与姜文的联络，我消除不了自己的犯罪感，并且，歉疚的程度与日俱增，想到陈国军居然这么爱我，不能失去我，在三魂失掉七魄之后竟然又升起感激之情。

有好朋友说我没有出息，好了伤疤忘了疼，可是没有用。我发现人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心，尽管心在自己的身体内。

我尤其不能左右自己的心。

我纠缠在这重重漩涡之中。每当与姜文联络或是在一起，我都大谈陈国军以及我对陈国军的感情，无情地伤害姜文，而和陈国军在一起时，又为了姜文使陈国军揪心裂肺，撕肝绞肠。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大概就是哪本书上所写的“世上最毒妇人心”的妇人，那个电影“比男人更凶残”里的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坏女人吧。

我不停地回想陈国军离婚所受的重重苦难以及为了我失去的一切。

有朋友攻击说他是为了自己。不对。这有偏见。太恶毒。他是为了我吧？他当然是为了我。不为了我为了谁？谁肯为我去惊天地泣鬼神地离婚？越想这些越觉得自己在犯罪，将来准有报应。

那一天，下大雨，我记得雷电不停地鸣闪，在一声惊雷的同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道闪电从窗户直蜿蜒到我的床边，我想这大概就是天谴，是上天在警告我吧？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频频告急，北影办公室也在找我。说是青岛税务局，再加上海淀区税务局，再加上国家税务局，好几个税务局都在调查我，等着我去交代。据说我是此次“税的运动”的重点。

我哪里顾得到这些？况且我也不自由。各地的演出票都早已告罄，我总得将此次演出进行到底吧？只做得到挣扎着腾出空来告诉“穴头”要好好上税，对税务问题一定要严阵以待，慎之又慎，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不能屋漏又再遭连阴雨了。

再加上我接二连三地总是得奖，早不得奖晚不得奖，这时候得奖，不仅高兴不了，还不够添乱的。

那时候得的奖有多少？都不怎么数得清楚。“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济南“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奖，“佛山杯十大影视明星”奖，影片的“卡罗维发利”大奖，政府奖，上影“小百花”最佳女演员奖，北影“青年进步奖”，中国表演学会奖，同时我扮演的《春桃》、《原野》的角色春桃、花金子在《芙蓉镇》领奖几个月之后的第二年又差不多同时获得两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短短时间内连中三元，是实实在在的“三连冠”，《原野》的花金子还获得法国电视台的最佳女主角奖。……这些殊荣我在不到一年里全部得到并且都要去领奖，领奖会上差不多也会碰到姜文，我感觉我快活不成了。

我想再没有什么领奖像领“佛山杯十大影视明星”奖那一次给我如此特别的记忆。

24 陈国军亲切了 我再也不觉得



“佛山杯十大影视明星”评选是由广东省委、佛山市委还有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联合举办的。中国电影界，自“文革”结束恢复电影制作以来，评选十大影视明星这还是第一回。

中国电影家协会、各大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对这次活动都极为重视。评选方式是专家和观众投票相结合。以观众投票为主，专家意见为辅。

还在投票阶段就总是得到消息，从一开始我的得票就遥

遥领先。

最后的结果是由珠江电影公司总经理孙长城亲自打电话给我表示祝贺："你以绝对领先的票数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十大影视明星第一名。"

颁奖大会在佛山举行。其时，我正在香港进行为期一周的《芙蓉镇》宣传活动。在港期间，陈国军打过好几次电话到我饭店。无论我在天涯海角，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将电话打到我所在的房间，查问我的日程，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我一直没有告诉他准确时间。我不大敢也不大愿意回家。佛山杯颁奖大会组委会发了疯似地四处找我，我也没敢吭声。心里想，要领奖也只能直接从香港悄悄去佛山，免得陈国军追到会上去再闹出什么事来，我在电影界就没脸见人了。

从香港回国后我找了个地方"失踪"了两天。听说各大制片厂厂长，各大导演，全中国文娱版的记者，电影家协会负责人，各位得奖影视明星，都已逐渐云集在佛山。北影厂厂长汪洋及陈强、于洋等著名老艺术家也已经去了。组委会急得要死。各路神仙均已到齐，第一名来不了岂不是大煞风景？

第二天就要颁奖了。所有找得到的电话均已打遍，我还是没有露面，都以为我肯定是不会去了。关于可能去不了的风声，早在香港时我已通过一部分渠道透露过很多次给组委会。我怕得要命，假如陈国军再去佛山找我。

头天晚上，先给孙长城总经理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第二天将去佛山的消息。他非常高兴。然后，我得通知汪洋厂长一声，汪洋厂长非常希望我能去佛山，受组委会的委托不知往我家打了多少个电话，并且在我可能去的地点都留了他的口讯，我的电话一定要打给他，免得他着急。

“喂?”电话那边有人接了。

“喂?”我说,“汪洋厂长在吗?”

“他不在。”对方回答说,声音清澈稚嫩,“他开会去了。请问你是谁?”

“嗯……”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是刘晓庆。”

“哦。”对方丝毫没有惊讶,“汪洋厂长正在找你呢。明天就要颁奖了。”

“我知道。那么你是谁呢?”

“我是组委会的,我姓王。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汪洋厂长既然不在,我只好跟他说了。我告诉他请转告汪洋厂长和组委会,我将于明天早晨到达佛山,问他去什么地方找他们合适?他告诉我在××饭店,并且告诉我详细地址,电话,找谁。我再问他明天的日程安排,他又不厌其烦地告诉了我第二天的日程,我接着再问都有谁来了,他一一告诉我都有谁来了……正谈得热火朝天,突然对方变了声音:“哥们,你在哪呢?”

声音那么熟悉!我的嗓子里突然有了一颗心脏,在那里“嗵嗵”狂跳。“我是陈国军。你以为我真是王秘书啊?”

我的话筒一下子掉到地上。脑子立刻变成了真空。原以为我这个孙悟空一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翻了好多个跟头肯定翻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结果翻得头昏眼花自以为得计,回头一看,翻跟头时撒的那泡尿还在人家的手指头缝里冒烟呢。

我不可能不是天底下最笨的笨蛋。陈国军也不可能不是天底下最优秀的演员。说了这么多话,对他这么熟悉,居然一点也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真够可以的!

就像是老鼠偷油被人当场抓住了尾巴，我说不出的狼狈。我只有第二天乖乖地去佛山。

我不敢不去佛山。我也不得不去佛山。尽管在此之前是我自己愿意，自己想去佛山。

佛山市的一切我全不记得。只记得开会之前，陈国军站在会场通道口，面向墙壁，一动不动。大家都把我拉过去，让我哄他，握手言欢。我不这样做。每次我被推到他面前又挣脱大家跑回自己的位置，让周围看够了西洋景。他不回过身来。没有任何缓和的意思。直到现在我写这些时仍然满脸通红，头和脖子都在发烧。

我硬着头皮挺住这一切。找不出别的办法来。尽管我花枝招展。

记得最清楚，那天我穿了一件红衬衣，系了条黑领带，服饰、头发都很漂亮，又正是华年。当然，我还肯定是全场的中心。

当宣布得奖名单时，我听见会场里一阵欢呼。佛山体育馆挤得满满登登，外面黑市票、高价票价格不断疯涨。会场气氛里外呼应，异常热烈，全国当时最火、最红的十个明星都到了这里，怎么不令佛山体育馆蓬荜生辉？

我和其他九位大腕等在后台。我站在前面，脑子里一阵清醒一阵糊涂。陈国军还在那里像一尊铜像，那是人人都看得见的地方。我根本就不敢回头。

朦朦胧胧听见叫我的名字，一凝神听见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心一横把脸抹下来揣在兜里，甩甩脑袋摸摸头发挺胸凸肚地走了出去。

刚一站在台上，四周欢呼声又起。一高兴，不顾一切，从台阶上跑到圆圆的舞台内，活像个朝气蓬勃、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少先队员。观众兴奋得要命。

我接过我的奖杯，双手不由得往下一沉。说是奖杯实际上是有机玻璃做的“奖柱”，又结实又粗壮，足足有十来斤。我双手把它抱在胸前仍然觉得有些气喘不匀。

颁奖仪式很快过去。我们下场，文娱晚会开始。按照日程，我们应该去到会场里面，坐在观众当中，观看为我们演出的精彩节目。可当我刚刚走到后台，观众的掌声还不绝于耳，突然就伸出来[illegible]只手，陈国军把我这位十大影星之冠和我的奖品，在众目睽睽之下“劫持”上了事先等在那里的小汽车。

没有人来保护我。没有人问我自己的意愿如何。更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任何人跟我们在一起。只有我和陈国军，还有司机。车是组委会派的。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无论我是十大影星之冠还是之尾，无论我是元首还是平民，无论我到天上还是地下，我是陈国军的老婆。这就代表了一切。没有人管我们“夫妻间”的事。我就是今天被陈国军拉去杀了，在杀之前只要别人知道我们是两口子，也绝对不会有人管。

那张结婚证充分发挥了它的威力。我原来一直觉得它只是一张纸，但它是这样的一张魔纸：当夫妻关系好的时候它毫无作用，你会根本将它忘却，当夫妻双方感情破裂要逃脱婚姻时，它突然间成为天罗地网，让你走投无路。你要反抗吗？它会先置你于死地。

婚姻究竟是什么？结婚证究竟是什么含义？它合理吗？它公平吗？它科学吗？

它，人——道——吗？

推开房门，一把将我扔在床上，陈国军气咻咻地坐在角落里，大楼里空无一人，整幢房子静极了静极了。人们都在会场欢呼、庆祝，欢呼庆祝以我为首的十大影视明星的诞生。

陈国军沉默着，我也沉默着。我悄悄瞟了一眼，他翘着二郎腿坐在那里，脸色苍白——是真的脸色苍白。几缕头发耷拉在额角，他在竭力控制他的情绪。突然间我涌起一股对他的同情，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他既可怜又可怕还——可恨。

他把累了的脚放在地上，发出一声响声，随着响声我吓得在床上一跳，过了半天看没有动静再悄悄坐稳。

我在等着他的爆发。

他爆发了。铺天盖地。我那美丽的刚伴我领过奖，感受了我的光荣的红衬衣被撕成碎布条，那十几斤重才得到的十大影星"奖柱"在我头上飞舞，完全彻底的绝望弥漫了我的全身，我想我今天这条小命肯定是交待了。

好像听见汪洋的声音。是汪洋厂长的声音！

"晓庆，晓庆——"是他们回来了。是厂长他们。汪洋厂长一定是想来看我，向我表示祝贺。自我到佛山以来，我还没有和他说上话哩。

"晓庆，晓庆！"他敲门。我听见有人在和他说话。"可能睡了吧。"厂长自言自语地说。然后脚步声远了。

"哎，汪洋厂长！"我终于回过神来，不顾一切大声呼叫，抓起外衣同时扑到门口。

走廊里全是人，陈国军不能阻拦。我拚尽全身的力气拉开门，冲到过道当中，绕过人群一把推开了厂长的房门。厂长

住的是套间，客厅里没有人。“汪洋厂长，汪洋厂长！”急得我连声大叫。陈国军后脚也进了房间。“汪洋厂长！”我今天就不活了。啊，厂长，您在哪儿呢！

陈国军抓住我的胳膊。这时听见了厂长的声音。“是晓庆吧？”“对！是我！”我马上回答。他在卫生间，马上就出来！我甩开陈国军的手，坐下来。陈国军也只好坐下来。

厂长穿着浴衣，刚在卫生间一露出头脸，我闪电般站起来扑上去，拉着厂长的袖子急切地说：“厂长，陈国军要打我……”

厂长看着他，陈国军马上说：“我怎么会打你呢？哥们，你说胡话了吧？”他的脸上竟堆满了真诚的毫不做作的笑脸！真是天才的演员！

猝不及防我愣住了。他过来拉我，和蔼可亲甚至慈祥。“走吧，哥们！太晚了……”

“不！”我清醒过来，大叫一声往后一缩，像捞救命稻草，我跺着脚，再说：“厂长！是真的，他刚才把我的衣服都撕碎了……”厂长又看陈国军。

陈国军笑嘻嘻地：“不会，不会，是这样，厂长，刚才我们两口子拌了几句嘴，你看，她就到这儿来告状！仗着您喜欢她！”厂长正色说：“陈国军，不许胡来！”陈国军连连点头：“厂长，我保证！她是我的哥们，我爱她还来不及哩！”

此时又有人进来找汪洋厂长。我不认识他们，好像是珠影的。陈国军春风满面：“哥们，走吧！厂长有事，我们也该休息了……”眼巴巴看着厂长我再也说不了什么话，厂长扶着我们的肩膀把我们送回了房间。

这一夜当然不可能睡。

第二天一早，我在陈国军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

陈国军又开始对我柔情缱绻，爱如至宝，可是，我不能忘记那一夜，它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可能再经受得起那惊吓的刺激。

陈国军在我眼里心上已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是我的爱人甚至朋友，我再也不觉得他亲切了。只要他一靠近我就会发抖，只要他说话声音一大我就会从呆的任何地方跳起来。睡觉时只要他一翻身我的心就会“嗵嗵”乱跳，睁大眼睛抓紧全身的肌肉，就像是睡在老虎的旁边……

25 决不能再回家去



又开始拍戏，拍戏的间歇"走穴"。陈国军从不与我分开。

拍戏时他在附近，拍完了就接我走。"走穴"更不消说，每分每秒都不离我左右。

拍戏时或在台上演出时，我是光芒四射的"大明星"、"大腕"，下妆后和下台来，我是大猫股掌中的小鼠。陈国军努力抚平我的恐惧。我强作笑脸表示感谢他的关切。

可是在我心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是否有过温馨?是否有过甜蜜?那是多么多么遥远仿佛是发生在上辈子的故事……

我壮着胆子试着提出离婚的问题,可是陈国军总是顾左右而言他,绝不理我这个茬。

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我。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紧接着是那次令我终生难忘的“走穴”。

这段时间,我的情况让父母操碎了心。虽然我从不与父母议论这件事,可是他们什么都能看得出来。

我想他们那平和的神经实在是难以经受起这些狂风骤雨。我总是一有机会就跟他们说要把全家搬到深圳蛇口的那幢别墅里去,我愿意他们离开我住到一个远远的地方,不能让他们再跟着我担惊受怕了。

可是我一直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安排这件事。他们时常急急地、悄悄地要求我走出去,走出这个家,远走高飞,不要再回来。

我总是坚决地摇头,那怎么可能?有他们在北京我绝不会离去。何况很多事千丝万缕,不是一剪子可以了断的。

在此期间,我原先在部队的一位女战友来到北京。目睹了几次陈国军的“霹雳”,回回都震得目瞪口呆。等回过神来她总是背地里骂我软骨头,窝囊,让我马上离婚。我仍然像祥林嫂那样跟她列举陈国军的许多好处,以及他那永不能令我忘怀的不惜一切代价为我离婚的行为,还有我对他的歉疚。我是这一切过错的导火索……

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怎么可能离婚?除非陈国军同意。

他绝不会同意。

我开始后悔把全家老小接到北京来。我自己身经百战，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再说我已活够，像我这样的“祸水”也死不足惜。没想到让白发苍苍的外婆、高龄的父母跟着我受连累。可是我无能为力。我只能小心翼翼，不再触发战争，哪怕是为了他们也要忍受一切。

又去“走穴”。离开家，让父母、外婆清静。给我多少钱去哪里我根本没问。

陈国军仿佛又换了一个人。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在他身上无影无踪。我尽我的最大努力克制自己，闭目瞑想他对我的种种好处，为走近他做各种艰苦卓绝的努力。

每当离开北京，我都要天天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报平安，同时询问他们的情况。多年来一直如此，成了我的习惯了。在临走之前，外婆、父母拉着陈国军的手，老泪纵横地求他不要再发脾气，要我们两人和睦相处。在得到我们尤其是陈国军拍胸脯跺脚的响亮保证后，又踉踉跄跄跟我们到楼下，目送我们的汽车挥手到不见人影。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

正因为如此，这次出门我很不放心。打了几次电话，总是回答全家平安。我也尽量报喜不报忧地将演出盛况及陈国军如何对我关怀吹嘘一通，让他们不要胡乱猜疑。

听说北影厂来了通知，要我在×月×日参加法国大使馆的一个酒会，一定要去，是厂里派的任务。无奈何只有把演出的日期提前，这样，我们可以在酒会的当天赶到北京。

回北京前照例往家打电话。没有人接。

奇怪。又打。再打。还没有人接。我们总是晚上赶路白

天演出，心想打电话都是在白天，碰巧不在家吧。

可是怎么会都不在？外婆呢？小兰呢？

接着打，有人接。是我的战友。她说一切都好，让我们放心。并且约定她会到法国大使馆见我。

好吧。既然如此就别胡思乱想了。又听说妹夫靖军也到了北京，那就更放心了。还是照顾眼前的事。

最近查税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格了。每到一地还没有开始演出，剧场后台税务局的人就坐了黑压压的一排。我们演一个节目下来给他们点一支烟，唱一首歌再去倒一杯茶，点头哈腰忙得够呛。偷税漏税已没有可能。“穴队”的队员们心劲都没有了。每个人都盼望着赶紧完成演出，早点回家。

那天下午，我们到了北京。想着不能误了晚上法国大使馆的酒会，心里急，一出火车站租了一辆车直往家奔。一路上筹划着晚上穿什么衣服，配什么首饰，梳什么发型，再想好衣服在什么地方，首饰在什么地方，喷发胶在什么地方，刚刚弄了个眉目车就到了楼下，一打开车门我就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冲。

“小兰，小兰！”一边喊我一边敲门。真慢。小兰总是慢吞吞的。

“爸爸，妈妈！丹丹！我回来了！”又喊又叫，手指头都叩疼了。

“妈妈！怎么回事嘛！快点开门！我来不及了！”我跺脚。

“手指头要断了！”我双手一起乱打一气。

一把钥匙打开房门，一跟头差点跌进房中。是陈国军上来了。气冲冲把包往床上一摔，咦，今天家里怎么这么安静？

回头一看，没有找着人。在这间房子里吧？

打开门，没有人。

那间呢？

那一间呢？

都没有人。突然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楼上厂长处吧？

飞奔到楼上，对着门一通狂轰滥炸。没有回音。一步从楼上又跳下来，喘着气慢慢搜寻……

再开房间，再看屋内。柜子里，床底下都看了，什么也没有。柜子里空空如也。爸爸妈妈他们的东西都没有了！一着急我大哭起来。

陈国军从床上拿起来一封信。信！是写给我的！是我熟悉的字迹：

晓庆、国军：

我们走了。不求富贵，但求平安，四代人像逃难一样地走了。就算没人赶，我们也要走的……老人、孩子无法再在这样的气氛下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

另外，作为老人，我们认为这样对你们也有好处。该到冷静的时候了。半年来，我们目睹着这一切，经受着这一切，心里也反复掂量着，事情不解决，将对每一个都没有益处。而真正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千万不能再失去理智了。冷静下来，才能想出好办法，做明白事。

国军：我们是晓庆的父母，也是你的长辈，疼爱晚辈是自然的。看到你常常发怒的样子，除受到惊吓外，心里的确也很不是滋味……我们盼望着你们早日摆脱掉困难，各自都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你们还都很年轻呀！

这只有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才会体会得到的。

晓庆：你一定要依靠组织，按法律办事。还要相信国军。好说好散。

不多说了，只望我们老人的心能得到理解。我们的话，能让你们听进去。

望安全归来，并能顺利平安地解决问题。

请勿挂念我们

妈妈、爸爸

1988年8月1日

他们走了！他们去蛇口了！他们一定是为我而走的！颓然坐在床上，心里拧成一股麻花。老的老，小的小，那么远的路，那么多的东西，他们怎么走啊？

我仿佛是站在沙漠里。四周一片空旷，我一个人，孤零零的。陈国军一直在说些什么。是暴风雨又来了吧！

突然间回过神来，现在几点钟了？又过了多长时间？好像有件事我要去做。是件什么事？我怎么想不起来？

想。皱着眉头，使劲想。楼下传来喇叭声。是汽车！汽车来接我！接我去什么地方？

轻飘飘走出房门，眼前白茫茫一片。云雾中看见了北影的司机，在向我说着什么。

你说什么？大声点！他大声喊。像是去法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

像锥子扎了屁股，我跳起来撞进屋里，一阵风似地拚命打扮。洗头、吹头、梳头、脱衣、穿衣、系腰带、穿袜子、戴耳环、戴

项链、高跟鞋……琳琅满目穿了一身，拿起手袋袅袅婷婷走到门口。

临出门时向陈国军打个招呼，关门时顺便看了他一眼：我看见他叉着腰抿着嘴气咻咻地站在屋子当中，这幅图画从此永远雕刻在我的脑海……

汽车停在了法国大使馆的门前。一出车门我看见了姜文。

眼前有许多金色的小星星在飞。大概是刚才起身时动作太猛了吧。再一眼看见了我的战友。

哦！是她。她在等我。

烛光闪闪。我们坐在桌前。那是些红蜡烛，上面的火闪着黄的光。战友和我，还有姜文，坐在桌子的一边。我的脸对着法国大使，战友的脸对着我。我一边频频举杯向大使及各位来宾报以微笑，一边听我战友说话：

“爸爸、妈妈、丹丹、外婆，他们都去蛇口了。”我的战友说。

我瞟了她一眼，又向大家抛了个媚眼。

“是我安排的，是妹夫靖军送他们去的。”战友接着说。

我微微点头，说不出话来。

“老人们不愿意拖累你。他们说，有他们在，你一辈子也离不了婚。”

一股热浪冲向我喉头。我感觉眼泪快要被那热浪冲出来，赶快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把它压下去。

“今天你无论如何不能回去了，我们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住处。”

含着嘴里的东西，我赶紧看她。

“必须这样做。你回去了就出不来了。今天晚上又得闹死。就这么定了。”我的战友坚定地说。

26 离婚吧，我对陈国军说



我没有回去住。我到了一家四合院里，战友、还有我一位律师朋友的夫人陪着我。

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以前？我认识了这位律师。我向他谈到了离婚问题。在此之前，我曾两次问过两个不同的有名望的律师，像我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离婚？离不离得了婚？两位律师都不约而同地给我泼了大小不等的两瓢冷水。他们说我是名人，传说中又有钱，从道义上经济上社会法庭都会同情对

方。我一想也是，本来自己就不坚决也就退了回去直到如今。

只有他。这一位律师，他姓吕，叫吕建民。只有他在我匆忙潦草地讲了几句之后立刻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离婚？当然能够离婚。"我说我没有理由。听说离婚要有充足的理由。"没有感情就是理由。是最重要的理由。"他简单明确地回答我。

从来没有任何人这样跟我说过。我的心一下子开了不少。后来，我见到了他的夫人杨曼玲。不由自主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们诉说了好多好多。他们一边摇头一边说，想不到中国的大明星也是这样的境遇。我赶快解释说都是我不好。我有第三者。一切都是由我引起……可是好像他们不听这些。

今天，战友和杨陪着我。慢慢地我知道了一切。

在我离开北京后，父母亲就给远在深圳的靖军打了电话，要求他立即赶到北京来。有要事，十万火急！

靖军吓了一大跳，星夜兼程立即赶到了家中。

老人们开了一个控诉大会，声泪俱下声讨在这里所受到的惊吓，讲到我的情况，心疼得全身发颤。父母、外婆齐声要求离开这里，不连累我，大家才能平安。

靖军听后一言不发。几分钟后作出决定，全家立即迁往深圳。

家人们互相嘱咐悄悄行事，不可声张。尤其是不能告诉懦弱而缠绵的我，免得打草惊蛇，也怕我哭死觅活加以阻拦。

这一天晚上，老弱病残四代人举家南迁。

这是一支罕见的逃难队伍：外婆年近九旬，父亲七十有

余双脚有残疾，母亲也年近七十身有重病，丹丹三岁，小保姆十六岁，全家老小拖着二十件大包小裹随身携带的行李踉踉跄跄。

老人动作缓慢，那天出发时就晚了。好不容易挤上两辆出租车，慌急慌忙朝火车站赶。

路上又遇到拥挤的车流，两辆出租车又冲散了。停停走走到了车站汇成一处，装行李的车又没有来。眼看着离开车只有二十分钟，靖军直在大钟底下跳脚。

冲过去买了几张站台票，分发给几位朋友，帮忙盯住几个进口，行李车一到帮忙找人运进去。靖军带着队伍蜿蜒前行。

时间越来越紧，老人孩子却越走越慢。急中生智只有掏钱雇人将父亲和外婆背进车站，妹夫和保姆拉着母亲和丹丹快走。

到了站台上一看，几张硬卧票还不在一处，三张在六车厢，三张在一车厢，又赶快分头上车。远远地，几位朋友拖着行李气咻咻进来。

好不容易到了车前车铃已响，车厢门口已停止检票，苦苦央求列车员半天，刚上车轮子就启动了。

挤过拥挤的人群两头清点行李，行李还没有清点好又出了麻烦：原来还有几张车票在送行的朋友手中！

无奈何只有又掏钱补票。可是好说歹说列车长直摇头，答复是没有卧铺不肯补。坚持不懈顽强求告，看着颤巍巍的白发老人和孩子在车厢里站立不稳摇摇晃晃，列车长才终于动了恻隐之心。

八月广州，骄阳似火。难民般的全家老小相互搀扶着下火车，没有地方逗留，只有坐在那一大堆卸下来的行李包上等

在站台里。靖军出站去买到深圳的当日火车票。

购票的排队长龙长得简直不可思议,"加塞儿"肯定会遭来众人的白眼和愤怒,闹不好还会被执勤人员揪出去痛斥一顿,只好老老实实地站在最后边。想到在烈日酷暑下晒烤的老老小小,急得从心里往外出火。突然,天无绝人之路,一个临时售票处的窗口一下子打开,靖军扑到窗口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面前,就在此刻,就能买到票。那份高兴那份激动,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好不容易将全家老小送上火车安置好,又立即跳下车去托运那二十件大行李。在深圳有表哥、表妹一大堆人从香港过来接外婆、父母,好歹可以放下一点心。

可是这二十件行李怎么办?靖军一个人守着堆成小山似的行李好一阵犯愁。

好几个包裹都裂开了嘴,有的包没有锁,托运处肯定不收。可是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去买针线,不能离开这里也不能随便把行李托付给人,怕东西弄丢。

靖军只好假装散步在周围慢慢地溜达。眼睛隔一秒看一下行李,越逛离那堆小山越远。磨蹭着到了商场门口,一抽身亡命地往里跑,飞快冲到柜台买了针线东西,赶快夺路又逃回行李堆旁。周围和商场的人都跑出来惊诧地观望,肯定认为这个人不是小偷就是逃犯。

幸亏行李没有遗失,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的体统,靖军坐在小山上一个人细细地把那几个张了嘴的包裹缝好。

接着排队托运行李。眼睛须臾不离小山,两腿往前迈进,轮到他了一边办手续一边跑过去拿行李,只有两只手,一次最多只拿得动两、三件,反反复复地来回转了好多个圈圈。

战友和杨都说这次逃难事件简直是一场恶梦。战友还发感慨:“老弱病残幼,千里南迁,大概也是一项基尼斯纪录吧?”

夜。万籁俱寂。静。静得不得了。

大家都睡了。窗棂上树影摇曳,是那院子当中的枣树吧。枣树竟能这样摇动,大概是有风。仔细听,果然有瑟瑟的风声。凉气从脚上一直透到我心中。陈国军在干什么呢?我不辞而别不回家,他一定很寂寞吧?

他一定非常非常想我。那年我去美国办影展,妈妈说,自我走的那一天他就每天晚上坐在凉台上,到清晨还不睡,等我盼我,直到最后等到我回来。

去年,他的母亲去世了。在北京我没有把她的病治好。今年春节,我陪陈国军在楼下给他妈妈烧纸,一边烧,陈国军一边说:“妈,晓庆看您来了……”当时我伤心得成了个泪人儿。

他一直说我是他的命根子。我是他的命根子,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人体贴。他对我的无微不至像空气弥漫在我的周围。

他是那么能干,坚韧不拔。他能忍辱,能负重,生活能力那么强。没有菜吃他能用吃剩的西瓜皮弄出一盘可口的菜来。那次他到北京来看我,没有钱买卧铺票,车上又挤,他一直站到北京,到北京没有地方住,在公园里的长凳上一连睡了好几夜!在部队里,他一定是侦察兵里特种部队的特种兵吧?

他现在一定睡不着。我给他打个电话吧。可是不行。战友和杨肯定会说我。骂我是窝囊废,没有骨气的东西。

不对。这是我自己的事啊。骂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电话还是打吧。陈国军肯定会暴跳如雷。我怕。他肯定会要我立即回家。还会马上到这里来接我。他查得到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他是最出色的侦察兵。我走之前他好像在说是我和家人串通好的阴谋。他会杀了我吧?

别杀我。我只是要离婚,离了婚还可以做朋友。照样在一起拍戏,"走穴"。你不同意。我知道你不同意。可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了。真的不能够了。我们的关系充满了恐怖。再说,我们怎么见那些看到过我们硝烟弥漫场面的人呢?离婚吧。哪怕是离了婚等过一段时间再复婚也可以。

那把刀子。还有那包炸药。从《大清炮队》拿来的炸药。我不,我不要和你同归于尽……

我被战友推醒。天已大亮了。我被告知说是陈国军已知道了这个地址,要立即转移。转移!我穿上衣服立即行动。这个秘密据点已经暴露了。像地下党一样。

也许是我怕陈国军怕得要死,于是吹他的神通吹得过火,大家的警惕性都特别高。兵贵神速,很快我们到达了新的地方。

我又没有钱了。所有的钱都在家里。早知道带点钱出来就好了。现在是一文不名。第一次离婚我还有三块七毛钱呢。这次倒好。成了光溜溜的穷光蛋了。

不敢去拍戏。不能去"走穴"。我也不敢去领奖。听说《原野》我又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近日就要开会领奖,我根本想都不敢想。

我在香港买的楼花怎么样了?要卖了还有钱可以吃饭。猛然间想起我还有那么多债,我的天!怕到时候楼花卖了,债

也还了，钱赚到一点了，我也饿死了。

钱都在陈国军手里。也好。我愿意给他。假如能够赎清我的罪恶。我欠他的债恐怕才是一生也还不完。

我想我不会再有幸福了。一个心灵上有这么沉重负荷的人是不会有美好前途的。

一想起陈国军就心绞痛。当然我要离婚。这是肯定的。可是我还是心绞痛。

律师和我谈话，我请求律师能不能不说对方的不好，另编一个理由去离婚？律师说不行。你必须说实话。于是我只好说“实话”。当然是一部分实话。一边说一边心里想：对不起，陈国军。我只是要离婚。

然后起草起诉书。是我告他。是我要离婚。其中有一段要我自己写。我开始写。写起来缓慢但是无力。唉！要是平平和和地离婚该有多好啊！

律师走了。说好我写完后通知他们，然后寄出。

大厅里空空的。呵，我才看清确实是一个大厅。我住在半片别墅里，厅大房间小，有朋友管吃住。尽管没有钱。这一点比上次离婚强多了。我坐在厅的中间，抬头一望，那高高的屋顶像宇宙的苍穹。想到如果架一个摄影机从上往下俯拍，我就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此情此景太像我看过的许多电影中描写的悲伤、孤独的镜头。我突然明白了，毛主席说文艺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多么准确。

眺望窗外，在勾花的窗纱那边是忙碌的人群。天照样蓝，草照样绿，谁也没有理会我这个渺小的人正在进行好像天都要塌了的离婚。啊！好久都没有在这样的蓝天白云下舒心地

走过了！

还是那年和陈国军……又是陈国军。哦，这几天他怎么活得成呢？又开始揪心裂肺。五脏六腑都疼死了。

没有人在旁边。我要给他打电话。我要安慰他，抚慰他。不能让他太伤心。

“喂？”刚喂了一声，就哽咽难言。没有出息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奔涌出来。

“哥们。”是陈国军的声音。他开始说话。讲我们之间的故事，讲过去细细的一切，讲在长影拍戏，讲《无情的情人》，在电话里小声给我唱歌，唱《大坂城的姑娘》，唱《无情的情人》的主题歌……

我的脸上沧海横流。那海水不停地淌到衣服上，我听到它们滴落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我请求他能协议离婚。离——婚——吧，我说。

他告诉我，香港的记者正在访问他。是他在香港的妹妹联络的，他在等待我的觉醒。他并不想毁我。只要回来什么都好说。不然他会用他的整个后半生来报复。

他的声音仍然轻柔。恐怖一阵阵向我袭来。电话里又在开始回忆，我的面前出现他各种各样的脸，所有的一切都在闪动，半空中响起嗡嗡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好像有一只手伸进我的肚子里搅动，我的肠子拧成一团。从沙发上滑到地上，我在地上滚动着，说不出话来。

勉强挂上电话，我蜷缩在一起。我知道了什么叫挣扎，我的喉咙被一大堆东西堵住，发不出声音，我感觉我开始窒息，我可能要死了……

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到床上来的。迷迷糊糊睁眼一看，阳光照在我的被子上。阳光是那么灿烂，我看见光线里飞舞的小小灰尘。想起小时候我时常新奇地看着那光柱去捉那小小的灰尘玩，此时看见这片阳光竟是到了世界的末日。那句著名的台词是怎么说来着？呵，对了，是“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我要睡了。那就睡吧。太累太累了。

钥匙在响。有人走进来。管它呢。我什么都不怕了。有声音在叫我。不是一个人。我看见了。是律师小吕和杨。他们拿着一份传真，先问我是不是病了？然后告诉我陈国军已委托人在香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我和他离婚的事。他告诉报界我的父母把所有细软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突然离去，只给他剩下一条毛巾……我坐起来。

我怎么一下子不痛苦了？小吕再接着说我们的结婚证已登在报纸上，我看见了那张报纸的传真。上面除了结婚证外还写了许多本来没有的事。

我头脑一下子清醒了，眼睛开始明亮了。我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晴朗，突然之间我感觉解脱了。我不再欠谁的了。

光着脚跳下床找来我写的那段起诉书。三个人鼻子碰鼻子开始研究起来。半个小时以后，我在起诉书上签了字。我人生新章节的引号打开了。

很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我的离婚案。

27

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我开始同外界联络。几个摄制组找我拍戏找遍了天下。其间我又转移了几个地方。绝对不能让陈国军找到我。

我认真感受姜文。惊讶姜文居然能忍受我对他的这种精神折磨。他这么包容我，真是惭愧得要命。

醒过来之后面临的第一个矛盾是一年一度的“百花奖”颁奖大会在深圳召开要我去领奖这件事。鉴于上次佛山十大影视明星颁奖会的风波，我是绝对不敢再重蹈覆辙了。况且此

次情况与上次又大不相同，尤其得知香港记者已云集深圳，要有什么丑闻发生岂不天下大乱，丢了我自己的脸面不说，也给中国大陆电影界抹黑。唾沫四溅地在电话里把这些理由重复了许多次，组委会也觉得这是个头痛的问题。

可是颁奖大会又不能没有最佳女演员。尤其是鉴于我在海外及深圳、广东一带的影响，当然要比获得其他奖项的那些歪瓜咧枣的男导演、男明星好得多。组委会开始研究"作战方案"。

首先，通过北影找陈国军谈话。他现在是北影职工，要服从组织分配，不许在此期间去深圳。据说没有谈通。深圳是大家的，谁都可以去。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一计不成只有另想一计，着重研究组委会的防卫工作。

要给我单独找一个地方住，不能和大家在一起。尤其不能住在记者们找得到的范围，万一发生什么事不至于影响面太大。

下了飞机就专车接走，住地要严格保密，只能组委会几个人知道。

航班号也要保密。组委会的小李专门负责我安全的事。

最重要的是严格控制会场的入口。千万不能在会场闹起来。那会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大丑闻。可是怎么控制得了呢？

加强保卫。这次大会请了一百多个保安队员和公安局的便衣。

要是陈国军有票进来了怎么办？发照片。陈国军的照片印它二三百张，每个大门收票处和警察保安一人一张，或是照片传阅让他们看过熟记其面孔，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严密

监视，必要时清场。

组委会把战略方针讨论来讨论去，枪毙了无数不成熟不完善的计划，最后成活了这样的一套方案。

再想办法如何施加压力，软硬兼施把我弄出来。哄到飞机上前往深圳。知道我这人吃软不吃硬，况且现在胆小如鼠，岂止胆小如鼠，简直是吓破了胆，得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又请来北影厂长汪洋。汪洋也早已离休，现正任《红楼梦》巨片的总监制。知道我素来敬重他，听他的话，所以电影界一有大事就请他出马。到目前为止，凡是汪洋出马在我这里都是马到成功，命中率是百分之百。而他对电影界的事也从来是有求必应，当然他是最佳人选。

汪洋厂长又照例鞠躬尽力，每天打无数个电话给我，打得电话线都热了。每次他打电话来，我血泪申诉的理由他觉得有道理，然后打电话给组委会替我解释。组委会又对他做一通工作，他再转变立场打电话来说服我。如此三番五次，我心里想，哼，厂长，您总是帮人家来劝我，我总是听你的话出山，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了！

汪洋问我什么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于是我在电话里给他讲这个普希金童话。有一个渔夫打上来一条金鱼，金鱼突然流眼泪了。金鱼说渔夫伯伯您放了我吧，以后您要什么有什么。渔夫惊愕之余觉得这条小鱼实在可怜可爱，于是放了它。回去跟老婆一说，立即挨了老婆一通乱骂。问他为什么不当时要点东西来？去，要一间屋子。于是渔夫回到大海，喊金鱼，金鱼游过来问，伯伯您要什么？渔夫说要一间屋子。金鱼说您回去吧，现在您已经有屋子了。渔夫回家，远远地果然看见一间漂亮的大屋子，老婆住在里面。从此老婆总是让渔

夫去要东西，渔夫也总是去向金鱼要，总是如愿以偿。后来老婆要金鱼去伺候她，渔夫被迫含泪跟金鱼一说，金鱼一扭头一摆尾游回大海无影无踪，所有豪华美丽的东西也全部都变回了它们原来的模样。

我说厂长，过去您说什么我听什么，绝对是有求必应，这次您不能让我拚着命听您的话去领奖吧？您不怕我也一扭头一摆尾游回大海无影无踪啊？厂长大笑起来，又打电话给组委会，大约四十分钟后再打回来，详细叙述他们的作战方案。还专门找了个直线电话打，免得走漏了风声。在来回听了几遍后我终于说：行——吧。

同时，《红楼梦》剧组要拍内景，内景搭在北影厂内。由于《红楼梦》的总监制是汪洋，他们也在制定方针。新厂长宋崇不停地找陈国军谈话，要陈国军保证不影响摄制组的拍摄工作。陈国军向厂里保证拍摄时不来找我。组里还给我一辆专车，车让我自己去租，于是我请了我熟悉和信任的在《春桃》组就为我开车的司机小李。

千般计谋万般防范，我终于在深圳体育馆颁奖大会上粉墨登场。下飞机后坐上一辆专车开到一个秘密住处，接着又顺利地到达指定地方。大会一直得到报告：平安无事。

从高高的台阶上走下来，我从凌子风导演手中接过那在八年前就该得到的电影《原野》女主角金子的最佳女主角奖。这个角色我已在法国电视台获得过最佳女演员奖。

八年前，我们拍摄了影片《原野》。这部影片在完成后成为国内及海外当时最轰动的大陆电影。它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是中国大陆“文革”后第

一部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电影。可是大陆的观众不知道这些。因为这部影片在出品的当年,就不允许在中国大陆发行。虽然不允许发行,可是"上座率"非常之高,录像带作为参考片组织内部观看,《原野》这部影片的影响遍布全国。

八年后,《原野》终于批准公映,"百花奖"选票纷纷投向我的名字。《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

从凌子风导演手中接过奖杯,他紧紧拥抱我表示祝贺,然后我缓步走到话筒前面。此刻站在台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很高兴我又一次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静场片刻,我开口说。一阵掌声像海风刮过。

"我已经是第四次获得百花奖了。"我接着说。又是海风阵阵。

深圳的观众真是热情而又礼貌,我同时想。干咳一声,我大声说:"不过这个奖假如是八年前领到,我会更高兴。"说完鞠了一个躬,下台。暴风雨般的掌声骤起!

我的喉咙又被升起的一团东西塞住,眼泪又好像要掉出来。最近我动不动就来这一手,不会是得了喉癌吧?

一切都很顺利。至少到目前为止都平安无事。接着去参加大会举办的酒会。

酒会的情况和我们预先想到的完全一样。刚进大门我就被香港记者及各地记者团团围住,我一边快步走,一边飞速回答问题。组委会全体上来维持秩序,问题太敏感尖锐,我就巧妙地绕过去,会场上就像是来了龙卷风,那情景令我想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喧嚣声中我听到最多的是离婚的问题。这正是香港报纸

每天的新闻。对这种问题我当然总是听不见，或是听不清，或是听不懂广东国语，或是被人踩了脚没有听到。幸好大会事先安排好的作战方案里有一条去酒会见记者限定时间十分钟。

十分钟后我被推推搡搡到了安全地带。我一边提高跟鞋，他们一边整领带拎衣服，大家盛赞这个作战方案的英明正确。

乱哄哄闹了一场，拿着奖杯我回到了北京。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状况。我们都虚惊了一场，简直是杯弓蛇影。想起由于我一个人给大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我对大会怀着深深的歉疚。

我总是歉疚，我得了歉疚病。

28 从女厕所狼狈出逃



第二天我走马上任。

王熙凤又重整旗鼓，去大观园里报到。

化装室里叽叽喳喳，夫人们、小姐们、老祖宗、老妈子、宝玉、黛玉、宝钗、湘云、迎春、惜春、探春，嘻嘻哈哈打成一片，花团锦簇，美女如云，一派歌舞升平。

我用凤辣子的特有眼光凌厉一扫，没有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把心放到肚子里，抱着大家狂呼乱叫起来。

大观园是场地外景，搭在北影院内。怡红院、衡芜院、潇湘馆……一个个小院层峦叠嶂，既气派又雄伟。看样子大观园里的"姐们"都知道我的事，可是大家心照不宣，我不说她们也不问。

好像从地下的囚室里出来放风，整整一天我都在现场撒欢。和大家胡侃神聊，拍摄现场里笑声阵阵。眼看着夕阳西斜，我的心开始沉重。一边拍戏一边往门外偷看，越来越心神不定。同时不停地安慰自己，别犯疑心病，上次领奖会自己那么紧张犹如惊弓之鸟，结果实在是多此一举。在这里可不能再"狼来了"。

突然间晃过一个身影，心里"咚"的一下赶快瞧：陈国军等在那里。我的妈呀！一下子我扑到地上，就像是炸弹刚开了花。一时间，丫环、婆子平素与我相好的演员们奔走相告，我蹲在那里半天出不得声。

卸掉钗环，脱下裙裾，在"姐们"的陪同下壮着胆子走出摄影棚。我的车停在那里。司机小李点点头，手指指旁边。我顺着他的眼睛一看，陈国军抄着双手，站在车门前。

回头望望，汪洋厂长跟在我身后。平素说我总叫"狼来了狼来了"，这不，狼真的来了。我打开门上车。陈国军关上门不许我上，快步绕到另一车门一溜烟钻进车内，陈国军站到车头前。车开始发动，车轮空转，陈国军顶在前面，大有欧阳海视死如归的气概。汪洋厂长义不容辞前去劝解，陈国军将他推到一边。

人群越来越多，都在观看这场表演。新厂长宋崇闻讯赶来，新老两位厂长一起解决问题。表演越来越精彩了，人们看得有滋有味。无奈何我开门走下车，像为了保护群众而从容

走出行列的革命志士。

我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和你谈谈。"我说："好，我们现在就谈吧。"他说："不，我要单独跟你谈，我们回家谈。""那我们在北影谈吧。""不行。跟我回家。""那不可能。"我坚决地说。

两位厂长又出来打圆场。劝来劝去从摄影棚里又拥出来几个《红楼梦》组的剧务，连哄带拖把陈国军推到一边。我跳上车跟小李说："走!"车轮刚一转动，陈国军拚命挣脱大家又站到车前面，随着刺耳的一声刹车尖叫，我的头猛地撞到前面的椅子上，头昏眼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最后新厂长来劝我，是否可以去他家谈。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任何选择，只好下了车跟着厂长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去宋崇家。

宋崇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我们谈了些什么已记不清。印象中不外乎是回家不回家离婚不离婚的纠葛。此时的我，对婚姻已心如止水，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动摇。谈话肯定是不果而终。因为太晚了，我只有在宋厂长处住宿。

一夜辗转难眠。我睡在他家的客厅。客厅的墙上有一只漂亮的时钟。我到现在也不能忘记那只美丽的时钟。那时钟不与我同样的心情，一直"滴滴哒哒"无忧无虑走个不停。这还不算，它每到一个小时大唱一支欢乐的歌曲，每到半个小时哼一首高兴的小调，气得我一会儿翻起身瞪它几眼，一会儿蒙头拚命睡也毫无作用。

第二天一早，我深一脚浅一脚神魂颠倒地走到化装室，昨日的昂扬已没有了痕迹，看我霜打了似的，大家也闭嘴敛声。一边化装我一边打瞌睡，头一点一点有一次竟然磕到了桌边

上。不是化装师及时扶着我，肯定变成水牛长了犄角。

连续几天天天如此。每天戏快拍完陈国军总在等我。然后又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尽管加强了保护，好不容易冲出阻拦，车开出了北影厂门，可已夜深人静，我和小李都筋疲力尽。只有在大街上停车冥思苦想，今晚上到哪儿去住呢？小李总是默默地等着，等我想好了去哪里住，他再送我去那个地方。再后来干脆借了一套被褥枕头放在车屁股后面，想好了去处，开车到朋友家，一进门打开被褥倒头就睡。

每天拍什么戏说什么台词，镜头一演完我全不记得。在开拍前打灯光时站在机器前脚直打晃，一拍完穿着服装带着满头满脸的刀刀叉叉，赶快找个地方一躺。有一次差点有人把脚踩到我的身上，她以为地上花花绿绿的一团是哪位演员不经意把衣服随便乱扔了。

此时姜文回到了北京，每天在北京满大街乱转拍摄《本命年》。时常，他正在酒吧间“追”程琳，得到我危急的消息，扔下程琳跑去四处打电话，再不就是拍主人公被戳了一刀的场景，姜文浑身洒上血浆躺在地上装死，一切都准备好马上要开拍，听说我又被围困，他立刻“诈尸”，浑身鲜血淋漓跳起来指挥人马，组织并派出营救我的队伍。

好不容易熬到了《红楼梦》去苏州拍外景。

我已吓得魂不附体。

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摄制组先拍完了其他演员的所有镜头，计划等我到达时把我的镜头一天抢完。

战战兢兢壮着胆子到了苏州。陈国军已经早一天等在组里。一听这消息，我扭身又往机场跑，制片主任拉着我安慰

说，不要害怕，不要紧张，组里已有了妥善安排。

听说他已经住了一天。有时间就控诉我，讲血泪史，周围聆听的人无不泪流满面。他说，只是要我回北京去好好谈谈。消息之灵通，情报之准确，我怀疑组里肯定有他的“内线”。

没敢去房间，我直接去了拍摄现场。现场是典型的苏州园林，亭台楼阁鸟语花香，好一个静幽幽的小院。全部几场戏都在这个小院里拍摄。夜景。我们从晚八点开拍，要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天明。

陈国军就站在院子当中假山这个制高点上。雄赳赳俯瞰全院的一切。事先他已观察好全院只有唯一的一个小门是出口，于是他严密把守着小门的方向。只要我往门口走他会立即跟在后面，扭头往回走他再回到假山上。事前他已向谢铁骊导演保证过，拍摄时决不打扰我，拍完后怎么处理他说要随他的便。

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镜头一个接一个拍完。不由自主我打了一个哈欠。斜眼一瞟，假山上的那双眼睛仍然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一个寒战我又找到制片主任。让他无论如何要使我安全离开苏州。

制片主任深知今晚的严重性。他悄悄地跑前跑后，像一个地下党的交通员。花园里只有一条出口，被陈国军严密把守，想不出好办法，我们急得抓耳挠腮。

突然主任又回来把我向旁边一拉，兴奋地告诉我女厕所里面还有一个小门！天无绝人之路，他可以把车停在厕所小门外，那里有条马路可以一直通向大街。我嘱咐他停车的时间早晚千万要把握好，早了被发现，晚了我出去后走不掉更不得了，要恰如其分。主任点点头再去安排，又回来告诉我说得让

女化装师陪我上厕所这样才演得像。

生活中从未演过这种戏，我的心嗵嗵乱跳。只听见主任在告诉我最后一个镜头马上要开拍。拍完后不能卸装要立即行动。再三叮嘱我不能跑不能跳要稳步前进。

我连连点头，然后站到了摄影机前。这一个镜头是在一间小屋里拍。摆好一副临危不乱的样子，像江姐从容赴刑场，我进行伟大的艺术创作。当导演喊出那一声“停”，我和主任立即制止大家终于结束一天工作的欢呼。我还有最后一个单独的王熙凤特写要拍。

老祖宗、小祖宗们都疲惫不堪，此时已是清晨五时。鸡鸣声阵阵传来，鸟雀啁啾。

曙光已映白了窗户纸。主任悄悄地对大家说：“不能卸装，不能说话，更不能上车，不然晓庆就走不成了。”

演员们一个传达一个，大家都鸦雀无声。啊，这是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的时刻！老祖宗贾母林默予已七十高龄，薛姨妈袁玫，王夫人王敏宜，还有宝玉夏菁，黛玉陶慧敏，紫鹃陈红……大大小小年龄各异的演员们明星们，静静地在熬了一夜的拚命工作后等在现场，为的是使我能在拍完后平安地离去。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深深地看了她们一眼，趴在贾母林默予老师的膝盖上我在她耳旁悄悄地说：“老祖宗，拍完这个镜头我就走了，回北京去了。就不再跟您告别了，您多多保重。”再看看大家，什么也不能说，我开拍我的最后一个镜头。

拍完了。大家仍然静静地。好像还要继续拍摄的样子。走出屋门，我放大声音说：“小王，我们去上厕所！”小王说“哎”，跟了过来。我们往厕所走。

拚命抑制住自己快跳出来的心脏，我尽量放慢步伐。

一阵脚步声传来，陈国军跟在后面。我不敢回头看。到厕所门前我愤怒地对着脑后说："我们上厕所，你干什么？"他站住了，我们缓步走进。

一进厕所赶快找门，一边四处张望，一边撒尿。要让门口听到有上厕所的声音，不能引起怀疑。在这儿！小王指给我看。她已来视察过。提起裤子拎起裙子我打开门闩，提醒自己慢慢地、轻一点。随着门吱嘎一声，一片朝阳倾泻进来。我立即在曙光中往外一跳。一眼看到小车已在门外，主任在车上招手，我拉开车门往里一钻，头上戴的金凤挂在车门上把我弹出车外，低着脑袋再往里进，裙子又勾住了车门，揪住裙角急中生智埋头曲膝往车里一滚，小车立刻开出几丈以外。

马达轰鸣，汽车在高速路上急驶。缩在车里，我一直回不过神来。突然间我说："不能去机场！我不能从苏州离开！现在陈国军肯定在机场等我。""那去火车站？"主任说。"也不行！"凭我对陈国军的了解及多年与他打交道的经验，他会查时刻表，会出现在我要去的任何地方。和他相比我的智慧是小巫见大巫。我玩不过他的。

"去南京！对，去南京！"我跺着脚说。

车头扭转，开往南京。南京，离苏州不近，火车要开五个小时，汽车要开一个白天。可是为了万无一失，我一定得去南京。而且在南京绝对不能坐飞机，怕陈国军等在北京机场。得坐火车去北京。不行，他也会出现在火车站。得坐火车去天津，再从天津坐汽车去北京。

计谋已定，突然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头上满是刀刀叉叉，也不能在车里坐直，只有斜靠在后座上，左右都碰不得悬在半

空，那车窗外闪过的是一片片黄色的菜花，看见菜花，耳畔就响起蜜蜂的嗡嗡声。在嗡嗡声中我回想起在四川的童年。每次上学我都从这些黄色花朵中穿过，伴随着我的就是那春意融融的嗡嗡声。有时我会在菜花下面睡上一觉，醒来时摘一朵菜花插在我系着红领巾的胸前。啊，那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恨自己总是长不大、总是不成熟的童年！

突然被一阵刺痛惊醒。原来是我的头叩在车门上，簪子一下子插在头皮里，我一摸渗出些血来。艰难地调整一下位置，浑身疼得不行。还是一副王熙凤的装扮。我嘱咐司机千万不能停车，要一直开，开到南京再打算。

汽车徐徐停止。南京终于到了。

我爬出车门，伸伸胳膊伸伸腿，头上的钗环凤簪一起乱晃。我们停在城市界外，再往前方就是那“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南京了。在这里，毛泽东的队伍把蒋介石赶过了长江，从此蒋介石再也没有回来过。

叉着腰，一副凤辣子模样，我站在大路旁四处眺望。发鬓散乱，残妆犹存，与汽车、公路、两旁的庄稼一起形成一幅奇特的图画。自己的情形比当年蒋介石仓皇出逃要凄凉、冷清、孤单得多吧。

远远地，好像看见路尽头来了行人。“快，主任，你们背过脸去，我要上厕所！”主任和司机背过脸去，我找个庄稼地钻进去上厕所。在苏州的小院里慌慌张张厕所也没有上好，现在先把这点办好。解除了负担后爬回路面，这才开始卸妆。

我的衣服事先已被主任放在车屁股里面，抓紧机会先三

把两把将衣服换好，然后坐进车内，再一点一点往下拔头上的那些装饰。簪子、绢花、钗头凤、点翠、步摇、假发、卡子……大观园里的二奶奶妆奁齐备，光是卡头发的卡子卸下来就差不多有一斤。最后脱下脚上的绣花鞋换上自己的运动鞋，这才算彻底回复了本来面目。

大道上有少许几个行人，他们匆匆路过谁也没有注意我们。世界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自己的稀饭还没有吹冷，哪里管得到别人的汤圆？”只是他们如果知道车里面那丢盔卸甲，口红歪在一边，画过的眉眼花成一团的疯女人，就是当今叱咤中国影坛的大明星，会作何感想？恐怕觉得还是有点——刺激性吧。

到了南京坐上火车，又经过漫长的旅程才到了天津。在天津火车站接我的人黑沉沉一片，是我的“穴队”队员！这时候他们出来发挥作用了。他们根本不问我为什么来天津，为什么立即要坐汽车去北京，对他们来说，有个机会为我服务，报答过去对他们的情谊，这就足够了。

找了个高级饭店，在那里大家请我大吃了一顿。这次我没敢掏钱——过去总是我掏钱。因为我掏不出钱来，在火车上吃饭都是用的摄制组给的补助费。

29 我偷税十八万？



回到北京，就像是刚从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突围出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

立刻接到消息说，北影厂有我的紧急公函，是税务局发的。让我立即去取。税务局！一直知道税务局找了我好长时间，没想到我东躲西藏为躲陈国军结果把税务局给躲掉了。税务局也许正因为我态度恶劣而怒火万丈哩。

这个公函是哪个税务局发的呢？挣扎着给几个"穴头"打

了电话。几个“穴头”一听我的声音都赶紧报告，异口同声说风声特别紧，弄得不好要被抓典型，现在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

我问是哪个税务局？有人说海淀区税务局，因北影厂属海淀区，我是北影演员。有朝阳区税务局，因我户口在朝阳区，属朝阳区管。还有石景山税务局，因我有一个“穴头”在石景山住。还有天津税务局，因为跟我演出的有天津的艺术团。还有政协所在的西城区，因我是政协委员。还有青岛税务局，因为我们用过青岛一家单位的演出证。高的还有国家税务局，低的、小的还有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的中小税务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十万八千个税务局一齐在找我，风声鹤唳，别提多紧张了。

“穴头”说，他们成天都在清帐。好多帐都忘了，一个一个把它们回忆出来，还要对得严丝合缝。每个人都竭力劝我一定要立即去拿那个税务局的文件，千万不要耽搁，免得误了大事。

疑疑惑惑站起身来，用呼台呼了司机小李，慢慢吞吞地穿衣服。真烦。又不能睡觉了。有几天没睡过囫囵觉了？搬起指头数，弄不明白。越来越笨了。连几天没睡觉都整不清楚。脑子里一团浆糊。楼下喇叭声。走吧。先拿到文件再说。

快到北影了，突然想起我仍然身处险境，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说不定陈国军正在厂里等我，正在暴跳如雷，总是这样顾头不顾腚。忙不迭地叫小李停车，想一想去哪里好。最好是我去一个地方等，小李替我去厂里取。想一阵想出一个地儿来，我们又往那刚想出来的地方奔。

我去了一个“穴队”队员家。

一进门就像是火上了墙，浓烟滚滚满满一屋子人都在抽烟。

一边咳嗽一边诧异地问，他们怎么会在这里集中？大家七嘴八舌说是来讨论税的问题。最近查税一阵紧似一阵，每个人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折腾这税。

我嘱咐小李快去快回。心里想，这下子我要睡一觉的计划又落空了。原来想小李去取文件我至少可以和衣躺上那么二十来分钟。现在还睡得成个狗屁。去他妈的。今儿个又只好豁出去了。

小李走后大家一窝蜂围过来。说你这下子来得正好。我说怎么了？他们说全中国的税务局都在找我们，就是有钱也不知道往什么地方交。这还不算，每个地方都得罚款。一罚款把家卖了都不够。还告诉我税务局下了大本钱啦，全国各地我们去过的地方都去过了，演出场次、地点、票价一清二楚，我们也都交代了。税务局说只要我们说出来就免我们的税，主要是查你。

我说不是好多剧场都和我们签了合同由他们交吗？大家七嘴八舌说别提了。我们在演出期间剧场都答应得好好的，我们一走就不认帐了，根本就没交。况且税务局也不承认。说是有一个什么公式，用这个公式算出来没有人不偷税，至少是漏税。

漏税怎么啦？偷税怎么啦？我奇怪地问。长这么大从没有听说过这些新名词，怎么还这么复杂。什么事情都是如此，要不就不存在，要一存在就到顶，春天一过就是冬天，脱了单衣就穿皮袄，没有过渡、认识阶段。还不知道有法律这事，一下子就成杀人犯了。

大家都懵懵懂懂。有那么个别人好像还清楚点。他听人说好像是偷税比漏税严重,偷税要判刑,漏税不判什么的。

还要判刑?事情怎么越来越严重了。不就是交点钱吗?把钱交出去不就得了?判刑?判个鬼刑。不可能,没有这个道理。

有人敲门。是小李回来了。我迫不及待地接过信封,是青岛税务局来的。青岛税务局?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都没有去过青岛。又没有拿过青岛一分钱。气不忿展开信纸,打印的黑字出现在眼前:

青岛市税务局市南分局文件

税南地字第003号

税务违章案件处理通知书

刘晓庆:

经查实你从一九八八年二月二日至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日,采用匿报收入方式,偷个人调节税壹拾捌万叁仟陆佰贰拾元整,情节严重,根据税法有关规定,除追补全部所偷税款外,并处以偷税款壹倍的罚款,计罚款壹拾捌万叁仟陆佰贰拾元整,限于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五日至青岛市税务局市南分局办理缴清偷税及罚款。

特此通知

青岛市税务局市南分局(章)

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

十八万!罚款一倍!三十六万多!全场一起惊呼。

我偷税十八万?我在哪里偷税十八万?他们怎么知道我偷

税十八万?什么证据?还要罚款十八万?一共三十六万多?我的老天爷!

三十六万简直是天文数字,把我们全家绑起来一块儿卖了也值不了这么多钱。还得在一个星期之内到青岛税务局去交清,别说我没钱,就是有钱,取钱、买车票、上车、赶路、找到税务局隆重交出,一个星期也过去了。谁都知道银行不取现金,光是三十六万取现金都得取几个月,这不是整人吗?

为什么下了通知不写明证据?为什么加上罚款要三十六万那么多?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做不到还要通知我一个星期到青岛税务局去交?为什么明知道我交不出就是交得出罚以巨款未免太不近人情却要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负什么责?我负得了责吗?是不是要我进监狱?我为国家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拍了三十部电影,每一部电影都为国家挣钱,有的影片还不止一亿,我从来没有取过一分钱的报酬,难道这一次就不能原谅吗?

偷税?过去有税吗?有税法吗?我们懂得偷税吗?不知道有税怎么会偷税?为什么没有问过我还没有见到过当事人就判定我偷税还要罚款?是不是觉得我名气大一定挣钱多,挣钱多一定偷税多,关在办公室把我假想成头号偷税分子,想当然办事认定我是坏蛋后,才追根寻源找证据证明我确实坏,好向上级邀功抱个大金娃娃?要是我不是大金娃娃而是大泥娃娃,再不就是小水娃娃怎么办?那时候你们怎么下台呢?

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愤怒,恨不得把那张通知书撕了。青岛税务局,哼,八杆子打不着我的地方。

大伙儿跟着我一通乱骂。把想得出的字眼找得到的词全骂完了,也累了,七歪八竖靠在屋里各处像鱼一样哈气。

慢慢地大家都告辞走了。

我的头脑不能停歇。现在它特别活跃。骂不管用，要解决问题。这事肯定要登报纸。那还得了?绝对不能登报纸。这事可不同于离婚当第三者或是生活作风问题还可以归于个人问题得到原谅，你挣钱还偷税全世界都不会原谅你!在中国更是臭不可闻。

越想越怕越觉得后果严重，此时此刻我才发现原来这税的事比陈国军的围追堵截性质上要可怕得多，凶险得多。离婚是与老百姓作斗争，偷税漏税是与国家在抗衡。古往今来，冤假错案还少吗?

我感觉我面临的是一场浩劫。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又一次运动。不同的是，过去搞运动是我革别人的命，是革命的动力，这次运动我是对象，是革我的命。而且在风口浪尖上首当其冲。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就像是在大海中乘风破浪向前航行的巨轮，每当巨轮在飞速前进的时候都会在船尾或是船的两旁掀起一阵阵的浪花，有时候浪花相当剧烈，在这些浪花中总是翻飞起无数条小鱼，它们肚子朝天，胡乱翻滚，一条条卷进巨轮的螺旋桨中，被斩得粉身碎刺。可是螺旋桨担负着推动巨轮前进的重任，并且巨轮也绝不会由于这些小生命而停止前进。

小鱼虽然小，它也有它的一生。既然是小鱼不是巨轮，就得想办法自己保护自己，不要游向那条巨轮。不要靠近它。假如一旦靠近尽量不要被翻飞在浪花中卷进螺旋桨里，或是已翻飞在浪花中千万别卷进去，要想办法跳出来。

我是一条小鱼。可是我已经靠近了巨轮并且还翻飞进了浪花中。我会不会卷进去?我能不能跳出来?要知道我是一条好鱼。我从没有做过坏事。我只是为了维持生命吃那些鱼草,由于我有能力多吃了一点并且存了一些。如果不应该存那就交出来好了。不要先认定我是坏蛋。不要先把我弄死。给我时间让我表白。过去我已经弄了好多吃食给别的鱼们。把我留着立功赎罪再做些新的好的事。

可是浪花是不会听这条小鱼的呼声的。小鱼只有自己跳出来。小鱼也只能自己跳出来。想办法自己救自己。

我继续我开始冷静但更加紧张的思考。长时间的风风雨雨使我逐渐没有了眼泪。因为我早已明白那些眼泪一点作用都不起。假设人们爱你,不愿意也不忍心看你哭,假设有人恨你,要的就是你的眼泪!掉眼泪只会亲者痛仇者快,只会使那些害你的人得到胜利,得到满足。

情况已十分严峻。首先我交不起钱。别说三十六万,三百六十块钱我都没有。花钱买平安这一条路已经完全堵死。再说眼下这形势,花钱也买不了平安。可以说花了钱更不平安。就算是我再借钱并且借到钱再掏了钱给税务局,那税务局是立了天字第一号的头功,举国上下的报纸会登个不停!我也就板上钉钉成了当然的并且自己认罪服法的全国头号大偷税犯,或是大漏税犯,不,当然是大偷税犯,刚才那位"穴头"说的偷税比漏税严重。那我的后半生也就全完了。

但我其实不是。我是冤枉的。这口冤枉气我怎么能咽得下去?不活活气死才怪。气死了也是活该,畏罪而死罪有应得。没有人同情你。死后连墓碑都不敢立,免得后人像对奸臣秦桧那样指指点点,戳我的脊梁骨,当然是戳我的灵魂的脊

梁骨，我早化成水了。

再不就不交?不交也不行。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好像听说不交税要进监狱。进监狱可不行。等出了监狱就老了。拍不成电影了。

得买本税法。好好研究学习、弄懂这突然长出来的法律。我们没一个明白人。什么都是“好像”、“听说”，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说不定我还有一条生路呢。我不信我没有挣钱会偷那么多税，这么大的冤枉没有地方去讲理。

要请一个律师。要请一个棒的、顶呱呱的、同情我的、有正义感的律师，他懂法律。我自己也没有时间。看来与税务局的官司(我感觉要发生一场官司)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

我自己也得腾出时间来。像我目前这样马不停蹄地拍戏，恐怕戏没有拍完我就进监狱了。还有许多剧本在找我。现在我当然是正在拍戏没有空档，假如手上这几部戏拍完了我不接新戏导演们就会有怨言，认为我架子大，看不起他们。而且手上这部戏也到了尾声。就是没有导演找我北影也会给我分配戏演，我得停止拍摄。除了《红楼梦》以外，不再接新戏了。怎么才能停拍呢?干脆息影算了。这是一个问题，再想再想。要好好想。

得马上去小吕和杨那里。马上!要把通知给他们看。和他们商量这件事。他们是我目前唯一肯帮忙又帮得上忙的朋友。走!小李!我站起身。

小李正在喝茶。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跟我走。他真是我的好朋友。太够哥们了。这段时间他看尽了我的沧桑，对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也从没有对他言谢过。我没有心思，光忙自己的事了。

30

我对律师说:我没有偷税



心急火燎到了吕家。

吕和杨都在。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

坐下来他们忙着给我倒水,我说不倒不倒,有紧急情况。

他们说还是喝口水再慢慢说,不着急不着急。近日他们为了我的事总是一惊一乍的,我这种模样已司空见惯了。

我没有听他们的,掏出那张通知书就往小吕的怀里一塞,看着他们俩一字一句地念,我直咽口水。

都觉得此事严重。吕和杨看完后几分钟都没说话，我煎熬死了。

眼巴巴望着他们，说不出的心焦。小吕说话了。“毛阿敏的事你知道了吧？”“不知道。”我摇摇头，“什么事？”我一边问一边心里想这时候还管别人的事，这个小吕也真是的。

杨转身走了。须臾拿了张报纸来，报纸上赫然印着毛阿敏的大照片，一晃眼先看到一个“税”字，抓过报纸赶快往下看。原来是毛阿敏未上税的事被人揭发，原原本本登在报纸上。最主要的是毛阿敏开始不承认，现在已供认不讳，到税务局去交了税款，成了当天的头条轰动大新闻。

一时间我简直没弄明白。怎么突然出来了毛阿敏？不是在查我的税吗？怎么过去一点儿也没有听说过？

小吕和杨说前几天报纸就有了，你不在北京所以不知道。我一想，啊！可不是嘛。我去苏州和陈国军打仗，又转战南北，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也没有电视，所以消息闭塞了。真是“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啊。看来这场税务运动还挺风起云涌。

会不会因为毛阿敏被揪出来了而对我松些呢？不会吧？我自己也觉得不会。吕和杨都摇摇头。算了，不管她。还是先顾自己要紧。

我开始讲话。我把刚才骂过税务局的话以及这些那些，又重新骂了一遍，只不过情绪没有那么激烈却口气更恶毒。再把我后来想的一切方针思路源源本本讲了一个淋漓尽致。我着重报告了我想要做的事。他们都表示赞同。

先想一想找哪一位律师。我说小吕你来做好吧？麻烦你拜托你。小吕说不用客气，这是应该的，可是不行。他马上就

要交回律师执照,帮忙可以,正式出面不行。我其实没弄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只知道他不能帮我了,于是赶快说,哦,那么请谁好呢?

小吕和杨商量起来。老张?不合适。小王?太年轻。我说太年轻了不好,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律师李?恐怕没有时间。我赶紧说没有时间能不能求他挤时间?他们没有理我,继续讨论。

天越来越黑,我们都还没有吃饭。我心里毛焦火辣,像猫爪子在挠。讨论还没有结果,杨起身说先下点面条,咬着嘴唇看着窗外我抖着两条腿心乱如麻。

突然听见厨房里传来几声惊呼。从沙发上跳起来,我箭一般冲进厨房。"我们想起了一个人!"杨说。"是小吕的同学,蒋京川!他挺合适的。"杨接着说。一下子背靠在门口差点顺着门滑下去,我还以为是煤气罐炸了哩。这年头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神经变得太脆弱了,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声音一大分贝一高,心就狂跳。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吧!"我急不可待地说。

"别着急别着急。先吃面先吃面。"小吕说,"我先联系一下。"

风卷残云。几下就把面条吃了个精光。小吕是做菜能手,可是在那"战争"年代简直可惜了他的手艺,在和平时期我就从来不是美食家,在那些时间尤其是那一天,嘴里吃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半夜三更,我们到了蒋律师的门前。出于对小吕和杨的无限信任,现在我已对没有见过面的蒋律师寄予了巨大的希望。

进得门来，大家坐下。我、小吕和杨坐在门的方向，蒋律师坐在床上。现在我回忆那天蒋律师可能穿的是睡衣，外面披了个外套，但在当天晚上我只看见一个轮廓，那个轮廓由于背后有一盏灯环绕了一圈黄黄的暖暖的光。

我看不大清他的脸。不过脸在此时一点也不重要。

我开门见山把我的来意说了一遍。没有力气再重复骂一通税务局，就把今天接到通知的事说了一下。反正将来还有机会在蒋律师的面前骂。最后我总结性地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没有偷税。"停了一下，为了更准确，我补充说："我没有偷那么多的税。"

沉吟了一会儿，律师说："你知道毛阿敏的事吗?"

我说："知道。"律师大概是指毛阿敏开始不承认，后来又交代并缴了钱的事。他可能以为我说的没偷税也是同样的情况吧?

我没有办法让他在几分钟之内了解我，我只能简洁而坚毅地说："我没有偷税，我也不是毛阿敏。"

我不记得当时他说了什么。我也看不清，所以就更不记得他有什么表情，总而言之我知道他是要帮助我了。

这就足够足够了。

在回去的车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大家都累得够呛。可是吕、杨和我都不轻松。漫长的旅途才刚刚开始，而且还不知道有没有路，到不到得了目的地。可是我只有奋起反抗，因为我没有偷税。更主要的是我没有偷那么吓人的天文数字的税，虽然绝不敢说"必胜"，但我已是"哀兵"，因为我没有一分钱。

钱！我突然问小吕和杨："请律师得花钱吧?"小吕说：

“当然。律师事务所肯定要收钱。另外，去青岛，去各地调查、申诉的交通费、食宿费都得要钱。”我又一阵阵开始犯晕，想到自己囊空如洗，我可怜巴巴地问：“那……那得要……多……少……钱呢？”

小吕他们说不知道。未知数，看时间的长短及费事费神的大小来定。过去打官司是输的一家掏钱，现在我的事不存在输赢，何况也不是打的官司。

“那么我可不可以告他们呢？”我激烈地问，把“告”这个字说得很重。“不可能。”小吕说。最好最好的情形就是纠正裁定——就是那张税务局的通知，我现在知道在法律上叫裁定，不过这种纠正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小，还没有听说过国家机关纠正过裁定的。

“那我也不能交钱，我也交不起钱啊！”我叫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要是我交得起钱，我有钱，也许再去招惹是非的心劲就不这么大了。他们逼我反，我不得不反啊！这才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呢。

没有退路。事情一开始就没有退路了。只有向前进浴血奋战，或许能杀出重围有一线生机。

又去小吕家。盘算我的钱包。我没有钱包。根本没有什么盘算的。要盘算的是我那在仓皇出逃之日扔在家里的“走穴”现金和我过去多年积累准备要还债（这件事小吕他们都不知道）的存折。

这些东西都在陈国军那里。有些钱是税法公布以前挣的，不属于上税的范畴，可以用来打官司。可是现在肯定拿不出来。借钱？根本没有人有那么多钱。我被问到那些存折是谁的名字？我说都是我妹妹、我妈妈，还有丹丹什么的名字，好

像有一张是我的名字。因为零存整取的定期存款要身份证，存钱时陈国军还没有北京户口，没有身份证，所有都用的别的名字，没有用他的名字，小吕问我有多少钱？我说不知道有多少钱，每次回来就把钱一交，现在都是陈国军在管理。那么知道在什么银行吗？我摇摇头。我没有上过街，我从没有去过银行。我不知道东南西北。况且那些都是结婚以前存的钱，时间早了，是为了每个月取利息拿来家用的。后来挣的钱都是现金，再也没有存过。啊，有了！“有了什么？”吕和杨一起问。

有了什么？我也忘了。别着急。等我慢慢想。最近受刺激太大脑子不好使，总是忘三忘四的。顺着思路倒回去。哦，对了。会不会我大表嫂那里有一个存折的号码清单呢？好像是有。记得我过去曾让大表嫂——我在北京唯一的一个大表哥大表嫂替我存钱，大表嫂看我昏头昏脑的老是建议我把存折的号码、银行名称写一个清单，这样万一丢了可以挂失，在银行凭身份证就能把钱取出来。说过多少次后好像她帮我抄了一份放在她那里，不过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抄了清单，找不找得到，是不是在她手中。

马上查。要是有并且在她那里就好了。可是天还没有亮，天怎么老是这么黑黑的还不赶快亮？

只有回到住处。一夜尽做恶梦。在梦里总是狼狈逃窜，被人追得到处跑。跑来跑去跑也跑不动，突然间来到悬崖上。追我的人越逼越紧、越走越近，心一横眼一闭向崖下一跳，浑身大汗淋漓我就醒了。

时钟已过了八点。马上抓起电话找到大表嫂，什么事也没说，问她有没有个笔记本上面记着银行地址和存折号？她说有！我赶快问她还在不在？她说好像在，让我电话别挂她去看

一下。过了十年那么久终于又听到她的声音，她说找到了。

长长地，我吁了一口气，我好比是作战之前的战士。终于有了弹药了。可是弹药还在弹药库里，得把它取出来。还得赶快！

又打电话。当然是打给吕和杨。他们告诉我已打听清楚了，最好是先取我自己名字的那一张，去银行恐怕得我亲自去不可，还得带我的身份证，蒋律师要陪我去。说不定还需要作法律证明。

戴着帽子捂着嘴脸，我和蒋律师到了银行。还好。银行还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熙熙攘攘。走到那个小小的窗口，蒋律师把来意跟窗口里的大姐一说，那位大姐把脸贴在窗口上看了我半天。然后问我结婚没有结婚？我心里想结婚与取钱有啥关系？忍着尴尬我只有交待说结了婚正在离婚。谁知这话惹了麻烦，大姐说有离婚纠纷就得让丈夫一起来取。我问为什么？她说他们有过这种情况，用挂失的办法一方把钱取走另一方来找银行大闹。所以银行从此实行新招，凡是挂失先问清楚，让那些两口子吵明白了一起来取方才认可。

我说这是我的钱。她说我们不管，我们弄不清楚。我说你们银行除了管钱还管两口子的事啊？不是存折是谁的名字就该谁领钱吗？她说是啊。可是我们不想惹麻烦。

眼看着要吵起来，蒋律师赶快出来打圆场。一口叫一声大姐说那是她婚前的钱，不干离婚的事。大姐说婚前的？拿结婚证来我看。小蒋说能不能我先给开个律师证明，盖上章放你这儿，明儿我再把结婚证、刘晓庆的身份证一起拿来取？大姐脸色不大好看，说我跟上级请示请示。你们明儿再来吧！

我赶紧想我的结婚证在哪里。找不到结婚证我的计划又

要泡汤。记得结婚证有两张。一张在陈国军那里，香港的报刊上我已见过了。另一张是不是在流量计厂厂长处？还是在北影人事处？是不是过去为了给陈国军办户口我用过？想不到结婚证真有大用场。听说，离婚如果双方同意到街道办事处，如果没有结婚证，或是吵架把结婚证撕了丢了，还不给办离婚手续哩。

赶紧找赶紧找。找电话打电话。打了电话我和蒋律师去流量计厂。小李去北影人事处，兵分两路忙乎了一天，还好，我找到了，立即交给蒋律师。

第二天我凭结婚证取回了需要用的钱。

31

三场官司缠身，发表“息影声明”



每天在车上、在路上、在任何地方，一有工夫我就学习税法。根本用不着去买，小李去取通知就带来了一本。税务局送通知就送了一本税法让我好好学。我一边看一边想，想一阵再接着看，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对照审查，那份严肃，那份情景远超过当年学毛选。而且比那还自觉、还认真许多。我学税法的成果在后来与税务局打交道及处理这个案子（我跟着蒋律师把这件事开始叫做案子）的时候充分显露出来。

当税务局的负责人向我宣传税法，刚咳嗽一声说："你的××××情况根据税法规定……"我就会立即接口说："第四十八条(或是第××条)。"我比他们背得还熟，并且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现炒现卖。

在学习税法中，第一个重大心得是发现税法第××条规定，如果接到税务局通知裁定偷税勒令罚款逾期十天不付款者，即是抗税。抗税金额超过二千元以上者，可判以三个月至三年的有期徒刑！

我早已超过十天。并且金额大大超过二千元。我已是抗税犯。哇！我很快就要进监狱了！像我这种情节恶劣者，都够枪毙几个来回的！可是我真的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哪！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天地良心！十八万的税我算了一下大概我要挣近三十万元，可是我所有的衣服、鞋袜，把背心、裤衩都算上也没有这么多钱！我承认我挣的钱确实早已超过了自己定的指标五万元，也曾经发过感叹这么多钱怎么用得完，可那离三十万还早着呢！我是冤枉的！真恨不得有包拯包黑子的开封府，我可以马上去击鼓升堂，或是写好状纸拦那青天大老爷的轿子，一溜跪步扑到那轿门前，大喊一声："冤——枉——啊——"

可是我不敢喊。连说也不敢说。目前还只能我们几个人知道。要是走漏了风声报纸一登生米煮成了熟饭就全完了。

"穴队"里总是来消息，"穴头"们日子也不好过。天天查、天天算帐。他们告诉我听说我的案子是"大案要案"，中央都挂了号的，税务总局有位领导亲口跟他们说，中央首长都亲自批了三条：一、要查到底；二、不许任何人包庇；第三条我记不得了。

天都快塌下来了。上方宝剑是不可能了。再说我也没有什么上方宝剑。从小到大除了在学校当过班长外，就是在拍戏的时候当过《无情的情人》的制片人，更大的官也没有当过，和领导也没有什么来往。就是现在开始来往“现上轿现扎耳朵眼”也远水解不了近渴。世界怎么这么困难啊？

沉住气，要冷静。一件事一件事地来。要查清这十八万的来由。蒋律师问过税务局，他们不说，让我好好想。我好好想了。想不出来。我听说税务局常用这种方法，这一招很灵。据说有一个演员去交税，税务局也让他自己想。那位演员就回去想，交待出来十几个地方都走过“穴”，上税上了好多钱，大大出乎税务局的意料，原来税务局只知道他去了其中的一个地方。

可是这一招对我没有用。我不是油菜，榨不出油来。就是有油也早就榨干榨尽了。这跟温度能使鸡蛋变成小鸡却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的原理一样。我的一切情况都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存在的问题是税务局知道的虱子比我实际拥有的虱子多得多。

要把那多的虱子找出来。我和“穴头”们频频碰头，开始是想后来去猜，排除一个一个的可能，就像是玩那十八猜游戏。

又得到消息，《人民日报》经济部、《经济日报》都知道了我被裁定“偷税十八万”的事，听说有一位记者已写好了文章，即日就要见报。一听这话我差点没吓晕过去。《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党说话了我还活得了？

听说记者对我都很反感。这一点我知道。最近一通忙乱把这些事都给忘了。我想他们都是坚信我“偷税”的吧。我能

不能去见他们一下呢?我要见一下那位《人民日报》的记者。行吗?告诉我消息的朋友说使不得使不得。他肯定不愿见你。他对你的印象坏透了。我说求求你嘛,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朋友说你说什么?叽哩咕噜一大堆我怎么听不懂?我说行了吧,那是我家乡武侯祠门上的对联。她说武侯祠?去过去过,挺好的地方。刚才说的那副对联怎么着?再说一遍!我说,唉呀,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啊?你帮我一下约约那位记者,我说完了就是他不相信我也死心了。她勉强说好吧,我试试看。

我感觉他会见我。我坚信人与人之间是共通的。只是他信不信我说的话我没有把握,但我要和他见面。毛主席说过:"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我心里想就是遭到拒绝我还会再一次要求,再一次要求,直到他见我为止。关键时刻脸皮得比城墙拐弯处还要厚才行。

还要处理"息影"的事。没有时间再拍电影了。得发表一个声明。最好是发表在《大众电影》上。已给编辑部打了电话,他们很感兴趣。以为我要和山口百惠一样退出影坛,可以做个大新闻。只不过山口百惠是为了结婚我是为了离婚。目的不一样。其实主要是为了"税",不过这是不能说的"绝密"。"息影声明"我都起草好了,我这样写:

我的声明

我从事电影工作十几年,已拍二十五部影片,很累。目前《春桃》业已拍完,《原野》也将上映,我决定从声明发

表之日起在相当的时间里不再参加电影拍摄了。在此婉拒一切电影及电视剧的邀请,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

刘晓庆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

注:

1.因有约在先,已拍三集的电影《红楼梦》我将继续把余下部分拍完。

2.在此期间不出国定居或自费留学。

3.关于此事恕不接受任何采访。

本来想写明只息影两三年,我估计“税”的事两三年差不多吧?没有写。因为不是真的“息影”只是为了给自己时间,写完后心里歉歉的。我只写了“相当时间”,谁知道需要多久?右派还二十年呢。我会不会一辈子?肯定电影圈又会说我“制造新闻”,而且这一次制造得如此拙劣:“暂时息影”、“相当时间”,不是故弄玄虚是什么?太可笑了。虽然心里明白不写息影两三年也是“五十步百步”之差,但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大众电影》编辑部总编亲自前来取走了我的声明。同时还取走了我们认为当时拍得最漂亮、最年轻的一张照片。

那是我在新加坡一个酒会上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笑眼盈盈、妩媚、迷人、充满了自信,像一朵艳丽的山茶花正在盛开。看到这张照片我愣了好几秒钟,简直不敢想自己居然还有过这样的时刻。当我把照片和声明交给总编时,心和手都在颤抖,生怕这一来我将永远离开倾心热爱的电影事业。这个世界时常阴差阳错,想指东却打了西,因而从此永远都是西再不能东的情况总是发生。

当务之急是要坐下来算帐,究竟凭什么税务局裁定我偷税十八万?我自己屁股上有没有屎?有多少屎?朦胧想来,从“走穴”开始到现在恐怕一共都没有挣到过十八万,刚开始“走穴”酬劳低,虽然场次多一场也就一百五十元钱,一天还不到一千元。况且“穴”也不是天天走,拍电影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黄金”时间。再说那一部分也不应该上税,是在税法公布之前。税法是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执行的,那以后我“走穴”走得很少,又拍戏,又离婚,还去美国、法国办影展,每天场次也开始少了。而且在“走穴”当中我已经有了一次血的教训,在我们还根本不知道有税法这件事的时候,税务局就给我当头来了一闷棍,我们的钱差不多在那一次全都交了,损失之惨重足可以使我们记一辈子。从那以后我们就处处小心,到每个地方都由我亲自签字交税。

啊!对了。会不会是委托剧场代扣税代交税上出了问题?上次好像听“穴头”说过一句。就是有也是区区几个小钱,离三十万有十万八千里,但是税务局从何“判定”我偷税十八万呢?

我想起“走穴”演出从来是现金往来,根本就没有过签字认领。没有我本人的签名认领税务局怎么能肯定这些钱是不是我拿的?会不会是把别人的钱算到我头上了?

又开始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怒火万丈。控制不住站起身来,血一阵紧似一阵地往上涌。心里不断地说,别生气别生气,生气也没有用。列宁不是说吗?“生气是用别人的愚蠢来惩罚自己。”我够受折磨的了,别再惩罚自己了。这年头,“姥姥不疼奶奶不爱的”,自己还不心疼一下自己?

勉强按捺住自己坐下来。给那些“穴头”打电话。凡是跟我走过“穴”的头都来。我要把它弄个明白。弄个水落石出。不能打一场糊涂仗。

没有多久全都通知到了。他们也是一样,成天在家里算帐。再不就是去税务局。别的地方也没有心思去。天津的“穴头”最早要晚上才能到。我们约好还是去那个“穴队”队员家里见面。我的住址不能暴露,这是秘密据点。

躺在床上歇一会儿,现在离晚上还有点时间。想睡也没法睡着。我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最近我的眼睛总是有血丝,每次拍特写镜头都很明显,只有在开拍前滴眼药水才能使它清澈。

啊!又是好几天没有在北影露头了。听说《红楼梦》在北影再拍一些镜头,然后就开始配音了。组里肯定又在找我。唉!他们让我演王熙凤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增加了多少麻烦?

对了,我要请求给我派几个“保镖”。“保镖”得我自己找,免得被人收买出问题。不然就是打死我也不敢去拍摄现场了。

谢铁骊导演一定会大吃一惊。觉得我怎么总是来些新花样,开创建国以来中国电影史上女明星带保镖拍戏的先河。但是他仔细想后一定也会谅解并且很明白,事实上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维持我在摄制组的正常工作。

本来是为了调陈国军到北影才同意上《红楼梦》这部戏,同时才结的婚领了结婚证,可是《红楼梦》还在拍,我们却为离婚闹得翻天覆地不可开交,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

怎么会到这般境地，弄成这般模样，我整个一个稀里糊涂。心里想，其实世界上谁也没有陈国军爱我。也许是太爱我却爱得不得法，结果把我爱跑了吧。

我坐起来。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现在大“敌”当前，情况已危若累卵，还在想那些生活上的问题，简直是抓芝麻丢西瓜。

我要是进监狱会有人去看我吧？那我进去以后干些什么呢？肯定很寂寞。我得先把这一点想好。我带点书。

不知道允不允许带书。那就带几本英文书。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干。我可以学英文。出来时肯定英文顶呱呱了。平时总没有时间系统学习，这一下逼上梁山，没准英文还练出来了呢。

可是听说监狱里的犯人都要劳动。劳动我不怕。在农村、部队已经吃苦吃惯了，拍电影也够辛苦的。我有底子。

听说还糊火柴盒、做些手工劳动什么的。那就更不怕了。我喜欢这些活。小时候在四川涪陵，那是盛产世界驰名“涪陵榨菜”的地方。每次放学我都去剥青菜皮，一分钱十斤。我还挣了好几角钱哩。好好好，手工活我喜欢干。要是分我做这些就行了。

可能还得跟“狱卒”搞好关系吧？肯定不叫“狱卒”，叫什么呢？同志？那也肯定不行。我是犯人，当不了他的同志。叫“领导”？叫“上级”？也不对。嗨！管他呢。去了自然就知道了。

他们会不会打我呢？可能不会，国家有规定。听说监狱里犯人打犯人。我肯定躲不了吧。只是别打脸，把脸打坏了就完蛋了。我可以抱着头让她们打别的地方。我还得拍电影呢。

拍电影?等我出来就老了吧!三年五年?八年十年?说不准。没关系,我可以从头来过。演不了年轻的演老的,再不就演囚犯,肯定比别的演员理解角色深刻,我有亲身体会。不对,有的演员也蹲过监狱,他们也演得好犯人。不过不怕,他们是黄色案件,比我轻,我是偷税犯,不,是抗税犯,金额又大,肯定比他们判刑重。要坐牢就得当一号,要不就不坐。哪怕把牢底坐穿!就是当演艺界囚犯的一号也行。吃屎都吃尖才有意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活着。

他们不会枪毙我吧?应该不会。不对,好像会!谁说过,像我这样都够枪毙几个来回的了。是谁说的?好像是我说的。后来好像也有人说过。是税务局。是税务总局那个小领导说过。我的妈呀!真的有可能要枪毙我了!我又要死了!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为什么?为钱。过去没有钱老在书上看到"钱是万恶之源",不理解。现在刚刚有点钱就太体会钱是万恶之源了。

可是我不是为钱。我没有钱。我没有偷税。肯定没有偷税。像我这样遵纪守法的人多不容易,绝对只有一个。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没有人相信。要真的赚钱我可以出国,免得成天在国内为了温饱吃苦受累,还担惊受怕。在中国呆着就没打算挣钱。

干嘛要枪毙我?就算我不是一个雷锋,但我是一只益鸟,至少无害。就像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他犯了错误也别杀他,让他到战场上去带罪立功,死在战场上也比死在自己人手里强。别说我没偷税,就是我偷了税难道不可以悄悄批评教育,让我把钱交了也就完了。何必要这样公诸于众罚款巨大把人往死路上推?把我留着再拍几部电影,哪怕是拍一部电影

多少个十八万三十六万都回来了。再大的国家出一个人才也不容易,出一个像我这样国内国外都认可的更不容易。

放我一码,我会感激涕零。不过中国人才有的是。少了我一个胡萝卜照样成席。可能要的就是抓我这个典型吧!杀一儆百,杀我这只鸡吓那些猴。可是鸡只有一生啊。不行不行。我不能当典型。我不是典型。弄错了弄错了。

会不会再也没有我说话的那一天了?我得赶紧告诉我的朋友,就告诉小吕和杨吧。让他们在我死后把我的冤案写一本书让世人知道实情。他们最了解情况。这样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我马上去和他们交待。需不需要写遗嘱?遗嘱怎么写呢?我这样开头……

啊!不行,我得先去算帐。“穴头”们肯定都来了。我不能死。我不要死。我要站起来运用我全部的力量与智慧,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战斗。

站起来。走出去。我上了车。我到了开会的地点。

32

关键的一仗



“穴头”们都正襟危坐。脸上的表情既严肃又庄严，有一种悲壮的意味。我注意到他们都没有抽烟。哈！我发现我现在开始临危不惧了。也许已经够惨的了，再惨下去余地也不大了，物极必反吧。

想起上次与陈国军谈话，他在面前暴跳如雷，要是在过去我肯定吓得魂不附体，可是在那天我一直盯着他在想别的事，就当他是在唱歌，只不过唱歌的声音大了一些、激昂了一些。

他后面正好有一架电视机，电视机一直没有关，变换着各种画面。突然我看到电视上正在放一部卡通片，好像是谁去太空探险，那些卡通全是由线条画成，像小时候我看的上影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一样。其中有一个卡通两只脚是两条线。一走快了两条线来回乱动，好玩死了。我居然"噗嗤"笑出声来。好啊！我已经具备一定的"拿得起放得下"的才能了！

既然"拿得起"今天就先"拿起"。我们开始算帐。屋子里又慢慢烟雾缭绕。一边拿着计算器一边算，一边听汇报一边讨论，这种情景在我后来做生意时多次出现过。可是第一次出现是为了"偷税"的事。人生是多么千姿百态啊。

今天是关键的一仗。不算出来一切工作都不能进行。我不能去见记者，蒋律师不能给税务局写"反诉"。税务局可以不讲理由，我不能没有理由。要有证据，有理、有利、有节。

查完了。我没有偷税。没有偷税？真的没有偷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那么漏税呢？有没有？再查一遍。再查一遍，连续查三遍，不能出差错。这事开不得玩笑。人命关天。

又查了三遍。我又跟着亲自对了一遍。情况还好，没有大问题。从一九八八年二月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我参加演出一百六十八场，共收入五万一千三百元，交税二万二千一百十一元。差不多都有纳税记录。只有几个地方没有税票，但有证明信委托当地演出公司代扣代交，我们没有责任。可能漏税指的是这些，可以跟税务局讲清楚并出示证明信，另外赶快去补交说不定也来得及，反正钱也不多。其实税务局应该去找演出公司，是他们违法。算了算了。我们讲清楚交了也就行了。去财免灾。这些事也就别较真了。

那么，偷税的十八万从何而来？为什么不是十六万、十九

万或是其他数字?肯定有原因。什么原因?再查再看。主要是看有没有演出收入的钱去了别处。并且要和我有关。

查了好久。有许多是给演员的单位交劳务费的。劳务费!我眼睛一亮。会不会是我的劳务费?我好像听过一耳朵,在《西太后》组曾有过一笔交到组里的劳务费。快查!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单子?多少钱?

查过了。有这回事!可是没有单子。只有手写的白条。因为是现金来往,手写了收条就算数。这不行,税务局不会认帐的。多少钱?一共二十八万五千。百分之六十的税是多少?大家拿着电子计算器一起乱算。算出来了。差不多就是十八万!在这里了!肯定是这一笔!

我的心一下子跳得天翻地覆。怎么过去没有人跟我说过?我们看你忙,事情都那么麻烦,所以就自己处理了。"穴头"们说。是谁去谈的?"穴头"L。跟谁谈的?《西太后》摄制组制片主任 T。什么理由给钱?组里要的赔偿费。谁去送的钱呢?"穴头"L。是谁收的钱呢?制片主任。李翰祥知道这件事吗?当然知道。就是给他的赔偿费嘛。

我长出了一口气。不行。还不能出气。我们还没有发票。不能证明。况且能不能说服税务局我没有把握,得找到李翰祥。可是又到哪里去找他呢?找到后他肯不肯给我们证明呢?在这样浩荡的一场税务运动中?恐怕谁也不愿意沾边,去惹是生非吧?

不管结果如何首先一定要找到他。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我们来不来得及呢?先把他找到,并且假设他会给我们正式发票,然后拿着发票去税务局,再与税务局交涉……这一切都得在我判刑之前做完。判刑?不得了不得了。还没给税务

局写我的反诉呢，呵，对了对了。蒋律师好像已代表我写过了，听说好像无效。税务局根本不承认。是无效。我研究了税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规定，被处罚者要先交完税及罚款才有资格提出反诉。我交不起钱也就没有交钱，所以表示反对也没有用。要交得起钱还闹这么麻烦的一场官司？废话。

得先摁着报纸。绝不能让自己的光辉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变黑。挣钱还“偷税”绝对臭遍大街。跟《人民日报》的记者联系得怎么样了？赶紧打电话给朋友。我今天晚上就得见到那位记者。必须见，非见不可！不然就来不及了。再不然我去他家登门拜访。

朋友说她已与赵志文联系上了。我说谁？你与谁联系上了？朋友说赵志文啊，就是那位《人民日报》经济部的大记者。我说呵呵呵。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朋友说他开始不愿意见你，后来我说了半天劝了半天，现在人家好歹同意了。我说好好好。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今天晚上怎么样？就今天晚上！朋友说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我说不着急还得了？再不着急就死路一条了。见不着我你不想我啊？不然你给我往监狱里送饭？天天送饭月月送饭年年送饭你累不累啊？朋友笑了半天说在哪儿见？我说你不是开饭店吗？去你的饭店好了。朋友说你出钱吗，你有钱吗？我说有。这个钱就是卖了我的奖杯也要拿出来。朋友说你等一下。等我的电话。我说哎。我等着。

“穴头”们都看着我。我得安排工作。首先我们得对好口径。不要谁说错了捅娄子。现在税务局等着抓我们的尾巴，出一点小问题被人拿住就可以变成整我们的证据。这么多年来教训还少啊？进监狱我一个人去。大家都去就太惨了。吩

咐一个"穴头"记录，然后我开始说。

这二十八万五千元是给《西太后》组的赔偿费。为什么叫赔偿费?是因为影片是香港导演李翰祥承包拍摄，我和他有一合同，李导演坚决不放，说是我如果去"走穴"会给摄制组造成损失，于是双方达成协议给予赔偿。一共七个月，赔偿费二十八万五千元。谁去谈的?×××。跟谁谈的?×××。怎么谈的?××××××……

全记下来了。我再重复一遍。再核对一遍。发给大家每人抄一份。抄好后再核对。然后排练。我演税务局。"穴头"们演"穴头"。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穴头"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答，答得不对大家一起严厉加以纠正，每个人轮流过关。有一个"穴头"记忆力特差，每句答话都有一两个字错误，刚开始有了错误我给他纠正，背了好几遍他都背不上来，所有人都急得要命，全体冲着他怒吼，吓得他冷汗长流。那情景特像我平日拍电影或是演话剧，可是比拍电影演话剧认真、严肃、紧张一万倍，所有参加排练者都那么真挚，那么进入角色，在和平时期绝对可以堪称文艺界的楷模。

每个人都过了一遍，成绩有好有坏。我没有台词背，一直在担任考官。时不时从我演的税务局角色里跳出来向他们犯的错误咆哮，咆哮了半天嗓子都冒烟了，看到他们瞠目结舌又一阵心疼。他们到这里千里迢迢是为什么?为了谁?还不都是为我。当然我们现在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可我是主犯。我是长城。长城一垮，大家都跑不了。不过又谁知道?也许税务局查的就是我一个人。只要把我弄出来别人也就不再追究了。反正税务局向他们一再重申的就是这个政策。只不过大

家都吓怕了，唯恐税务局是“引蛇出洞”，到时候交代完了才一网打尽，不敢轻易相信就是了。

我把“剧本”就是那些要背诵的要点，每人发了一份，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熟记在胸中，还不能太熟练，不能像背台词，可以加一些水话，不要千篇一律，只要主要环节不错就行。我在那些关键的“台词”下面打上红杠，这些是绝不能错的地方。要紧的是在背熟之后这份记录要销毁，最好是烧成灰烬不留痕迹。紧要关头可以学革命志士放在口中嚼烂，不过那样税务局就发觉了，这个方法不好，不可取，还是背好后立即烧掉的好。切记切记。

正在忙乱之中电话铃响。我回头。大家也都回头。是不是朋友告诉那位记者约会的事?接电话的“穴队”队员说不是，是别人打来的。楼下邻居说楼上厨房漏水，要她下去看一下。

接着我赶快分配任务。对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李翰祥。每个人都要去打听，尽快给我回话。散会。

“穴头”们得了指示，一个个都走了。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发愣。

我干什么?好像有无数的事情要干，理不出头绪。

对了!见记者。怎么还没有电话来?现在还没有消息情况好像不大妙。从凳子上弹起来，“咚”的一下坐在电话机前拚命拨电话，越着急越出错，电话老拨不对。最后耐着性子一下一下慢速度拨，这才把电话要通。要通后那边又去找人，好久好久才听见脚步声从远到近直到响起朋友那沙哑的平时我们讥讽她富有“磁性”的声音。

她告诉我已同赵志文联系上了。晚上他本来有事，朋友

让他推一推，他现在正在推，不知推不推得掉她正在等电话。

我跺着脚说那你就想办法让他推掉嘛！她说我哪做得了别人的主啊！停了一下我说，我马上过来。

坐上车就往朋友的饭店开。心里想，要是赵志文今晚没空，我就去他家门前等他，就像我的那些影迷一样。总之今天一定要见到他。想不到堂堂的"中国影后"在人们称之为"刘晓庆天下"的时代，体会到做一个影迷的心情，过去我总是烦那些影迷，甚至讨厌他们，嫌他们打扰了我的清静，要是这次能活着出来，一定要好好地对待大家。

谁知道这次逃不逃得脱啊！听说是大案要案，税务局去了全国各地我们演出过的所有地方，把情况查了一个底儿掉。千万不能上报纸。得给大家都留点面子。如果报纸一登，税务局将在那儿一口咬定我偷税，就彻底完蛋。

关键是今晚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要由浅入深，从里到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再讲到自己。太复杂太冗长了，他会烦吧？还是开门见山先讲证据。糟糕！我没有证据。只有凭嘴说。得先默念一遍。

靠在椅背上我开始在心里"演习"。我设计好进门的表情，坐下来的态度，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什么时候低沉什么时候高亢，说到哪句话时要停顿，要运用表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那个理论，叫做什么"名角的停顿"，说哪句话时要哽咽难言，另外千万别忘了掉眼泪。在什么时候掉，掉几滴全都要把它想好。掉了眼泪以后要把头往上一扬，再转换表情，说下一个段落。要是到时候眼泪掉不出来怎么办？不会吧？我有技巧，并且可以事先积累。

我告诫自己，假设赵志文态度不好也要忍住，绝对不能恼

羞成怒。要知道我已是介乎于明星与囚犯之间。到监狱只差一步路，脸皮要厚一些。到哪个山唱哪个歌，此一时彼一时，要学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小不忍必乱大谋。

车快到了。抓紧时间把表演设计的要点再重复一遍。又忘得差不多了。这段时间刺激太猛烈，脑子不大好使了。我不会得“少年痴呆”症吧？

车“嘎吱”一下停住。朋友站在车头前。风风火火打开车门就告诉我，赵志文已经来了，在楼上。他离这儿近，晚上推不掉，先见了我再走。

三步两步跨上台阶，朋友拉住我说别疯叉叉的，给人印象不好。我赶快听话，慢悠悠假装淑女。心里急多跨了几步，也没问在哪个小房间就一把掀开了面前的门帘。里面一桌人全都回头，惊愕地张大了嘴，几个人一起叫“刘晓庆”，我赶快把帘子一放又去掀第二个门帘，朋友才拉住我说跟我来，别像一只无头苍蝇。

过了一道门，再过一道门，终于到达其中一个门前。这一次是由朋友打起帘子，一眼我就看见一个人坐着的背影。那个背影站起来，转过身。只听见朋友在说：“这是赵志文。”“这是……”

一股热气冲向我的喉咙，所有声音都远了。既看不见又听不见，只勉强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在心里说不能哭不能哭，这不是设计方案。千万要忍住，不要功亏一篑。

我转身走向座位，一边走一边拚命倒气，倒得差不多了再坐下来，转过身时已是笑眼盈盈。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赵志文比我想象的要和蔼得多。我事先做过的计划、想好的台词全部无影无踪。第一句

话该说什么来着?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只能坐在那里直咽唾沫。

朋友打破了僵局。她胡说八道把税务局一通乱骂。骂了没有几句触动了我的肝火,我不由自主开始帮腔,越说越来气,越说越激昂,我爪子伸了出来,牙齿露了出来,全部恢复了本来面目。

我像决了堤的洪水,从头到尾把想得到的都说了一遍。我怎么去演出,怎么第一次上税,怎么有了教训后再也不敢偷税,怎么来的十八万,税务局怎么裁定,这是“文革”以来最大的冤案,等等等等。

突然想起我忘了掉眼泪。哎呀!真糟糕。可是在这个时候掉已经来不及了。再说情绪也不对。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再绕回去。情况和我事先想好的全不一样。再说现在气得眼睛干干的,要掉也掉不出眼泪来。本来想演一个弱者,可是现在事与愿违。怎么办?我赶紧观察赵志文。他肯定觉得我是个泼妇,更讨厌我了吧?

出乎我的意料,在那和煦暖暖的灯光中,我看到的是一双亲切、理解和同情的眼睛。

从那一瞬间起,赵志文成了我永生难忘的朋友。他是第一个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我没有偷税的人。在那一天,他开始帮助我。他和他的一伙北京的记者朋友一起,为我的税案起了重大作用。

33

带保镖拍《红楼梦》



《红楼梦》摄制组又在找我。

他们肯定在找我，我把这事差点都给忘了。

蒋律师已出发去青岛与税务局交涉，我仍然成天在为税的事奔波。

赵志文又介绍了许多记者朋友给我。其中最了解情况的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杨洁。在杨洁的帮助下我又去找了《经济日报》的主编范静宜，他们都对我表示了理解和同情。

香港的债务和楼花我根本不能管它。

曾有过海外的追求者,知道我在为税苦恼,多次提出可以为我办出国留学,躲开这是非之地,被我一再拒绝了。从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一出国更是畏罪潜逃,更说不清楚,我一辈子都得背黑锅。

何况我恐怕也走不了。中国公民有官司在身不许跨出国门。“久病成良医”,我现在从一个法盲变得这法那法都懂一些的半罐子水了。

海外人士还问我究竟欠国家多少钱?我说三十六万哩!他们说那算什么钱。人民币吧?不多不多。我们替你还了就是了。我说我不要。早说也许还会接受,现在战幕已经拉开,来不及了。我已构成抗税,再交税务局也不收了。何况这是冤枉钱,凭什么要交?我还想不通呢。交了再让报纸、电视把我臭一顿。他们可倒好,弄错了还得钱又邀功,不干不干。我就是要血战到底,弄个水落石出。

当前的任务是等蒋律师的消息。还有找李翰祥。继续离婚。到《红楼梦》拍戏。找保镖!

把找保镖的想法告诉《红楼梦》制片林主任,他特别特别地赞同。经过上次苏州风波,陈国军跟他又干上了。在我走之后陈国军痛哭流涕,在园子里掏肝掏肺大骂,我听了不知道怎么搞的还是一沉,心里酸酸的不知道怎么才好。

主任说这事向导演、还有宋崇厂长请示一下,恐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陈国军一而再、再而三的行为,使得舆论已逐渐倒向我这一边。我说陈国军的心思我知道。他就是要把我抓回去,一切等抓回去了再说。凭着对我的了解,他只要抓了我回去,再好好待我,一切都会融化,他仍然坚信“近者胜”的原

则。他忘了我已不是当年的刘晓庆，狗急了也能跳墙，只要跳了墙就再也不跳回来了。

我向主任要求说，保镖要我自己选。他说可以可以，那都好说。我问究竟什么时候这事才批得下来？反正没有保镖我决不拍戏。主任停了几秒钟咬牙说，你就先请人吧。组里不掏钱我自己掏钱也要保证你顺利拍戏。我说哪能你掏钱啊，当然是我掏钱，这些钱我还是有。

原先我以为人情薄如纸，没想到世间还是有真心。想到自己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纯属我个人的事件当中遇到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场景，简直可以组成一曲阶级情不亚于骨肉情的大型史诗。

紧接着忙活请保镖的事。全是姜文找来的哥们。一共请了四个人，四个都来自武警部队。

抖擞精神再开始粉墨登场。大观园的二奶奶又卷土重来好不威风。拍戏时四个保镖围绕在镜头周围，休息时保镖在我身后齐齐地一排。找我的记者、律师、法院、税务局络绎不绝，把《红楼梦》的现场变成了我的办公室。

几天之内陈国军都没有露面。可能是听说或是看到我有保镖望而却步了吧！

《红楼梦》场地外景很快就拍完了，组里开始配音。由于组里演员多又来自四面八方不好召集，所以只有谁在就配谁的戏。

连日来又拍戏又弄税，一直没有睡过好觉。嗓子充血，声带嘶哑，通知配音我总是一再推迟时间。后来发觉这样下去嗓子不可能有好的一天，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还是早配完

早好。

这一天是礼拜天。我和保镖们来到了录音棚外。今天是加班，配王熙凤和贾琏打架的一场戏。这场戏需要大吵大闹，我现在嗓子嘶声哑气也许正和剧情贴切。

由于有四个保镖小车坐不下我换了一辆面包车。每天先接保镖然后再接我，接齐了人再去工作现场。层层打报告，宋崇厂长批准了带保镖拍戏的事，可是组里不能出这份钱，因为从没有过这种先例，怕会计室不能入帐。面包车比过去的皇冠车便宜，费用照例由组里出。摸摸自己的口袋又开始羞涩，坐吃山空没地方挣钱总是花钱，又快到山穷水尽了。想了半天束手无策，寻思着保镖的钱反正不是今天就给，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到时候再说。

录音棚前的休息室照例是熙熙攘攘。嗓子疼不敢多说话，我只有向大家频频摆手。刚坐下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小声说："没看见陈国军来，放心吧。"

那边厢几个婆子夫人在看手相。演王善保家的北影演员樊书棣眼镜戴在鼻梁上煞有介事地一边抓着人家的手看一边讲解。大家一阵阵地哄堂大笑。她身边围了好大一堆人在排队。她看完一个人说完一个人要收一毛钱。她说这是历来的规矩，免得被看的人霉运转到她的身上。

组里好些人信这些信得入迷。我从来不听这些邪。有好事到来我不愿先知道，免得不努力去争取反而错过了机会，要是有坏事，更不愿意提前悲伤。假使第二天要得癌症我也绝不要先了解，假使了解了肯定头一天就死了，根本活不到第二天。

突然大家嘻嘻哈哈地向我冲过来，吓得我抱头鼠窜一下

子钻到了桌子底下。保镖全都站起身几步跨到我的跟前，几只手把我从地上抓起来说是要给我看手相，看我的手有什么特别显示出我这么大的福气。这些该死的，不打招呼突然冲过来，你们不知道我早就没有胆了?你们难道要吓死我吗?你们把我吓死了至少今天就没有琏二奶奶给你们配音了!王夫人你甭想明天就回南京去见你老公!

动不了口就动手，我把他们一通乱踢乱掐，她们根本毫不畏惧，抓起我的手就看起手相来。对着阳光把我的掌纹研究了半天，咳一声，樊书棣说："你这小子有钱。"我心里想，鬼才有钱。你知道个狗屁。再看一会，她又说："你要离两次婚。"我心里一个劲地骂她。你就蒙人吧啊!全中国都知道我要离两次婚。多新鲜哪。樊书棣又装模作样地看半天，啊!突然大叫。大家齐声问她叫什么?她说："风筝儿，你可是寿字上缺一点儿。"我看着她，心里想怎么啦?"你大概活不过六十。"我豁出我的破嗓子大喊："我只要活过六十零一天就去杀你!"我冲上去拧她脖子，她一迭声地告饶，嘴里不停地说："给钱给钱!"我心里想，给你个空气，你把我命算得那么不好，我就要把霉气过给你。我一边呼气一边把气抓在手里再朝她脸上、身上放过去，她气得像杀猪一般尖叫。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进棚了，进棚了——"

大家偃旗息鼓，罢战收兵，静悄悄地进了录音棚。所有电影厂的录音棚都是一个样，里面是录音间，中间隔一道门和一个大玻璃窗，外面是操纵台。录音间里照常黑黑地一片，又闷，又不透气。银幕上已经放映着要配的样片，片头在闪动着"一——二——三——预备——开始"。只听见琏二爷正在一边出气一边对口型："没有什么娘娘!你就是娘娘!"他正

在配跟鲍二家的床上戏。大家一边喊着:“不够劲不够劲!一点都不性感!”一边走到自己的话筒前。

对了好几遍要正式录了。这一段我只有一句台词。贾琏和鲍二家的在床上偷欢,我在门口偷听,偷听时到我的画面我出点气,再跳到他们的画面我不出声,然后在“你就是娘娘!”这句话后,银幕上的王熙凤一脚踹开门,我就赶快说:“好你个琏二爷,你干的好事!”

说实话对口型我是一绝。从来配音差不多都是一次成。可今天不行,今天是大场面。不,应该算是中场面。每次都是我好了别人没好,此起彼伏,所以得耐心些。

这一次正式录。到了我偷听的画面我出了气,然后憋着劲,脚趾头抓紧,准备那石破天惊的一句。结果琏二爷“你就是娘娘!”这句话口型没有对上,我白准备了半天。再来。这时广播里说:“刘晓庆,电话!”

怏怏地我走出来。电话在操纵台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就是在那小屋子里换下我们已录好的胶片卷,同时再放上新的要录的胶片和声带。

录音室的胖师傅拿着电话在等我。我恶狠狠地给她无声地打口型:“你干吗叫我接电话?”她也恶狠狠地无声说:“是长途。”哦。

师傅们都知道我不喜欢接电话,而且找我的人又多,所以一般都不叫。这次是长途。难怪。我接过话筒,胖师傅又打口型说:“青岛来的。”

只听见“嗡”的一声,我把话筒放在耳朵上。“喂?”嗓子里有痰。

“晓庆吗？我是蒋律师。我在青岛。”

“对。”我咳一下，还是有痰。

“今天得到消息，青岛税务局已正式把你的文件转到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作为抗税罪立案侦察了。只要一经检察院认定，你抗税的罪名就成立了。目前这个案的性质已经转变，是刑事案了。”

我赶紧把痰清理掉终于问出声来：“是不是如果检察院认定我有罪，下一步就是进监狱？”

“……一般来说是的。”蒋律师迟疑了一下说，“不过可以申请从宽处理。先不要想这些。”

“……这怎么办呢？”眼前一片黑暗，我对着那虚无说。

“检察院已经到了北京。你可以去找他们一趟。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我马上也回北京。我希望能够帮助你。”

放下电话我竟然对胖师傅笑了一下。我都麻木了。回到录音室刚才的那一段大家都已录好了。只剩下补录我这一句。我照例冲着话筒大喊了几声，过了！大家鼓掌。我总是一遍就成，简直是天才。

走到录音室的角落，一下子躺在地毯上。浑身像散了架，脑子空空的想不出什么。我感到心在往下沉，身体在往下沉，沉向那无底的深渊。天才？哼。天才管个屁用？还不是一只小蚂蚁让人一掐就掐死了。小时候常趴在地上摁那些蚂蚁玩，现在自己也被人摁才是殊途同归。刚才樊书棣说我活不过六十岁就死，说得太准了。我看我活不到四十岁就会一命呜呼。

原来总说进监狱进监狱，心里总存在侥幸，那只是一种调侃。现在真的监狱来了，它离我越来越近了。我好像听到那监狱的铁门在吱嘎作响，我感觉到人生最大的危机已经来临，

我现在正处在生死关头。

“凤哥儿,配音了。”我一愣,是老祖宗在叫我。

对了,还得配音。配下一段。凤姐踢开门以后和贾琏打成一片,然后贾琏急了拔出剑要杀凤姐。凤姐一边跑一边哭,最后跑到贾母身边一跟头跪到老太太膝前:“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

我除了这两句话没有太多台词,前面全部是哼呀哈呀打架的声音。口型我早已对好,盯着银幕上在打架的凤辣子出神。原来说进监狱进监狱,现在果真要进监狱!没准还要枪毙我呢。想到枪毙我不禁毛骨悚然,出了一后背的冷汗。

快,我要好好地,好好地配音。我要把她配成精品,在我死后人们想我的时候就会来这里看她,看银幕上这个玲珑剔透的凤哥儿。想到自己是牺牲在艺术的岗位上,就是英年早逝也勉强说得过去了。

我还得快快地,快点把今天的音配完。我要作好一切准备,一出棚就去找检察院谈话。谁知道检察院来的人又是哪路神仙?不管他是哪路神仙,走投无路也要孤注一掷。我总是孤注一掷。我要掷到哪年哪月啊?唉,夜漫漫,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啊。

一声“实录”打断了我想东想西。抬头看银幕“一二三、预备、开始”的画面已经闪过,我赶快跟着银幕上的动作哼呀哈呀地出声,然后陪着凤辣子气喘吁吁地跑出门,贾琏一拔剑,演琏二爷的演员哼的那一声哼晚了,配到了剑的特写上,大家“噗哧”一笑。得,这一遍又作废了。

条件反射我扭头看玻璃窗外的操纵台,一眼看到一个人

站在那里：陈国军！我的妈！我不由得大喊起来："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

听到我变态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回头诧异地看着我。在黑暗中看我看不那么真切。大家又扭头看玻璃窗外，一霎时录音室里起了一片骚动。"轰"的一声，沉重的门打开，几个保镖一起冲了进来。

"关门关门！"我连声呼喊。抛开话筒，躲到那录音室里外面看不到的死角，和保镖们商量对策。

"我们几个一起把他抬出去吧！"一个保镖说。我急急地放低声音说不好不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们也抬不出去，他不可能老老实实地让你们抬出去。"那他会不会……""嘘！小点声，那里有话筒，别让声音传出去。"我警告他们。保镖也使用了气声。

此时演员们又在开始对口型练习，我们的谈话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那他会不会冲进来？"保镖接着问。"不会。"我说。"他给北影厂作了保证，绝不影响工作。我没有工作完他是不会有什么举动的。关键是我怎么出去，只要出去了就是胜利。""放心吧！"保镖们说。有这样的机会展示他们的能力，一个个无不摩拳擦掌。

说实话我不怎么放心，因为我太了解陈国军了。我再三嘱咐不可莽撞不可以小看对方，另外更主要的是防卫，不是进攻，千万不要伤害到他。我们只要安全离开北影就可以，绝对绝对不能打人。

大家都一齐点头。两个保镖留在录音室内陪我，两个保镖出去监视他。我回到我的位置上。

这段音别提我配得多么好了。身临其境我声泪俱下比我

演的镜头还要真切十倍。嘶哑的嗓音与戏的规定情绪是那么地相配。记得当时拍摄这场戏时我从外面跑进门来一跟头磕在地上连滚带爬扑到老祖宗的脚前，使所有在场的导演演员全都心里震颤。拍完后我的膝盖起了两个大包，到后来的镜头不得不用一个厚垫子垫在我的膝盖下用裙子把它挡住，才能继续拍戏。后期配音的重大弊病就是从来不会比现场效果精彩，万万没想到我今天比现场拍摄还要感人十分。

扶着配音的栏杆我一直站立不稳。一双泪眼在银幕上滚来滚去，注意力一直在玻璃窗外。旁边的演员每过几分钟向我报告一次那里的情况，我的肩膀、脖子、头颅都像撑着一个无限沉重的地球。

我今天一定得走出去。一定要活着出去。检察院的事还没有办哩。今天还约好去《大众电影》编辑部送照片，这些事都不能耽搁。对了，李翰祥找到没有？现在检察院立案了更要加紧找他。快点！快点！快点把音配完！我恨不得立即就插翅飞出去！

擦干眼泪，捋捋头发，站稳脚跟，昂首挺胸我站在话筒前。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要振作起所有的力量来救自己。我又成长了。我现在特别明白江姐、许云峰、邱少云这些革命先烈的无畏精神是怎么来的。也彻底弄清了“百炼成钢”这句成语的道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配过的卷越来越多，剩下来还没有配音的卷越来越少了。保镖已进进出出好几次，场内场外气氛越来越紧张。陈国军仍然站在原处，在我出录音室必经的地方。保镖跟我已悄悄说好：“直接走，别犹豫，不要管我们！”我在黑暗中点点头。

开始配最后一卷!我全身肌肉都收紧了。两个保镖已站在陈国军身后,三个人虎视眈眈地盯着里面。两个保镖站在我的左右两侧,我站在话筒前。银幕上的凤姐儿在贾母面前撒痴弄娇,把个贾母哄得团团转,最后勒令贾琏当众向凤姐道歉赔不是,凤姐才委委屈屈地跟着贾琏走出门外。

这段音我配得淋漓尽致,只是声音止不住地颤抖,录出来倒是好听,像声乐界形容的那种专业名词“水音”。尤其是配凤姐撒娇委屈的台词,更是别有一番神来的韵味。这时候演尤氏的陈祖荣在我耳边小声说:“风筝儿,我要是有你十分之一的事就活不成了。”我看看她,拍拍她的肩膀。心想她要是处在我的境地还不是得活?人都是逼出来的。想起自己小小年纪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打天下,经历如此巨大和众多的风风雨雨,究竟是招了谁惹了谁?倒也是够集中够特殊的了。要是王夫人、薛姨妈、尤氏们知道检察院立案,我可能离判刑和枪毙的日子不远时,还不得一起乱叫,恐怕是我还好好的,她们就先吓得活不了了。

配完了!顾不上与大家打招呼就往外走。两个保镖几步赶到我前面,沉重的录音室大门缓慢打开。我看到陈国军向我这边挤,两个保镖上去拦住他。争吵声、撕扯声开始在录音棚回荡。

我走出门。突然从空中伸过来一双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衣服。我吓得拚命大叫:“啊!”一抱头听见陈国军在说:“哥们。”挣扎着往前跑两步又被那只手抓了回去,听见好几下衣服撕裂的声音,只看见两个保镖一齐抱着陈国军往外推,我身上的那只手逐渐松开,所有的女演员一齐尖叫,尖叫声回旋在整幢大楼。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被眼前的场面吓傻了。手和脚一点也不听使唤，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只听见保镖冲我大吼：“快走！”我没有动。几个保镖一齐吼：“快走！”

这时不知是谁推了我一把，我终于反应过来冲出录音棚。顺着长长的过道拚命奔跑，我听见后面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几下子近到我听得到他喘气的地方，这时候又传来一群脚步声，只听见后面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好像是一堆什么东西倒了。一瞬间我又放慢了脚步，所有人一起喊：“你快走，不要管！”

我跑向拐弯处。再过一个走廊就是棚外，远远地看见了小李的面包车。不顾一切我大叫：“小李，小李，小李，小李！”

小李正在睡觉，一听见喊声马上跳起来。马达开始轰鸣，面包车停在离门口大约三米多远的地方，车门开着。棚的门口有好几节台阶。

我不敢回头，三步两步跑到了门口，来不及下台阶就往前纵身一跃，手抓在车的椅背上腿掉在外面，连滚带爬跌进车厢里。“小李，快走！”车一冲就箭一般开了出去。

躺在面包车的地上好一阵我才惊魂甫定，闭上眼睛直喘粗气，像是刚做了一场恶梦。棚里的声音仍然在头上震响，那惊心动魄的喊杀声还在耳旁。暗自庆幸自己从小生长在体育学院耳濡目染，在音乐学院常常在运动会上田径都是第一名打下了童子功，不然决不会有今天的突围成果。由此联想到我假如当一个女侦探肯定毫不逊色。

小李的车在北京的大小街道上乱转。我躺在地上不敢动，像一只缩头乌龟。过了好久好久，感觉好像没有危险了，悄悄直起身偷偷往窗外四处张望一番，才爬过去先把车门关

严。

我和小李都没有说话。我没有力气说话。他没有必要说话。情况一看就一目了然，深知内情的小李不用问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这才坐到了椅子上。头发散乱搭在脑前花容惨淡。那副模样一定十分可怕。我的头靠在椅背上，全身像一摊泥。在战火硝烟的年代，那些女八路、女志愿军，大概就像我这样神形凋疲吧？我想一定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她们是为光荣、为祖国、为真理、为神圣的使命而战，我是为什么呢？为偷税、为离婚、为婚外恋而战？多丢人。真丢死人了。八路军、志愿军代表的是光明的一面，是正义之军，所以节节胜利；我肯定是黑暗的一面，不伟大、太肮脏，所以处处倒霉、处处挨打，成天逃跑像一只丧家之犬。我就是丧家之犬。这个比喻实在是再恰当不过。我没有家，四处游荡，还不能像一只真正的丧家之犬那样在大街上哀嚎。我只是收气敛声暗地里活动的一只冒牌狗。

艰难地翻了个身。激战过后怎么这么疲乏？屁股下有什么东西窸窣作响？好像是一张报纸。管它的。不行，它好像不平还窝成一团硌着我。还是得把它清除掉。

我挪了几下才挪出一小块地方来。好不容易抽出了那张报纸，正要随手一扔，“刘晓庆”三个字滑过我的眼帘。又有我的消息！不会又是什么骂我的文章吧？最近报纸上总是说我不好，什么主持《世界电影之林》不端庄喽，什么王熙凤我肯定演不好喽，等等。还没有看到结果就断言我演不好，真是咄咄怪事。这些先知先觉也不怕将来影片放映后事实会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今天这张报纸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我都不敢看了。可是我又不得不看。我要了解社会,人们又在评价我什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嘛。唉!我都不敢说百战百胜了。

拿起报纸开始找。好像是一篇小文章。突然一行黑体字映在我的眼前:“刘晓庆偷税十七万。”我揉揉眼睛,无数的星星在飞,在跳舞,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我的灵魂离开了我的身体,在不知道什么地方游荡。太阳穴有一个拳头在敲,越敲越重,越敲越响,我的头马上就要炸开来了。“哎呀!”抱着头倒在椅子上,我不由得呻吟出声来。

“怎么啦?”小李从驾驶室探过头来问。“小李,我的头疼,麻烦你帮我去买点治头疼的药好吧?”我挣扎着说,那声音不是自己的。

停车。小李走了。我躺在椅子上奄奄一息。不能睁眼,一睁眼就天旋地转。拳头仍然不停歇地敲打我的太阳穴,我用双手掐着它们。

须臾,小李回来了。大概是猜到什么,他说:“这是今天的报纸,看你那样刚才就没敢告诉你。好多报纸都登了。”我撑起身,闭着眼睛吃了他买来的止痛药,又咚的一声倒在椅子上。“歇会儿吧。”小李说。

车停在大街上,静静地。我躺在后面,小李坐在车头。汗如雨下,湿透了我的内衣。好像今天说好了要去《大众电影》编辑部吧?远远地在天空中我说:“小李,我们走吧。还得去《大众电影》呢。”

“街上好多学生在游行,肯定堵车。再不就明儿去吧!”小李说。

哦，是听说几天来都有学生游行，今天又在游行啊。“还是今天去吧。”空中的声音说。

我去了《大众电影》。还上了台阶。还坐了电梯。还找到了人。把照片给了他。我找的是谁?看不清楚。也不记得。只知道是一个人。跟他谈话和给他照片的不是我，是别人。不对，就是我。是我的身体。我在别的地方，我在梦游。这么多的小金星在飞。我看着它们，轻飘飘地，好像我也在飞舞。啊，这种感觉真好。我跟那人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要给他照片?我只记他是一个男人，头发短短的是个男人，还谈到春——桃，春桃……啊，《春桃》是一部电影，春桃不是我演的吗?怎么那张照片上是斯琴高娃?呵!我错了，这部电影是斯琴高娃演的。不，好像是我演的。怎么这么多的门啊?好像有人在前面带路，就跟着他走吧，还有人在推我。别推我再推我就倒了。楼梯怎么在旋转?别转了，太晕了。我得扶着扶梯。慢慢走不要急。汽车、草坪怎么都在天上?唉呀，这真是好看。还没有看见过呢。“海市蜃楼”就是这样吧?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在什么地方啊?

我又推开门。我看见我的手。啊，我还有手呢。它麻麻的抖抖的是别人的手吧?我怎么会是在空中?脚为什么踩不到地?大地在远远的地方，我在飞速降落。糟糕，我忘了打开伞，开伞开伞不然我要死了!头疼，我的头疼。我的头怎么这么疼?唉呀，我的妈呀，我活不成了!救救我，谁来救救我!救——命——啊!

睁开眼睛，我躺在住地的床上，浑身像水洗了一样。被窝里湿漉漉的。肠子里、肚子里、脑子里空空如也。我的手搭在

床边。我想把手拿回来，可是动弹不了。有舌头在轻轻舔我的那只手。一种温暖的感觉传遍全身。是它，是熊仔。是我那只相依为命的小狗。熊仔抬起头看着我。哦，它懂得我的心思！它把我的手含在嘴里轻轻咬着，它在安慰我。哦，这个善解人意的小东西，好多人都不如你啊！

我泪如泉涌。在静静的屋子里大放悲声。有电话铃响。不理睬，不接。我只管哭，在电话铃声中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孟姜女当年哭倒长城就是像我这样山崩地裂吧？

哭累了。躺着。不时抽泣几下。感觉舒服了一些。熊仔两只爪子搭在床边，懂事地看着我。我拍拍床，它跳到床上。把熊仔紧紧抱在怀里，心里不停地说，熊仔，我的好熊仔，你是世界上最乖最乖的好狗，谁也比不上你。熊仔发出轻轻的"呜呜"声，告诉我它听懂了我的话。

过去我就听说过许多关于狗救人的故事。熊仔，今天是你救了我。有你在我就不会死。因为我至少，至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一个朋友。你是永远不会背叛我的对吗？熊仔舔舔我的手。

电话铃又响。匍匐过去摘下话筒。是"穴头"的声音。"大猫吗？我找到了李翰祥，他在沈阳。我们把情况跟他说了，他说要与你面谈。"我开始恢复精神："在沈阳面谈吗？""在沈阳面谈。两天以后他就回香港了。""穴头"说。"好。我去。"我一边说一边起身："我们今天就出发。我马上去接你。外面情况怎么样？""街上还是有学生游行。登你偷税的报纸已经铺天盖地了。没有人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们都没法出门。""穴头"不停地说。我把话筒放在桌子上，开始换衣服。我感觉自己非常冷静。电话里继续传来"穴头"的声音：

“所有的报刊都详细登了这件事，并且报上写明此类违法者判刑三年……”

“行了。我四十分钟以后到。”扣上电话又在呼台给小李留了言，让他马上来。我收拾东西。

二十分钟前心如死灰，现在我坚如磐石。我已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了自己过去的尸首，马上要继续前进。先去沈阳，再返回北京找检察院。还得去一趟青岛。最重要的，是要在报上发表我没有偷税的声明。

好多事要做。蹲下身再抱抱熊仔，熊仔伸出前爪跟我握手。你在鼓励我吗，你这个小东西？刮刮你的鼻子，告诉你，我又长大了。你知道什么叫“一天等于二十年”吗？我们俩度过的这一天就是二十年。再见，熊仔。乖乖的。祝福我吧。

我把熊仔关在里面。姜文会来管它的。只听见熊仔在一声高过一声地叫，它是在给我送别吧？

34 是钱使我现在一筹莫展



我，还有两个“穴头”，坐上了去沈阳的飞机。旅途中我知道了一切。是《山东广播电视报》最先把我偷税十七万的消息公布于众。内容与青岛税务局给我的裁定大致相同，只是数字上比裁定要少一万。

五月三十一日，中国新闻社给全中国发了通稿：“电影演员刘晓庆无视税法，据报载，她在山东省青岛市一地就偷税十七万元人民币。这是山东省目前进行的‘执法大检查’中爆

出的新闻。刘晓庆在青岛拒绝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税务部门曾多次催促她迅速补交欠税款，但她却一直拖延拒交，为此，青岛市税务部门已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一位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案正由青岛税务部门全权处理，总局支持地方税务部门依法行事。”

新闻社的通稿吹响了号角，全国所有的报纸全都揭竿而起。《天津日报》更为详尽地披露：“红影星刘晓庆率队演出而轰动津门的青岛电视村影视艺术团，最近被青岛市电视村收回演出许可证和公章。由刘晓庆挑大梁的这个艺术团，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四日曾在天津演出了二十四场音乐会，每天演出四场，票价高达六元。此后，他们还到江西、河北、新疆等近十个省市自治区演出，收入达数十万元。艺术团内幕重重，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

《生活周刊》发出文章：《刘晓庆掠过浙南山后》；

《浙江日报》刊出《大明星掠过海南》；

《四川日报》登出了两篇文章：《铁面收税人 —— 自贡税务人员与“明星”逃税的斗争》、《大明星偷漏税百万元，毛阿敏小巫见大巫》；

还有一篇文章标题更吓人：《刘晓庆把山里人的钱都弄跑了》。

“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偷税十七万的消息。这几天各地报纸一直在这个税案的报道上爆出冷门，覆盖面非常广。现在这件事是热点中的热点。”“穴头”说。

“我偷税上百万元？这个记者凭什么这么说？”我又止不住怒火万丈。

“这张报纸最恶劣，想把你置于死地。”两个“穴头”都怒

不可遏。

“我要告他！”我毅然决然地说。

不能停歇。我们马上研究到沈阳以后的方针政策，以及这件事如何跟李导演说，怎样才能让他这个香港人理解我目前的处境。我们没有上、中、下三策，对我们来说只有上策一策，中策、下策都是死路。

飞机载着我和我的命运在沈阳机场徐徐降落。我们站起身拿行李准备下飞机。全机的人都认出了我，走的时候慌急慌忙忘了戴眼镜和帽子。取下行李转过身来，听到后面一片嗡嗡议论我的声音：“哎，快看快看，那是刘晓庆呢。”一个年轻女人在说。一般爱发议论的女人为多。

“你知道刘晓庆偷税的事吗?听说她光在青岛就偷税十多万，被查出来了。”又一个声音气愤地传过来，也是个女的。

“这些人也真是的，演一场就上百上千，还要偷税，真该治治他们。”一个新的声音冒出，全飞机都听得到，这一次是个男的。

我的后脑勺直发热。就是有地缝钻进去了也没用。这会儿土地老爷阎王小鬼大概也都知道我偷税了。在这个社会，赚钱就是罪恶。偷税更是十恶不赦，不会有人同情你。我——已经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既然已经是狗屎堆，那么我这个狗屎堆干脆就大大方方地走出机场。在出租车站有几个人冲过来要我签名。这光景儿居然有人来找我签名，真是新鲜事，太阳会从西边出来，我一点也不敢相信，一弓身狗屎堆就钻进了迎面开过来的出租车。关上车门还没有说要去的地址，就听见车外在怒吼：“刘

晓庆偷税十七万!打倒偷税犯!”

一溜烟到了沈阳某饭店,不费吹灰之力就见到了李翰祥。李导演正在等我。简单扼要说明情况,我请求他再给我们开具正式发票,我需要帮助,这对我非常重要。李导演皱着眉头半天没有说话。他说我可以将二十八万五千元的一部分退还给你由你去上税,税务局最好不要去惹他。我说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再说钱也不够。税务局罚款三十六万,我根本就不可能交得上那么多,何况现在也晚了。我早已过了税务局给我的期限,现在就是交钱也得判刑了。越交钱多,判刑越重,我只需要证明。其余让我去办,认罪认罚都自己承当。

李翰祥干脆地说:“好吧。我写一封信可以给税务局先看,然后我马上回香港去开具正式发票,用快件寄给你。”我们三个人站起身一齐说谢谢。

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顺利。当天晚上我们哥仨就带着李导演的信件回到了北京。

虽然艰难,总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进展。没听说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燎原不燎原我倒并不奢望,只是心里明白,只有坚持住才能苟延残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对,这还不是我的处境,我现在是已经掉在悬崖下,只有两只手抠在悬崖边,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依靠两只手的微弱力量往上爬,坚持不住稍一松劲就会掉到万丈深渊粉身碎骨!

现在绝不能乱。要先去蒋律师处,把信件拿给他看。还得去找赵志文,找杨洁。也得把信件给他们看。检察院还得去找一次。对了,最重要的是要去一趟青岛,蒋律师说检察院要求我去青岛面谈。这一次我可不敢不去了。先偷税后抗税

还无视法律，那还得了？

可是去青岛我怎么有脸见人呢？无论是在火车站还是飞机场，只要有人看见我一定知道是大偷税犯来交代税的问题了。唉！败军之将岂敢言勇？已经到这个地步本来就没有什么面子了。要学那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妈他们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全家逃难去蛇口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见家里的消息。只隐约听朋友传信说她们平安到达了。可是我这里没有固定的地址，固定的电话，蛇口也没有安电话，所以一直联络不上，连日来整天当救火队四处奔跑抢救各种各样的火灾，我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无法顾及她们。

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几个老弱病残又不会说广东话，每天怎么过呢？还没有钱。肯定是只靠父母的退休金支付日常开支。那一个月总共三百多元的退休金，吃饭都不够吧？在深圳那样高消费的地方？

一想起这些我就心痛。钱！到哪里去弄钱？全家在那边吃苦，我在这里流水般花钱。请保镖，请律师，去沈阳，去青岛！所有的一切只出不进，现在《红楼梦》也告尾声，眼看着车费也得自己掏钱了。上次派"穴头"去那几个漏税的演出地方又补交了一部分税款，虽然演出帐好歹弄平了，又损失了一大笔钱。尽管损失钱能让我补交税款不判我偷税已谢天谢地，不过说实话我现在都不怎么敢撒开肚子吃饭。好在总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天到晚紧紧张张也不怎么觉得饿。

前些天我又换了司机。小李的车他们出租汽车公司要价太高，我出不起，想办法弄了一个破面包车，每天三十元。姜文请了他同学的一位哥哥给开车，这已是少得不能再少的价

钱了。

付了车费就付不起饭费，无论多晚多累，我从来不请那位同学的哥哥吃饭，总是装着忙得忘了还有吃饭这件事。有一次实在是说不过去，进了一个饭店，我点了一个最便宜的工作餐，每人六元，坐在那里一边吃一边别提我觉得多不好意思。同学的哥哥肯定认为我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这么抠门吝啬，难怪有本事偷那么多税。

是钱使我现在一筹莫展，钱确实是万恶之源。因为钱惹出这漫天大祸，又正因为有点钱才可以奋起为自己的生存抗争。钱是祸水，钱又是我的生命线。假设我有钱也许就不会有这一场官司。不对，我没有钱也会有这一场官司，因为我有名，这场官司是因为有名引起，税务局查的也不是我自己的钱。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钱我根本就没有可能纠正税务局的裁定，没有可能为自己正名，没有可能挽救自己的危亡，我现在最可惜的是自己的钱太少太少了。我还得拚命去挣钱。只要还有机会。

我要去深圳看看我的家。当然这又牵涉到路费的问题。不过这是必须花的。还要给他们留一些钱。要好好计划，精打细算。

先去青岛，然后去深圳。把机票、火车票订好。

行了。

35 登载我的声明没有报纸愿意



当务之急是要在报纸上发表一个我没有偷税的声明。听说现在全世界的华文报纸都登载了我偷税的消息。这下好了，我的臭名远播全球。我不能让他们一手遮天。官司还得打呢，不能在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就被活活气死了。

再没有比我更惨的了。北京现在天天都在游行，好多学生在天安门静坐示威，还开始了绝食。很多单位组织都来邀请我，说实话我也想去看一看。可是我不敢。准确地说是不

好意思。我没有脸见人。像我这样的头号偷税犯怎么能去天安门呢?到时候学生们集体狂呼“打倒偷税犯!消灭国家的蛀虫!”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有反面的意见。一定要让人们知道有来自我这一方截然不同的呼声。想一想,想一想在哪个报纸发表我的声明最合适?

这件事应该不难。从来各地的报纸都非常愿意刊载我的消息和文章。每次求爷爷告奶奶地求我哪怕是写几个字题个词总是求不到。以骄傲出名的我吝啬得连在报纸上写一句“向大家问好”都不肯。这一次我要发表的从没有偷税的声明是自己亲笔所写,又是当前最喧闹的新闻热点,对各个报纸来说一定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求之不得的事。一方说我偷税,另一方硬说没有偷税,打起来报纸才热闹,而结果如何报纸仍然可以再登,不管我偷税没偷税都是热门新闻。而且报纸还可以概不负责,这种大好事只能给一家过去与我有交情的报纸,跟我吵过架的报纸才不会理他呢。

坐在屋里拨电话,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奇怪,没有报纸愿意登载。为什么?我简直搞不懂了。是他们不敢吧。那为什么报纸上可以登对我的污蔑,谩骂,偷税十七万甚至上百万都不经过调查核实,而我的一个文责自负的声明却没有人敢登呢?这不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给钱行不行?不行。不行拉他妈倒。我把话筒一摔。

可是我自己拉倒不了。我不能受屈蒙冤活在世上。不能让舆论一边倒。要告诉世人我是怎么回事。让大家知道我有呼声。然后给我时间等待结果。求求他们。求求报纸。放下架子抹下面皮,还要那么多的尊严干什么?只有不要尊严才能

争取尊严，这算是哪码子事啊。

再一个个电话重复打。一次又一次在电话里重申我的理由和冤屈，三寸不烂之舌被说短了两寸。我七窍生烟，变成了一只录音机。由此我想到过去老贫农忆苦思甜，还有老山前线的英雄作报告是多么的不容易，如此众多的重复仍然声泪俱下，说明他们有着多么强壮的身体和多么健全的神经。

可是报纸们仍然就像约好了似地拒绝我。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新文件、新精神，不许登来自我这方的消息呢？

我突然发现自己其实在上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使我明白了那么多深邃的道理，虽然我付出了极昂贵极昂贵的学费。可是假使我能活着从这所大学毕业，我会因此而获得无论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财富。

你看我又想到哪儿去了？最近我总是胡思乱想。我有神经病了吧？我看好像差不多。我总是跟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车轱辘话来回倒着说。我看这次官司过后不死我也得扒层皮。死了当然就不消说了，扒层皮多么难看啊，红腥腥的也没法拍电影了。啊，电影！电影现在离我是那么遥远。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打官司几个电影都拍出来了。十八万？三十六万？怕二十个十八万二十个三十六万都挣得了。电影界都知道我拍片的命中率特高。我还没有拍过一个赔钱的电影呢。

我现在都老了吧？成天这么折腾谁也经受不起。那天我从录音室跑出来后曾收到《红楼梦》组和我要好的女演员关切询问的电话，问我感觉怎么样？我声音清亮，听起来神采奕奕地告诉她说：“我的体会是，麦考尔是不难当的。”麦考尔是正在播放的美国电视剧《神探亨特》中亨特的搭档女侦探，经过数次考验，我发现自己比她强。跑起来比她速度快，而且敏

捷多了。不然怎么会有我的今日?

我发现我已具有了相当的乐观主义色彩,哈,什么都练出来了。现在是老油条炸也炸不泡了。许多海外的朋友、亲戚,看到报纸纷纷劝我出国,他们一切手续都为我办好了。可是我不出国。他们骂我死脑袋。死脑袋就死脑袋吧,好多事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平时头脑里总是有两个我,它们天天在一起打架,只有近期来才高度紧密合作,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也许是它们认识到大敌当前要一致对外吧。

又想到哪儿去了?想回来想回来。刚才想的什么来着?哦,对了,是要发表声明。就是要发表一个声明,那些报纸太不像话了。你看现在把我弄成什么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们不惭愧吗?尤其是那一篇四川记者的文章,居然痛打落水狗说我偷税上百万元!还说凭我的脸蛋"巴结几个上层人物岂不容易",还说我"有权力庇护,偷漏税算得了什么",简直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告诉你,存心要偷税我就不在中国呆!挣这么点钱,这税有什么好偷的?这种人太恶劣了!我要真巴结了上层人物还有你的好果子吃?话又说回来,我要真是上层人物的女儿,或是七大姑八大姨,哪怕是"兔子的汤的汤的汤"!你敢写我偷税上百万元吗?借给你一万个胆子也不敢!

又开始气不打一处来。乐观主义又没影了。去他娘的乐观个狗屁!有他妈的这些无中生有半夜吃桃子照着软的捏的人,中国就好不了!"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他们就不怕老天爷制裁吗?就不怕有人告吗?

告?我可不可以告他?我为什么不告他?没有报纸登我的声明我干脆告一家报纸,效果也跟登我的声明差不多,说不定还要好一些。在打官司当中肯定会牵涉到税的问题,反而能

弄个水落石出。对！告他告他！可是万一我又打输了怎么办呢？我输得起吗？我是不是又抓了新的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

先不想那么多。没关系，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穷则思变，要变要革命。不告，那四川记者过几天说我偷税一千万、一个亿的报纸都会出来。我不是毛阿敏，我不任你们宰割！

又打电话给蒋律师。强烈要求告那个四川的记者。蒋律师已习惯了我的大叫大嚷，他一个劲地说好好好，我们再商量再商量。我说别商量了，就这么定了！

哦，对了对了，还要开政协大会。政协大会正在召开。我还是政协委员哩。结果弄得一塌糊涂，把开会这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可是我好意思去开会吗？每次开大会我都在给政协委员们签名，三千多委员三千多张卡，还有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记者、工作人员，不签说不过去，只有个个签名有求必应，会场上人群卷成一团一团的。总是要大会警卫来维持秩序才得以安宁一小会儿。过去光彩照人时我就怕这样的场合，现在阴暗龌龊就更不能去这样的环境了。

可是我还是应该去吧？我是不是应该写一个关于税率太高的提案交给大会？不好不好，这是私字大暴露，会认为是偷税犯才有这样的想法，不会引起共鸣。那我可以在大会上去找税务总局局长金鑫吧？他是人大代表，在政协列席人大会议时能见到他。也不好，在人大会上找税务总局局长也太招眼，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不够闹的。

罢了。不去开会了。我得去找蒋律师，再去找金鑫。我

多像那层层告状倾诉冤情的秦香莲啊。

在蒋律师那里，很快通过了我告四川记者侵犯名誉权的方案。我又委托了蒋律师作代理。我们起草了起诉书。这一来，我是名誉权案、税案、离婚案三案缠身了。怪不得有人说我是打官司的专业户。干脆，我把离婚案也交给蒋律师去代理，这样，他也是三位一体，我也算是有个伴了。

很快，我收到了香港李翰祥导演寄来的三张正式收据。从这天起，我们的战争不再是赤手空拳，应该说是有一个小小的但是货真价实的武器了。

我也找过了检察院的老徐和小李。我这位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再也不像往常那样激烈。平平和和，谦谦虚虚，有理有利有节地把我的理由陈述了一个明明白白，最后，出示了我的“武器”。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案子已十分熟悉。我仿佛感觉到他们在看到那三张收据时的小小震动和惊愕。

当然，我也找过了税务总局局长金鑫。

记得我穿一身白衣服拿了一个公文包，看起来一副浩然正气的模样走进了他的办公室。面对这位税务官的总指挥，我也临阵不怯场，他也不凶神恶煞，倒是慈眉善目的像个好大伯。尽管像好大伯，是不是好大伯我还要考察你，天知道我还有什么权力去考察“敌对阵营”的总司令。不过看他光是名字中就有四个金，肯定是钱从不往外出只往里进，不当税务总局局长也是财政部长，再不就是人民银行的行长，总之一定会与钱有关才会干休。

我先下结论。结论自然是我不是偷税犯，我没有偷税之类的光明面。然后再出示李翰祥的信件及一切有关文件，最后使出“杀手锏”，亮出那三张正式收据，接着洋洋洒洒、滔滔

不绝陈述我的冤屈，最后不由自己控制地批评了税法，并且指责了中央首长不该在我这个小小的案子上定三条规定把我当成大敌。我不断重申我对中国人民做过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一再表白我是一只益虫。我不仅不应受到打击，应该受到表扬，过去我的所作所为正无可辩驳地证明我是纳税的尖兵，模范，带头人。

我连声说，当然我不是要求表扬，只要不进监狱就行。我没有掉眼泪。我事先没有设计掉眼泪，我也早已没有了眼泪。我本来设计过眨几下眼睛放那么一会儿电，可一看到那总司令，我就短路停电了。

我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发表完了我的演说。金局长慢吞吞的话使我大吃一惊。他首先说并没有中央首长对你的案子批示之类的事，这一条让我尽管放心。再一点我提的税率高也有道理，也许将来会改进。另外让我相信国家，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

第一条我听了当然如释重负。第二条听了也很舒服。第三条听了我不以为然。这种安慰的话我听得太多了，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不过我只是心里想，嘴上没有说我已经学精了。豁出一切打这场官司，就是将来进监狱上法场，我也不会因为过去没有尽心竭力而悔恨，是我现在的既定方针。最令我惊讶的是金局长居然同意我告那个写我偷税一百万的四川记者，并为我提供了转载这篇文章的《每周文摘》给我作为依据。

抱着对全国税务运动总指挥是“好大伯”还是“坏大伯”的疑惑，我出了税务总局，紧接着又去找了赵志文、杨洁，还有一大帮记者朋友们。我把我的“武器”亮给他们，并得意洋洋地

说，我的特点就是从来不会说谎话骗人。我明显看到赵志文他们舒了一口气。

一下子，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我与记者的交往简单概括下来有三次浪潮，用音乐上一个术语来说就是“三段式”。曾经有一个时期，记者是我衷心信任的朋友，那是在我还默默无闻、急于要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承认是这些报纸、这些新闻兴风作浪，把我乔装打扮推向了广大的市场；

在我刚刚开始当明星，还不懂得“游戏规则”时，一些记者们根据每一次与我短短交谈的印象“盖棺论定”，报纸上的“拷贝”时常和我本身这个“原装货”对不上，我开始感到受了伤害；

在《我的路》引起的批判浪头中，我的心被砸成了粉末。从那一天起，我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像一只冬眠的蝉。我告诫自己绝不可忘了对方是“记者”，永不能再敞开胸怀；

后来随着我日渐受世人注目，全国各地记者蜂拥而来。也许在潜意识中觉得自己“木已成舟”，记者对我的作用已不大了?就像国营企业的服务员由于顾客太多服务态度不好一样，我也日渐烦躁，态度越来越恶劣。

这段时期，我与记者的关系降到了零度以下。

而今天，在需要新闻的时候，我吃了数不清的“闭门羹”。我痛尝了不知道是谁也许就是我自己种下的苦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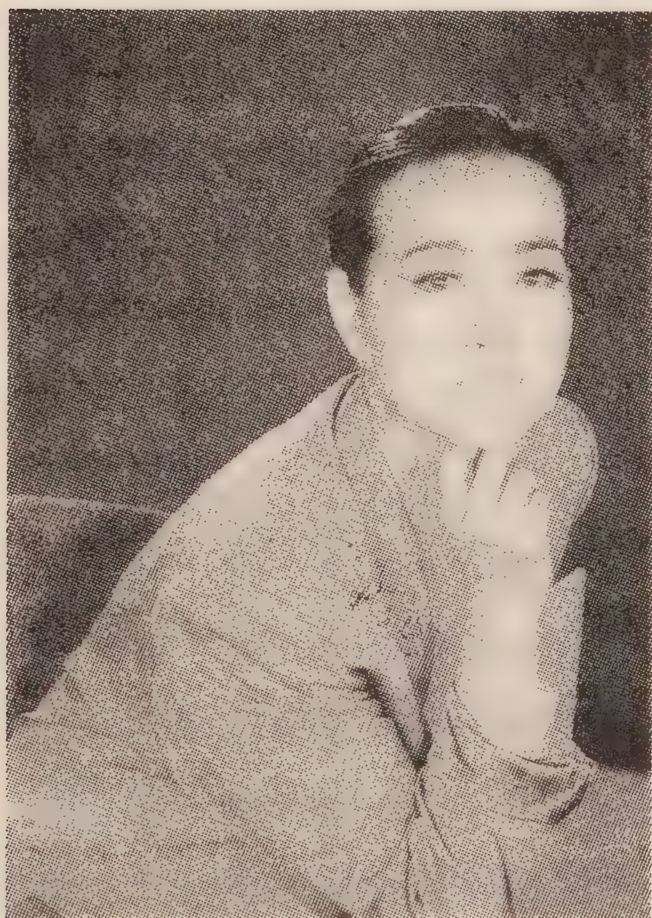
是赵志文、杨洁他们，给予我信任，伸出正义之手，为我呼吁，为我打抱不平，使得我的税案透明度大面积地渗透，以致于有关税务部门不能一手遮天，当然这是后话。

是他们使我懂得什么叫正直，什么叫档次，什么叫记者，

什么叫新闻道德。他们改变了我对记者的一切看法，使我明白记者队伍犹如演员队伍文艺队伍一样，层次有高有低，水平有优有劣。

36

上青岛找检察院说理去



马不停蹄，律师们和我还有姜文，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去了青岛。

在青岛，我没有去那头号对立面青岛税务局，而是直接去了检察院。我已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刑事案件了。

青岛，这风景怡人、山青海秀的地方，我虽然从没有来过，却把我的生死牢牢系在这里。青岛也随着这件对我来说生死攸关的官司，永远、永远进入我的记忆。

在这次税案中，以蒋律师为首的三位律师先后五次来到这里，替我申报个人所得税。我和姜文两次来到这里，也是为了申报同一笔个人所得税。我花了多少钱？我都不敢去数，不忍心去数，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去青岛上税，假使我只挣了一百元，为了上几十元的税要去一次青岛，如果不去就是偷税，去一趟连路途费用都不够，又怎么能公平合理呢？税务局为什么不能像社会上其他公仆标榜的那样，也提供全面服务、上门收税呢？

假如我没有过去在税法公布之前的稍许积累，我又怎么有钱打得起这个官司呢？我来都来不了青岛，肯定不能如期上税，不能如期上税就是偷税，一个星期之内交不出这笔钱和罚款，你就没有反诉的资格，就构成抗税罪，那不是肯定要进监狱么？这叫我们这些“偷税犯”心里怎么能服呢？

那么税务局方面花了多少钱？恐怕更是数不胜数。泸州、天津、保定、南昌、新余、杭州……凡是我和“走穴”队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税务局的足迹，他们花的大头加上我所花的小头，一定远远超过了十八万。不夸张地说，也许比三十六万还要多。所有人在这件事里面投入的精力、人力以及我这个当事人受到的精神压力和折磨，又岂止无数个三十六万所能弥补的！

我承认我觉悟低，理解不了伟大的税务运动的战略思想，可是见都没有见到过我本人就裁定我偷税，置我反诉的呼声于不顾就报到检察院立案侦查我抗税，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我永不能理解的。这一点，我永生永世都不能原谅。它在我的心上狠狠地刻上了绝不能愈合的伤痕。

在这长达半年多的持久而艰苦的拉锯战中，我已耗尽了

心力。我的抗争只是出于需要，再已不是出于激愤了，我一天比一天丧失信心。我——开始考虑出国。

当我在北京、在天津、在青岛、在沈阳，我被千夫所指戳脊梁骨的时候，当我在《红楼梦》剧组就靠那微薄的每天十元补助维持生活，还得勉强运作打官司，饥一顿饱一顿，而税务局连这点钱也要上税又差点要罚那根本付不起的高额巨款的时候，我逐渐从头凉到了脚。连周围都看不过去了，好多人都悄悄跟我说："出国吧，还呆在这里干吗？太遭罪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朋友们也纷纷劝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一个护照回来，又是一条好汉！"

慢慢地我开始办理出国手续。在法国有亲戚，美国有朋友，手续对我是那么易如反掌，我自己却缓缓进行。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为我平反昭雪，我还是希望有一天青岛能张开双手拥抱我那颗荒凉的心，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是好孩子，留下吧！"假如真有那么一天，假如我的梦想成真，那多好啊。我将永远，永远不离开自己的祖国，我也将永远永远地热爱青岛，因为青岛毕竟是那样的美丽，因为中国——只有中国是我最魂牵梦萦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联系的地方。

可是青岛，并不那么欢迎我。除了那些了解内情的朋友外，许多人都给不了我好脸色。我也曾走投无路去登门拜访过市长，希望他能责成税务局秉公办理，明察秋毫，纠正冤假错案。可市长一问三不知，推了个一干二净。只有检察院，那森严壁垒的衙门，却给了我一丝意想不到的春风。

我的案子承办人张伯之、李华苓认真严肃，一字不漏地听了我的情况汇报。从开始到后来，我把演出场次、地点、收入、

时间讲解得丝丝入扣。为了生存，我早已把那些枯燥乏味的数字背得滚瓜烂熟。蒋律师适时出示了李翰祥的信件和香港会计师楼的正式收据，承办方爬在桌子上，一分钱一毛钱与税务局交来的文件对照。

这种艰苦的工作进行了两天。两天之后，张伯之终于从桌子上抬起头来，平静地说："从这些证据材料来看，没有发现你有偷税十八万的事实，这二十八万五千的赔偿费也不能算是你个人的收入。"

手脚一阵发软，我差一点从椅子里滑到地上。这轻轻的两句话，我近两年来还是第一次从国家检察机关那里听到。趁热打铁，蒋律师抓紧问能不能就这个结果给我们一个文件？

摇摇头。他们不能为我出任何文件。哪怕就事论事的文件也不能出。无论我们几个人左求右求，来回拚命乱求也不管用。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不能为这一个小小的案子付出重大的牺牲。检察院能与税务局背道而驰，做出截然相反的不同结论，已经是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它不仅需要正义良心，还需要更多更大的勇气。

我的心又凉到冰点。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从希望跌到失望，比本来就没有希望更痛。原来以为透出来一线曙光，如今又被重重的黑幕罩上。

绝望中我们问他们，下一步将会怎么办？答复是不予立案退回税务局。又退回税务局！再问，会不会税务局再往其他检察机关报呢？承办人同情地看着我，回答说，一般不会，特殊案件也说不准。

我是多么需要那份还我清白的文件，要知道它对我是无限无限的重要。有了它，我就有了说话的依据，不仅报纸上可

以登载，我也从此得见天日了。

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从来就达不到。下一个错误的结论轻而易举，推翻一个案子比登天还难。连纠正都不可能。尽管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姜文为了我的案子拚出命去与有关人等大杯喝酒，酩酊大醉，最后倒在了桌子底下，可是，青岛这一趟还是白来了。

折腾了半年多，忙天忙地昏头胀脑还是一个零圈圈。

我突然没有什么事想做了。只有一件事就是等待。我这时非常非常想家。我要立即找一个地方憩息，立即去那友爱、温暖、不需要防范、不需要伪装、更不需要缩头缩脑能还我真实自己的小小的窝。

蒋律师留在青岛继续与有关方面交涉，再最后争取一次检察院在退回税务局之前给我们一个书面结论。我飞回北京进行《红楼梦》的后期工作，补录一些声音，然后将前往深圳。

37

和母亲大吵是要她不要过于节约多多花钱



又坐在飞机上。这段时间总在空中乱飞，都赶得上空中小姐了。

只身一人，我前往深圳。深圳这会儿还没有机场，从北京去深圳很麻烦，从北京去蛇口就更麻烦。我办好了去深圳的特区通行证，先坐飞机去广州，从广州再转火车去深圳车站，出了站再乘“的士”或是“中巴”去蛇口。

上一次去深圳是什么时候？好像是几个世纪以前了。哦！

对了，还是那次我刚从美国办影展回来去深圳办理银行贷款及买楼花的各种事宜。虽然上次去深圳同样是为钱头痛，可处处见到的都是春天般的笑脸，现在又去深圳，戴眼镜、戴帽子，还得四处躲避那横扫落叶的秋风。

唉！往事不堪回首。几年前我的家在四川，现在我的家在深圳。几年前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我负债累累，是正在通缉中的头号偷税犯，整个一只过街老鼠。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幸好在此以前就已经借钱买了蛇口这么一个去处，不然我今日这副模样别说借钱，借空气都没有人给你。唉！人生难料，此一时彼一时也。

遮遮掩掩，躲躲藏藏，坐了飞机坐火车，坐了火车坐汽车，辗转颠簸，我终于到了蛇口。

蛇口与我过去来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然是那样安静、整洁，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就是这位少女羞答答使我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从此流连忘返，继而“一怒为红颜”，从而惹出这一系列的风波。蛇口，你还认识我吗？

哦！我的家在什么地方？记得当初买这幢房屋是看的图纸，头一昏脑一发热就顺手圈了一处。我想起那幢别墅是在海边，小小的，乖乖的，树木葱茏，在我心目中是白雪公主住的房屋。

唉呀！蛇口怎么这么热呵？知了在没完没了地叫。各种昆虫不停地嗡嗡嗡嗡。在大街上刚站了一小会儿，汗水已湿透了我所有的衣衫。快走快走，再不快走就通体透明了。

几步冲到有冷气的大楼里，一股凉风渗透进来。父母、外婆他们不会太热吧！在这赤日炎炎的地方？哦！不会不会。那幢房子里有七个空调呢。

想到这里不由得多多少少回复了一些自豪感。只要能为亲人谋福利，我吃多少苦受多少罪都愿意。我头上的千钧重压身上的脚镣手铐突然无影无踪，啊！人有了尊严是多么好啊。

快走快走！不要停留！脑海里浮现出外婆、爸爸、妈妈慈祥的笑脸，仿佛听见小丹丹叫“姨妈”的甜甜的声音，一家人团聚的美满情景激荡着我，三步两步我跨进了家。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一边呼喊，我一边冲进客厅。这段时间除了呼救吵架外好久没有这样快乐地喊过了，我心里一阵通畅。没有回声。临走前因为家里没有电话所以没有通知，他们不知道我回来也没有思想准备吧。

轻手轻脚走进屋去，怎么这么热啊？“轰”的一片蒸气扑了过来，怎么屋里气温高得像水开了锅？坚持着往里又走了两步，“唰”的一下汗水从全身的毛孔里冒了出来，放下东西朝大厅里一望，一幅悲惨的图画映在我的眼前：

一家几口老弱病残全靠在沙发上喘气，丹丹满头满脸都长了毒疮，几个空调静静地不动不响，屋子里所有窗户都大开着……一步冲到他们面前拚命大嚷：为什么不开冷气？为什么不开空调？这会热死人的！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

母亲站起身阻拦我。竭力解释说空调费太贵了，付不起这些钱。外婆、爸爸也跟着帮腔：不热不热，多洗几个澡勤扇扇子就行了！过得去过得去。我吼起来：不热？还说不热？你看丹丹长那么多痱子不就是热的吗？都成毒疮了就不心疼？你们不心疼我心疼！

一边说一边关窗户，又爬到桌子上去开空调，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边流泪一边忙活一边继续喊：你们不要觉得我没

钱!告诉你们我现在钱多得花不完!你们不要看到报纸上写这写那,都是假的!骗人的!我好着呢!马上报纸就要登反面文章了!

那天夜里,我和母亲大吵了一架。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母亲吵架。吵架凶得我嗓子全部失声。与别的家庭吵架不同的是,大部分家庭是为了谁多花了钱吵架,我是为母亲舍不得花钱而吵架。

记得前些年我刚刚工作的时候,在成都跟外婆吵了一架。原因是外婆七十多岁高龄为了省钱偏不坐那三轮车,而去挤那人满为患不安全的公共汽车。几年以后差不多的原因我又与母亲发生激烈的冲突。我告诉她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们对我才是最重要的,家庭幸福才是最大的财富,只要你们好就什么都好,我的事一切都好处理,只要把你们自己照顾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听说你们嫌物价高吃饭贵就每顿吃面条?这怎么能行呢?本来我想说要是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在监狱里送饭都没有人送,话到嘴边我赶紧把它咽了下去。

我强行给家里订了计划:每天必须开空调多少时间,吃饭必须用去多少开销,自来水必须用去多少,并且告诉他们留好付帐单,我下次回来要检查。并且威胁说假如他们不按计划完成我就把这些规定计划内的钱撕成碎末扔到大海里去!

我把带回来的所有钱财全都交给了母亲,"命令"在多少天内要把它花完。我知道我走之后她一定会"阳奉阴违",可是命令与不命令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告诉他们我最近又挣了一笔钱,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没有地方用。我妈说你说的都是真的呀?那报上写的你偷税还罚款,你哪来那么多钱去交

啊?我说这一点妈你就不知道了。你知道我挣了多少钱吗?税务局查我查错了,现在还要退钱给我呢,我因祸得福,又发了。飞机上不许带现金,所以这次才带了这么些,下一次坐火车多带点回来。我们住这样的房子就要花得起钱,别小里小气的成天哭穷,让周围那些外国人和港商、台商笑话。人家说中国的头号大明星怎么会这个样子?还以为我们抠门,这点钱都舍不得呢。妈你去蛇口招商局要求水电按大陆标准照顾就不好。以后别这样了啊?

母亲将信将疑点点头说: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我说:春节。春节我肯定回家。你忘了我发誓无论在天涯海角只要是春节我一定要在家过吗?你知道我从来不说二话的。母亲点点头。她知道我是说一不二的。可是我心里想说,不过非人力所能抗拒除外。要是自由受到了限制,我就是插上了翅膀也难飞了。

一晚上絮絮叨叨千言万语全讲的是钱的事。这几年我好像跟钱干上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离开家,回到了北京。

38 “打观众”事件发生在Y城的



“走穴”。还得“走穴”。

尽管是大偷税犯也得“走穴”。“走穴”是我的唯一出路。冒着枪林弹雨，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走穴”。为了外婆，为了爸爸、妈妈，为了丹丹，为了我自己，我必须也只有——“走穴”。

“穴队”队员们说那么高的税挣的那点钱简直是眼泪。我说有眼泪总比没有眼泪好。别说是眼泪了，哪怕是眼屎呢。

“走穴走穴”。别说那么多，听我的。

大家哆哆嗦嗦地跟我出发。就像被共产党打过了长江的蒋介石军队残余，每个人重整旗鼓抖擞精神也掩饰不了心里的慌张。每到一地，东西一放下就急急忙忙去税务局报到，税务官来到了后台，所有人一齐拥上，又递烟又打火，端茶送水摆凳子寒暄，活像老鼠见了猫。

记者们成群结队等在舞台边轮流采访。拿着表卡时间看你出场多少分钟。你必须出场至少半个小时，超出了是应该的，少了一分钟明天报纸上刺刀见红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挣钱？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工人、农民成天汗流浃背一年到头辛苦，还没有你们一场演出的钱多。战兢兢我们小声说艺术是无价的。无价？无价卖票干吗？收钱干吗？无价就义演嘛！我们大着胆子说，那我们也得吃饭啊。吃饭？想想红军二万五千里吃草根树皮，你们的日子强多了！

观众席里每天不停地起哄。好多人买了票花了钱看完了表演，出剧场便一通开骂。什么节目不好啊，蒙我们啊，这么多钱了还来挣我们的钱啊……他们早就忘了是他们自己掏钱来买的票，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也不敢拿枪逼着他们到剧场来看。只要节目稍不精彩便会响起“下去吧”，甚至“滚下去吧”的吼声，更有甚者，可乐瓶、鸡蛋、黄瓜都会向台上的演员飞过来。走笔之时我想起几年后“百花奖”在深圳有过一场演出，一位歌唱演员上场时不小心一出台就摔了一跤，狼狈地爬了起来，那位演员等着那听惯了的起哄、大笑和口哨声传来，可是观众却静静地听他唱，直到他唱完后报以比别的节目更热烈的掌声。记得在当时，那位演员禁不住热泪盈眶，其余的同仁也不免有些唏嘘，演出多年何曾见过这样尊重艺术、文明

礼貌的场面！

我又想起那一年去法国办影展。一天无事去一小剧院看一出来自苏联的滑稽剧。讲的是俄文，表演又粗糙，水平更低劣，实在是乏味得很，法国人却个个正襟危坐，眼睛炯炯有神。每当我不由自主打个哈欠便有人怒目相向，凡是我们交头接耳哪怕是说一句话，旁边总有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演出完全场起立鼓掌达十分钟之久，那位功夫不敢恭维的演员居然在台上谢幕十三次！后来我得知法国所有的剧场包括电影院都是如此。不由得我想到在法国做一个艺术家实在是最幸福最幸福。

可是在我们这里，在那样的年代，艺术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艺术再与金钱挂钩则是肮脏得不能再肮脏的交易。许多人去看你，欣赏你，同时哄你，批判你，骂你。演员差一点就在台上摇尾乞怜，观众和艺术家形成了一种互相需要又互相仇视的畸形关系。

我们每天在这些错综复杂当中生活着。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舞台到一个舞台，从一个税务局到另一个税务局，从一场观众到另一场观众。税务局动不动就让你去一趟，供电局不送票就停你的电，剧场时常借口取不出现金不给你演出费，你求不了爷爷告不了奶奶，只得忍气吞声。

和观众直接发生冲突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我一直压抑着个性，小心翼翼避免出事。尽管每次出场都会引起全场骚动，尽管有时唱完一首歌笑容满面地正要向大家鞠躬时，突然传来一声清晰的“刘晓庆，偷税！”的怒喊，尽管我也在台上遇到过“下去吧！”的哄声，可是我仍然坚持“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再三告诫自己不能再出偏差，不能再授人以口实，直到后来那一天，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震动全国的“打观众”事件……

那是在江苏的Y城。在去Y城演出之前，我们已去过一些地方，每个地方都有着数不清的烦恼，受过了数不清的委屈。每场都有许多观众等在门口要我签名，不管我是不是正在化装，或是正在换衣服，只要没有给他们签名就喊着名字骂几声。每到一地演出还没有开始，市税务局、区税务局、县税务局各级税务领导办事人员坐满了后台。有的地方，我们钱还没有拿到手，就让我们填税票，交了钱才许演出。报纸是天天登、天天骂，到一个地方臭一个地方。观众总是在没有看我们演出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报纸，心里抱着成见，到了剧场当然会找茬，找茬的情况给记者知道又登报纸，身受重重压迫走投无路的演员们，可不是更得气不打一处来。

每天演出无疑是一场斗争。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身处恶劣环境被人当作戏子的演员们同观众、记者之间的矛盾已白热化。

那一天照常是晚场演出。照常是为了安全，晚会已开演了我才出发。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节目，剧场距离住处也很近。我们照样派人观察了剧场所处的地形、环境，找好了最佳进场的通道。

我的住处照样已被人发现，房间外照样人山人海。照样是喧闹之声不绝于耳，议论我的各种语言时高时低、时隐时现传到我的耳中：“刘晓庆，这时候还来演出，真够贪财的！”“税务局正在查她呢，你看吧，在Y城肯定也吃不了兜着走！”“她的出场费听说一场就好几十万呢，真够黑的！”“哎！刘晓庆多大了？都老了吧？”“不知道。呆会儿出来就可以看了。她大概

有四五十了吧。""四五十?还来演出?不累得慌啊?""她还没有结婚呢,听人说她一点儿都不显老,肯定整了容了。""其实她演电影挺好的,我都喜欢看。没事跑这儿来干吗?""嗨,挣钱挣昏了头呗。哎哎哎,别挤别挤,你们挤啥?一个破戏子有啥好看的?还不就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她也是人!"

外面好像打起来了。我放下化妆笔,心里一阵慌。一直处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一看见人多条件反射我就害怕。想起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阶级敌人反动派才怕见阳光、怕见天日、怕见革命人民,跟我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这么一对照我越来越彻头彻尾地向反动派靠拢,怎么不令我心惊?

天已渐渐昏黑。逐渐更昏更黑,最后黑沉沉一片。屋外面越来越挤,人越来越多,小院的门在开始摇晃。拥挤声、争吵声越来越严重,"穴头"照样领带歪斜,挤得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突破包围圈跌进屋里:"快!快走!再不走人越来越多时间也来不及了!"

二话没说我站起身来就跟他走,前呼后拥照样"穴队"队员们担任保卫。照样我戴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低低。

照样在出屋门之前我站一下,我们的人照样"轰"的冲出去想把群众拦在两边。可是今天人手不够多,我只有在密不透风的人群中勉强穿行。

人们都纷纷阻拦我的前进。后面的人往前挤,前面的人蹲下来看我的脸,有的用手电筒在我脸上照,我本能地转过脸去,另一方向手电筒又从那边照过来,我用手挡住眼睛。大家七嘴八舌:"嗨,刘晓庆,别走啊,停下来让我们看看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吭声,继续往前走。车就在前面,可是我无法到它的旁边。有人抓住我的手,在抽回手的同时,条件反射

我一回头，有人喊："看见了看见了！嗨！不怎么样！不好看嘛！"

我们的人在前面开路，左推右挡仍然行进艰难。人群中传出阵阵哄笑声。"到我们 Y 城来挣钱还不让人看，那张脸不就是给人看的嘛！是不是我们没掏钱啊？""有啥珍贵的？要是我就不看！""刘晓庆，戴帽子干吗？把帽子摘了，让我们瞅瞅！"笑声越来越热烈。

我咬住嘴唇，一声不响。只盼望能早一分钟、早一秒钟到达车的跟前，只要坐上车，一切也都好了。只听见有人拍胸脯说："我来。看我的。"我正在跌跌绊绊地躲过那些蹲下来嘻嘻笑盯着我脸看的人眼，突然一个身影窜到跟前。我吓了一跳往后一闪，一只手一下子摘掉了我的帽子，在周围一片大笑声中那只摘帽子的手从我的脸上摸过，那一瞬间仿佛是鬼神驱使，我扬起手向那摘帽子的身影就是一掌！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一言不发我走向汽车。只听见后面传来尖声的哭嚎，那声音之嘹亮刺破苍天。"不得了啦，刘晓庆打人了！你凭什么打我？我跟你拚了！"

我上车、关门。一张脸扑在车窗前，是个女的。她披头散发无限悲痛，一只手扣着车前镜，一只手伸进窗内向我抓来。我怒视着她，无动于衷。此时的我已无所畏惧，今天就是死在这里我也不会后悔。我看到有人把她拉开，汽车开动，我们扬长而去。

我在 Y 城已无法呆。人们肯定正怒火万丈。最后一场刚一结束我就出发去了下一个城市。听说那天有许多人守在我的住处找我打架一直等到半夜。

当然第二天报纸立即发表了这个消息。当然说我蛮横无

礼，出手打人，居然打热爱她敬爱她的观众。当然说我当晚不敢回宾馆灰溜溜地去了别的地方。

报纸的表现全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反应木然，我知道过两天全国的报纸都会转载这条新闻，果然在几天之后几乎全国的大小报纸都出现了这条消息，并且在老百姓的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我更讨厌、更仇视。可是我并不在乎。

我根本不承认那被打的人是我的观众。就算是我的观众，她的行为也早就超出了热爱我尊重我的范畴。何况我没有打到她。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深深地后悔。自卫是一个人的正常本能。那突然从黑暗中伸来的一只手我怎么知道是好意还是歹意？我怎么分得清是要摘我的帽子或是洒硝镪水毁我的容还是其他？她凭什么随便动我的头甚至摸我的脸？试问无论哪一个普通人哪怕是农民或是清洁工或是家庭妇女走在大街上，你可以随便去摘他的帽子摸他的脸吗？难道我们做“戏子”的比所有人都低一等？这种事任何人遇到都会给来犯者一记耳光，要遇到有的人不打扁了你才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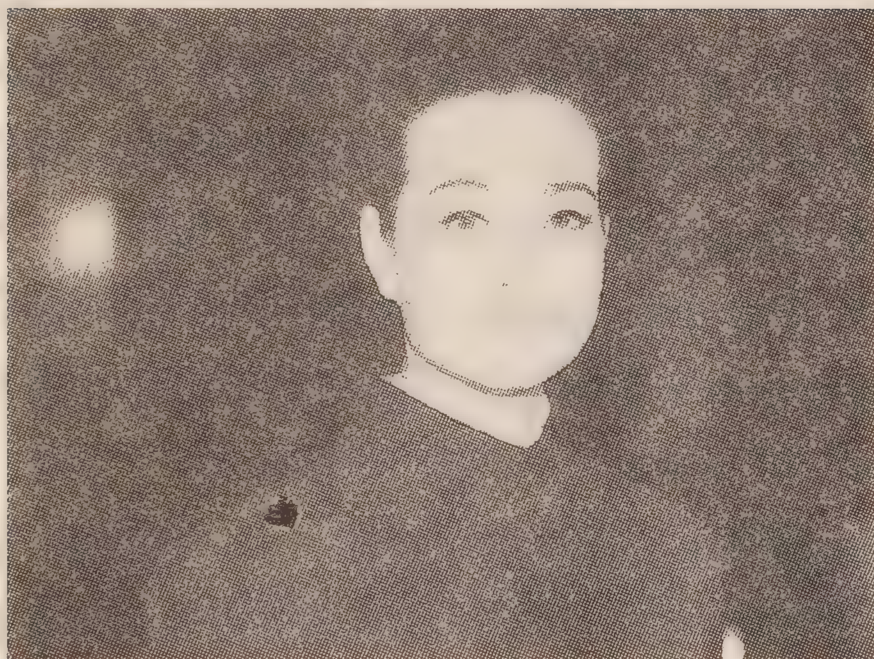
我是艺术家不是玩具，不是小猫小狗，我至少是一个人。人格是平等的，不能随便被人玩弄。就算用污蔑性的语言说我们是来“卖艺”但不是来卖身，你就是不可以随便摸，随便动。你要欺侮我不把我当人看我就要反抗，试问假设是邓小平、李鹏来，就是你们市长来，你敢去围观起哄，掀他们的帽子吗？在黑暗中你去掀帽子警卫绝对会给你一枪，别说打你，不要你的命才怪呢。

我直后悔我没有真的打她，打到她。依我现在的心情脾气，我既然打了她也背了打她的名，就该把她打痛，就该打彻

底，让她记住，记一辈子。我总是这样窝囊，怪不得别人老骂我“窝囊废”。我一辈子从没有动手打过人，如果这算一次那就是唯一的一次。我时常在挨了欺侮受了委屈，在事发的当时张口结舌只顾生气，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回来后接着生气，过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才想出反扑的手段或是言语，可是已过了时效，机会已永远失去了。

当然不是说假话，我拥有大多数好心肠真挚的观众。这些观众虽然痛心疾首看着我“变坏”，但绝不加入损害我的行列。还有许多观众无论报纸怎样写也不相信那些拿他们的话来说的“无稽之谈”，是他们使我得以有今日。可是那位摘我帽子的女人，她属于另外一种类型。

39 在自贡灯会『与记者吵架』



在此事件之后，我又发生过许多起与记者吵架的事件。

最有名最有轰动效应的是那次参加自贡灯会与一香港记者和一自贡记者的吵架。

那一架吵得上上下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吵架有什么了不起？我不相信有人活一辈子从不吵架。也许因为是我在吵架，也许因为是同记者吵架，这场争吵变成一颗氢弹在四川自贡爆炸，冲击波遍及中国各个角落。

那时候，姜文和我以及艺术团的同志们应邀在四川自贡市演出。

其时，自贡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灯会”。

我是四川人，在从影前去过自贡许多次，灯会的盛况自然是熟悉得很了。

可是现在来到自贡，我已“失去自由”多年，对自贡日新月异的面貌完全无法了解。每天在房间里关“禁闭”，因为窗户外、门上边都爬满了人。人们不停地把笔记本和各种纸张捅进来，我迅速地在上面签好名后给他们送出去。每天我去吃饭都得冲过人群，才能到达饭厅。在无数双注视、观察、来回打量的眼睛下“表演”吃饭的节目。听着人们对我的各种议论，讲着我的许多轶闻，我一边回答着各种问题，同时做出各种亲切动人、和蔼可亲的笑容，唯恐在笑了九十九下到第一百下时坚持不住肌肉的抽动，稍一停顿让人误会为我的不耐烦、傲气，在这犹如开一场群众大会的情景中我每顿饭都毫无食欲。

在这样的日子里演出到了最后一天。这以前，全体演员一致要求去看看自贡的灯会。而当地负责同志及灯会管理人员坚决要我一起去参观。在我表示为难的情况下，他们为我的安全问题作了许多安排：在演出之后灯会专门为我们延长开放时间，而他们会在平时法定关园时间内尽量快速清场。

被家乡人的热忱感动，我这只关在笼中多日的“猴子”终于跃跃欲试了。一方面想看看阔别多年的灯会，再者哪怕是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也至少对我的健康有益，我同意了。

演出结束了，我们都换上了便服。我乔装打扮了一番，然后在我浓妆艳抹的舞台妆上随便地抹了几把，把我的脸变成

一个五彩球，像一个“钟馗”。在确定没有人认得出我之后，我们下了汽车，逆着滚滚出园的人流，进了灯会的花园。

我高兴起来。抬起头放眼浏览四周：走了几分钟也没有人认出我。我开始挺直腰板。好久都没有这样放松过了，我感觉到空气的清新。我意识到这对我是多么难得的时刻，我绝不能辜负这美好的瞬间。

灯会里气象万千，各种彩灯精美绝伦、琳琅满目。作为久未返乡的四川人，看到这些灯，闻到泥土的芳香，听到熟悉的乡音，实在感到无比亲切。遥远的童年回忆一一浮现在眼前，深切的恋乡情怀充满了我的心头。

正在冥想中，感到有镁光灯在频频闪动。怎么会有镁光灯在闪动?我立刻回到了现实。四处一望，有一位女人被一个男士陪着，在我回头的当口又眼疾手快地抢拍了好几张照片。我现在这副尊容怎么可以拍照?我马上开始心烦意乱了。我叫来我们演出团的负责人，请他去给他们说一下，问问看是不是记者。如果是记者，请告诉他们今天暂时不要拍照，如果要拍照访问，可以约定明天一个时间，我打扮得整齐一些让他们拍。并且也可以安排时间访问，务必请他们原谅，因为我今天为了避免观众围观，脸上像打破的化妆盒，太脏太花，太不雅观了。

负责人去了，不一会回来告诉我说，他们确实是记者，已跟他们说过了。我放了心，涌上了一股感激之情。长期以来，生活使我感到有这种体谅实在是太难得了。我重新又带着对家乡的无比热爱以主人翁的姿态向姜文介绍灯会的历史，以及我所一知半解的各种灯的来头、构造，还有同过去灯会的对比。

可是，我们的兴致又再一次被继续闪亮的镁光灯打断。那位女士不停地按动她的快门，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不停地拍照。

我压抑住我的不高兴，再次请负责人去对他们说。也许，这位记者想抢到我和姜文的合影。我请负责人再一次告诉他们，如果要拍我同姜文的合影，我答应他们可以明天在饭店好好拍。

可是负责人回来说，他们说他们是香港记者，没有太多时间。

此时，我已完全没有了观赏灯会的兴致，走到一个石桌边坐了下来。演出团的同志围了过来，在几天的相处中他们已完全了解了我的苦衷。此刻，他们深深地同情我。可是，镁光灯继续跟踪到石桌边。不仅没有停止，还加快了它的速度，一而再，再而三地闪动着。

我从来听不得和看不得任何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耀武扬威，自以为有某种特权。此时，胸中的怒火又开始燃烧。镁光灯每闪动一次，我的愤怒就增长一分，我听到我的心跳在加速，我的血管在膨胀，我的脑袋像是要炸了，我的脸憋得通红，喘不过气来。当那位女士居然走到离我一尺的地方正对着我的脸拍照时，我完全忍不住了。

像一头要吃人之前压抑着咆哮的老虎，我尽量低声地问他们："请问，你们是哪里的?"那位女士放下照相机，姿态幽雅，口齿清楚，趾高气扬，一字一句地说："我是香——港——记者。"

我再问她："我对你说过多次，可以抽时间请你为我拍照，为什么不能够商量?"那位女士说："我是香港记者，我没

有太多时间为你拍照。”我勃然大怒。我站起来，也一字一句地对她说：“如果你真的是从香港来的，那么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不允许香港记者为我拍照。”

她一点也不生气，怡然自得地说：“请问国家有这个规定吗?”我盯着她那张完全不能让人记住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脸说：“我刘晓庆有这个规定。”她笑起来，带着满脸的嘲讽：“你知道吗?我们香港的明星是不敢对我这样的。”

我用手指着她的鼻子尖，说：“对不起，我不是香港明星，这里也不是香港，这里是中国大陆。如果你再无理纠缠，我要请你滚出去!”大概是那位香港女士觉得我生气的样子很有新闻价值，她退后一步，又开始拍照。演出团的同志们一拥而上，抢下了她的照相机，那位女士终于失去了风度，大声尖叫起来。

在整个过程当中，那位陪同香港记者的男士一直拿着录音机，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容，在录我们的吵架。此时，他一边录音一边以骑士风度保护那位香港女士，并且不停谄媚地对她说：“不要生气，不要同他们一般见识。”我问他：“你是香港什么报社的?!”那位男士掏出名片，我一眼看出原来他是当地的一位记者。他说：“我是自贡电台的记者，我是负责接待她的。”

我问他：“你既然是自贡的记者，那你录音干什么?”他说：“这是一篇很好的稿件，你们吵得很精彩，是那位小姐让我录的。”

这时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出窍，我看见那灵魂扑上去双手狠狠地拧了那位男记者的脸，他的脸立即开了花，鲜血像打破了颜料瓶一样向四处溅落。

可是我的肉体没有与我的灵魂同步。愣了几秒钟之后我做了这一生当中从未干过的行为：我冲过去抢下他的录音机，拿出录音带，把录音机扔给他，扭头跑出园去。

我到现在眼前还浮动着那位自贡记者一边对香港记者献媚一边用录音机录下我们愤怒的语言时那副幸灾乐祸的嘴脸……

虽然我有官司在身，虽然我是即将在押的"偷税犯"，但我是中国人。我们国家不能没有尊严。我不能没有人的尊严。

国家是我妈。她打我可以，你打她就不行。她打我打得再狠，我最多发几句牢骚或是东躲西藏，你要打她我就会跳起来打你，打你个狗血喷头，体无完肤。

可是我的拳拳赤子之心没有得到谅解。"打观众"事件和"与记者吵架"事件成了当年最轰动的恶性事件。"打观众"激起了民众的公愤，"与记者吵架"使几乎所有记者与我为敌。

那位自贡男记者写了很多稿件给一些报社、杂志社发表，挣了不少稿费，也出了名，闹了个名利双收。而我呢，由于全国一些大报小报不明真相一齐转载这位记者的文章，再加上我又是全国的大"偷税犯"，又是正在离婚的"生活道德败坏者"，我成了反面教材。

我不想说话，我只是又像上次"打观众"以后为自己没有整痛他让他记住而懊悔不已，我总是对不起那参天大浪的舆论，行为与它不配套。我做事总是不到家，跟不上社会反响的步伐。我们的香港导演李翰祥劝我说："你不要和记者对着干。这样对你没有好处。"我说："那不是大陆记者，是你们香港记者。"李翰祥说："她不是香港记者，我没有听说过她。

香港就没有发消息嘛。”

果然，香港没有任何消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打听到那位女士是谁。

我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在青岛，我的偷税抗税案已被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的理由退回税务局，税务局一直没有声音。蒋律师多次与他们联系，答复是要我再去青岛税务局当面申报；

在四川，我告记者侵犯名誉权一案已拉开序幕，法院已正式开庭审理；

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离婚案经过持久战拉锯战，终于判决我与陈国军离婚，可是由于财产分配陈国军提出异议，又重新立案二审开始……

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景，看不到柳暗花明的可能。层峦叠嶂的黑雾弥漫在我的周围。

我的出国手续已经加紧进行。由于我有那么多的官司又被卡在上级主管部门那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官司未了的中国人不允许离开中国。不允许也就不允许，反正我还没有下决心。我仍然在等待、在期望，我在等待在期望那也许永不会有的清清白白的未来。

40 我终于又属于了自己，但我没有钱



这一年，我和姜文又一起上了一部影片《大太监李莲英》。“息影声明”的纸温未凉，我的新片就开拍了。

我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记得几年前曾问过在海外事业辉煌硕果累累的商界朋友，什么是他成功的秘诀？他想了一会儿回答我说：“生命第一，信誉第二。”我觉得这句话是金玉良言。

假如说我这一生有过那么为数少而又小的一两回失信，

那么这次重返影坛应该是最严重的一次。

为什么失信?为钱。又是为钱。真讨厌。自“打观众”“与记者吵架”以后,各方面的呼声越来越走向反面,处在历年来的最低点。从此我再也没有走过穴。我也再不能走穴了。我一边打人一边吵架一边吃苦受累挣来的血汗钱在上税之后全数寄给了父母,寄款单上不敢写我的名字,免得又惹人调查。这以后我又囊中羞涩了。青岛、四川、北京的官司还在打,各项开销仍然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地如秋水流去,陈国军已完全进入了财产诉讼的角色,他认定我有六百万元美金的财产,发誓要分得至少一半三百万美金包括蛇口的半幢房屋。

他曾经有一次抢我到他住的地方要我答应好给他多少钱才放我离开。我说我没有钱,真的没有钱,实在要钱只有给你一张欠条,离婚后我终生辛勤劳作来还你的钱。

他四处托人要我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了,他开着录音机问我财产的事,套出我的答复,录下我的对话,交到法院,磁带有整整五盒。

他收集所有杂志上我的封面和插页的照片,提供给法院,请承办人注意我身上和手上那些他不知道是假的以为是真的贵重首饰。

他要求法院去调查蛇口我那幢历尽千辛万苦,至今还欠债累累并且是用别人的名字购买还没有转给我的房产。

他还……

他还……

罗曼蒂克、欲仙欲死的爱情业已逝去。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实际阶段已经到来。

我终于卸下心灵上沉重的十字架。除了听说陈国军的父

亲在他母亲死后第二年又去世，对老人的缅怀当中多多少少有些微的歉疚以外，我和陈国军之间的一切全都平衡了。虽然仍然在官司当中，尽管婚姻还是存续，可是我的心不再痛了。我的情感不再参与这场纷争，我的躯壳本来就没有知觉。

在我们离婚案的审理当中，当事人双方参与出了一次法庭。为了避免我们再不可开交，法庭规定开庭时陈国军先到，我后到，审理结束后我先走陈国军后走。

像在电影里看到的法庭差不多，审判长坐在当中，我和我的律师还有陈国军和他的律师分别坐在两边。准确地说，那一天才是我和陈国军第一次双方情愿、平和地见面。我们交战的双方遥遥相对，形成一种奇特的场面。昔日的恩爱夫妻如今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敌对阵营，此情此景在审判长和陪审员的眼睛里也许是见惯不惊，在我的心中却是犹如打翻了五味瓶。

审判长讲完开场白，双方律师代表我们发言。我和陈国军袖手旁观。我不会忘怀的是当他的律师说我这不好那不好不堪为人妻时，陈国军站起来大声说："你们错了，刘晓庆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而当我的律师指责陈国军对我行为暴烈构成精神虐待不能作丈夫后，法官问我的意见时，我小声辩解："你们不知道，陈国军其实是最体贴人、最无微不至的模范丈夫。"

可是我们还是要离婚。生活，真是一团麻呵。许多事情决不可能像剪子剪乱麻一样一刀两断，从此再无瓜葛，离婚使我仿佛是死了一次。

这年春节，妹妹晓红从法国回来探亲，先到北京见我，然

后我们一同去深圳蛇口。想到一家人久别终于重逢，心里说不出的欣慰。

我们不停地窃窃私语，晓红告诉我她在法国的经历，我给她讲述她走后发生的一切，包括细细地讲了陈国军。我们从住处讲到机场，从机场讲到了飞机上。在飞机上晓红终于憋不住去了一趟厕所，在回座位的过道上突然伸出一只手拿着一盒糖果，一个声音在说："把这个带给丹丹。"

晓红脸无人色地回到我这里，一迭声地问我猜她遇到了谁？我说谁？她说是陈国军。并且惊魂未定地说她算是服了陈国军了，居然能猜到我们在今日回深圳，并且神通广大地买到了票与我们同坐一班飞机！

我们俩再也不能安定，一路上叽叽喳喳像两只惊慌的小燕子说个不停。两个神经绷紧的脑袋一直在紧张地考虑对策。

肯定他也是去蛇口的。万一他过来与我们说话怎么办？万一下飞机后他一直跟着我们怎么办？就孤身两个人又没有人保护我们！

三十六计归为一计：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飞机就跑，跑得了多少算多少！可是我们还有行李！陈国军肯定没有行李。他比我们快。那怎么办？我们又商量好一出机场就把行李票交给来接我们的靖军，我们上车先走。

上什么车？不能坐火车。坐火车又坐到一处。飞机场有直接开往深圳的巴士。陈国军肯定想得到我们会坐巴士直接从广州机场去往蛇口。他一定会跟着我们，我们坐什么他坐什么。

那我们就"打的"！"打的"价格昂贵，直接从广州坐往深圳

的很少。而且还快，他追不上。好，就这么决定。

飞机刚停稳，我们就站起来。机上旅客也全都站起来取行李，我们一弯身暂时消失在陈国军的视线之外，不顾一切拚命往前拱，惹得周围一片愤怒的谴责。

跟头扑爬滚下扶梯，坐上了机场内的巴士。在焦急的等待中巴士好不容易微微起动，陈国军的身影一跃就跃进了另一头的车门内！犹如蝎子螫了屁股下了巴士再往机场门口窜，三找两找看见了前来接我们的妹夫靖军。

一猛子扎到靖军跟前，抓过他的手把行李票塞给他："快！陈国军在后面！你去取行李，我们走了！"慌乱中看见靖军胡乱地点了两下头，我和晓红拎着包一鼓作气往前疾奔。

陈国军大步流星向我们追来。不好意思跑，只有快走，我们前后三人像在举行竞走比赛。灵机一动我拉着晓红走到了长途巴士前面，陈国军先一步跨上了那时间唯一的一辆去深圳的公共汽车。

他肯定知道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也知道我们一定要等靖军的行李，他肯定也看到了靖军。他料事如神。他知道就算是我们不坐巴士坐火车也会比他更晚到蛇口，总之他会比我们早至少是与我们同时进入我的家中。他甚至在车上还向我招了招手。

压抑住内心的紧张，我拉着晓红往回退了几步，假装向着机场的方向退到了他看不到的死角。踮起脚看到他的后背好像是在买票，转身我们俩撒开脚丫子拚命跑。我们跑向那停在车场的出租车，打开车门一人一个跟头翻进了车厢。"去深圳！蛇口！"气喘吁吁我们俩齐声说。

长途跋涉颠颠簸簸在下午时分总算到了蛇口。我们拎着

大包小包时走时停，心急如焚。实在走不动放下东西站在那里张着嘴哈气，一回头看见了陈国军正雄赳赳赶上来。

跑！又跑！到了家的花园栅栏门口，按门铃。后面的身影越来越近，我们双脚直跳。慢吞吞从花园那头的屋里出来了在我家做饭的厨师三哥，我们俩一起狂呼起来："三哥！开门！快开门！"

终于三哥开了大铁栅栏门，我们两人并成一个卷了进去，翻身锁上了花园，一阵扑腾才进到了客厅中，只听见门铃疯狂奏响，外面陈国军在大喊："妈！妈！快开门！开门！我是陈国军，是我回来了！"

我们当然绝不敢开门。也不能开门。我们之间已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开门让他进来不知又会闹出些什么事来。一家老弱病残，又是春节，再受惊吓怎么得了？

我预感到丢人的事又要在蛇口发生了。

从下午到晚上，陈国军的喊叫声一直在小楼前回荡。绕着我的那幢别墅变着花样使用各种各样的字眼，我惊讶为什么他总是滔滔不绝没发现过有词穷的时候，并且从不哑喉咙。

天渐渐昏黑，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铺一个毯子坐在小院门前，陈国军又唱起了那凝结着我们共同回忆的歌："假如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须臾，口哨声又传来，吹的是我为之呕心沥血我主演主唱他编剧导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主题歌。……

一年一度的大年三十除夕夜已经到了。端起团年的饭碗我心里在想，陈国军怎么办呢？他一定又冷又饿又凄清又寂寞又恼又气又悲惨吧！大过节的到了蛇口被我拒之门外多么可

怜啊。他肯定没有想到，一向在他面前优柔寡断的我能作出这样绝情的举动吧?他父母双亡无妻无子孤身一人，哪怕是普通朋友也该让他进来喝一杯热茶啊。外面雨下个不停看来还会下大，他今天晚上怎么过呢?依他的脾气他肯定会在地上睡一夜，明天一定会患重感冒吧?

又开始揪心裂肺，假装上厕所躲开父母我来到了窗前，想往外看又不忍看还是回到了桌边。我跟刚回来不久的靖军说你出去给他点钱吧，让他去旁边找个旅店住，有话我们第二天再谈。

靖军去了半晌回来了。他说陈国军不去旅店一定要进屋。他还说这是他的家，他竟从未来过，今天必须在家住。我一生气掉头说，那就不理他，咱们吃饭。

饭吃完全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无不心里惶惶。门外窗外陈国军的歌声说话声高一嗓低一嗓。突然听到花园里“咚”的一声响，全家老小都跳起来吓得半死不活。掀开窗帘缝是陈国军来到窗下好像是打开被铺毯子一边听到他在说:“妈，你们过节吧。我今儿就在窗下睡了。”

全家人吓得抱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摁着肚子头上冒冷汗我又得了绞肠痧。站立不住滚倒在沙发上我喘着气对靖军说:“快，快报警。叫警卫来。”

本来一直想家丑千万不要外扬，事已至此纸包不住火只有这一种选择。好在蛇口那群别墅是高级住宅，属于重点保安单位，每夜都有专门的警察巡逻维护住户的安全。

母亲颤抖着双手把电话拨通，上牙下牙一直打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晓红、靖军接过话筒简略报告了情况，大概说，花园里有人跳进来，那进来的是母亲的女婿，可由于有家庭纠

纷，姐姐正在离婚，母亲不欢迎他进来，现在他已强行进来，我们请求警卫帮助我们请他出去。

警卫答应说尽快赶到这里。想到我个人的隐私又在蛇口暴露，不禁羞愧难当。一抬眼看到九十一岁的外婆白发苍苍在那里站立不稳，瘦骨嶙峋的父亲坐在轮椅上瑟瑟颤抖，母亲跑前跑后闩好窗户关严几道门，丹丹吓得哇哇大哭……一家老小为我的婚姻担惊受怕，外婆、父母风烛残年竟受这样的连累，又心疼家里又牵挂外面，真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

十分钟以后警卫果然来了。屏着气不出声，连丹丹也停止了哭泣，全家人凝神听着窗外的动静。模模糊糊不大听得真切，交涉好久之后只听警卫最后说："走，出去，我们去给你找一个住处。"然后就听见脚步声渐远渐轻，最后消失在花园外面。

一瞬间我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我多想立即扑出门去阻止他们，我多想张开双手对陈国军说："进来吧，进来过节，大家快快乐乐地先过个好年。其余的明天再说……"

可是我不能够。我心如刀割。尽管心如刀割我仍然是心如明镜，知道绝不能够那样做。多少次的经验告诉我假如放他进来，肯定又是一场新的恶梦的开始。我恐怖地捂住眼睛。不，这些恶梦不能再重复了。我们之间已不再是朋友。让一切都过去，过去，快快过去！

全家没有听新年钟声，也不再看电视，早早地熄了灯躺在床上。睁大眼睛看着黑暗，海涛声一阵阵回旋在我小小的卧室。

刚才，姜文从北京打了电话来祝全家新年快乐。心烦意

乱一肚子气全撒到他身上，我们大吵了一架。两个家庭的节日都让我一个人给搅了，心里像有几只猫爪子一齐挠我得不到安宁。

陈国军的声音又飘过来："哥们，你怎么这么狠心哪！居然把我赶出来……""哥们，祝你们节日快乐！""你好久没有回家了，好好和全家一起过节吧。不要管我……"又唱起那两首熟悉的歌。

我推醒了晓红。"晓红，你去劝一劝吧，让他去找个宾馆先住下，明天再说。"我央求她。晓红说："不不不，我不敢。""你不敢就更没有人去了。要不我去？还是你去吧。"我推着她说。

晓红迟迟疑疑穿好衣服，出了卧室门去到了二楼的阳台上。"晓红，好久没见了，你好吧？"陈国军热情的声音。晓红说："好。""丹丹好吗？我可想他了。他还记得我吧？"又是陈国军的声音。"好。陈国军，你不要这样……"晓红哭起来了！

堵上耳朵，我不能再听。我的肠子一定会断了。这一切都在陈国军的预料之中吧？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比他更能掌握我心理状态的人了。只不过他万万没有料到我居然会有勇气能硬着心肠，就是在大年三十把他关在了门外！

一夜没有成眠。晓红终于打熬不住，在我身边响起轻轻的鼾声。整整二十多个小时，陈国军唱了又说，说了又唱，唱唱停停，停停说说，屋前屋后来回绕了不知多少遍，直到天已大亮。他总是具有惊人的超乎寻常的毅力。

后来，他的声音停了。有如大病初愈我下得床来，远远地透过落地窗看到陈国军孤零零侧面对着我坐在海边。一股怜悯歉疚又直冲心头。

平日总觉得自己可怜，其实他比我要凄惨十倍，我们是一对天涯沦落人，可就是阴差阳错到不了一处。自从他离婚之后来到北京，他生命的脐带就切断在山海关外，新的生命，新的前途，新的理想，全寄托在我的身上，一生的赌注也都押在了我的手里，我变成了他所有的维系，无论是他认为还是我觉得，我都是他的命根子。

可是现在，我要举起大斧把那命根子连接处一刀剁掉了。我在干什么啊这是？我是一个什么人啦我？我怎么下得了手呢？在这春节全家团聚的日子口？他不和我团聚又和谁去团聚？他不投奔蛇口又投奔哪里呢？我这样落井下石算个什么东西混帐玩意儿啊？“世上最毒妇人心”吧？

唉，这种折磨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大年初一，家里从香港来了好多亲戚。所有男性亲戚轮番出去劝他，没有人劝得动他离开这里。想了好几次请他进来一起吃饭算了！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理智警告我千万别感情用事轻举妄动。一天我都奄奄一息躺在楼上我的卧室里，又羞又急又恼，心又绞痛，我不能也不好意思下楼见客。到了晚上，那揪心揪肺的夜半歌声又开始传来，尽管我困极乏极，仍然清醒异常不能入睡。

这场炼狱之火的煎熬，直到第三天早晨因为一个小小的发现，才告平息。

那天早晨，已经折磨得脱了相的我，下决心与他出去谈谈。只要是不干扰全家，我个人无论如何结局，都心甘情愿。

当我深一脚浅一脚鼓足勇气走到窗前正要掀开窗帘，从窗帘缝里我看到他正拿着照相机，一边整理被褥、毯子在门口

的现场,一边对着那地上的东西拍照!拍了几张又过来再把那地铺弄凌乱一点,打量一番换一个角度又拍了一阵。然后他围着房子,屋前屋后各个角度咔嚓咔嚓了十好几下,猛然间我想到他莫不是又在给香港或大陆的报刊留资料?

震动过后,一股清新的空气贯穿我的全身,我苏醒了。不管他是不是给报纸提供"炮弹",可现在他没有悲痛,没有愤怒,只有计谋。从那一片刻起,我真的感觉到天晴朗了,花红了,草绿了,万物原来还是那样的生机勃勃!

在我后来大量艰苦的与陈国军的财产争夺战中,我消耗尽了存留的最后一丝歉疚。就像牢牢捆绑在身上的铁锁链,一旦砸断,心上的大石头终于全部搬开,我感到海阔天空竟自由。尽管我仍然离不了婚,可是我的心,我的头脑,我的思维,我的灵魂,又属于了自己,本来送给了别人,现在又全部拿回来了。

存在的唯一问题是钱的问题。我给不了钱,因为我给不起钱,我没有钱。暂且不说那全都是我挣的钱。而陈国军认为我是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他一定要分到一半,拿他的话来说就是决不能让属于他的那一半"跟随我落到别的男人手中"。

我需要钱。打官司需要钱,养家糊口需要钱,吃饭穿衣需要钱,离婚更需要钱。我怎么总是需要钱,我是不是无底洞?好像是一个无底洞。我为什么是无底洞?我闹不明白。原来"走穴"觉得自己挣了不得了的钱,居然曾经发愁这辈子怎么才能把它用完,算来算去一共才挣了十万来块钱,税法公布前七万多块钱,税法公布后五万来块钱,上税上了三万多块钱。还剩两万多块钱,加上以前挣的七万多块钱才九万多块钱。

买房子办手续、打官司及保镖费租车费，夯不朗当全给砸进去了。还别提我的那些天文数字的债。

为了钱还得去找钱。没地方找钱只有“走穴”。“走穴”走不了只有——只有拍戏。

还得拍香港出钱制作的戏。

41

为了钱应港方之约拍《大太监李莲英》



《大太监李莲英》就是这样的一部戏。

这部影片的名字原来叫《李莲英》，是香港一家公司要制作的电影。在开拍之前还没有考虑谁演李莲英就来请我扮演慈禧，大概是认为李莲英没有慈禧就不成其为李莲英，慈禧不是刘晓庆演也就不像慈禧吧。

刚开始他们请我的时候我当然拒绝。一是没有时间和心情拍戏，二是因为我刚发表的"息影声明"的纸张尚热，还有比

较重要的一点是我不想再拍清宫戏了。

在过去拍过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西太后》影片中，我已三度扮演过不同年龄阶段的慈禧，简直可以算得上是扮演慈禧的专业户了。慈禧这个角色对我已没有吸引力。何况“喜新厌旧”本来就是我的天性之一。

还且别提那沉甸甸一层套一层的龙袍；且别提那领子上、身上左一根右一根永远也弄不清的佩带领带；且别提那中间高两边空走起来深一步浅一步时常扭伤脚脖子的清式特制高跟鞋；且别提要再蓄出那除了演戏以外什么也干不了的尽可能长的手指甲，还带上重重的金指甲套银指甲套；也别提那脖子上手上头上玎玎珰珰几十斤的项链、耳环、戒指、头饰，就光想想抓住头上的一小撮头发把一大盘花团锦簇的旗头扣在脑瓜子顶上，弄得成片成片的头发不翼而飞，左一块右一块活像得了“斑秃”，因而每天拍戏头疼得如同古代有一种刑法叫“发悬梁”什么的受罪滋味，就足以使我望而却步，裹足不前了。

现在我走笔之时想起那一身“行头”，脑袋仍然一阵阵发痛。慈禧我已演够了。不管人们有没有说东道西，这个形象给人们的印象之深使大家一提起慈禧脑海中出现的就是我坐在宝座上的模样，以至于每次路过北影旁边的国家专利局时看见那大字招牌我就想是否该去申请扮演慈禧的专利了？

再说还没有李翰祥。李大导在拍清宫戏上是一绝，好像没有听说这部影片请了他。也许觉得他太贵了吧。

请我的人若隐若现地暗示我会有较好的“补贴费用”，每当提到此事时我都精神为之一振。可是这个“补贴费用”的具体数目一直没有明确地显示出来，我辛辛苦苦折腾得死去活

来的在三部慈禧影片中塑造的不同年龄层，从而也不同个性不同故事不同阶段的西太后光辉形象，总不能为了那不清不楚的“补贴费”而毁于一旦吧！

尽管我“偷税”，尽管我“离婚”，尽管我在四川与一报纸打官司，尽管我“打观众”，尽管我“和记者吵架”，尽管我这般那般这门那门刘晓庆三个字名扬四海。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还没有哪一个角色被众人嗤之以鼻。我的业余生活虽然是杂七杂八涉及各个领域，可我在工作时间却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兢兢业业出来的活还都说得过去。刘晓庆这三个字要卖，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钱来买呢。

想想那些光芒万丈、牛皮哄哄的时刻？那些在全国各地，只要我出现便会出现的排山倒海奔涌而来的人群？无论我何时何处身在何地只要一演出门票便黑市价飞涨，疯抢一空；在上海我的个人影展上，几千人载歌载舞欢迎我这位冒牌的“元首”；中小学生们慷慨激昂地开展演讲大赛，题目是“关于刘晓庆现象及刘晓庆精神”……

算了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我这只缩头乌龟只有时不时想想当年的威风来长长自己的志气。刘晓庆三个字值钱？你自己觉得值钱还没有人肯买哩。命都快没有了，一个虚名管个屁用？与其像现在这样千人踩万人骂，还不如把臭名扔出去换几个钱花花。

我开始说服姜文来演李莲英。他是质量的保证。在合作上，我们相互之间有无限的信任。

那时我们住在石景山一套租来的房子里。地址电话保密，均不能说。是朋友帮忙，租金便宜，并且付款日期不确定。

每次我们从城里回石景山都经过那著名的长安街，只是那时期长安街上人群如海潮，一浪又是一浪，有许多人静坐示威听说还在绝食。

事过之后我才知道那就是“六四”。可是我这只地老鼠成天畏首畏尾不敢见人根本两耳不闻窗外事。我知道有许多带头人都找过我，要我出来呼吁，他们并不计较我“偷税”的劣迹。可是我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太肮脏龌龊，既怕围观又怕签名更怕捐款，因为无钱可捐，弄不好别人还认为我腰缠万贯只是抠门小气态度不好，把我当成革命对象，我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所以，我根本不敢在天安门停留或是下车观望露面。为躲陈国军我销声匿迹，所有人找不到我的行踪，于是游行示威也没有找到我的行踪，我对“六四”完全没有感受。

我的精力全部集中在说服姜文扮演李莲英上。也许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吧。政治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想当国家主席。就是要当也得当的时候再说。万丈高楼平地起，得先把眼面前的东西张罗好。

我当然首先是告诉姜文有好的“补贴费”。他根本不以为然。我再告诉他假如他演我可以再演一次慈禧。他哼了一声说想得到。我说剧本可以我们自己写，导演可以自己挑。

最后吞吞吐吐说，主要是我需要这个“补贴费”。很需要。

姜文立即有动于衷。他可以为我做一切事。哪怕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在那些艰苦岁月里，姜文一直和我在一起。为了陪我，他从来接新戏都以不离开北京作为第一前提，《春桃》、《本命年》外景内景都在北京。每次都根据我的时间表来安排他的日程。

《红高粱》拍完后影片在柏林影展获得大奖，摄制组红极一时，周游全国风风光光，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与观众见面，可是没有一次能看到主要演员姜文的身影，他正在陪他“目不识丁的相好”青岛、北京两地奔波打官司。

谢晋拍摄《最后的贵族》邀请林青霞主演，一再要求请姜文扮演男主角，并且去美国拍摄，许多演员都打破了头往里挤，连姜文的父母都私下找我谈话，希望我说服姜文去参加，姜文考虑到我在水深火热当中需要支持，毅然决然多次拒绝。

同样的原因他也拒绝了影片《菊豆》的男主角。

到后来，他干脆不拍戏。为了我，他才是真正的息影了。

他的工作根据我的需要安排：他为我在青岛与各种有关部门应酬，每一次都遵照山东习惯喝得多才能证明你讲义气够朋友，姜文总是豁出命去喝酒，回回都喝得瘫倒在桌子底下。

他为了我去义演，奔走全国各地不拿一分钱报酬，为的是答谢那些帮助过我或是对我有用的单位和个人。

他为我请保镖、找汽车，陪着我来回转移，找这个房子找那个房子……

这一次，他又要为我演李莲英。

我知道他一向不喜欢拍古装戏，他怕胶水怕得很厉害。在《芙蓉镇》演秦书田老年时，粘头发用了一点点胶水，他就在化装室里面大叫大嚷。当时我觉得这个男子汉怎么这么娇娇气气的？后来发现他对胶水这东西是真的过敏。

可是李莲英非粘头套不可。还得天天粘，时时粘，月月粘。

我要他先别想那胶水的事。我也不想那服装、旗头等啰

里啰嗦几十斤重量的事。先把影片的主题想好。再把请哪位导演想好。

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谈论这部影片。晚上也不睡觉。我们决定以新的立意来解释李莲英与慈禧的关系。

我们一致通过请田壮壮来作这部影片的导演。

田壮壮是电影圈里俗称“第五代导演”的先驱之一，出生于电影世家。父亲是北影老厂长田方，母亲则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兰，父母亲均在中国电影界卓有成就。田方除了领导北影外，也作为演员拍了《英雄儿女》等著名电影，于兰则是众多脍炙人口的影片如《革命家庭》、《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中的主演。

可以说我是看他们的电影长大的。“龙生龙，凤生凤”，他们的儿子田壮壮如今也龙腾虎跃，占据了中国电影新一代的一席之地。

不管他是第五代第四代还是哪一代，田壮壮具有主意新、观念新、手法新的特点，同时他出生于演员世家，具有驾驭形象、刻画人物、发挥表演的能力，可以弥补其他年轻导演在演员表演上功力的不足，我们认为他能拍好《李莲英》。

去找他。我们找到了他并且一拍即合。我的小狗熊仔参与了我们的讨论。当我们声音越来越大时，它也激动得在桌子底下一个劲地用爪子擦脸。

我们决定剧本由田壮壮和姜文自己来写。我们的“补贴费”也水落石出。几方约好这件事绝密不得外传，免得又节外生枝，数字不小可也不大，正好弥补我当前的亏空。

田壮壮和姜文关在什刹海的一个小小宾馆里闭门思考写剧本，我和熊仔天天去“探监”送饭并乱侃一气。后来把熊仔

留在那里陪他们写剧本，我一个人独来独往。在写剧本的间隙我们又买回了两只小狼狗，一只公狗归田壮壮，他给它取名为“狼仔”，一只母狗归我们，给它取名为“二妞”。因它在我家比熊仔年轻排行老二，又是女性，我们正在拍《李莲英》，慈禧小名叫二妞，为纪念这部影片，于是给那条小母狼狗取了这么个傻傻俏俏的名儿。

我的小狗队伍日益壮大。

在《李莲英》拍摄时我已有了四条狗，持台湾护照没签证偷渡进中国大陆的两只小狗“点点”和“滴滴”也在我们这里安了家。

不知啥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台湾突然红得发紫。台湾民意测验最受欢迎的大陆演员我又是第一名。那阵子仿佛全台湾都在请我拍戏，或是请我访问宝岛。

我把所有台湾、香港的事务交给好朋友吕建民和杨帮忙代理。听说我有一只狗，我也喜欢狗，于是两个小小的“狗大使”偷越国境从台湾来到我家非法居留。

两只小狗一黑一白都是国际名牌。到达时还未看到它们的庐山真面目便看到了一大堆它们的出生证件：什么品种，什么地方，生辰日月，父亲叫什么，母亲叫什么，外祖母外祖父爷爷奶奶叫什么，白纸黑字全写得明明白白。

“点点”刚到达北京时，听到消息，我和姜文便立即赶往它“下榻”的宾馆，与台湾来的朋友勉强寒暄几句便迫不及待地找寻小狗的踪迹。台湾朋友献宝似地从里屋拿出一只小小的笼子，煞有介事庄严隆重地把上面的布帘一掀，乍一眼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仔仔细细来回乱瞧，才发现在那笼子当中有一个小小的黑点，凑近些把鼻子嵌进笼子框格里才发现那小黑点由于天冷在瑟瑟打抖。把鼻子拔出来揉揉眼睛再插进去凝视，才看见那小小的黑点有耳朵有嘴，还有几根横七竖八的胡须，像一个小小的包公。最令人惊奇的是在黑点上有两只圆圆的亮亮的眼睛，一边看着我们一边打着喷嚏，那神态撩拨人的心弦。

把小黑点放进袖子里，我们一溜烟去到了姜文的家。热爱小动物的姜文全家拥上来一迭声地问道："狗呢狗呢？"像变戏法一般，姜文从袖子里抖啊抖的抖出了那小小的黑点，小黑点在桌子上甩甩几根小黑毛，突然一声大叫，四座皆惊。

接下来大家挖空心思为这个小东西取名字，各种馊主意层出不穷。有说叫"蒋匪帮"，大家说难听难听。有说叫"小美龄"，又一声哄说不好不好，这小家伙是男的。然后是"国民党"，"小台湾"……后来我大声喊，你们怎么都跟台湾干上了？现在它是咱们的小狗。结果姜文弟弟姜武说，这小狗真好玩，这么一小点儿，姜文妈妈说，那就叫它"点点"吧！

吵来吵去就这么一锤定了音。于是大家又冲着那小黑狗"点点""点点"一通乱叫乱嚷。"点点"恼羞成怒又突然大叫了几嗓，弄得我们几个庞然大物立即闭了嘴，再也不敢出声。

"滴滴"到来时我们《大太监李莲英》影片已拍了一半，我去飞机场接它时抱到手中活像是一团白绒。这小母东西像一个公主，又娇柔又可爱，还可以任你把它翻过来四脚朝天像抱婴儿似地抱在胳膊弯里。几乎每只狗都不喜欢这样的姿势呆着，可这个小白球肚皮向上毛茸茸的脑袋还若无其事地左右巡视，像检阅队伍的英国王妃。

它的名字得来比较容易。开始我给它取名"妞妞"，因它

是女的，并且貌美如雪，后来还是姜文妈妈说，就跟了“点点”的名字叫“滴滴”吧，我一看那小白球娇滴滴的样子，也觉得这名字再合适不过。

几只小狗在那困难时期都自食其力，不仅如此，还尽量发挥了它们的作用。每只小狗都先后上过电影电视，成为小小的表演出色的艺术家。

“熊仔”参加拍了一部电视剧，只去了两天就带回来五十元的酬劳，除了它自己吃外，还给了其他几个伙伴一些。“滴滴”参加拍了一部广告，在新疆的绿茵草地和沙漠上它纵横奔跑，雪白的小球滚动在绿色与金色的天地之间，它挣回了十好几听罐头，那段时间它吃的是自己劳动所得的口粮。

“点点”则是《大太监李莲英》中的“副主演”，它随时陪伴在慈禧太后身边。在慈禧西逃的马车上，西太后的近景下方出现的便是那功勋演员“点点”来回张望的小黑毛毛脸。

它能记住自己的位置，每一遍表演都不走样。比方说一次拍慈禧伏案挥毫的镜头，点点的位置在桌子的下边。每当姜文扮演的李莲英端茶进来往桌前一跪，“点点”便开始大叫，无论是试戏还是拍摄，每遍如此绝不走样。摄制组人员无不赞叹地说：“到底是明星的狗，训练有素。”有几个人还问我们：“每天都给‘点点’说戏吧？”我们都喜形于色地点头：“啊——啊！”

“二妞”这只小狼狗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随着拍摄的进程它一天天变得威武雄壮，越发高大起来，每次见我时欢呼雀跃，总是一不小心就把我弄到地上。而我穿着靴子牵着“二妞”在街上散步的形象绝对威风凛凛，那模样活像是英姿飒爽的美国西部女郎。

由于“二妞”体魄伟岸，不能随便让它进摄影棚，它就乖乖地在棚外自己游览、散步。好在人人看见它的尊容都屏气倒退绕道而行，不必担心它会像“点点”、“滴滴”那样轻意被别人抱走。

每当我们走出摄影棚，便向着那虚无大喊几声“二妞！”人们听见我们的喊声总是举目四望，想看看那位叫“二妞”这么动人名字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娇柔东西，而“二妞”总是在夕阳中披着万道金光翻越栅栏向我们奔腾而来，它黑头黑嘴气势汹汹，回回都吓得周围一片尖叫声。

“熊仔”、“点点”、“滴滴”现在还和我在一起，“二妞”却去了别处。“二妞”形象不令导演们中意，一直没有戏演，总是闲置在家，由于是狼狗，深怕养不好，一天几次维他命、钙片，我费尽了心思。它食量惊人，没有一顿好像有些微饱，再喂下去我的补贴费会吃光，律师费会吃光，飞机票、火车票都会吃光，我也不能再继续我的官司。

一痛心，一疾首，我们只好把它送给一位爱狗如命并且懂得养狼狗的人，在送“二妞”出去的头一天，姜文捧着它的脸几个小时都热泪纵横。他说：“将来，我们一定，还要养一只狼狗，像‘二妞’一样漂亮的狼狗……”

在“熊仔”的陪伴下剧本终于写完。影片名字定为《大太监李莲英》。打开剧本一看我的戏差不多都是慈禧六十三至七十四岁的老年戏。一边看一边着急，我怎么能演得出来，头皮一阵阵发麻。

过去虽说我喜欢扮演不同类型的角色，可那都是我所熟悉并能掌握的年龄层，只是一种横向的跨越，现在要扮演的角

色不仅是女皇而且年老，是往纵的方向发展，说实话我一点儿也没有把握。

假如角色以年轻时代为主，老年作为点缀，假如是现代人物我有地方去观察捉摸，情况也许会好一些。

可是这个剧本百分之九十都是老年的戏。一开始就是慈禧中年，只有几小段，然后一下子就是六十岁，然后七十岁，再接着就死了。

心急火燎我把姜文骂了一顿，说这写的是什么臭剧本，你简直不为我着想。要是我演砸了，你看着高兴怎么的？

姜文一连串说不碍事不碍事，你能演好能演好。我说狗屁狗屁狗屁，别放狗屁。

我说这个角色应该请个老演员来演，或是等我老了再来演。姜文说那才真是狗屁，现在就是它了，硬着头皮你就上吧。你不是吹牛说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吗？

我说别说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就是全世界最棒的演员也要懂得"藏拙"吧。"藏拙"是什么你懂吗？就是不要暴露弱点。每个人都有弱点。没有人是万能的。不要顾头不顾腚。

姜文说能行能行。真的你能行，我了解。我说你了解个空气！要真了解才不会胡写乱写那演员能力达不到的剧本。这时电话铃响。

抓起电话田壮壮通知我们去试妆。

《大太监李莲英》从开拍前到拍摄结束我一直都在试妆。三四十岁的慈禧不用试，看《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照葫芦画瓢就行了。老年的慈禧可是把我折腾惨了。

试了六十岁试七十岁。试了七十岁试病妆。试了病妆试

临死前回光返照七十四岁的妆。从脸上到心灵、从里到外我痛苦不堪。

拍摄《李莲英》时我们住在姜文父母家，全家人随着我们乱七八糟的作息制度忙得团团转。

刚开拍时演年轻的慈禧，好日子很快过去。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我每天在脸上刷满胶水，绷着皮肤用吹风机把胶水吹干，在胶水干后再用手把皮肤推出一道道皱纹，满脑袋的头发根据剧情需要染成花白色或是白色，到最后我将眉毛、睫毛都剃掉了。

我把自己吃得胖胖的。在服装里面穿上羽绒衣、毛衣，造成老年臃肿的体态，连脖子上都吹满了乳胶，叮嘱摄影师从下往上仰拍，我再稍稍一抬下巴，脖子上便出现几根老年筋。

剃掉眉毛后效果非常好。没有了浓浓的眉毛，我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剃掉眉毛后再画上两根细细的弯眉，很有一番老年人修饰后的感觉。再涂上深红的浓浓的唇膏，并把它画成清式小嘴，样片出来后确实能够认可。许多人进摄影棚参观，找了好一阵都没有把我认出来。

姜文与我相反，拿我的话来说他是“自来旧”，从来就没有过年轻时代。在戏剧学院当学生时他就尽演父亲或是爷爷，在这部影片里他演老年根本就不用化装。

可是他演青年李莲英却比我费事多了。又粘眉毛又贴双眼皮又画红嘴唇还上粉底膏，拍近景时镜头还加了纱才整了个八九不离十，别看这么麻烦，青年李莲英在影片中却只有短短的一小段戏。演李莲英最老的时候他也效仿我剃掉了眉毛，我问他大家感觉怎么样？他说没有人看出来他有什么变化。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已经很多次得到了证明。那次我们去凌子风导演家作客，我刚一进门凌子风就大叫一声：“啊！真难看！”可是他没有说姜文。尽管他也刚剃了眉毛。他和夫人都没有发现他也存在眉毛的问题。

我时常笑话姜文的眉毛和熊仔的眉毛一样。熊仔也是隐隐约约好像有两根眉毛在眼睛上边。他们俩的眉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能用眼睛看，只能朝着脸上那个位置去猜。

原来以为演比自己年轻的角色难，现在才知道演比自己年龄大的角色更难。尤其是那角色年纪大得多并且是女皇，就难而又难。

我时常在摄影棚突然间丧失一切自信，经过层层化装后的老脸下包含着的是一颗跳跃、虚弱、不安分、不沉稳的心，这颗心时不时显现在脸上，使我的那些皱纹组合成一只滑稽的猫咪。

创作的过程成了一种痛苦。在开拍前我往往不敢试戏，小声小气囫囵地走一下地位给灯光师摄影师，然后就藏头缩尾地坐在旁边。

我怕田壮壮或是姜文给我提意见，因为我知道自己黔驴技穷只有一招，很难有什么新的突破以及改变。

只有当那摄影机转动后的马达轰鸣才能使我彻底解脱出来。尽管我坐在金碧辉煌的宝座上，或是在即将跨出去的帘子后面心神不定，空虚得背上直出冷汗，可是只要那“预备——开始”的话音一落，我就变得英勇无比，判若两人，把我脑海里演绎过无数遍的形象、动作、声音再现出来，镜头上记录下的是那自信、慈祥、伟大、悲凉、垂暮之年的西太后。

我想起过去曾看到过的一本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的自传。她写到平时自己是羞怯而不自信的，只有当正式开拍时才能收放自如并游刃有余，我一直对这一点不理解。根据我过去拍摄三十部影片的经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景，总是在接到剧本后作案头工作时就开始慢慢将自己融化成要扮演的那个角色，然后把变好了的自己放到银幕上。

现在我觉得索菲亚说的也不无道理。这种过去认为不会有的奇特现象如今就在我的身上发生。我甚至感谢那时候摄影机的马达居然会"轰鸣"，至少我的耳朵里听起来是轰鸣，假如像现在的潘拉维辛或是拍电视的摄像机静悄悄的没有声音，岂不是情况会一塌糊涂，我一定彻底完蛋。

还有那每天在化装室里难以忍受的不异于蚕蛾咬破了蚕茧挣脱出来的痛苦蜕变过程。看着镜子中自己由年轻逐渐变丑变老，脑海中浮现出不知多少次一位法国作家说过的话："老比死更可怕。"

我体会到一个女人对丑与老是多么地恐惧。尽管我知道那只是化装，尽管我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的，可是在那漫长的半年多拍摄时间当中，我已把自己当成了那丑的老女皇，我的心态行为已完全与她融为一体，我进入了老年阶层。我与老人们谈论保养、心血管卫生以及如何防止老年痴呆、儿子孙子就业、上学、恋爱，孝不孝顺父母等问题，谈得津津有味，看到组里的年轻演员，尤其是身边成天陪伴我的小宫女、小太监们，时常对他们啰里巴嗦地谆谆教导，已是一个真的好外婆。

透过没睫毛没眉毛秃头秃脸的老眼，看到那丝丝渗进摄影棚的阳光，我又无数次地想起那句著名的台词："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在一天天的拍摄中，我曾失去了自信，后来又逐渐恢复了自信，随着一张张日历翻过，我身心都变成了一个真的老人。每天拍摄结束与姜文回到他父母家，我头发花白、步履踉跄、动作缓慢、满脸满脖子的皱纹，简直是姜文弟弟妹妹的老祖母。

“老祖母”和“老爷爷”时常在饭桌上讨论第二天要拍的戏，一次为拍一场戏，慈禧是浇花好还是在打扮梳妆更好，我和姜文又争吵不休。正吵得不亦乐乎时，姜文妈妈突然说："舞剑！"我们停了两秒钟，一场大笑之后，老慈禧舞剑的精彩片断于是诞生。

姜文妈妈在我看来简直是天才。她时常妙语连珠把我们震得目瞪口呆。她的艺术感觉好得以至于每当她看过我们的影片时，哪个镜头长了，哪个镜头短了，说得之准确，弄得我们心服口服。

一次我们给小狗“点点”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点点”沐浴在阳光里，阳光透过它横七竖八的毛发渗透过来，“点点”的黑眼睛黑鼻子点缀在那丝丝金线当中，由于照片实在太好，大家议论个不停，七嘴八舌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到点子上。这时姜文妈妈拿过照片看了一会儿说："点点像一朵花。"

姜文拍完《红高粱》后，音像公司请他录了一盒录音带，唱的就是《红高粱》的那首《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姜文录音时掏心掏肺，跺脚裂嘴，满头大汗，皮带都松了，裤子都要垮了，唱完后当然嗓子也全哑了。拿回家把磁带给全家人一放，那撕肝裂胆的气氛绝对把我们给唬住了。

所有人都专心地听着。唱到最后结束句，姜文一声

"哎……!"大家一起鼓掌。这时候姜文妈妈说:"好了,这下子拉屎拉出来了。"

《大太监李莲英》的样片愈来愈接近理想。惯于充当预言家的我已多次跟田壮壮和姜文说过:"快做好领奖的衣服,量好上领奖台的步子,练好得奖后要讲的那句话的英文,不然来不及了!"

他们笑了,没有答腔。后来在去香港时我看见他们一人买了一套西服。当然,如我所预言的那样,这两套衣服半年以后在柏林电影节派上了用场。

《大太监李莲英》获得第四十三届柏林电影节特别大奖,我由于没有准备,上台时穿的是在法国借的服装。田壮壮也没有听我的话准备好领奖的英文,上台后用中文讲了句"谢谢"便一溜烟跑下了台。

《大太监李莲英》拍完后我变得臃肿、迟缓、死气沉沉。这种状态至少半年以后才逐渐恢复过来。

八个月以后我身材苗条、朝气蓬勃、容光焕发、青春活泼地出现在柏林影展的奖台上,令所有看过"李莲英"的评委及到会参加者们大吃一惊。

几个记者凑近我的脸看,仔细研究,一位西班牙的记者对我说,他不明白为何在银幕上特写镜头慈禧的形象都是那样的苍老,而现在这么近看我,仍然是非常年轻。

他可能寻思我是作了整容手术,当然我没有。我想说,因为我是最好的演员,可是我没说。

拍摄《大太监李莲英》的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封闭在摄影棚小小的天地里与世隔绝,一切仿佛都停滞了。

横下一条心拍戏，不管它外面天地怎么翻覆，反而心里静了许多。虽说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但远比耳聪目明消息灵通好受不少。

与四川记者的官司还没有结果，青岛检察院将材料退给税务局后也一直泥牛入海没有声音，据说报纸为我“打观众”、“与记者吵架”一通热闹，最近又登出“为看刘晓庆，死了一条命”的文章，据说我在××地演出拥挤，一观众爬墙上房结果不幸跌下楼摔死。

我不看报纸，不听任何小道消息，当然也包括所有大道消息。每当在摄影棚一有报纸拿进来我就像躲霍乱那样逃得远远的，并且把自己藏在摄影棚的旮旯充耳不闻他们互相议论报纸内容的声音。

当然杜绝不了律师时常来找我。我“老脸老嘴”花白着头发，脖子上手上青筋暴露，匆匆处理完要解决的问题，律师们就走，除此以外一切来访者全交待好摄制组制片一律挡驾。

最奇怪的是陈国军居然一直没有来。也许他来过，组里没有人告诉我？我们拍内景全在北影摄影棚，天天进进出出，刚开始我紧张得要命，一边拍戏一边时不时看着周围那些晃动的身影，好几次也头昏眼花看错了人，把自己吓了个半死不活。

可一直到拍片结束也没有任何“恶性事件”发生。是不是因为中级法院已经判决我们离婚，目前他上诉到高院只是为了财产纠纷心境不一样了？是不是因为姜文一直和我在一起毕竟有所不方便投鼠忌器？还是知道我已成长并且一定会有所防范就是来也不会达到任何目的反而闹个一身腥？

总而言之，在那个时期是相对而言较为平静的时期。尽

管我仍然背负着三个大的官司，尽管前途吉凶仍然未卜，尽管耻辱的红字仍然悬在头顶，我还是像一只蜗牛，虽然带着所有的沉重但却能缓慢地向前爬行。

一大堆律师在某一天成群结队突然来到摄影棚把我从老太后的昏睡中唤醒，青岛税务局要我立即去一趟，申报个人所得税。

如同一声霹雳震响，我的老眼一下子睁大了。带着满头白发及全身上下的丁零当啷“呼”的一下从宝座上站起来，急匆匆往台阶下走，忘了穿的是花盆底鞋，一脚踩空了绊倒在丹墀上，三把两把脱下清式高跟鞋甩到旁边，席卷那一大群律师如狂风刮过，我们走到摄影棚的犄角。

情况是青岛税务局非要我亲自去一趟不可。律师已去了四次仍不管用。我说我正在拍戏他们不知道吗？律师说知道他们也不管，偷漏税是头等大事，不去一切后果由我自己负责。

又是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老生常谈了。我负得了责吗？要是什么事情都要我负责，那他们成天在干什么？律师说，已同他们交涉多次，对方意志坚定，只有来找我，情况紧迫刻不容缓务必要立即出发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颓然一屁股坐到地上。心里又打破了五味瓶。原先已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一瞬间又全都反扑了回来。

几年里重复经受过的耻辱、痛苦、焦灼、迷惘、冤屈、怨烦、惊恐、难堪、愤怒，一起涌上了心头。

手在脸前挥了几下仿佛暂时挥去了那无尽的烦恼，定了定神我说：“我去。”

42 税务局申诉 再上青岛去找



我们第六次为同一税案前往青岛。我是去的第二次，律师们则是去的第六次。

两位律师先走两天去打前站，姜文陪我随后出发。

摄制组只有停拍，等着我们的归来。

我的心里已再存不下歉疚。本来应该对摄制组有歉疚，可是我没有力气也没有余地去歉疚。我只奇怪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对我有歉疚？

又坐在飞机上了。我坐了多少次飞机?数也数不清。

我只明白没有钱是不可能这样来回飞的。我又一次想到没有钱绝不可能打这样的官司,绝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去那千万里之遥的税务局去上税。没有钱就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冤沉海底,眼睁睁一步步走向抗税,眼睁睁走向灭亡。

税法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开始实施的。幸好是那年才开始实施。假如在税法实施之前我没有挣到一些钱,假如这次拍《李莲英》没有一些补贴费,那后果又将如何?

停止。不往下想。

这段时间,说实话把这些事都忘了。本来是掩耳盗铃,后来时间一长不知不觉把假象当成了现实。虽然仍顶着耻辱柱,可是只要不去想也能苟且偷生赖活着。这一懈怠我连出国的手续都忘了催办了。

拍《大太监李莲英》之前又托朋友去过公安局,所有的材料均已齐全,只剩下发护照了。朋友交涉过好几次,公安局答复说在报纸上看到我离婚案、税案两案缠身(与四川记者的名誉权案公安局可能还没有看到报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官司未了的公民不得离境。

朋友把中院对我的离婚判决书交给了公安局,当然她没有说陈国军已提出上诉此案又到了高级人民法院,那张判决书其实无效。朋友照我事先面授的机宜,只把判决书在主办人面前大概地晃了一晃,公安局接着说,那我们要看到税务局方面的文件。

出国的事又搅和进了那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这一来,出国一事已成了僵局。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已沉浸在老慈禧晚年的悲凉之中,现实暂时离我遥远,情况并不那么紧迫,何况

在我预料之中，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沮丧。

在律师出发之前我们召开了“战前会议”。会上没有谈国际形势，也没有议论国内形势，不管它形势是大好还是小好还是越来越好，我们单刀直入谈我的税。

大家一致肯定了这段时间来艰苦斗争取得的成果。毕竟青岛检察院因为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又将材料退回了青岛税务局，还是比过去前进了一步。律师们说，此次青岛之行一定要有理、有利、有节，陈述那铁证如山不能辩驳的事实，务必要争取一纸纠正那“偷税十八万、罚款三十六万”的错误裁定。

我似睡非睡地听着大家的发言。我对这些事已经烦透了、腻味透了。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我控诉它们的疲惫，世界怎么这么没劲啊?

律师们谆谆嘱咐我要好好报告，万万不能出差错。青岛税务局等着挑刺，绝不能疏忽上当。我迷迷糊糊地说这点你们就放心吧。这些数字我早已千锤百炼背得滚瓜烂熟，不信要不要我倒过来给你们背一遍?

于是我开始摇头晃脑仿佛在念八股文:“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在四川自贡演出，每场一百元，演出五场，其中三场由体育馆按六场付劳务费，实际收入八百元，缴税二百六十元。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在四川成都演出，每场一百元，演八场，共收入八百元，缴税二百元。二月八日到十四日，在云南昆明演出……”

好了好了。大家一起说。他们相信我的能力。我的记忆力一向惊人。虽然受了多次惊吓有些损伤，但这些生命攸关的数字应该没有问题。何况已有那么多次在重大关键时刻的重复背诵，别说我，恐怕连律师们都会背了。我甚至还背得出

完税后税单的号码呢。我的税单都交给了税务局，我要不把号码记好，万一税务局丢了或是硬说没有还无处可查，怎么办呢？

我发现自己变了。过去为人做事总往好处想，现在遇人遇事先往坏处想。

而经验告诉我现在是对的。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几次躲避陈国军的成功以及告那四川说我偷税上百万元的记者，都是先把情况往坏处想的结果。

过去发现的事都比我想象的要恶劣，现在我至少能保护自己不让事态向更坏的方向大踏步发展。

其实还能怎么大踏步？别说大踏步，再跨一小步就进监狱了。我只不过是在监狱的门外徘徊，我是危若累卵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形势也许就会急转直下，到那个时候没准儿押赴刑场连“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都不许你喊。

律师们说没有那么严重。关键在于你临场的发挥和表现。

我说我哭不了，眼泪早就流干了。再说背那一串数字也不知道该在那儿哭。

大家说不用哭不用哭，只要真挚就可以了。

我说我也放不了电了。现在没眉毛没睫毛老鼻子老脸的电力也没有。再说那税务局是我的头号敌人，就像白毛女见了黄世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谁听说过火眼金睛还带电的？

大家笑了几声又戛然住嘴。这不是笑的时候，离笑的时候还早着哩。

他们说随你吧随你吧。设计好了也没有用。

设计好了是没有用。过去每一次重要场合我都设计周

密，可回回都让我的设计落空。

去他妈的设计个狗屁。

一股火冲上心头。别，千万，千万不能发火。这一次短兵相接，近半年时间交战双方才面对面，我深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闹出那得不偿失的事来。

我只要还我的清白，只要尊重事实。我不想整谁。也不要报仇。我已被诬蔑、陷害整够了。己所不欲，岂施于人？我只要一张纠正的文件。只要那薄薄的一张纸。唉！那生死攸关，我前途、事业以及一切所维系的纸啊！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吧。凝视着远方我在心里说。

我不恨你们，真的不恨你们。我不会报复的。我也没有能力报复。你们不会怕我的，是吧？

你们是为国家效力，我知道我知道。国家有你们这样的工作人员会很欣慰、很欣慰的。为查我的案子你们也吃了不少苦吧？

其实我们之间本来无怨无仇。不是你们专门要和我过不去对不对？一定是告我的匿名信太多了你们就相信了。再说像我这样的“大腕”在税法还没有普及认识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税的问题呢？

你们不知道我已有过一次税的教训了是吧？你们没有想到像我这样的众矢之的早就有人捷足先登，我的狐狸尾巴已经被逮住过一次了。

你们大概以为我这个人狂放不羁、目空一切、不拘小节，殊不知吃一堑长一智正是我所具有的特长呢。之所以留在中国就没有打算成为百万富翁，我才不会为了那区区几个臭钱

而失去我一生光明磊落的品格和坦荡的胸怀，你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

其实你们也是有道理的是吧？我知道有一位“穴头”曾交给你们一份手写的白条，上面写明：“三月五日、五月二十九日、八月十日，×××交刘晓庆二十八万五千元”。

当然这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二十八万五千元因为我不翼而飞了。你们不会无风不起浪的对吧？只不过那确实不是我之所得，你们事先也该问问我啊？

我相信你们肯定来找过我。也许我为了躲陈国军把你们也躲掉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你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阴差阳错命中注定我该挨这一回劫难吧？

可是你们在下裁定之前还是该再找我问一下啊。也许是你们已经觉得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了，没想到半路杀出来我这个程咬金，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吧？可是你们的罚款太多太多了，三十六万谁能付得起啊，还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部付清？你们以为我是印钞票的机器吧？

千万不要听信那些谣传。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假如不是罚款太多我也许就不闹这一场风波了。不行也不行。十八万我也付不起。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认定那二十八万五千是我的钱呢？

不过我也确实是像那个“偷斧子的人”。站在你们的角度一想，我要是税务局也会觉得刘晓庆是偷税犯。不偷税不可能嘛。在税法远远没有普及的今天？

我其实是有没交的税。只不过恰巧不是你们查的那笔巨款。只有零星的几个钱。在一风吹草动的时候我就想办法全部补交了。现在的我绝对堂堂正正，是依法上税的模范，我的

任何帐目都经得起调查。不夸张地说，每一分钱都是税后所得。

查税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教育我们吗？这个目的早达到了。谁还会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的？

现在的状况是我没有偷那十八万的税。这一点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虽然全国上下都不明白，可是你们心里其实比我更明白。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正确的裁定呢？

是不是你们觉得既然事已至此，报纸也登了，如果再改变无异于自己打自己一记耳光下不了这个台呢？要是我就不会在乎这个。不过我理解你们。我不会打翻天印的。我们一起商量出一个办法，大家都体体面面地过去行吗？

也许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勇于承认错误形象才更高大、更雄伟呢。

后天，不，也许明天，我就要和青岛税务局见面了。听说我的案子是市南税务分局在管。又听说主办人是青岛税务局的一位处长。青岛税务局和市南税务局在一个楼办公。

唉呀那不等于是一回事吗？我去申报税会不会记者、群众铺天盖地而来啊？要知道我对这一点怕得要命呢。

临行前再三嘱托律师们务必要将这一点安排好。悄悄地进去，万不可弄出动静来。

想起毛阿敏去税务局交税那份热闹，我的后背就直出冷汗。要也是那样的场合我扭头就走。豁出来抗税到底，大不了就是一条命，脑袋掉了还不是碗大个疤。

再不然就大叫大嚷。该说什么说什么发表我的演说。破罐子破摔图它一个痛快，捎带着把那些记者也骂一顿，最后一定要声泪俱下像戴安娜那样对记者说：“是你们使我痛苦！”

作为精彩的结束。

可是报纸也不会登啊。我这么热闹还不够他们看西洋景呢。还是静静地好。不要出声。把自己包裹起来，申报完了税就走。税务局说不定也不愿意张扬，还不知道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呢。

唉呀，我好累好疲倦啊。真的再没有力气在这个漩涡里挣扎了。你们就可怜可怜我给我那张纸吧。上帝你保佑我吗？

飞机徐徐降落在青岛。

帽子压得低低，对周围的指指点点以及四面八方传来的叽叽喳喳充耳不闻，我一阵风似地出了机场。

律师们同侨办的一位张仁光处长，还有我的朋友贝贝，在机场迎接我。

顾不上与大家打招呼，我飞快地钻进汽车，把头埋在前面座椅的靠垫上，汽车立即起动。

十分钟后，我慢慢把头抬起来。啊，青岛，我又来了。

律师们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来接我的贝贝是大导演凌子风夫人韩兰芳的侄女，《春桃》中我们摄制组的场记，与我和姜文相交很好。青岛侨办的张处长是她的朋友。

为了避免毛阿敏在税务局交税所有记者、摄影机一拥而上的悲剧重演，律师们在我来之前已与青岛税务局，更准确地说是青岛市南税务分局进行了一番交涉。

鉴于我这次来青岛暴露给新闻单位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律师们建议能否选一个中间地带见面。税务局坚持要去税务局申报，不过同意安排在远离市中心的小税务所进行。也表

示可以作好一切保密措施，绝对不向外界透露消息。

时间定得很早，可以在税务所人员上班之前先到达他们的会议室。

具体日期是明天早晨。七点半，青岛市福山税务所。已完全弄清楚了行走的路线。

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由青岛税务局发出了“税务违章案件处理书”，直至五个月之后，被处罚人刘晓庆才被通知前来申报。

一切都颠倒了。

43

在青岛税务所的重要一幕



明天，重要的一幕即将开始。

当晚，我们就住在贝贝的父母家。

贝贝设家宴为我和姜文接风。处在激战前夜，我的心惴惴不安。

贝贝的父亲是青岛著名的牙医。他说，晓庆你怎么不笑啊？我赶快勉强笑了几声。

牙医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你的牙是最好的。

我高兴起来说是吗?有人说过我死了以后我的牙可以送给牙科医院放在橱窗里做标本呢。那我就送给你吧。

牙医说那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了。

我说不见得不见得。也许很快了也说不准。黄泉路上无老少啊。

牙医哈哈大笑。他说上次你们来有人看见就问我,刘晓庆上你家是不是请你看牙?我说晓庆的牙是最好最漂亮的。又问晓庆的税怎么样?我说那都是胡说八道,晓庆没事。

牙医的夫人帮腔,这不,晓庆是没事,我就信这一点。

大家都笑起来。欢快、温馨的气氛弥漫在小屋中。一团东西又升起来堵住了我的喉咙。

啊,这些善良、真诚的人啊。

一夜“孤灯挑尽未成眠”。

清晨,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在律师们的陪同下,我前往福山税务所。

街道上没有行人,只听见车轮在柏油马路上沙沙作响。

好静好静。打开车窗,一阵清新的空气和着细雨扑面而来,不由得深深地好几口呼吸。

几个月来的郁闷仿佛一下子吐出去好多。也许今天会出现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机?

两位承办人已在福山税务所等候。七时半,我们准时到达。

所里人还没有上班,我们是唯一的几个人。

受周围静谧气氛的感染,大家悄悄地点头,握手,双方都没有说一句话,仿佛是多年认识的朋友。

承办人带我们去到二楼会议室，大家坐下。我们三个人他们两个人，各自占据一张长会议桌的一侧。没有人为我们互相介绍。

强作镇定我坐在屋子中央，眼珠子在对面两位的脸上滚来滚去。

不用介绍我就知道在我正前方年长的一位是张处长，旁边那位年轻的大概就是他的助手了。

窗外雨点仿佛大起来了。敲打在窗棂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没有人说话。

少顷，钟摆的声音又开始传来，与雨点的“滴答”形成了和谐的二重唱。

张处长划火柴点烟。我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抖得很厉害，抖了好几下也没有把火接触到那支烟上。

我突然心疼起他来。这么大年纪为革命为党工作兢兢业业这是为什么？为我这个黄毛丫头闹出这么大动静他也不好受吧？我们这是何苦来啊？

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上前去帮他点烟的冲动。

“今天，是刘晓庆申报收入和纳税情况，你们律师没有必要在场。”突然一声惊雷击碎了宁静，处长冷冷地说。

我抬头诧异地看着他。

申报还未开始先对律师下了逐客令，处长的话实在是出人意料。

律师们几天来一直与处长面谈或是通话好多次，也告诉他律师是要陪同前来申报的。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反面意见或是表示不同意，这下子临时变化是什么意思？

我赶紧看我的两位律师。

两位律师就像没有听见一样。

我换了一个姿势。我的椅子不安地嘎嘎作响。

处长提高了嗓门。我在椅子上不由得一跳。

“你们是不是可以离开,让刘晓庆抓紧时间申报。”

处长的声音如雷贯耳。

卢光耀和田福祥露出了愠色。

一股火药味扑过来。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刘晓庆的代理人。刘晓庆申报,作为代理人我们当然要在场。”卢光耀也大声说。

“我们是让刘晓庆申报,你们在场毫无意义。”税务官以更大的声音说。

“这是法律赋予刘晓庆的权利。依照法律规定,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是任何人不能阻止的。我们在场并不影响你们听刘晓庆申报。”律师又说。

我的头扭来甩去成了拨浪鼓。此时此刻我变成了配角。我的妈呀,事态怎么这么严重啊?

“刘晓庆申报是她个人的事,与你们律师没关系。”税务官毫不退让。声音越来越大。

“刘晓庆申报确是她个人的事,但申报中会涉及到许多法律问题,这对刘晓庆来讲则是生疏的,她未必了解和熟悉有关的法律规定。也正因为如此,她才委托律师代理,请律师为她提供法律帮助,我们律师也是有责任为她提供法律帮助的。应当说明,这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同在一个法律的约束之下,想来税务局也是不应当置之不顾吧。”律师们不改初衷,义正辞严拒绝了税务官。

双方代表相持不下，像一声声惊雷炸开。

又双腿一软我差点跪倒在两位律师的脚下。别走，你们千万别走，走了我怎么办啊？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只会背数字，万一出了差错又被抓住把柄那还有个完啊？

我真想爬过去抱那税务官的腿：张处长我求求你求求你吧，我好好申报我马上申报，让我的律师在场可以吗？处长好处长你就同意了吧！

全身没有一点力气，我瘫在椅子上，出不过气来，我感觉自己快要虚脱。

好像有一年那么久吧？远远地传来税务官的声音。

“这样吧，你们可以在场，但刘晓庆申报时不能插话。”

长出了一口气，我开始坐直身子。

“这个要求我们不能接受。”又是律师的声音，“我们是否插话，要依不同的情况来确定。刘晓庆在申报演出收入和缴纳税款时，我们可以不插话；但如果牵涉到法律问题，如哪一笔是偷税或漏税等等法律问题时，我们则必须插话，甚至由我们来交谈。作为代理人，我们不能不对刘晓庆负责，更不能不对法律负责。”

冷场。雷声又隆隆滚来。

“我是前来申报的，我委托了代理人，他们要在法律上为我把关，还是让他们讲话吧？”

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怎么有胆量敢讲话？！大白天来了鬼了！

我把自己给震懵了。我以为是别人在讲话，讲完了才回过神来，原来是自己的嘴在说话。

傻呆呆看着他们，我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我等着那暴

怒的一刻到来。

税务官收回了成命!

雨停了。没有那“滴答”的雨打窗棂的声音。天空也亮了好多。

申报终于开始。

正襟危坐我开始背诵。我背诵的是在北京与几个“穴头”碰过多次并排练过多次,也在重大场合重复交代过多次,随“青岛电视村影视艺术团”一九八八年二月至九月去各地演出的收入及纳税情况明细表:

“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在四川成都演出,每场一百元,演八场,共收入八百元,交税二百元。在成都演出时约好,演员的税款全由艺术团交,所以我这二百元也是艺术团代交的。

“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在四川自贡演出,每场一百元共演出五场,其中三场由体育馆按六场付劳务费。实际收入是八百元交税二百六十元。

“二月八日到十四日,在云南昆明演出,每场劳务费三百元,演十四场,共收入四千二百元。纳税多少我不清楚,‘穴头’告诉我是由主办单位负责代交,至今没有看到税单。

“泸州、天津、保定、南昌……”

我依顺序一一申报,声音清亮,准确明了,数字无误。

我演三十多部电影,背任何台词也没有今天这么流畅过。这可不像背台词背错了可以重来一遍。

偷眼看看税务官。没有任何表情。是不是睡着了?定睛仔细瞅有眼睫毛在眨。

我等待着。律师们等待着。我们等待揭开盖子的一刻。

“你把《西太后》摄制组的二十八万五千元的事说说。”一个冷峻的声音打过来。

终于到了问题的核心!总算,总算正面谈到了这个问题。要是在五个月以前或是五个月当中给我机会和税务官讲清楚这二十八万五千的由来该多好啊。

陡然间唤起我无数的精神。如江河奔泻滔滔不绝我实际上开始控诉几个月来为这二十八万五千所受的种种冤屈。

我说到因为那时正在拍摄香港导演李翰祥的影片《西太后》,而这部影片又是由李导演个人包拍,资金使用非常节约,我说到由于我要去“走穴”,摄制组没有了主演要停拍,于是不同意我参加演出,“穴头”心急火燎于是答应给《西太后》组赔偿费,双方达成协议每天赔五千元。

在我演出期间艺术团如约分三次付给摄制组赔偿费,第一次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赔偿费九万五千元;第二次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付赔偿费八万元;第三次一九八八年八月十日付赔偿费十一万元;三次加起来一共二十八万五千元。

这笔钱自始至终从哪里来去到哪里我一概不清楚。要不是税务局查税我根本不会去研究此事。我不能没有收钱还要掏腰包交税,我肯定交不起税,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说着说着我不由自主叙述起长期以来因为这该死的二十八万五千元我所受的种种屈辱、种种磨难,到末了免不得语气中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哀求。

税务官无动于衷。他们意志坚定,使我第一次看到了如保尔·柯察金那样“钢铁铸成的”人。

我的话尽管波涛滚滚,浪潮汹涌,对他们来说只是一阵小

小的秋风吹过，他们坚如磐石，我动不了他们一根毫毛。

我完全醒过来了，看清了我们是交战的双方。我们实际上已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不是我全军覆没，就是他们彻底认错，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只有事实，只有事实才是唯一的准绳。

我把全世界认可的香港律师楼开具的三张数额一共二十八万五千的收据一一摆在税务官的面前。

我的头脑异常有条理，并且清醒。

事实已一目了然。二十八万五千不是我所得，所以我不该交一分钱的税。他们肯定会追究是谁去送的钱，假如钱是我经手也可以强行认定是我的收入也可以判定我要纳税。

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我娓娓道来，我没有看到过这笔钱，从而根本没有碰过那笔钱。尽管我心里认为，就是我转交的又怎么样？我转交的并不等于是我的，纳个狗屁税。

当然我嘴上没有说。我不再惹麻烦了。我也不再愤怒了。

我知道下一步要谈昆明的问题。果然开始谈昆明的问题。

昆明我与主办单位说好由他们代交税，可我们离开后人走茶凉，当地根本没有办理，所以我没有完税单。这最多是漏税。我首先承认是漏税，可税务官强词夺理说，昆明方面不承认我与他们曾经讲妥过。

律师和我一通据理力争，双方辩得个天昏地暗。

我一边争一边心里明白，我们注定会在昆明问题上失败。一方是国家机器，一方是个人。一方握有强大的权力，一方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小民。

另外，总不能闹来闹去整了差不多一年，花了成千上万人民币，最后我一分钱都没有偷税，税务局也得下台阶。

我乖乖地住了口。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位律师也不约而同住了口。

第一次申报在表面看来双方在不分胜负的局面下宣告结束。

大家握手。第二天上午再继续谈。

回来后我们议论了一番。最后总结为二十八万五千再认定为偷税已是十分尴尬了，但昆明的演出费明明是漏税，肯定会被划为偷税并被处以罚款。

姜文、贝贝和牙医全家都异口同声说简直没有道理。

第二天上午，税务官果然只与我谈昆明。

我没有激情，但思路清晰。发扬我素来伶牙俐齿的作风，再加上占理，我不可能输给对方。

律师随时提供精彩的插言。

当然，无论怎么申辩也无济于事。税务官的坚强意志又一次显露出来。

我又被告知，要查我演出之外的收入。

那就是《红楼梦》、《大太监李莲英》的补助费了。我闪电般地想。

首先是绝不让他查出来。要是万一查出来的话……唉！随他去吧。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步履轻盈。

坐到了座位上系好了安全带竟哼起了小曲，“假如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真要命。怎么哼起了

陈国军的歌。

要换一首歌哼哼一时又想不出来。

空中小姐在过道上循序渐进发报纸。手伸长破天荒地我要了一份。唉!好久没读书没看报了。这下子今天也该了解了解国际国内一派大好形势了。

看了国际版看国内版,看了国内版看体育版。心有余悸眼睛却不由自主往文艺版溜过去,果不其然我的名字又跃在眼前:

“刘晓庆亲自去青岛补交十七万个人调节税。”

44 我在焦灼中等待着



一大群法官和律师在北京等我。

我告四川记者一案，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成都法院李庭长、陈法官已到了北京。

我的离婚案已正式转到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的高审判长和她的助手要找我谈话，了解情况。

那位被我告的记者在四川的辩护律师吴也要与我面晤。

而他的另一位特邀第一诉讼代理人、在江南享有盛名的

大律师曹星和助手任旭荣也由于开亚太地区律师协会年会到达北京，希望能与我接触。

此外，摄影棚在等着我。老慈禧在等着我。

每拍完一个镜头我甩掉花盆底鞋又丁零当啷跑下来与法官们律师们一通侃，一听见“预备 —— 开始”我再进入角色慢吞吞走回宝座继续我的创作，慈禧太后摇摇晃晃一步步从老到死，我也摇摇晃晃一步步从一个法庭到另一个法庭，一个律师到另一个律师，一个官司到另一个官司。

坐着摄制组为我租的天津大发面包车，面包车除了喇叭不响车全身到处乱响，震得耳根子发痛，我见到了名闻遐迩的曹星律师。

曹星律师曾站在我国著名笑星陈佩斯的对立面与陈佩斯打过一场官司，据说是他使得陈佩斯一败涂地从而使他声名大噪。

这次他接受我对方那位四川记者的委托也许对我是一个凶兆。正因如此，争取减少阻力，我接受了蒋律师的建议，并且应曹律师的邀请来见他。

我们约好在另外的地方见面。考虑到曹律师是外地人所以亲自来接他。

拉开嘎嘎乱响的车门，跳下车我对曹律师满面春风：“曹律师，请吧。”

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他当时脸上的惊愕表情。愣了一秒钟，我看看全身，看看后面，想起来也许是自己没有眉毛他觉得奇怪。

干笑了几声我摸了摸眼睛上方，自我解嘲地说：“嗨，演老太婆，把眉毛剃了！”

后来到地方了我才知道他惊愕的是我居然坐天津大发。他原以为海内外闻名的大明星一定有高级轿车，像那张报纸说的："陈国军去法院，衣衫褴褛，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刘晓庆坐着皇冠，穿着皮大衣，怀里抱着小狗，形成鲜明对照。"

外界肯定以为我吃错了药，神经病发作，居然抱着狗上法庭，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其实坐天津大发简直没有什么了不起。比这再破的车我还坐过呢。有车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我把我要讲的话又全部对着曹星和任旭荣二位律师讲了一遍。

这几天见了成都法院的庭长我讲了一遍，庭长的助手我又讲了一遍，那位记者在四川的律师我再讲了一遍，现在，对曹星和任旭荣，我还讲一遍。

连着喝了好几杯水。这真是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啊。

自始至终，曹律师都和善地看着我。他没有插言。虽然我在个别地方动了些微情感，但绝大部分时间我都非常有理智，出现在曹星面前的是一个饱经沧桑，千锤百炼，虽然受尽冤屈但代表的是真理是正义的凛然形象。

曹星被无数铁证如山的事实深深地震撼了。

我再接着说，告记者的官司输赢与否我并不太在意，我只是要通过这个官司给自己提供说话的一席之地，不能再让那些歪曲、诬蔑的言论一手遮天。

曹星律师连连点头。最后我请求他给予我力所能及的帮助。

然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去往那高级人民法院。

再一次与审判长高文俊交谈。谈话的中心依然是与陈国军的财产分割问题。

在中级人民法院作离婚判决时，法院判决我给陈国军五万元，并且住房都给他，陈国军嫌太少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

陈国军精神抖擞上诉状长达二十页，洋洋五千余言的文字，充分证明他对这个官司兴趣盎然。

我则觉得这件事已经没意思透了。只是我拿不出陈国军理想的数字才继续争论，说句心里话，我真恨不得有那足够的钱来给他，以买回我的自由与安宁。

在漫长的拉锯战中，连法院的承办人和蒋律师都觉得案子进行到这会儿实在也是无聊得很，本来是离婚案，结果主题变了，变成了大家共同努力分割我的财产，真是滑稽。

我感觉到我的耐心已一点点消耗殆尽。

我的心又一次跌到低谷。我越来越努力活动出国。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我在焦灼中等待着，乞盼着那税务局通知书的到来。

这边，《大太监李莲英》的拍摄也接近尾声。

我扮演的老慈禧已经安然在李莲英的背上升天。拍摄升天的那场戏时全场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听得见。

老慈禧在老太监的背上晃啊晃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在弥留之中走向天堂。

尽管影片即将结束我才彻底掌握角色如鱼得水，但也为时未晚完成了影片中的光辉篇章。

那一边，台湾方面紧锣密鼓请我拍戏，五次三番几个电视台主管亲往北京，早超过了当年刘玄德三顾茅庐访诸葛。

千挑选万挑选左谈判右谈判，决定了拍摄台湾中华电视

台的四十集连续剧《风华绝代》。

约定好去台湾拍戏。我没有说自己身有三案缠身不能离境，总觉得到时候也许情况会有好转。

由此，我更加急迫地盼着三个官司早日结束。

可是，每一个官司都仿佛陷入了越南战场成了僵局。夜茫茫路茫茫。

45 我终于到了法国巴黎



终于，青岛税务局来了新的通知：

刘晓庆：

经我局调查核实，现将你的有关税务违章问题处理通知如下：

一、经查你在一九八八年二月期间，在云南演出匿报个人收入四千二百元，偷税二千五百二十元；在一九八八

年二月至九月期间，在云南、四川、河北、天津、江西、辽宁、新疆等地演出，匿报工薪收入六百四十五元，偷税三百八十七元。

二、经查你在上述期间，在上述各地演出取得收入，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申报纳税，和由于付款单位代缴个人调节税，未将代缴税款部分计入收入总额计税，共计漏税款七千零四十元五角三分。

三、在我局检查期间，你拒绝申报纳税，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

对于你的上述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做如下处理：

一、补缴偷税款二千九百零七元，并罚款一倍，罚款金额为二千九百零七元。

二、补缴所漏税款七千零四十元五角三分。

三、对拒绝申报纳税之税务违章行为，罚款四千元。

四、上述补缴的税款和罚款共计一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元五角三分，限你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前到我局交清。

此外，关于你在一九八八年二月至九月期间，"赔偿《西太后》摄制组损失费"等问题，另将继续审查。

此通知自下达之日起生效，以前的有关文件与此不一致的以此为准。

对上述处理有争议必须首先按上述决定缴清税款及罚款，然后在十日内，向青岛市税务局申请复议。

抄：市税务局

青岛市税务局市南分局(章)

一九八九年十月四日

一切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昆明的演出果然被定为偷税并且罚以巨款，又限我于十日之内再去青岛税务局缴清。而那二十八万五千元仍然继续审查！

盼星星盼月亮，半年多的艰苦奋斗，换来的是这样一张纸。

短短的几句话，除了立即要交钱以外，把我的一生又都拴在了这个案子里面。

而我知道，所谓的继续调查，是漫无边际的，永无时间限制的搁置。也就是说，“偷税犯”的帽子永远掌握在税务局手里，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你扣上，你甭想乍刺。

这个通知比第一次的通知还要麻烦得多。

因为，我不能再用这个文件去为自己申辩，文件上并没有结论。没有结论的东西是不能推翻的。对方可以说也许结论是对我有利的呢？

多么善于利用文字啊。

我一阵阵地心痛。

我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去往法国。去我妹妹所在的地方。

在中国，我已永远没有了得见天日的一天。我将背负着那沉重的十字架，走我那黑沉沉没有光明的人生之路。

我将如何生存，又将如何做事为人，有何面目在银幕上扮

演英雄人物及纯情形象，怎么能让喜爱我的观众对我信服呢？

过去那么多世界名牌大学请我去读书并提供优厚的奖学金，我没有去。美国许多次邀请我去学者访问或是讲学，我毫无兴趣。富翁富豪追求我希望和我结婚带我去国外，一次次被我断然拒绝。

现在，我要自觉自愿地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去那陌生的地方了。

祖国已不再喜欢我。中国已不再欢迎我。堡垒只有从内部攻破，堡垒已经破了。

长时间没流过的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

我的父母、外婆、丹丹他们又怎么办呢？古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是像我这样的不孝子孙留在中国成天一惊一乍还不如滚得远远的，让老人家眼不见心不烦呢。

外婆今年就该九十二岁了吧？一定要给她老人家过完了生日再走。这一去我不会再见不着外婆的面了吧？别想，不能想。赶快在桌上拍三下，解解霉气。

中国，我是不能呆了。本来是想从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可是这一次我是彻底被打败，被打垮，打得举双手投降了。

想想当初自己纯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赤手空拳还想跟国家机器抗衡，有我的好果子吃？现在不是弄得头破血流摔倒摔痛整了个四仰八叉？

走，走，走！离开这是非之地远远，远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十年过后，我又是一条好汉！

可是，怎么走呢？

我已经知道有官司缠身的中国公民不能离开中国大陆。

而我有三个官司缠身。

和四川记者的官司问题不大，可能公安局并不大清楚具体情况，并且我是原告，主动权在自己手里，可以争取早点结束，实在不行撤诉就是了。

离婚的官司高院还在审理，看来遥遥无期。只有到国外将来挣了钱给陈国军，这个案子才会有了结的一天。不过我已将中院判决的文件提供过给公安局，他们已表示认可，也许这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头痛的还是税案。迟迟不能领护照的原因就是我一直出示不了税务局方面证明我已清白至少交税完毕的文件，而这一个案子才是全国瞩目的。当然，现在已是世界闻名，因为每一张华文报纸全都刊载了。

啊，对了，我去了法国会不会也同样臭名昭著呢？可能会，肯定会。不过还有好多高鼻子绿眼睛的西方人呢。在他们当中我又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

可是在中国人当中这样也不好受啊？

不行，还得有个说头才行。

可是手上的这份税务局的新通知还不如没有。既不能在报纸刊登，也不能给公安局看。除了增加新的税款外，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最多人们认为我动用了上层税务局网开一面不让我立即交钱就是了。

唉，真讨厌。怎么这么讨厌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所以我才不相信算命嘛。别人为我算了多少次命从来没把这些倒霉事算出来。

要是没有那两行“再继续调查”的字就好了。真恨不得把它们抠掉。

抠掉?突然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飞驰而过。

我可不可以把它复印掉?别着急,别慌乱,好好想。

我先把文件在复印机上复一遍,然后把复印的那张纸上的这两行字裁掉,再用胶水将两页纸粘贴好,再复印一遍,就成了!

对,就这么干。你们不仁我也不义。只有不择手段。

马上动手按计划行动。找到一个朋友处,他有复印机。我没有告诉他要复印什么东西,只说想复印剧本,他也根本没问。

我带了《风华绝代》的故事大纲作掩护,只要他不在就赶快干我的秘密活动。瞒着朋友鬼鬼祟祟,毕竟觉得自己不光明正大,不够仗义,不过这年头遇人遇事先往坏处想,再不能轻信别人了。

按我的想法复印了几次,在连接处都有一道黑印,弄来弄去总是弄不干淨,眼看计谋要落空我满脑袋是汗。

后来又想到何不如在复印件上再复印?最后灵机一动拿一张小纸盖在那连接处复印出来再复印它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重重孙子……直到大概是第十八代孙,成功了!

拿着那不理直气壮的纸张,我的手微微颤抖。小心翼翼把几份“成功者”放在包中开始给公安局及几家报社打电话。

联络好后我立即出发去送文件。我清晰地从记者朋友杨洁的脸上读到为我终于洗去冤屈的欣喜。

我又拜托律师对那税务局的文件提出异议。昆明的演出费是漏税不是偷税,仍然要据理力争。

还送去了律师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及提请复议必须

先交的一万多元罚款。这样,我的律师将会第七次,我希望是最后一次前往青岛。

然后我静静地等着。

第二天,我就去公安局拿到了护照。

第三天,报纸登出了税务局重新改变裁定的文件。内容全文照登,是那份我加工过的通知。长长地,长长地,我出了一口大气。

与此同时,《青岛日报》以醒目标题《刘晓庆偷税案并未水落石出》发表了青岛市税务局负责人的讲话,其中强调此案并非像那些"失实报道说的那样'真相大白'"。

不过这不足为虑。目前登载我加工过的通知的报纸已遍布全国,势如破竹,《青岛日报》的小小呼声已不能扭转舆论的航向,我和税务局的位置已经颠倒了。

杨洁来找过我。在报纸登出那份新通知的当天,她就看到了青岛税务局传来的真文件。她知道我做了什么。面对杨洁我很惭愧。但她说了一句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忘怀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

与四川记者的官司已有了眉目。律师打来电话希望我能与那位记者调解。我说可以。我只要正名不要整人,我已被人整够了。只要他不再这样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将来再危害别的演员或是别的公民,有了教训就行了。不要坐在屋里异想天开墙倒众人推故作惊人之语,以使自己的文章引起注意,不要认为名人强大,其实我们演员最可怜,没有后台,谁都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就像那没有皮肤裸露着的红翻翻的鲜肉,苍蝇蚊子随便叮咬,而偏又招惹苍蝇蚊子叮咬。要知道许多演员没有我这样的能力、时间、精力去维护自己打官司,不要为

了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利益，半夜吃桃子专捡软的欺，随便伤害人，不要踩着别人往上爬。

律师们说这个官司打得异常艰辛。整个案子我都没有出面，全由我的律师代理。

曹星律师在这个案子中完全站在同情我的一边。他作为对方的律师在中间周旋，作了大量的调解工作。案子结束时曹律师心力交瘁，他说太难了，做些事情太难了。他每到夜晚常常失眠，晨起便看到一把把脱落的头发。

在成都新闻界举办的宴会上，曹律师竟流着泪伤感地说，打官司太累了，并表示说这是他接的最后一个案子，这位大律师公开宣布从此退出诉讼。

曹律师没有失言。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亲手参与过任何官司，他在我的案子中伤透了心。

离婚案没有进展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我已失去了一切兴趣。成日价分财产分东西分这分那，我感觉加入了那俗不可耐的小市民行列。

我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我不管它。世界上只有结不成的婚，没有离不成的婚。

刻不容缓，我去了法国大使馆，不费吹灰之力办了签证。

然后设宴与所有老朋友、新朋友，以及在我的众多纠纷中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们话别。

谁也不知道我的用意是什么。只猜得出是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那天我喝醉了。在醉意朦胧中，我的眼含着泪花，心里在默默地说：别了，朋友们，别了，北京。

最后，我前往深圳，去到我爸爸、妈妈、外婆、丹丹，我全部

的亲人所在的地方。

“穴头”们，“穴友”们知道我即将出国，都自费赶到蛇口来为我送行。

本是来自四面八方，为挣钱这个目标走到一起，可现在经历了共同的暴风骤雨，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还有姜文，还有“滴滴”，我最心爱的小狗也代表“熊仔”和“点点”到了蛇口与我告别。

父母亲知道我要出国，什么也没有说。相反，他们默默地点头，并且叮嘱我千万不要轻易回来。

望着全家老弱病残，我心里一阵酸楚，妹妹走了，我也走了，父母、外婆风烛残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啊？

我再一次亲手给外婆洗头发，剪头发，洗澡，洗脚，剪手指甲，剪脚趾甲，我每时每刻在父母身边与他们聊天拉家常，回忆小时候怎么淘气的故事，我亲自送丹丹去他所在的学校。……

最让我放心不下的还是外婆。她已九十二岁高龄了。

我为外婆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会。我要让她和最喜爱的外孙女在一起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度过九十二岁的生日。

我买了九十二根蜡烛，一个硕大的蛋糕，我要把九十二根蜡烛一根不少全部插到蛋糕上。我光是插蜡烛就整整用去了二十分钟。

在把九十二根蜡烛都插好并且数了好几遍确定数字无误以后，我带领丹丹还有表兄、表妹们一起，拚命地拍着手大唱生日歌，把外婆从楼上扶下来。在蜡烛的冉冉火光中，我看到了外婆开心的笑脸，当我们一起用力替外婆吹灭那九十二根蜡烛时，我感到同亲人们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

可是，我要离开他们走了。

千般嘱咐万般叮咛，母亲、丹丹、姜文、“滴滴”，还有“穴头”、“穴员”们一大群，前呼后拥送我来到了深圳罗湖海关。

海关的工作人员一看是大明星来临，破格允许大家送我到香港海关的入口。

在深圳海关和香港海关中间有一片小小地带。过了那小小地带再上台阶就到达了香港的管辖地盘。我将在香港转飞机去到那目的地法国巴黎。

我往前走、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事到如今我只有也必须往前走。在上台阶时回头一望，我的眼睛为他们拍了一张永恒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每个人都在招手，母亲飘扬的白发和“滴滴”努力挣脱人的胳膊要向我扑来的小白身躯相映成画。我带走了照片，而底片却锁在心中。锁在那深深的、厚厚的、大大的、永恒记忆的心灵保密柜里……

在香港逗留了一个星期，我到了法国巴黎。

46

在巴黎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巴黎，全世界人人都向往的花都。

如同心被揪去了大大的一块，我感到凄清，悲凉，身体空荡荡的。

像是从地球上一下子到了月球，失去了重心在飘浮、飘浮，却又茫然不知飘向何处。

没有了税务局，也没有了法官，也没有了追踪我的报纸，也没有了律师，也远离了官司，同时我也没有了亲人，没有了

家，没有工作，没有自己的住处，没有语言，没有我熟悉的一切，整日无所事事。

东游西逛在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枫丹白露城堡、塞纳河，总觉得再伟大再光辉灿烂富丽堂皇不是自己的家。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话浮现在脑海中究竟多少回？

我想念我的“狗窝”。幽幽的塞纳河恰如我那深切的绵绵不尽的思乡情怀，默默地流淌，流淌，流向远方。

只有小狗，只有法国满大街的小狗偶尔能慰我几分寂寥牵挂的心胸。

到处都看得到“滴滴”，“点点”，巴黎地铁车站的一张广告上的小狗与“滴滴”一模一样娇憨可爱，每次路过那里我都留连忘返，至少要停上十来分钟。

我在街上追逐每一只小狗，与它们玩耍，抚摸它们。而当我叫那些“滴滴”“点点”时，小狗们虽然雀跃，但不是冲着我而是对它们的主人，我才猛醒自己是身在异国他乡。

啊，中国！那充满无数惊涛骇浪带给我重重苦难却又令我丧魂失魄神牵梦萦的祖国啊。

我每天几次给家里、给姜文打电话。在电话里每个人都要轮流说话，并且还要跟小狗们一个个说话，叫它们的名字，以至于每个月电话局的帐单一来都令我和晓红瞠目结舌。

到达巴黎的那一天，晓红来飞机场接我。没有鲜花，没有镁光灯闪动，没有记者访问，没有围观的人群，没有喧闹，晓红一个人迎接孤零零的我一个人。

静悄悄出机场习惯性地去出租车站“打的”。晓红说你以

为是在北京啊?这儿的车费特别贵,我们从来都坐地铁,地铁在巴黎便宜得多。

我点点头于是坐了地铁。反正没有任何人认识我。

在巴黎我最富裕的就是时间。时常一觉睡到中午才醒,醒来后觉得没有什么事做接着再睡。实在睡得太多了睡不着,就打扑克打麻将,再不就买菜做饭。

没有人整我。没有人逼迫我。没有人欺侮我。没有人议论我。可是,也没有人等我——因为,没有人需要我。

我完全被摒弃在那社会之外。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并且坐吃山空。没有地方去挣钱。没有工作给我做,刷厕所洗碗洗盘子领位这些事我又不能做,在那些地方中国人很多,偏只有他们知道我是谁。

原先打算的去台湾拍戏也成了问题。我作为政协委员台湾方面不许进港,更不许拍戏,我与台湾华视签署的拍摄《风华绝代》合同变成了一纸空文。

据说台湾方面为此事闹翻了天。

可是,新闻的主角却在静静的巴黎打牌、作饭、喝酒、聊天。

时不时地与一些中国人聚会,唱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中国歌。

听说国内盛传我偷越国境跑了。我一笑置之。那太远了。

我努力适应法国。睁开眼睛看那些在法国居住的中国人在干什么怎样生活。

在法国,没有人会无代价为你做事。因为每天的时间都

要用来挣钱。连我们去卢浮宫、凡尔赛宫玩，有朋友陪同作翻译，我们为了回报都要适当地给他一些钱。这里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最大目的就是取得法国居留及得到法国护照成为法国公民，以至于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很关心地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办居留。我介绍一个人同你假结婚，或是你给五万法郎(一般是七万法郎)，我为你买一个三个月的居留。"他根本没有问我愿不愿意办居留，因为他所见的中国人，每个人都在办居留。

法国人反移民的情绪越来越严重。除中国人外，阿拉伯人、黑人几乎充斥了法国的街道。

在地铁车厢里，有时放眼一望，几乎一大半都是中国人、阿拉伯人及黑人。一位法国朋友告诉我，在他孩子上学的学校，只有他的孩子一个是法国人。其余全是其他国家的儿童。我的一位中国朋友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法国老太太拿着世界地图质问他说："你们中国那么大，我们法国这么小，为什么你要到我们的国家来住?"

在法国，我们也亲身体会到法国人反感外国移民的情绪。我们住的房子在十七区，是十八世纪的建筑。法国人的居住十分讲究地区，十七区在法国算是高级区，也是好区。

这个地区外国人非常少。自从我们搬来以后，楼下的邻居一直给我们找茬。因为整幢楼只有我们一家外国人，十分突出。

法国法律规定夜里十点半以后不许放音乐、吵闹，每天一到十点我们只要说话她就敲墙。因为是老建筑，楼板十分不隔音，轻轻一动就会有响声。开始我们十分照顾她，只要她一敲墙我们就不说话，只是做手势，连走路有时都四肢着地爬着

走，可是还是不行。

她不许我们上厕所，不许我们接电话，因为我们的电话大部分是从中国或是亚洲打来，由于时差的关系，经常是在半夜。她除了不停地敲墙以外，几乎每天给我们写信，用词十分恶劣。她警告我们说，既然在法国，要懂法国的法律及规矩，还威胁我们，如果我们再发出响声在十点半以后她就要叫警察。

看到她的信我们紧张了好几天，想了好多对策，给我们的律师朋友打电话，请他做好准备，然后每天正襟危坐在家里等她带警察来。结果等了几夜警察也没有来。

后来，她变本加厉了。每天她早晨六点上班，在上班之前先上楼到我们的门口不停地按响我们的门铃，直到我们睡眼惺忪地开门为止。而当我们打开门看见她时，她带着一种报复的笑容对我们说："早上好，先生。早上好，小姐。"

把我们气得要命，真想揍她一顿然后自己早点滚出法国。

由于楼下邻居的骚扰，我们开始变得疑神疑鬼。回想起来，自从搬进这间房子我们就不顺利。

开始去买桌子，挑来挑去挑了一个钟头，看上一张桌子，一问没有货，这是样品，不卖。只有改弦易辙。

又讨论了好半天，选中了另一张，回答说可以卖，但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取货。我们只得又放弃主张，重新在商店里转来转去。勉强又看中了一张，法国人又告诉你没有车送。最后我们只有问他究竟有没有又可以送又可以买的桌子？他想了半天，最后指点给我们一张。横竖没有挑选的余地，我们只好买它。

然后，我们又去买吸尘器，好不容易把买的桌子、吸尘器

及乱七八糟的东西吭哧吭哧弄回来再抬上楼，已是掌灯时分了。

我们又累又饿，决定先弄点东西吃。开了电灯、开了电视、开了台灯，然后去开电炉，炉子却没有电。我们把所有的线路检查了好几遍，查不出任何问题。无奈何只有派一个人去买"比萨"饼来充饥，我们眼巴巴地在屋里等着。突然一个朋友在厨房叫起来："有电了，炉子烫得要命"！结果，"比萨"饼也买回来了。

吃过饭后，我们打开吸尘器，想先打扫房间。可是一看，只有吸尘器的机身，没有吸尘器的杆，这怎么办？根本不能用。于是只好又奔上街去买吸尘器的杆。

买回来往上一套，不对，还缺前面的扫帚，气得我们一边跺脚，一边又冲出去买扫帚。到了商店又不知道扫帚的规格，又跑回来取杆。急匆匆地把杆和扫帚拿回来再往上一对，不行，又少了杆和橡皮管之间连结的拐脖，只得又百米赛跑去买拐脖。

拐脖买回来了。把所有的杆、扫帚、拐脖全连在一起了，可以吸尘了，又发现机身里没有装垃圾的纸袋，于是又上街去买纸袋。

晕头转向地把纸袋装好，电源插上，打开开关，吸尘器终于可以开始工作了，得，吸了还不到两分钟，机身里突然冒出了浓烈的黑烟，吸尘器坏了。我们再也没有半点力气了。大家一摊泥似地坐在地上，抱着头，懊恼得不知怎么解脱。

半晌，我们共同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外国人，肯定是这个房间的幽灵不欢迎我们。大家一古脑儿爬起来，决定向房里的鬼魂求情。我先跪在壁炉的面前，大声说："爷爷奶

奶，我们从中国来，我们都是好孩子，你们接受我们吧！”我感情真挚，突然间不知怎么回事，一股酸楚涌上咽喉，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妹妹晓红也跪在地上，用法文说：“外婆，我们是喜欢您的房子才来住的。看在我们从那么远的中国来的份上，不要生我们的气吧！”我们趴在地上，脑门着地，扎扎实实地叩了三个响头。我看见妹妹晓红想笑，拚命对她摆手。

你们猜怎么着？从那以后，一切事情居然顺利了。第二天，我们从扔掉的吸尘器纸箱的隔层里捡回了全部吸尘器的配件。原来，是我们自己在心慌意乱中把它们扔掉了。

47 在香港涉嫌使用假护照



在法国我逐渐越来越闷，越来越惆怅，也越来越忧郁了。我产生了强烈的欲望离开法国去东方。

我要出去旅游。最熟悉又最想去的地方是香港。

可是，最不好用的护照就是中国护照。

我的香港朋友出钱出力，为我和晓红办了两本多米尼加的护照。

多米尼加是南美的一个小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护照可

以用钱得来。朋友为我们在多米尼加投了资，于是我和晓红拥有了多米尼加国籍。

拿到护照后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签上名、按手印、贴好自己的照片、再复上胶纸，护照上居然还盖上了多米尼加的出境章。天知道多米尼加在什么地方，长的是什么模样？

想到中国的大明星成了多米尼加的公民不由得想要笑出声来。十一亿人的代表在国外旅游居然要借助那小小的远远的国家。

可是多米尼加的护照比中国护照要好用得多，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用签证，而中国护照去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签证而且签不到证。

再者，法国允许双重国籍。两本护照可以同时使用。

在香港，多米尼加护照不用签证可以住一个月。

朋友告诉我用两本护照要小心。我晃晃脑袋想不明白。小心？怎么小心？我多加注意就是了。

兴致勃勃我和晓红订了机票在圣诞节前后前往香港。并计划晓红从香港回深圳与家人团聚过春节，我顺便办一些其他事情，再等她出境一起返回巴黎。

在巴黎机场海关小姐直翻我们的中国护照。上面没有香港签证，她不允许我们上飞机。得意洋洋我们又掏出两本多米尼加护照，小姐的脸上立刻像鲜花开放直说对不起对不起。

香港机场我们异常顺利地通过了海关。刚一过海关我和晓红就高兴得跳了起来，这护照真好用，我们今后可以常常用它！

听说多米尼加是中国禁止使用的八国护照之一，据说这个国家卖护照挣钱声誉很差。不管那么多，去中国不用这本

护照就行了，我反正也回不去。晓红目标不明显，没有那么麻烦。

朋友们在香港机场外等我。一见到他们我飞奔过去连声欢呼。闪光灯、鲜花又连成一片。啊，这里的空气怎么都是那么舒服啊？潮潮的、腥腥的。是从深圳刮过来的海风吧！

还是东方舒服。我是东方人嘛。

转眼间到了圣诞节的前一天，花天酒地之后晓红要回家了。临行前我去送她。在酒店里吃告别饭，姐妹俩相对无言。

一个小时以后晓红会踏上归途，四十分钟就到达深圳，再坐上出租汽车，她就可以暖暖地与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了。

我百感交集。蛇口在我肉眼都能看到的地方，对于我却是咫尺天涯。给家里打了无数次电话，家里人都异口同声要求我千万不要回来。

我无尽地羡慕晓红。她有丈夫有孩子有我这样爱她的姐姐，她还可以回家。

而我似乎在命中注定沦落天涯、飘泊一生。

晓红突然哭了起来。

我扭头看她，百思不得其解。问她为什么？怎么了？她说不出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往铺在腿上的餐巾滚落。

莫名其妙地胡乱安慰了半天，站起来送她上路。

在香港工作的表妹前来接她，她们约好一同过深圳海关。

临分别时晓红问我出香港多米尼加护照会不会有问题？我开怀大笑，告诉她只要切记进中国用中国护照就行了，香港这地方是出去容易进来难。哪有要离开这里还把人抓回来的道理，放心放心放心。

雨过天晴，晓红和表妹说说笑笑离开酒店，看着她们幸福

的背影,一股怅然弥漫了我的全身。

平安夜。香港处处灯光闪烁。著名的东方之珠遍布了节日气氛。

在凯悦酒店,我和朋友们欢聚一起,度过那多少年来不曾有过的宁静、喜庆的圣诞节。

杯盘碗盏的碰撞之间,闪过几下晓红。啊!她现在正和儿子、丈夫、父亲、母亲、外婆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吧?

我们热烈讨论起那购买楼花的事。谈到香港目前楼价飞涨,好多人作楼花转手买卖都发了大财。

我赶紧讲我也买过一批楼花,在××地××区,大家都说我很有眼光,那地方很有前途,过不了多久便可抛出。

我立即拜托一位朋友帮忙管理此事,到时候该抛出给我电话,我来港作文件,把楼花弄出去赚了钱我们俩分。

兴奋之间没有忘了咨询有没有税的问题,答复说炒楼花和炒股票一样属于资产增值,不在上税的范畴。

隐约间好像有"大哥大"在响。"有电话"!喧嚣之中我大声喊。每个人都往身边乱找,一位朋友打开手机,电话铃戛然而止。

我们继续刚才的讨论。我燃烧在那即将呼之就开的阿里巴巴宝藏库大门的热情之中,我差一点就要喊出声来:"芝麻,开门吧!"

朋友在向我说话。是那位接电话的朋友。看她的口形像是在说晓红。晓红肯定到家了向我报平安呢。

一边继续说话,一边接过电话机。"喂?"我喊。

那头传来表妹的声音。她在深圳。在过香港海关的时

候，晓红的护照出了问题，被香港海关扣了。

“什么？怎么会？”我脸色突变。

表妹说她也不知道。她说，快想办法救晓红吧，她太可怜了。

大家都看我。我的脸色一定特别不好。

我飞快地给他们介绍了一下情况，我有些着急。

朋友说不要紧吧。也许问问情况就放出来了。我一想也是。再问多米尼加护照会不会有问题？大家说不会有问题，香港好多人都有，也用，没听说出过什么事。

我还是有些神情恍惚。朋友说，这样吧，我打电话给律师，请他与海关联络，问问情况也好放心。我说那好太好了好极了，我本人不用去吗？

朋友一起说香港是法制社会，什么事都是律师出面，你根本用不着操心。脑海中浮现起在青岛税务局律师被赶一幕，我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稀里糊涂地结束了酒会，晓红没有消息。律师来了电话，电话说晓红被怀疑使用假护照，她自己也承认是买的，并且说是五万法郎买一个，还盖了手印，表示说可以“前堂公证”。

我问什么是“前堂公证”？就是说这绝对是事实不能反口。我说那不是真的，晓红根本不知道护照是怎么来的，她肯定怕事情连累我才胡乱说。

律师说，海关告诉晓红，只要她承认护照是买的，并且盖手印签字就可以帮她。晓红傻乎乎以为是在大陆，只要写个检查就可以蒙混过关。海关第一句就问她你这本护照多少钱买的？晓红随口胡编说了五万法郎，又问她谁为她买的？晓红想绝不能说出姐姐，临时想了一个名字，是法国人，叫咪咪小

姐。

律师说情况不大好，也许会非常严重，香港海关说不定还会查当日进关的电脑，就会把我也查出来，弄不好连我也不能出香港。

我忙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中国大明星使用多米尼加护照简直是奇耻大辱，中国人民不会原谅我，新华社也不会原谅我的。而晓红，她说的全不是真的，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她为了保护我不能说护照是我给她的，又说不出谁给她的只有胡编乱造。

朋友说，在香港没有律师可以什么都不说。香港海关这样做就是欺侮大陆人不懂法律。朋友还说，有一次她有一个官司，律师不在场，问她什么名字，她说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她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她说不知道，全部不知道，别人也无可奈何。

朋友还说，你没看见电影上警察抓犯人当拿枪对着那人犯的脸或胸膛时，首先说："你可以请律师"吗？

朦胧中一想，好像有那么几个镜头是那么回事。

律师说晓红签了字盖了手印，翻起案来非常麻烦。我说，拜托你了，这件事就委托你了，谢谢你，麻烦你，千万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律师说，你放心，我是你朋友的朋友，明天我去移民局会看到晓红，一切情况都会弄清楚。

我说，晓红什么时候能出来？律师说，海关有权可以扣留三天，假如没有太大的问题，三天之后肯定会出来，三天如果出不来事情就大了。

我问事情会有多大？律师说使用假护照根据香港法律要

判刑进监狱十八个月。

带着哭腔我跺脚又问，那怎么办怎么办？律师说，我们可以先把晓红保释出来，一切下一步再说。

律师和朋友讲好，第二天上午晚一点在他的律师楼见面。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上午晚一点儿，我和朋友到了律师的事务所。

朋友熟门熟路几下子就见到了陈昌浩大律师。

陈律师开门见山，告诉我他已见到了晓红。也看到了晓红交代的状纸，她讲得很糟糕。看样子移民局三天后不可能放她出来。她现在拘留所，条件非常差，和那些从国内偷渡到香港被抓住的人关在一起。

可怜巴巴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律师神色不变，从纸盒里抽了一张纸递给我。他对这些事已见惯不惊。我擤了一下鼻涕，假笑了一下，很不好意思。

律师继续说，明天上午法院开庭，可以要求保释晓红。我忙说有希望没有？律师说一半一半。朋友插言说，律师讲话都是不能讲得太满的。

我说我能见到晓红吗？律师说明天上午就可以见到了。不过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这话我没听懂。

律师和朋友都劝我不要去法庭。法庭上有记者发现你了，报纸登出来这事可不得了。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我可以乔装打扮尽量小心不让他们认出来。

争论了几分钟，我坚持非去不可。看我如此固执坚持，他们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我担心晓红不懂事明天又在法庭上胡说八道，律师说，这是香港，已告诉晓红，只需要说三个字

“不认罪”，其余的话律师都会帮她去说。

我又忙问，听说在法庭上你们全用英文，那晓红只会法文不会英文，用中文会不会法官听不懂？律师笑了，说她可以用中文，法庭上有翻译。

接下来谈论需要两个在香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担保。朋友说她可以保，还有另一位朋友也可以保，那位朋友非常乐于助人，一定会帮忙，这一点她可以担保。还讲到大概需要保金二万元。朋友说，她可以负责没有问题。

转眼间到了第二天上午。

早早地我和朋友到了法庭门口。戴眼镜戴帽子还系了一条围巾，怕引起别人注意，我们远远地坐在大厅尽头的咖啡酒吧。

陈律师在与什么人热烈地交谈。大厅里的柱子庄严雄伟，富有法律气息。人们三三两两走进法庭门口，大厅里回荡着的只有皮鞋咯咯的声音。

正点差一分钟，我们悄悄溜进了门内。埋着头找了个位子坐下，脸红筋胀，血管好像要破裂。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的法庭。法庭的格局布置与我在外国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正中央面对我们是法官的座位，一个高大的椅子在桌子后面巍然挺立。法官的座位旁边有一张讲台，大概是翻译或是书记员或是副法官什么的说话的地方。

面对法官的右边有一个拐了弯的通道，四周全围上了密密的栅栏，在那出口处站立着两个凶巴巴的警察，我想那肯定就是人犯出来上庭的地方了。

陈律师已和一大排的人在最前面就座。朋友告诉我，其他人是移民局的官员和他们的律师。

须臾，法官迅速走了出来，坐在那庞大的椅子上。他戴着那法官特有的官帽，胸前有一个白白的围巾，像十几世纪的英国绅士。有没有戴那仿古的假发，由于是近视眼我看不清楚，这时候听见宣布开庭。

所有的话全用的是英文。说得又快又流利还复杂，我根本不可能跟得上他们的步伐。朋友一直给我翻译。只听见大声宣布了一句什么话，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野内，是晓红！她果然从那栅栏围住的窄窄通道里走了出来！

两个警察跟着她。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穿的还是那件在香港我为她挑选的衣服。此情此景此时此刻她太像一个犯人了，而且像的就是那我们在外国电影上常见的犯人。

我的心一阵阵地抽紧。睁大眼睛望着晓红的背影，我的视线都花了。晓红的背影很快和那一格格的栅栏交织成了一片，分不清谁是谁。

只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朦朦胧胧带着浓厚的四川音说的是国语。定神一听是晓红在说："不认罪。"律师事前教了她！整个法庭只有她一个人说国语。法官又问了她一遍，晓红大了些声："不认……"真该死晓红，就三个字，而且生命攸关的三个字都说不好。

这时移民局代表站起来先讲晓红的罪状，朋友一迭声地为我翻译。移民局说晓红身上有两本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不能有双重国籍，并且犯人自己承认是用五万法郎买的，触犯了香港法律第××××条，买护照应判刑十八个月。

我的律师站起来开始说话。他连珠炮般阐述要保释的理由，滔滔不绝。律师大意说，晓红是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她的护照是她的胞姐投资多米尼加为她争取到的名额，使用多米尼加护照是为了旅游方便。况且法国允许双重国籍，香港法律也允许投资移民。

移民局代表大声说，她自己都说是买的护照，并且还供出是法国巴黎一位咪咪小姐教她盖手印、签名、放好照片再复上胶纸，犯人自己说可以在前堂公证。

律师说，多米尼加等国投资移民有过这样的做法，把护照发给投资人由投资人自行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的委托人因为是大陆人，不懂香港法律，不知道前堂公证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律师停了一下，更重要的是她胡说八道是为了保护胞姐，因为她的胞姐是中国大陆非常著名的大明星。

移民局站起来用手指着陈律师的方向说："她的胞姐是谁?"

陈律师说："Refuse(拒绝)。"

此时前面记者席里几个人一齐回过头来。我条件反射往别人身边一闪，可是晚了，记者已看见我了。糟糕!朋友拉我快走，快离开这里，我冒着危险赖在那里要等待最后结果。

移民局又站起来说，既然她胞姐是大明星，轻易拿得出二万元替人犯保释，那么放她出去后谁担保得了她不从香港潜逃到别处?

律师又站起来为晓红辩解。

法官敲了三声锤子，宣布休庭。

最后晓红不允许保释。

我和朋友赶快低着头混在人群中下台阶，一直感觉到脑

门上镁光灯闪闪。我推开朋友，告诉她我们分头出去，因为她是香港名流，不要受我们连累。况且看到她也会猜出我来，基本每次我去香港都和她在一起。从眼角余光中我看到记者们扑向法官的讲台，我知道那里有陈律师的反诉文件，文件中有我的名字。

完了。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一闪。

48 给了我狠狠一击 多米尼加领事馆



第二天早上，全香港的报纸登出："刘晓庆胞妹涉嫌使用假护照被告，法庭正在审理之中。"文章里将案情经过，我去法庭旁听等一干事，写了个明明白白。

朋友直埋怨我不该不听她的话偏要去法庭。我却死猪不怕开水烫，事已至此反倒一脸的坚毅之气。我对晓红不被保释伤心之极，而最关键的是自己也使用了多米尼加护照，万一被扣在了海关，再抓我进去，晓红更救不出来了。

我一口拒绝了朋友让我找香港新华社寻求保护的建议。新华社肯定不会帮助我。中国人民也不会原谅我，在他们心目中“头号偷税犯”呼声未停我又跑去了法国，还违反法律使用多米尼加护照，还被香港海关扣住，简直是奇耻大辱，活该。

我使用多米尼加护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就是自动放弃中国国籍，中国政府在香港的代表也就是新华社，怎么可能出面去保护两个多米尼加公民?别说名不正言不顺，就是他们出面保护不更证明了我们的护照是假护照么?岂不连他们本身也违反了中国公民使用他国护照自动放弃中国国籍的法律?

一时间我对自己使用多米尼加这个护照后悔莫及。我一片好意处心积虑弄来这个东西也害了晓红。现在祸越闯越大看不出有什么好结果，又身在香港，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钱，我走进了死胡同。

而我只能在香港逗留一个月。多米尼加护照最长只能停一个月。

这个案子越闹越大，也许中国会取消我的国籍。我和晓红就变成了多米尼加公民。可是多米尼加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语言出产什么东西有没有电影制片厂，我一无所知。而且鬼才要它的国籍!我，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泱泱大国的电影明星，不，还不是电影明星，是电影皇后，对，是中——国——影后，岂能是那小小弹丸之地的多米尼加人?简直是笑话!

我无比珍惜地掏出中国护照左看右看。可律师告诉我，法律规定用什么护照进关，必须用什么护照出关，至少还得再用一次多米尼加护照才能离开香港。

并且说，如果晓红被认定是假护照，那么我的护照一定在被怀疑之列，会被输入电脑，很可能一出关就被拦截。

朋友说，香港移民局是最厉害的。尤其在“九七”香港即将回归中国前夕，愈加变本加厉，更加仇视中国人。那天她与律师前去拘留所，看晓红和那些偷渡的内地人拉家带口全挤在一块，大人哭孩子闹真是可怜。

朋友还说到一次越南有条船去别的地方路过香港，由于没水了停在香港加水，被移民局认为非法逗留全部扣押了起来，官司打得旷日持久沸沸扬扬，电视台报纸一通转播登载成为头条新闻。那一天法院开庭宣布越南船民无罪释放，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越南人欢天喜地雀跃而出，一迈出法院的大门移民局早就等候在那里，一个个又被手铐铐住乖乖地回到了监狱。

大家都说移民局厉害，惹谁也别惹移民局。在世界各地旅行一定要了解当地法律加倍小心。朋友说她有一个朋友的朋友从某国回香港，他的朋友托他带一包东西给亲人，在路过×国时下飞机办转机手续，结果在他的朋友托带的东西中查出有海洛因，根据当地法律，携带毒品属于犯罪，要枪毙。朋友再三申诉也没有用，于是在异国他乡命丧黄泉。

越听越害怕，我那许久没有的眼泪又奔涌而出。又开始像偷税案时那样连声问，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该做些什么？

律师说，我们可以试试去找一下多米尼加领事馆。你们使用的是多米尼加护照，为维护一个国家的尊严，他们应该提供保护。

我连声说好好好，这个办法好。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出发。

由于报纸上消息传出，关心我的香港朋友日渐增多。有几位朋友自告奋勇与我一起去帮忙出主意壮胆。

拐了一道弯，又拐一道弯，过了一条小街，又过一条小街，迂回曲折，我们终于找到了多米尼加领事馆。

走了一些楼梯，又坐了一阵电梯，过了好几个小门，这才摁响了门铃。半天才听见门响，一个脑袋伸了出来。

律师用英文向他说了半天，才打开门让我们进去。

房间很小，一点儿也不像我见过的那些领事馆。也没有人。只有他一个人。

律师与他在那边桌子上谈话。我们几个坐在这边的沙发上。

原来总领事不在，那人是总领事的丈夫。律师讲述了我们的来由，那位丈夫扭头向我看了一眼。我赶快作出动人的微笑，并且充满了乞求的眼光。希望他能可怜我因此帮助我。

那位丈夫说，他们已收到移民局的信。信中要他们证明晓红的护照是买的或是伪造的。

我们全部坐直了身子。那位丈夫说他们还没有答复。他说可以帮我们的忙，他可以带我们去见总领事。

我心里一下子充满了希望。如果多米尼加领事馆肯帮助我们，那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任何人也不能诬告及怀疑我们的护照了。天高地阔，还是有好心人啊。

我们立即去他家，也就是去总领事的家。

一路按捺着兴奋又来到另一处所在，门一打开我们眼前为之一亮：客厅宽敞、豪华、金碧辉煌，我心里想这位总领事不知道多有钱。几位朋友小声议论说，多米尼加几任领事这

几年靠卖护照，办投资移民，赚了很多香港人的钱，因为香港即将面临“九七”，为寻找出路，不少人手中都有多米尼加的护照。晓红被扣，一方面她是中国大陆人，持多米尼加护照回大陆本身就引起怀疑，另外大概是移民局看她穿着打扮不像是有钱人，于是认为她使用的是伪造的假护照。

正在议论当中，从长长的通道里走出了一位妇人。我们想，这肯定就是那位总领事了。走到面前她满面春风和我们一一握手，乍一看清她的面孔我吓了一跳：说实话，在生活当中我很少看到长相如此难看又身居高位的女人。

赶快摇了几下头，摆脱掉自己头脑中这邪恶的思想认识，眼前的这位妇人无论她漂亮与否，她都可能成为我的救星，她是我的希望所在。她的言行、决定，直接影响到我和晓红的安危。

我们依次坐下。女佣为我们倒上英国式的下午茶。正等待女佣倒完茶退出之前，从屋里跑出来一个身高一米七以上的大小伙子，依依呀呀胡乱叫喊，同样面目狰狞。当那青年人走近时我不由自主往后一缩，我们都看出来他是一位低智商的畸形儿。

此时那位妇人柔声呼唤他。她显然是那位低能儿的母亲。听到妈妈的呼唤，小伙子高高大大地走到妇人身边，妇人整理着他的头发，抚摸他的脸蛋，目光中充满了慈祥的光。

这慈祥的光芒使妇人的脸一下子变得光彩照人。身临绝境的我不禁对这位总领事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与景仰。母爱是多么伟大，我如今亲眼看到。有如此赤诚爱子之心的人，一定是最了不起的人，我坚信她会理解我的心情，对我的困难伸出无私援助之手。

再说这种援助对她来说不费吹灰之力，只是举手之劳。

我看出大家都有与我一样的感受。当那小伙子张牙舞爪狂呼乱喊跑回他的卧室之后，我们在愕然甚至可以说是惊恐之中，一片静寂。

总领事的声音打破了沉默。律师缓过气来开始娓娓而谈。

妇人专心听讲。一边听一边点头，眼睛中继续充满慈爱的光芒。还时不时看我一眼，用清晰的英文说："这位小姐非常漂亮，很漂亮。"

我一边表示感谢，一边不由自主又饱含了那不争气的泪水。总领事的面孔在我眼中此刻是那么光芒四射、那么充满魅力、那么高大、那么圣洁美丽，并且四周萦绕着无数的光环，像圣母玛丽亚。不，她就是圣母玛丽亚。

我扑过去拉着她的手，差一点跪在她的面前。实际上在心里我已经在她面前屈膝跪下了，并且还亲吻了她的手，就像在电影中看到的在神父或是教父面前一样。我眼含泪水不停地用英文说："求求您，求求您！"

她用亲切和蔼的眼光看着我，答应给我帮助。在场的人无不皆大欢喜，松了一口气。兴高采烈我们邀请她与丈夫、儿子今晚共进晚餐，她也欣然答应了。

临走，她要求陈律师单独留下，说是有一些小问题要咨询。我们连连点头，懂事地出了门，大家又向我祝贺了一番。

当晚，我盛装出席在全香港最昂贵的一座大厦的圣诞晚会。兴奋的心情无法言表。我们大家举杯相庆，等着总领事全家的到来。

等了好久没见总领事出场等来了陈律师。陈律师匆匆告诉我们说那位总领事要求给她好处费五万美金，还得在香港以外的第三国交付。她还说，必须收到这笔钱后才开始帮忙，不然就会给移民局回信，证明晓红的护照他们不能认定是真的。

一瞬间圣母玛丽亚的伪装尽数剥去，善良的天使变成了魔鬼。简直是乘人之危！俗话说人不可貌相，现在看起来就是应该貌相，刚开始见她就吓了一跳，现在更是大大地吓一跳。

我和朋友们立即变得紧张异常。律师说，那位总领事故意晚一点来好让我们商量出结果给她一个答复。当然是那令她满意的答复。

我首先说咱们就给她钱怎么样？律师说万不可以。一来钱太高心太黑，另外，根据香港法律使用假护照监禁十八个月，如果贿赂罪判刑十年。你是不是打算进去十年？

我说，要是她不帮助，又有什么别的办法证明多米尼加护照是真的呢？律师说就只有你投资多米尼加的股票了。可是我的护照是别人办的，那位办护照的多米尼加领事早已调走，又到哪里去找股票？律师说，只有去多米尼加让他们开证明了。

我说我去。为了救晓红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律师说，你只身一人去多米尼加凶多吉少，还会遇到数不清的困难，而且最后也许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我说不怕。大不了我与晓红一起去关它十八个月。

律师和朋友们都为我们的姐妹情深所感动。拿大家的话说，妹妹为了掩护姐姐不惜进拘留所胡说八道，姐姐为了救妹妹不顾一切。

大家共同商议好不给那妇人钱，但要想办法稳住她，不让她那么快给移民局回信。另外，律师告诉我先不必着急去多米尼加，看看情况再作下一步打算。

每个人都叮嘱我不要在脸上露出来，要高兴欢快彬彬有礼充满感激之情。我答复说放心，我是最好的演员，为了晓红，我敢上九天揽月，肯下五洋捉鳖，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事。听了我叽里咕噜一堆豪言壮语，大家都面面相觑，没弄懂我说的什么胡话，每个人都以为我大概是一着急神经出了点问题。

然后又共同意识到我必须了解多米尼加的一切，以备万一来临的不测。于是我知道了我投资的是“太阳酒店”，多米尼加使用的是西班牙语，总统叫“俄肯·波罗基阿”。

唉呀真讨厌，连个总统的名字都这么复杂，据说这还不是名字的全部，只是那总统的姓。可是我必须知道并且要熟记在胸。于是我立即“俄肯波罗基阿俄肯波罗基阿俄肯波罗基阿”一直不停地说，像一个尼姑在念经。

正念到热闹处，多米尼加总领事及她的全家满带着节日的笑容向我们走来。我戛然而止静默了不到一秒，立即恢复了平静。大家一拥而上争相表示热情，看得出那妇人及丈夫的脸上有着愉悦及满足。

陈律师趁乱与她耳语，告诉她那件事问题不大，我们正在想办法，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我立即看到那丑陋的脸绽开了笑容。在杯觥交错之中看着她一家人，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她自己如此不幸，却不能怜悯别人的不幸，我仿佛看到是撒旦，不，是撒旦老婆的身影在晃动。

多米尼加领事馆给了我狠狠的一击。在香港的朋友一传十、十传百无一不对我的悲惨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们大

部分都信奉基督教，在他们成群结队作礼拜当中，在他们聚会的“艺人之家”里，专门为我及晓红的平安集体祷告。

我简直不知道香港还这么富有人情味。香港，这在我从小的教育中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大染缸，是人吃人的地方。

我每一次来香港都觉得与香港社会格格不入，对香港人都心存戒心，每次来香港都与记者吵架，甚至在内地，众所周知，我也与去自贡的一位“香港记者”大动干戈吵了一架，差点还打了起来。

可是今天，差不多全香港的艺人、朋友都在为我出主意、出钱、出力、奔波。而且，比许多内地人还要重情得多、热诚得多。

也就是从那一瞬间起，我爱上了香港。

49 为救晓红再请『大庄』



我们再一次商榷保释晓红的问题。准备我们的第二次冲刺。

陈律师开始写“状子”。他奋笔疾书，比我还要激动。他说他写的状子感人至深，简直就是一个剧本。

他说法官同不同意保释只是在那一念之间。官司的双方在十几分钟内阐述完各自的理由，然后由法官凭他的法律知识和良心的天平作出决定。

我问他我们可不可以请法官开个后门?律师说绝对不可以。香港是法制的地方,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上次亚视总裁邱德根吃官司,照样被公正审理,不会有任何宽容。

我心里想,这可和内地不一样。还有不一样的是,在香港一切都由律师处理,讲话也全是律师讲,当事人只说三个字"不认罪"就一切担子交给了律师。在国内什么事都得自己亲力亲为,委托了律师也没有用,上次我与税务局的官司还把律师往外赶哩。

陈律师说这个案子对我们姐妹俩举足轻重。他建议再请一位"大庄"。我问什么是"大庄"?他说就是大律师。我说你不就是大律师吗?他说香港律师分工很细,"大庄"就是专门在庭上辩护的律师,有些场合,只有"大庄"可以讲话,他不可以讲话。

只不过请"大庄"很贵。开庭一次港币十万元。我又吓了一跳,扭头看朋友,朋友说可以可以。我也不知道怎么个可以,反正我是没钱,事到如今别无他法,只好胡乱地跟着点头。

点了几下头后醒过盹来说,那可得请个好"大庄"。陈律师说有一个"大庄"与他合作多年配合默契,建议我们请他。

我们说好吧好吧,一切都听你的。于是出发去见那位"大庄"。

"大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葡萄牙人,长得还算过得去。他不会说国语,只会说英文,还有广东话。律师用英文,朋友用广东话,分别向他介绍情况,我在一旁干坐着,突然悲从中来,又开始珠泪成行。

"大庄"面无表情地听着,顺手递给我几张面巾纸。如同医生见过无数鲜血淋漓的场面一样,"大庄"和陈律师一样,对

我的悲痛见惯不惊。

一想到这里，我赶快止住了哭泣。这时听见“大庄”在说：“这位小姐很漂亮。”这句话我特别熟悉，因为我时常听到，并且那位多米尼加的总领事也是在我五脏俱焚的时候说过。我赶快仰起头习惯性地说了一句“谢谢”，然后心里想，这是什么时候了还能注意我的脸蛋，这个“大庄”也真够浪漫的。

紧接着商量要请两位有名望的保人。郑明明小姐说她算一个。还有一个请谁颇费踌躇，还有谁既有名望又愿意出面担保?想来想去想到了乔洪。

乔洪是香港演艺圈资深老前辈，在许多影片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电影《侠女》我在内地看过，好像他演的是一位神通广大从天上下来的佛爷。他为了救人自己负了伤，最后在光芒万丈中“圆寂”，也就是去世。这个电影我印象很深。我问是不是电影里临死之前肚子流金肠的那位和尚?大家说是。

朋友说乔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向乐于助人，名望也高，他肯定会愿意帮我。

然后律师和“大庄”叽哩咕噜讨论起庭上发挥的具体措辞。

此时已万事俱备，只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我无比牵挂晓红。晓红在里面怎么样?她什么东西都没有带，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吧?

晓红一向脆弱，从来就是我作她的依靠。她的一切都是我来决定：上学、就业、找对象、去法国，除了生孩子是她和我妹夫犯自由主义没有先打报告经我批准以外，其余一切都是我事先为她安排好的。

她老实、本分，我经常骂她墨守成规，不思变革。而我跳跃、活泼，不喜欢循规蹈矩，总要作新的事。所以我们俩的生活线也大相径庭。她拥有我没有的一切，我拥有她所奢求不到的东西。可是我们俩也相互补充，她给我温馨及亲人的爱，我给她丰富及变幻无穷的生活。

我们虽然同母异父，却是真正的血肉相连。

她时常跟着我跑东跑西，像一个忠实的“拖油瓶”。每当她遇事慌张的时候，我就小声告诉她，别怕，有我。每一次确实也都能逢凶化吉。因此，她对我的能力以及我对人对事的判断力有极大的信任。

就连去商店给她买衣服，也全都是由我作主。一进商店她就坐在旁边，也不看也不找，静静地等着我东钻西拱，为她选出一大叠衣服来，然后她再去试衣间一一试穿，穿好后再钻出来给我审查，我点头认可方才付钱。

这一次使用多米尼加护照，也就是她对我无尽信任的结果。

她根本不知道这个护照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用它，她甚至都不知道多米尼加是国家还是一个地区，在此之前她对多米尼加这个名词几乎闻所未闻。

是我告诉她，走，我们去香港。于是她放下学业跟我去香港。我说拿着，这是多米尼加护照，你现在是多米尼加国籍。于是她拿着，只是我们嘻嘻笑了一通，对我们几分钟之间变成多米尼加人觉得十分有趣。

出巴黎海关，进香港海关，都是我一人拿着两本护照在前面答复一切问题，然后她跟着我前进。

她总是这样跟着我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从一个地

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这一次，她走进了拘留所。而且很大的可能要再一步走进监狱。

是我亲手将她推上了法庭。

我为了爱她却害了她。我包办一切，她相信我。在只身一人出香港海关时什么也没有问我，我也没有把“俄肯波罗基阿”什么的教给她，于是她被扣留时不知道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胡言乱语。

我应该想到，可是我没有想到。是我不谨慎不小心粗枝大叶，一手造成了现在不可原谅的过失。

假如她被判刑十八个月然后被遣返回中国，她的学业、她的学历、她的工作、她的前途，她还将被没收中国护照并记录上案底，她不仅再不能进香港，更糟糕的是再不能出国……我都不能往下想。

真想与她交换，进拘留所的是我也比是她要好得多。

一定要救出她来。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要救她首先必须保全自己。要是我们姐妹俩双双进去，那就真的是死路一条，如果非要进去一个，还是我在外面的好。

可是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移民局说不定已将我的资料输入电脑，正张开大网等着捞我这条鱼。

我的资料非常容易查到。只要查与晓红同一时期进港的多米尼加护照就一目了然了。

可是我离港的日期已越来越近。

我曾去找过法国驻香港领事馆。领事馆总领事十分热

情，他有一个中国名字，说得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尊重艺术的法国领事馆对在法国居留的我这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及艺术家的妹妹，表示愿尽一切力量帮助。

在我向他请教如何安全离港的问题时，他曾向我建议采取“政治避难”。他告诉我，如果“政治避难”可以不通过香港海关，直接由他亲自从特殊通道送往他国。我拒绝了。

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祖国对我来说不是陈国军，不是四川那位记者，不是青岛税务局的张处长，而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一亿的人民，是我的父母、外婆，是我的家。

与此相比，我情愿进去关它十八个月。十八个月后出来仍旧是一条好汉，照样能叱咤风云。只是晓红……我绝不能让晓红由于我的疏忽，在监狱里度过那么漫长的岁月。

可是我现在见不到她。移民局不许犯人与家属见面，以免互通信息攻守同盟。据说晓红与那些偷渡的内地人关在一起。只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别的人是偷越国境逃往香港，而晓红则是一门心思要回国，回家。

而香港移民局居然把要回内地去的中国人愣给抓回香港，并且掏费用诉讼，还管吃、管住、管关押。

我不明白移民局什么地方“短路”了。既然要回内地，放她去内地，以后不许进港不就得了？岂不更省心？

我要求过许多次去看望晓红。可从来没有得到批准。陈律师说，两天以后晓红会转移关押地点，在“大榄女子监狱”。女子监狱！啊！这么早就去了监狱了。

律师说不要着急，那是一个中转监狱。是专门关押未定罪的犯人的。

我赶忙问可不可以去看她？答复说，按规定可以一、三、五

上午去，每次探视二十分钟。

律师还给了一张表，表上写明批准带给犯人的东西及品牌名称。还登有允许带的东西的照片，奇怪的是牙膏、牙刷、擦脸油等都规定了只许买一种牌子的产品，由此我想到说不定那牌子的产品就是监狱生产的。

并且还规定全部要照图购买。图上是些软管之类的包装，我想大概是怕犯人自杀。

为买这些东西我跑了整整一天。因为没当过犯人，尤其是从没有当过香港的犯人家属，对这些牌子的产品过去简直闻所未闻。

再没有比买这些东西更难的事了。

所有的朋友都帮忙寻找。这些平日出入精品店名牌店的珠光闪闪的朋友们都跟着我走街串巷，去那“大拍档”“女人街”“男人街”只是佣人们才来的地方。

虽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在需要这些东西的前一天均已齐备。真是铁杵磨成针，只要功夫深啊。

终于，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去“大榄女子监狱”探监的那一天。

50

去香港"大榄女子监狱"探监



听说"大榄女子监狱"非常远。怕错过探视时间,这一天我早早地就起了床。

望着衣橱里东一件西一件的衣服,不知道穿什么好。今日我成了犯人家属去那狱里探监,不知道怎么装扮自己才合适。

郑明明小姐坚持要陪我去。

明明姐是大老板,在香港日理万机,但她执意要陪我去,

盛情难却，我胡乱穿了一件衣服上了她的汽车。

车子在山路上蜿蜒穿行。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来过香港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知道香港也有树木葱茏，也存在没有建筑物看不到人的地方，原以为全香港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呢。

好久好久以后，我们到达了监狱大门前。

“大榄女子监狱”的大铁门洞开，两个站岗的警卫神色严肃。我去了传达室，传达室的职员要我等候。

通融了半天，那职员问我是谁的家属？我说是刘晓红的家属。又问是什么号？什么什么号？啊！想起来了，律师嘱咐过不能说名字要说犯人的编号。

找来找去找了半天报告那职员说是探视 10354。

接着又是一通查对，最后告知我们可以进去。但是车要留在外边。

于是我和明姐提着大包小包，高跟鞋橐橐响着走进监狱的大铁门。

监狱里面真大啊，到处是水泥，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

而且是那么安静。只有我们两人的高跟鞋发出的声音在四周的建筑物中间回荡。

生活总是这样与我开玩笑。过去在国内躲来躲去藏猫猫挣扎着终于站在了那铁窗之外，今日却阴差阳错不知弄拧了哪根筋自己走进了监狱。

爬坡上坎，累得气喘吁吁。这么远啊，晓红，不，10354，怎么关得那么高啊。

汗流浃背，终于到了那要去的铁门边。

铁门牢牢关死，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开着。有零星几人

在排队，我和明姐排在后面。

前面的人当然和我们一样是犯人家属。只不过他们衣着俭朴、色调单一，不像我和明姐，花枝招展像两只正在开屏的孔雀。

很快轮到我们。我递进去在传达室领的卡片，报告说是探望犯人 10354。

里面听不懂。凶巴巴地吼了一声，明姐赶快用广东话翻译给她。

半晌，旁边一个小铁门徐徐打开，我们几个家属鱼贯而入走了进去。

迎面而来是一个狭长的通道，我们的高跟鞋声更响更脆。我多少有点狼狈，转眼看明姐，她尽管也成为犯人家属却泰然自若。

通道的尽头有两个狱卒，全是女的，年龄大约在四十上下。穿着一色一式的衣服，与我想象的狱卒差不多。

狱卒守着一个门框旁边有一个传送带的机器，和飞机场的安检进口一模一样。恍惚间我以为自己又来到了机场，是去北京还是去巴黎?眨眨眼回过神来又重新进入我 10354 家属的角色。

所有的东西都要放在传送带上通过电脑检查。我刚一放进去就被女狱卒把我的包给推了回来。我抬头看她她说了一句什么。听不懂回头看明姐，明姐说她让你把包直放在上面。

那狱卒的脸色不好，说话也不大客气。想了一下反应过来，当然我是犯人家属嘛。不过见多了崇拜的笑脸作惯了明星的我，还是觉得老大不适应。

我还是乖乖地照做了。当我跨过门框时狱卒突然用生硬

的普通话说："你要好好学习广东话啊。"一股火涌上来，我立刻反驳她："我看你倒是该好好学习国语，'九七'快到了。"

转身往前走，我脑海里映出那狱卒铁青的脸。她会不会为此折磨虐待10354?她知道晓红的号码。去他妈的，老子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一辈子也改不了，横下一条心，冲着你这副嘴脸，我也非把晓红救出来不可。

又到了一个地方，是换衣间。我们带的东西已被收去，由监狱交给犯人，我们不能经手。

还要换下我们的衣服，穿上监狱提供的服装。

时间不多，我三把两把换好了等在那里，明姐不用换，再说也没有多的衣服，她也就不进去了。

狱卒一个个叫号。突然明姐推了我一把，定神一听听懂了是在叫"10354"，经过几次印象深刻的重复，我已熟悉这几个广东话说的数目字了，又一次明白了语言是多么需要环境。

走到那门前向里一张望，只听见有人拍了几下手。是晓红！我转眼一看果然是她。她坐在一个小桌边，一个屋里大概有四张小桌。

我奔过去坐在她的对方。小桌一头只能坐一人，我们正好面对面。晓红穿一身浅蓝色的囚服，脸上没有化妆，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用四川话飞快交谈。

晓红说她听陈律师说我的护照也危险，她一夜没睡着。如果我也进去了那一切都完了。

我告诉她我们正在营救她，准备第二次保释。并且安慰她也安慰自己说，要不了一个星期她就可以出去了。

晓红说她在这里没有名字，只叫10354，她时常因为听不

懂广东话被严厉训斥一通。不过她无所谓，反正脸皮厚，要是我进去了这样呼过来喊过去肯定受不了。

我叫她安心坐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体会监狱生活，我和陈律师还有明姐已想了很多办法，肯定能够救她出来。我招招手让她俯耳过来，想跟她说几句悄悄话，狱卒大声宣布时间到。

挣扎着再说了几句什么好好的乖乖的保重的话，就被狱卒赶走。到门口又看晓红一眼，狱卒也正在赶她，那场景犹如生离死别。

那天以后，每到探监的日子必去看晓红，我成了监狱的常客。

每次都是明姐的司机送我去。天热又远，路又不好走，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可明姐的司机一直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他对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司机常常对我说："刘小姐，想开点啊。"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感谢他为我的服务及关切。想了好久终于怯怯地掏出几百元港币要表示我的心意，可他坚持不收一再谢绝。他说，只要晓红小姐平安就好。

这一天，第二次要求保释晓红的开庭时间到了。

陈律师估计到我们这个案子的次序会是在那天上午的第五或是第七，让我和明姐、乔洪在早晨十点钟到达法院。

乔洪对帮助我一事满口答应，已约好十点在庭外见面。

我早早起身，与明姐及几个朋友在一个酒楼喝早茶。

我们集体祷告，愿在天上的圣明的主保佑我们，保佑晓红平安出来。阿门。

划了好多十字。

九点五十分，我们准时到达法庭外。远远地看见陈律师和"大庄"站在那里，可能还没有轮到我们。

乔洪也赶了来。还没有与他打招呼陈律师就手一摊说，完了。完了?什么完了?晴天霹雳，我头一晕。一看我的表情，陈律师脸上春意盎然，告诉我们说，法庭已同意晓红保释，今天下午我就可以见——到——她了!

事情顺利得连两位担保人都没有派上用场。

并且陈律师还见到了移民局请的皇家大律师，那位律师表态说这个案子根本不用打，他要劝说移民局撤诉。

我说为什么?他是移民局的律师呀。他说他也不明白。

我在法庭外跳啊跳啊跳，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又开始到来。

下午，我见到了晓红。

保释出来后，案子又搁置了下来。事情还远远没有完。而我，离境的时间快到了。

情况仍然非常危险。皇家大律师劝说移民局后，移民局非但没有接受，反而更上一层楼，他们一定要把晓红弄进监狱。

而我们，目前没有更多更新的证据和材料可以提供。

陈律师建议我们再请一位皇家大律师来帮忙出庭。因为，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下一次的法庭上，将决定晓红的命运。

不过请皇家大律师更昂贵，出庭一次要港币二十万元。我又是一跳。

那移民局请的也是皇家大律师吧?陈律师说对。移民局可真够出血本的,这次跟我们干上了。

明姐说可以可以。我也点头说可以可以。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才可以。

接下来要认真商量的,是我的出境问题。

我说我不走。我要呆在这里看结果。

律师说不行,你非法逗留,凭这一点就可以抓你。

明姐说你还是要走。走得出去就是好事。你是最重要的。晓红的事交给我们好了。

可是,怎么走呢?

陈律师说,看情况移民局还没有怀疑到你的身上来。也许他们知道你是中国大明星,用的肯定是中国护照,可以请法国领事送你出关。

法国领事有特别证件,能陪你进机场,万一有事,他给我们打电话,陈律师可以立即与移民局交涉。至少不会当日被拘留。

我说好吧,于是给法国领事打电话。法国领事表示很愿意送我出港。

临行前,一一与各位香港朋友告别。

千叮咛万嘱咐,晓红一个人在香港要安心,不要出新的差错。

哪一次离开香港都没有这样恋恋不舍,牵肠挂肚。在告别宴会上,我们戏谑地叫晓红 10354,陈律师说,假如官司打不赢他就是 10355,我说,那我就是 10666 了。

大家问为什么不是 10356 而是 10666?我说 666 图一个顺顺顺的谐音,只希望官司顺利,晓红早日平安回到巴黎。

尽管我们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胜利的踪影。

可是我要风不来风，偏下冰雹，只得离开香港。

走的那一天，朋友们如临大敌。陈律师、明姐都在机场外送我。

我和法国领事走向机场深处。陈律师、明姐及朋友们等在外面直到飞机起飞，以防不测。

过海关时我与法国领事各排一个队。我不时看他，他给我一个鬼脸，让我放心。

结果十分顺利。尽管我紧张得差不多要晕倒在那柜台前，海关查了半天电脑，还是在我的多米尼加护照上盖了章。

我回到了巴黎。

51 我走在巴黎的街头臂戴黑纱，



巴黎，有新的噩耗在等着我。

从大陆传来了消息：我的外婆，两个多月前在蛇口去世了。

立即给母亲拨了长途，证实了消息的准确性。在电话里与母亲大哭大喊，质问她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

母亲说事情来得太急告诉你也赶不上，再说你不能随便回中国，我们严密封锁消息就是不让你知道。我们不要你回

来。

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就是外婆去世的日期。

从小到大，我没有失去过亲人。可是话真的不能说得太满，我亲爱的外婆离开我，走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奶奶，只知道外婆。我是在外婆的怀里滚大的。

啊！外婆，我是多么爱您啊。

外婆，您二十多岁就守寡，一个人带大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带大后，又带我们几个孙子。在您带大的孙子孙女当中，您最喜欢的一个就是我。

我体弱多病还惊人地淘气，每每当我生病的时候，您总是在我身边，而我绝不能忘怀的是我做错了事父母拿出尺子要教训我，您总是挺身上前保护我的动人情景。

还有，我不会忘记您的"偏心眼"。我是您带大的，晓红不是您带大的，理所当然，优点都属于我，缺点都归了晓红。

啊，外婆！您是这样无原则地爱我，当我刚拿起扫帚扫了两下地，您就连声不绝地夸我"勤快"，而晓红尽管从早忙到晚，您总不会忘记教育她要好好向我学习。

您经常趁我妹妹不在时给我吃舅舅、姨妈们给您送的点心，那一次我在秋天没有穿秋衣，您竟心疼得大声地哭了一场。

您慈祥的眼睑下有一颗小痣，小时候我时常摸着那粒痣玩。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小痣开始流脓流水，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皮肤癌。

那一年，我正在四川达县军分区当战士。成都家里发来

了加急电报，说您病了让我速回。我一看到电报说您得了癌症天塌地陷立即哇哇大哭，一直从达县哭到成都。

在医院我一直守候在您的床边，端茶送水倒屎倒尿。我对您的爱创造了奇迹，外婆，您的病居然好了。

外婆，我记得您搬到深圳以后，深圳又炎热又潮湿，您对深圳的气候很不适应。可是您不知道从哪家报纸上看到开冷气会得空调病的消息，说什么也不开冷气，热得满身都是痱子。

我绞尽了脑汁想办法，自己动手编写了一篇文章，内容当然是空调怎么怎么好，开冷气不仅对身体无害，反而有益处等等。我将这篇胡编乱造的文章照报纸规格打好印好，最后再复印一遍，制造出一份伪造的报纸复印件。我把文章给您看，又摇头晃脑地大声将内容念给您听，其效果可想而知，我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外婆，还记得吗?在出国之前，我给您过的九十二岁生日?我一直自豪有您这样一个老寿星的外婆。您头脑清醒，记忆力好，头上甚至没有一根白发，我觉得您至少会活到一百岁。可是，您九十三岁就去世了。外婆，您怎么会，怎么会……您怎么可以现在就走，不同我告别一声?

外婆，从我自力更生开始，就发过不知多少次誓，一定要您不再劳累，不再吃苦，要您安享晚年。我曾告诉自己无数遍：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给您送终。我还想过，假如有这么一天，外婆有了三长两短，哪怕是摄影机正在转动，我上刀山下火海，也会立即飞奔到您的身边。

可是外婆，我再也不能如愿以偿了。我的法国之行为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我为什么要来法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法国?外婆,您为什么这么匆忙就去了?

啊,外婆,我的好外婆,我最亲最亲的外婆,在走之前没有看到我,您遗憾吗?您想我吗?您最疼爱的外孙女在跟您说话呢,您听到了吗?她没有赶回来送您,您不会怪她吧?

我想您了,外婆。您知道吗?您常常回来看我吧。好吗?

啊,外婆,我是这样这样地爱您。

胳膊上戴着黑纱,我走在巴黎的街头。我戴着它参加了戛纳电影节。

我寄托我寄托不尽的哀思。

52

10354案子正式开庭的那一天



回到巴黎以后，我天天打电话到香港，询问晓红的消息。

10355——陈律师发来了传真，告诉我——10666，×月×日10354的案子要正式开庭。

从听到这个消息起，我就紧张万分。吃不下饭也不能睡觉，直到开庭的那一天。

这一天清晨五点我就起身，两眼通红蓬头垢面坐在电话机前。

实际上，我已经作好了晓红进去十八个月的准备。事已至此必须作准备免得措手不及。本来移民局除了告晓红使用假护照还告她中国护照与多米尼加护照个人资料不一致，为解除这一点怀疑，我打电话给家里，也正巧那一天妹夫靖军从四川来电话，于是得知要他火速在公安局办理正式公证文件，并且要在两天之内送到香港。

靖军吓了一大跳，立即行动。找这个找那个盖这个章盖那个章，当最后拿到公证书时两只手激动得颤抖不止。飞奔到机场等了一张票送到深圳，再交给表妹带到香港，正好赶上开庭保释的时间，于是两条罪状取消了一条，晓红得以暂时出牢笼。

今天要开庭，我心里觉得有些凶多吉少。我也没去多米尼加，也无法取证，没有任何新的王牌材料提供给法庭。

不过移民局也提供不出任何新的王牌材料给法庭。

可是，是他们告我们。而胜负决定于当日法官的一念之间。谁知道法官善不善良，心境好不好？假使他昨晚输了钱或是跟老婆吵了架，那可就不得了了。

也许他把气发在移民局一边？

目前，胜负的概率是一半一半。

扔钢镚。过去有事我也扔过钢镚，不同的是这次扔的是法国钢镚。法国钢镚一面是自由女神，一面是一法郎。

我心中认定自由女神象征着晓红的自由，而一法郎代表着失败。扔了几次都是一法郎坐在地上，愣了十几分钟，心上就像放了一块通红的烙铁，胸口火烧火燎。

几个电话都不是来自香港，我匆匆告诉他们别打长了，赶快挂断电话，我在等一个生命攸关的长途。对方问什么事这

样不得了?我跺着脚求求他们先别问那么多,等事情结束后再告诉你。

半小时过去了。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电话铃反而不响了。看着桌上的点心我一点也没有食欲,腰酸背痛身上一软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

时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意识逐渐开始朦胧。

轻飘飘地我来到了法院。又坐在了上次那个座位上。那讲台仍然挺立,只奇怪那法官怎么还是上次那个法官?

又看见那密密的栅栏。一个穿浅蓝色囚衣的熟悉身影从里面走出来。"晓红!晓红!"我扑到那栅栏前面。

晓红看我一眼,木然地转过脸去。她恨我。她装着不认识我。她一定恨我带给她这飞来横祸。

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响,随着那法官的锤子一声断喝:"拉下去!判刑十八个月!""不,不——"我心胆俱裂连声大喊扑向法官。

声泪俱下跪爬过去抱着高高在上的法官的腿:"求求你,求求你大法官——"我有好多话要说,可是发不出声音,胸口上的那块烙铁已烧断了我的喉管,绝望之余我张着大嘴脸上热泪横流。

法官俯下身来看着我。他的眼睛硕大无比。我迎着他的脸比划着手势,像一个只会打哑语的哑巴。法官逐渐流露出同情与怜悯的眼神,我抓住他的手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大法官,您的电话——"法官回头。隐隐约约是有电话铃响。

法官接电话。这该死的电话。我狠狠地埋怨着。

可是法官总是接不起电话来。他对着话筒"喂,喂",可是

电话仍然铃声不断。

法官敲打电话。铃声还是在响。

一生气法官把电话向我砸过来。

哎哟好痛。我睁开眼睛，原来是窗户没关，风吹起一张报纸打到了我的头上。电话铃在响。电话！

跳起来滚扑过去拿起电话。是香港来的！是陈律师的声音！

“我是10355。”陈律师说。声调快乐。

我的心一下子一松。“我是10666。你好，10355。”

我们像地下党接头在对暗号。好，暗号对上了。

“怎么样？”变了声音我急切地问。

“怎么样？”陈律师学我，“无——罪——释——放。”

“哎——呀！”我拚命大喊，把电话机扔向空中！

我去机场接回了晓红。

晓红说，那天她的案子全程进行还不到二十分钟。也没有请皇家大律师。法官听完陈律师和“大庄”的申诉，拿起了晓红的多米尼加护照看了几看，说了一句“Very interesting（很有意思）。”然后就宣布无罪释放。

移民局呢？移民局也没有表示过多的异议。

最奇怪的是，在晓红之前的一个案子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黑龙江一位省长的儿子使用了葡萄牙护照，被移民局怀疑是假护照，那位儿子请了律师，请了“大庄”，还请了皇家大律师，结果他被判刑十八个月。

晓红紧接着那儿子出场，同样的案子却宣布无罪，并且立即释放。

我百思不得其解。打电话给明姐，她也百思不得其解。陈律师也百思不得其解。每个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对这种突兀的飞来结局感到不解。

陈律师说，整个案子如有神助。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为什么案情会急转弯一下子万事大吉。

也许是艺人们无数次虔诚地为我们祷告，感动了上苍？

也许是那位移民局请的皇家大律师起了作用，制止了移民局？可他这是为什么？出于什么动机呢？

想不明白。

是不是天神或是上帝在帮助我、在警示我什么？

整个官司的费用陈律师和“大庄”都表示只收一半，另一半作为给我的一点心意。而剩余部分全由香港朋友们自愿承担。目前帐已全清了。

晓红在港时，朋友们轮流陪她逛街看电影怕她寂寞，关切安慰甚过我在港十分。

那天晚上，我们点燃了炉火，把两本多米尼加护照投入了熊熊的火焰中。

不要这个臭护照。

假如是中国公民在外国遇到了麻烦，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绝不会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连持台湾护照都会受到中国方面的照顾。

我们把中国护照紧紧捧在胸前。

幸好我们是中国人。还是中国好。

53 天上真的掉下个大金娃娃



晓红这件事情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思念中国。

上帝是不是在用晓红这件事来巧妙地示意我应该回中国呢？

姜文也来到了巴黎。他去卢浮宫，攀登埃菲尔铁塔，看电影，参观博物馆，在艺术的海洋里尽情遨游。

我在心里不知不觉地计划着回国的行程。

而在此时，中国驻法使馆蔡大使通知我，国务院对台办破

例同意我直接从巴黎飞往台湾拍摄四十集电视剧《风华绝代》,不必回去重新办手续。

这段时间,台湾与我签约的中华电视台——大家叫它"华视",一直在活动我去台湾拍戏的事宜。

由于是中国大陆著名演员第一次主演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我去不去得了台湾成为台湾新闻议论的中心。

四十年两岸的隔离要沟通又谈何容易?

在此以前,台湾当局有明文规定,大陆职业演员如果参加台湾的电影或电视拍摄,在影片里出镜不得超过九分钟。

另外,如果是大陆出生的演员,要拍摄台湾的电影或电视,必须持有第三国护照,也就是外国护照,并且要在大陆之外居住五年以上。

而且,还不得是中共党员或是共青团员。

四十年来,真正来自大陆的演员担纲主演电视剧还从来没有过。何况我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委员在台湾当局看来是中共高级干部,所以事情变得复杂而困难重重。

我虽然曾经有过第三国、也就是多米尼加的护照,可是我没有在国外居住五年以上。何况,这个护照已经永远消失了。

再说我也绝不会用它去往台湾。要去就得作为中国演员去台湾。台湾是我们中国的地方。

况且,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专职演员,我将在片中出镜不是九分钟而是不少于九个小时。另外,我除了是全国政协委员以外,还是全国青年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其他琳琅满目的各类头衔还有好多好多。

我没有一条符合台湾当局的要求,华视的申请当然不会得到批准。《风华绝代》这部电视片的拍摄变得太不单纯了,

我的情况成了海峡两岸这个阶段的代表。

华视十分焦急。他们的制片人罗小鹏发传真给我，约我去香港就此事面谈。

我回了传真表示同意并且即日起程。

晓红去不了香港。姜文又不愿去。

于是，我只身一人到达了香港机场。

明姐、朋友、表哥、表妹及一大堆好友，在机场外迎接我。

晓红一事逢凶化吉之后，大家见面比过去亲热十分。朋友们都争先恐后对我说“恭喜恭喜”，还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熙熙攘攘拥到一个酒楼吃饭。席间我们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官司，与移民局的斗争，以及那异峰突起的大获全胜的结局。我表妹说，事过之后她一次从香港回深圳，碰到了上次扣留晓红的那位海关职员，那位职员看了她的回乡证半天，然后说：“你们打官司花了多少钱？神通广大啊。”

我问那多米尼加总领事怎么样了？大家说，从那天以后一直没有见面，为了稳住她，打过几次电话去寒暄，官司之后就没有人再理她了。她也没有再与我们联络。大概是看到报纸了。

站起身来我举杯真挚地敬了大家一杯酒。结结巴巴说了几句什么感谢话，突然有东西又哽住了喉咙。

有人大喊岔开岔开岔开。这倒霉事已经过了还提它干什么？

对对对，说点别的说点别的。话锋一转，议论起了香港越来越热的房地产行情。

原以为临近“九七”香港的房价会大跌，大家说跌什么涨得不得了。朋友说她买的房子在尖沙嘴，买的时候是七百港币一英尺，后来涨到一千多港币一英尺，现在，哼，都三千多港币一英尺了。有人说，那你就把它卖了吧。朋友说，那舍不得。

明姐说，舍不得什么？当初不是我劝你买还不买呢。

张先生说，要是自己住就别卖，我看香港房子还会升值。

王老板讲，要赚钱最好买楼花，一手买一手卖，钱来得快得很。我太太最近买楼炒楼赚了不少钱哩。

“我有楼花！”我赶紧喊。

大家都转头看我，哄的一声笑了。大概是想不到我一个大陆人还会在香港有楼花吧。

我马上详细汇报。在什么区，什么地点，楼叫什么名字，入伙日期是什么时候，我买了多少，以及我买它用了多少钱。

一口气说完，我瞪大眼睛看着他们。

突然大家一起说，你现在不得了了，你发财了。

我说怎么发财？你们说给我听。

全体都来了精神。大家一起算帐，算来算去数字现在已相当可观。假如再过几个月……假如再过半年，最好一次抛出去，那你就真的不得了，是个富婆了。

我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奔跑。

我说等不了半年一年了，我现在就要卖。最好明天就卖。我已经来不及了，何况还得掏一笔钱供楼。我供不起楼。

朋友们开玩笑说，那你就卖给我们好了。

我说好啊。我这就卖给你。

集体大笑说，你卖多少钱？我问现在行情是多少钱？不是

现房是楼花?

七嘴八舌说,楼花嘛可能是两千港币一英尺,有人说大概是两千五百港币一英尺,也有人说,不对,是两千三百港币一英尺……

我说一千五百港币一英尺,我卖给你们。

所有的人一起说,你当真?

我点了点头,慎重地说:当真。我们明天就去办手续。

所有的人都欢天喜地。包括我在内。

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金娃娃,喜不自胜我掰着手指头加上脚趾头盘算着当我赚到钱后这些钱马上要发挥的作用:A,还银行的贷款;B,还朋友买蛇口那幢别墅的钱;C,买衣服影碟还有录像机摄像机镭射机;D,付一笔钱给陈国军早日离婚;E,还得留相当部分的钱给晓红;F,剩下的全交给妈妈;G,我要好好安葬外婆。

我仿佛看到父母与我吃穿不愁全家团圆的笑脸……

打住。别再想下去。千万别是"黄粱一梦"。

第二天,我们全体去了律师楼。

朋友们龙飞凤舞,一张张支票向我飞过来。

我快晕倒了。

勉强站稳脚跟,在一张张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在国内为无数影迷写过无数次的"刘晓庆"三个字,现在变成了印钞机。怎么也想不到我的签名会在这里派上用场。

我的眼前钞票乱飞。此情此景我的感受怎么与第一次去邯郸"走穴"时一模一样?

只不过邯郸"走穴"每场是人民币一百五十元。现在的数

字实在是今非昔比。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今儿个鸟枪换炮喽！

手拿着一大叠支票我立即冲进了最邻近的一家银行。

开帐户，签名，出示护照，放进支票，领出支票本。

紧接着办转帐手续，再签出一张张新的支票。

我还了银行的贷款。也还了朋友的钱。

我现在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一个人。我的腰板一下子挺直了。水是清灵灵的水，天是蓝湛湛的天。

唉呀，香港！香港怎么这么可爱啊！

心旷神怡，按约定我见到了罗小鹏和他的夫人。

与眉飞色舞的我正好相反，罗小鹏忧心忡忡。

“华视”要求我入台的申请又一次被台湾新闻局拒绝，事情形成了僵局。

罗小鹏设计了好几个方案我都说不好不行。他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

我真心实意夸《风华绝代》的剧本写得好，我看过前五集已兴奋莫名。

罗小鹏说这个剧本“华视”还不满意又换了新的编剧，我说那肯定更精彩，这部戏拍不成真是太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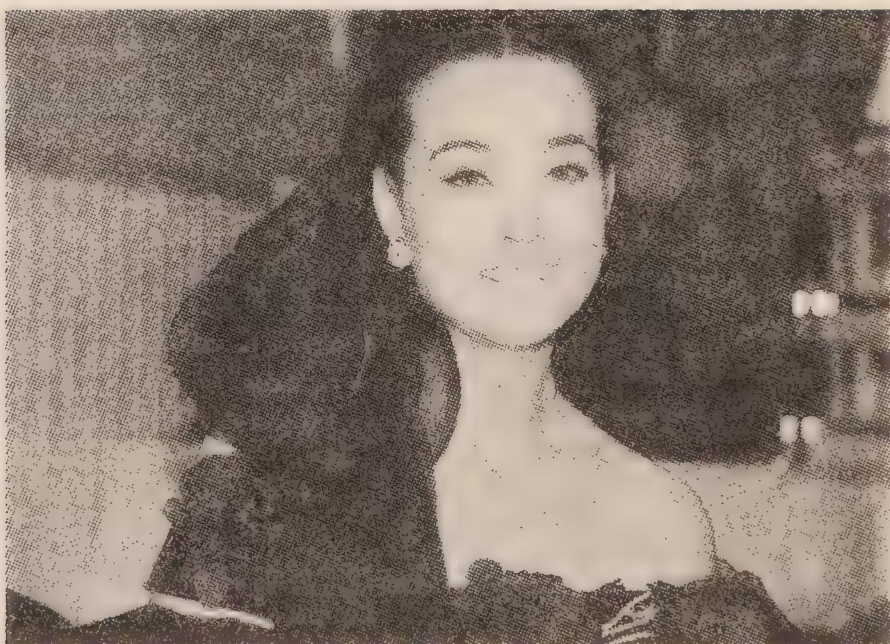
我们互相叹息了一阵也没有弄出什么高招来。此次会谈只好不果而终。

我的签证只能在香港停留七天。罗小鹏说只有请我先回巴黎等候他的消息。

腰缠万贯精神抖擞，我大步流星跨出了巴黎戴高乐机场。摇身一变，我成了小财主回到了法国。

在我变成小财主的前后脚时间，我又成了新闻人物。

54 我又处在漩涡的中心



我暂时去不了台湾的消息遍布了全世界华人报纸的重要版面。台湾的舆论简直翻了天。以柯俊雄为首的台湾演员工会也在这巨大的浪潮中奋起,强烈反对以我为先锋的大陆演员进入台湾市场,他们呼吁要保护台湾演员的合法权益。

我又处在漩涡的中心。我成了统战与反统战的焦点。我的艺术创作第一次同政治如此息息相关。

在这错综复杂的状况面前我只能安之若素。我保持我平

和的心境，照样去卢浮宫，照样去电影院，照样在巴黎的咖啡店悠闲自得地观赏来去匆匆的行人，照样去十三区中国城购物，精心制作我的中国菜。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小鹏仍然没有消息。

催他没有用。所以我不催。每天与香港联络把自己淹没进了炒楼花当中。今天买进，明天抛出。抛出后又更多买进。

随着香港楼价有下降的迹象出现，我的速度也愈加缓慢，最后终于停止，洗手不干了。刚赚到钱时的惊喜已经过去，我的心里仍然空荡荡的。

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我需要的东西不是钱可以买来的。心里又逐渐涌起不平静不安宁的潮流。思乡的情绪不断地扩散，扩散，笼罩我的全身。

在国内的一切愤懑，烦躁，怨气，怒火，全部逝去，什么四川记者，什么税的官司，什么离婚……对我来说都仿佛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事。

就连青岛税务局的那位张处长，那位手抖了半天也没有把烟点着的张处长，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亲切。

我想念中国的一切。

法国的什么东西我都看不顺眼：法国人头发太黄，像一堆堆枯草，鼻子太高，像一只只老鹰，服装黑色居多，一点儿都不五彩斑斓，还有，他们太喜欢说话，太啰嗦。

我嫌巴黎的街道干净过分，不像中国的城市虽然时不时有些垃圾看起来脏脏的反而显得温暖自然；我讨厌这里人口太少，不像中国熙熙攘攘是一个多口之家，人情味浓郁；我甚至恨没有人找我收税，不把我当成自己人，也不把我作为是有能力的人看待；还有，法国太文雅太安静太人工太做作太“丫

挺”，太……连空气都不像中国。

……连空气都不像我魂牵梦萦的中国那样觉得亲切，舒服，有一股熟悉的自己家里的味道。

终于我不耐烦了。

我对台湾当局磨磨蹭蹭的做法起了反感。

我不喜欢一部电视剧的拍摄笼罩着如此浓厚的政治色彩。

台湾当局对我入台拍戏如临大敌的态度使我很不舒服。

我对法国的一切兴趣尽失。

我想回中国。我要回中国。我决定回中国。

我发了传真给“华视”。大意是说谢谢他们的盛情邀请及锲而不舍的努力，我表示既然不能去台湾拍戏，那我就不拍《风华绝代》了，好在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另外，我告诉了他们回北京的日程。

我的传真在“华视”当然是炸了锅。在开了几次重大的会议之后，“华视”做出了决定：迁就刘晓庆，全队人马拉到北京去拍。

可是，我还有一件非处理不可的事。不了断这件事我仍然不能回国。这就是我的婚姻。

我连续不断地打电话给北京的律师，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会回国。我请求他们尽快与高级人民法院联络，越快越好地解决我的离婚案。我明确表示可以多付钱给陈国军，只要能换回我的自由。

台湾“华视”方面已组织好了拍摄班子，将在我回去之前抵达北京。他们要作一些前期准备。

假如陈国军再重蹈覆辙，台湾的新闻将不堪设想。

我等待着北京的答复有如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律师们为我鸣不平。他们认为凭什么要付钱给对方?越是要钱越是不能给他。好说好散还差不多。

对方也寸步不让。

一天、二天、十几天、二十几天……毫无进展。

“华视”的《风华绝代》摄制组已经到达北京。选景、搭景、谈合同、选演员，一切准备就绪。

我快急死了。可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

最后，我们还是让了步。高院也动了恻隐之心。

这个历时六年之久的离婚以我单方付给对方人民币七万元成交。

陈国军还要上诉。可这已是终审。高院责成我立即交付。

北京的朋友们受我委托东拼西借还是凑够了这个数。这一点连我也没有想到。他们才一年不见竟富成这样了?后来才知道是从国营企业里借出来的钱。

我终于踏上了归途。

55 我鼓动姜文当导演



从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六日去法国，到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回中国，历时整整九个月。

九个月中，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的面孔，一样的身体，一样的名字，可是气质、穿着、秉性、世界观，都不同了。我，已脱胎换骨。

《风华绝代》摄制组在北京已等了我相当一段时间。

但我坚持要从香港回国。先去深圳一个礼拜，再到北京。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外婆安葬骨灰。

在香港，我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终于结束的新闻又铺天盖地。赔偿费有说我给了对方八十万，有说给了一百多万，就是没有人说到那真实的数字七万。

无论数字是多少，我生命中的这一页是永远翻过去了。

戴着黑纱，静静地，我回到了蛇口。

外婆的骨灰一直没有安葬，全家人都在等着我回来。

捧着外婆的骨灰盒，轻轻地、轻轻地放在墓穴中，就像平日我把睡熟的外婆抱起，轻放在她的床上。

在家里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出门。

每天白天，我无数次走进外婆的卧室，回忆起我们亲爱的一切。

晚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外婆走进来，为我掖好被子。

而在早晨，我明明白白地感觉到她拍拍我的脑袋，以她习惯的语气大声说："起来了，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在蛇口那幢如今真正属于我的别墅里，我跟外婆说了好多好多话。外婆，她一定听到。尽管我回来晚了。

外婆，您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吧。

六月五日，我回北京的第二天，台湾的《风华绝代》电视连续剧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场地外景，也就是我们电影《红楼梦》的大观园所在地开拍了。

所有来自台湾的工作人员、导演、演员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大陆，为了《风华绝代》的拍摄停留七个月。他们要在北京度过夏天、秋天和冬天。

在开机仪式上，罗小鹏热泪盈眶。"华视"的节目部经理

张永祥激动不已，他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终于请到刘晓庆了！"

在鞭炮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我拿着点燃的线香，双手将它举过头顶，像台湾电视界的同仁一样，深深鞠躬，叩拜四方，把香虔诚地插在香炉上。在大家互相祝贺，川流不息的人群当中，我的心平静而新奇。在我不短的电影生涯里，我从没有举行过开机仪式。我新奇这次开拍的特别。

张永祥和罗小鹏从人群中挤过来，要同我合影，当我们三双手紧握在一起时，张永祥说："海峡两岸统一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功之臣。"我看着他们，心中充满了肯定的激情。

这一天一定会有。我早知道它一定会到来。

我每天早出晚归。除了拍摄《风华绝代》以外，还给上海《新民晚报》写专栏。与此同时，我与姜文一直在筹划我们即将要合作的第四部电影。

几年以来，姜文让我闹得够呛。由于我的情况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他的日程表从来就是跟着我的时间安排。

相当长的阶段他都没有随心所欲地拍过戏了。

姜文在寻找他喜欢的角色。而我却又一次苦口婆心地说服他尝试作导演。

在我长期与他的合作中，我感觉姜文仿佛是为电影而生的。尽管他热爱舞台并且毕业于戏剧学院。

有人说一部影片只要有他参与就有了质量的保证。我所知道的是他每部影片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导演创作，并且使他主演的影片成为那位导演的里程碑。

我一直觉得他应该作导演并且会非常出色。我对这一点

坚信不疑。

我不断地劝说他试试干干导演看看，每一次都被他拒绝。拒绝的原因是他对自己目前的导演能力有怀疑，并且他有一个秉性：假如一件事开始做不好，那他就永远不能再做那件事了。

他是不能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要不就站着，再不就干脆趴下。

他是一个个性极强的演员。

他时常无意中令与他合作的导演难堪。他喜欢睡觉，工作不准时，摄制组只有在他到达之前将一切准备就绪。导演或是副导演替他走位打光。

可当他姗姗来迟时，会不假思索地推翻已弄好的一切，提出新的方案。而这新的方案尽管要造成道具、时间、人力的浪费，却又使全组人都觉得高明一大截，不得不重新来过。

每当在这些时刻，我都觉得既然这么费事还不如自己导戏。像他这样主观意识这么强，只有作导演才会真正有天地去纵横驰骋。

姜文十分动心。可总是一再犹豫。

直到有一天我跟他大吵一架。

姜文说，他要去美国学习几年导演再回来导戏。我说那你就永远失去机会了。真正的导演不是学出来的，是天生的。学习只能弄懂技巧、技法，而那是通过时间可以掌握的东西。

姜文说，现在当导演还为时太早。我说当你觉得不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导演最需要的不是经验而是才华，而才华是由激情引发，激情则是由生命力诞生。只有年轻，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技巧可以不娴熟，可是生命力才是影片的灵魂。

我接着说，你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导演。

姜文反驳说，你也这样说过陈国军。我说别提这个，那一章已经翻过去了。我说的是你，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导演。

姜文说，不会有人给我投资的。我点点头说是比较难。也许非常困难。不过可以去想办法。事在人为。你现在就选题材。

在拍《风华绝代》期间，我们天天选题材。姜文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旦投入绝不善罢甘休，我的劝说已经大大奏效了。

过去，我从没有参加过任何电视剧的拍摄。这一次拍《风华绝代》给了我无数的下马威。

过去拍电影，一天平均拍七个镜头。现在拍电视剧，每天至少要拍十几场戏。总是深夜十二点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家，卸装洗漱完已是凌晨一二点，再伏案写作《我这八年》专栏，又到三四点，常常是清早五点我们开始讨论要拍摄的题材、剧本，总是脑袋刚一沾枕头就又该出发去摄影棚化装了。

在《风华绝代》七个月的拍摄中，我几乎天天如此。随着拍摄的进程，一个又一个的剧本被我们推翻，一篇又一篇的专栏文章被我写出来……

我时常在镜头开拍前，甚至是正在拍摄中，只要是自己背对机器时睡着。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正在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拍摄进度已三分之二时，我扮演的主人公春泥返朴归真，从红遍上海滩的歌女变成了乡村女教师，最后要死在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中。为了扮演朴实无华的春泥，拉大角色年龄的跨度，我开始吃减肥药。

我吃的那种减肥药许多香港演员都吃过。据说吃这种减肥药可以在短期内很快降低体重二十斤。我看到一位正在吃这种药的女朋友陡然消瘦大吃一惊，于是立即请教减肥的方法，她替我买了这种减肥药。

这种药的功能是不吸收脂肪，但你每顿能随便吃什么，丝毫不限制你的食欲。我每天照说明书吃下药去，过了差不多半个月，我开始消瘦。这消瘦的程度连我自己都感觉出来。

我不仅摸得到身上的根根排骨，还在拍摄现场电视机的回放中看到自己的脖子青筋暴露。

由于长期严重缺乏睡眠，并且不能补给营养，我的身体已毫无抵抗力，可是我自己对这一点没有觉察。我一直对自己的健康充满自信，因为我几乎从来没有生过病，我的许多朋友不止一次形容我壮得像头“牛犊”。

直到最后，我患了败血症。一种很难感染的尖端厉害病菌，它有一个灿烂的名字叫“金黄色葡萄球菌”，从我划破的手指头进入我的血管去参观、游览，并且寻找合适的地方定居。

我持续高烧十几天。当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有些迷糊。医生说幸好来得还算早。再晚几天，“金黄色葡萄球菌”找到住处安营扎寨，可就麻烦了。

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患了同样的败血症，因为到医院太晚，已经死去。著名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大夫也是手指头划破被感染，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而我今天，凑巧来得及时，并且医学界已发明了特效药。医生们把那极贵极贵的针药一天几次缓缓推进我的血管，昏昏沉沉中我看到无数的小小圆东西与那金黄色葡萄球菌展开大战，并在我的身体里惊天动地地呼喊：“冲啊——杀呀

——啊啊啊啊——”

它们还拿着各式各样的小棍，可能是它们的武器。

我感到小小圆东西的大军节节胜利，灿烂的金黄色一片片退去。睁开眼睛我对医生说：“哦，那些小小的圆东西打赢了。”

可是，我的心脏有了损伤。我患了病毒性心肌炎，需要至少三个月最好半年卧床休息。我从长沙医学院转到蛇口医院，又从蛇口医院转到北京海军总院高干病房。

这时候我的身体里小小圆东西已经太多。小小圆东西们忠于职守，见到细菌就杀，不仅一个不留地杀死了敌人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把我身体的友人——那些帮助消化等等的好细菌也杀了个丢盔卸甲。

我的身体没有了同盟军，基本上成了一个“无菌体”。我成天拉肚子，不能吃任何东西，再不就患感冒，吃什么药都止不住。我以为我得了“爱滋病”。

通过一个朋友悄悄打长途电话给湖南医学院的主任医生，告诉他我的担心。他哑然一笑，隐晦地说，他们在确定病源的时候已培养过许多病毒，他们得出的诊断就是败血症。

在海军医院，许多朋友、记者闻讯来看望我，占据了大量的卧床休息时间。每天还打电话与姜文谈论剧本，或是从医院偷跑回去高谈阔论一番。

在我重病期间，姜文选定了他要拍的东西，这就是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在开始写剧本的同时，我们确定了影片的名字《阳光灿烂的日子》。

随着我身体的康复，剧本一天天成熟。在我出院的时候剧本已告尾声。姜文主张编剧署上我的名字，被我一口拒绝，

我说是谁写的就是谁的，我从不贪天之功为已有。

姜文说，女主人公虽然是照你的模子写的，可你恐怕演不了。我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是为你的成功，又不是我自己要演戏。

出院以后，我立即寻找影片的投资人。

影片需要一百万美金。这在中国电影的制作中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第一次作导演的姜文的影片来说。

而且，没有人相信姜文能导戏。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可是我有。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

那时候，我作房地产生意轰轰烈烈。为此自己还悄悄创办了一家“刘晓庆实业发展总公司”。我任命妹夫靖军担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

我从来喜欢做新的事。姜文说我如同站在海洋中的冰块上，虽然履着薄冰，却总能从这块冰跳到那块冰，一直屹立不倒，是一个真正的“不倒翁”。

我确实对房地产兴趣浓厚。一位台湾朋友非要给我算八卦，说我有“房宅功”。虽然我不信这些，但我真是与房宅有缘，我由于房宅受尽苦难，又由于房宅发家致富，至今我仍然相信蛇口那幢房屋是我的风水宝地。

买它时我一贫如洗几次濒临破产，可自从有了它后我开始赚钱，并且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尽管我后来在法国、香港、上海、烟台、深圳、北京等诸多地方都有了房子，也做过数次的房产买卖，我从来舍不得卖那幢蛇口的别墅。

尽管它已从一百十五万港币升值到三百万港币以上，我仍然要留作自己用。我曾租给别的公司与个人，听说在居住

期间那些公司与个人都财运亨通。

我也曾试着炒地皮，也炒出了不少名堂来。

我从抓住拍片的时机已转换成敏捷准确地搜寻并且绝不漏过做房地产的好时机。

与人谈话，谈不了几句便谈起房地产生意来。

可是我悄悄做。大明星做生意让人知道了多少有些不好意思。我保持绝密。

连姜文都一直被蒙在鼓里。他沉浸在创作的激奋中，对其他事不闻不问，我也不说。说了他也搞不懂。他从来对数目字弄不清楚，一过了二十就开始犯晕。

而现在，与我的拍档或是谈生意的对手说不上几句话我便大谈特谈姜文的电影。当然，不大光明的是，经常都是以我主演作为投资的诱饵。

因为《风华绝代》拍完后已被台湾新闻局禁演，不能在台湾放映当然更不能在大陆放映，为此我愤怒得几次拒绝去台湾访问。自几年前《大太监李莲英》后，我没有在银幕上露过面。

而《大太监李莲英》电影院放映得很少，没有多少人看到。

可以说，自我去法国以后，观众没有看到过我的任何电影，甚至是电视。而热爱我喜爱我的观众盼望着我的再度出山。

可是我的兴趣已大幅度转移。我觉得拍戏够了，不想再继续了。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电影是一门残酷的事业。严格地说，电影演员只能算是一种生涯。我的心早已伤透。

一个人没有必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反复证明一件已经被事

实证明成功的事情。我喜欢体验不同的人生。

可是，要为姜文的第一部影片拉投资，必须用自己作先导。

毕竟再度出山有大的吸引力，并且人们对我主演的影片有相当的信任。

我的谈判失败过几次，后来还是获得了成功。

我的一位西南的拍档愿意投资一半。这正合我们的意。我们本来打算就是大陆出资一半，海外出资一半。

龙飞凤舞签好合同并且收了定金。星夜兼程我前往香港。

在香港我销声匿迹，只有一件事，就是寻求影片的投资者、合作者。

长长的时间里没干过这种事，我乍一下摸不着火门。坐在饭店里想了好久好久，翻开电话本找到一个号码，打给一个朋友文隽。

文隽准确地说是姜文的朋友。我是通过姜文才认识他的。他作为一个制片人曾邀请姜文与万梓良拍过一部电影，我相信他对姜文的才华至少是略有所知。

电话里我与文隽约会说想见见他。他问什么事，我说电话里说不清楚，能不能见面再谈？

文隽客客气气地马上说好好好我立刻过来。我说现在晚了，还有些别的事，我们明天上午在××地方见面好吧？

第二天，我在××地方拍照片，约定时间一到，文隽便风尘仆仆赶到。十八只手在头上、脸上扑腾，为我化装吹头发，摄影师在另一边找角度打灯光，文隽则气喘吁吁坐在我的对

面。

他个子矮矮胖胖，浑身上下是一个圆圈。他眼睛圆圆，鼻子圆圆，嘴巴圆圆，姜文说，他活脱脱是一个“吉祥物”。别看文隽其貌不扬，他可是香港电影圈的一个人物，他是著名作家，出了不知道多少本书，同时又写剧本又作制片，还当导演，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越过那些飞舞的梳子、剪刀、吹风机以及从各个方向伸到我脸上脖子上的手及粉扑，我把姜文要导戏，导的什么戏，什么内容，什么题材，大略说了一遍。我告诉他已有了国内的资金，请他帮忙找另一半海外的资金。

他频频点头。然后问：“要多少钱？”

我说：“五十万美金。”

文隽说：“我来投资。”我笑了，问他：“你相不相信姜文会拍出一部最好的影片？”

文隽说：“当然相信。”

以后的事实证明文隽确实对姜文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导演这一点深信不疑。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坚信姜文有导演才华的人。当然除了我以外。

我们双方约定到北京再详谈这件事。

一个星期以后，文隽和姜文还有我，签订了拍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合约书。

我的签名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多种用途。过去只单纯是为影迷签名，后来出了磁带又为歌迷签名，再后来写书又为读者签名，买楼花炒楼在文件上签名，接着又在支票上签名，今天又在各式各样的合同上签名，真是“大笔一挥，钞

票乱飞”。

文隽也付了摄制组的开办费定金。不久，姜文去香港访问，又拉了台湾协和电影制作公司作为同盟。大局已定，摄制组正式成立。过了不大一阵，影片正式开拍了。

56 商海无情



大功告成，我又埋头于自己的企业。我的公司已由几个人的小小团体变成十几人、几十人、上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集团，我的业务范围开始跨越房地产界，经营饮料、手袋、服装、化妆品，并把它集体命名为“晓庆”牌，同时我们做进出口贸易。在四川，我们公司是松茸出口日本的最大出口商。

同一年，我进军上海，与朋友合作在上海虹桥路附近买下二百亩地，准备兴建一座大面积的“名流城”。

在云南昆明，我任董事长的香港北星投资公司与昆明一家公司合作，在市中心黄金地段准备兴建十八层高楼“星原大厦”；

在山东烟台，开发区内的三十八幢别墅顺利卖出，我没有回收资金，又投在烟台市慎礼中心开发慎礼商住区；

此外，我还有广告公司，影视中心，花粉酒等等各类产品……

而我做生意的事情偶然一次不小心走漏了风声。

在去香山拍摄我为台湾录制的个人演唱专辑 MTV 的时候，我见到了《中国文化报》的记者张作民。

张作民告诉我他只需要十分钟与我交谈。我也只给了他十分钟。谁知道他是有备而来，在见我之前他已知道了许多内幕消息。

几天以后，《中国文化报》以显著标题“第一老板刘晓庆”泄露了几乎我做生意的所有秘密。这篇文章震动了全国。

许多文章评论说“刘晓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弄潮儿”，也有的人说“刘晓庆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

殊不知我做生意的起因完全因为生活所迫，而且早就开始，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知道有改革开放的浪潮到来才马上抢站在风口浪尖上。

其时，我已拥有二十六家、甚至还要多的企业。这些企业投资总需求量已超过五十个亿。

我通过各种办法融资，从海外引入资金，与国内外有经验、有实力的集团合作，在银行借贷，同时，投入自己拥有的钱。

可是，我的手伸得太长了。胃口也大了一些。尽管我秉

行自己做生意的原则："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我应该最多放在三到五个篮子即已饱和，我却要把鸡蛋放在近三十个篮子里并且装满它们！

我目不暇接、来回奔波，成日在天上飞，视察全国各地的战场。

我忙得把脚丫子都使上也不够用。公司职员形容老板像一条"破冰船"，我则说自己是一支"救火队"。

尽管这支救火队左打右冲，还是扑灭不了那熊熊燃烧此起彼伏的战火。

在上海，我们驻扎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公司开发"名流城"。整了两年多，工程师，建筑师，概预算，工民建，工程部，评估师……各类职员全部集聚在那里，先投下四百万，再投下七百万，一直拿不到我们需要的文件及土地证。尽管我们拿不到文件及土地证，可当地仍然天天催我们付款，当我们一共砸进了二千万人民币后，才发觉那片土地目前根本不可能开发。

与我们签约的土地方是上海县建设局所属的一家公司，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连施工的起码条件"三通一平"都还作不到，更别说建筑"名流城"这种高级住宅需要的"七通一平"。另外，我们签合同时白纸黑字写上容积率至少一点八，并且许愿说还可以争取更高。我们经过周密测算觉得项目可行于是大张旗鼓开始行动，当我们已陷进去不能自拔时才从当地政府那里得知容积率规定只能一点一。

而且在我们二百亩地的当中，也就是最好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在签约之前那家公司保证在半年之内村民全部

拆迁完毕绝不影响我们施工。当我们勘探、设计等一切花费庞大的工作全部做完可以开工时，那个村庄根本还没有人知道我们已征用这片土地要把他们的房屋推倒修建“名流城”这件事。

我来来回回为这些头疼欲裂的事飞了不下二十几次，次次都以毫无进展、灰心丧气而告终。尽管我对上海县建设局这家公司无视法律的行为怒火万丈，可是我无计可施。

因为，上海县已合并为闵行区，这一切由新的区长区政府管理。

而新的政府接手后遗留问题太多太多，许多企业只能自救或是自生自灭。尽管新的政府，闵行区的黄区长、汪区长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可是他们不能那么快地改变这片只能盖动迁房，短期内实现不了“七通一平”的生地。

而我们出自对上海县建设局这个国家机关的信任，要在这片生地上兴建高级住宅区，可是我们的高级住宅小区必须“七通一平”，必须容积率超过一点八。

我们陷入了“越南战场”。进，进不得，没有条件也没有办法进攻。退，退不了，我们的二千万已被收款方挪用，根本不可能退给我们，没有地方退却。二千万人民币成了一堆死钱。公司的成员整天无所事事守在上海。

上海这个房地产战役，成了我的“滑铁卢”。

与此同时，昆明的“星原大厦”也已投资二千万。我的“星原房地产开发公司”进展神速，设计、拆迁、平地、勘探全部就绪，我们的计划是先卖第一期楼花，并且已谈好了银行的贷款。

我从上海飞往昆明，亲自签名售楼。售楼那天人山人海，人们都闻讯赶来，争相一睹我的“风采”。我坐在那高高的柜台上，为买我们楼的人签名。

可是，“星原大厦”还没有来得及与银行挂钩。银行“按揭”的方式在昆明还没有过先例。每个买楼的人必须一次付清全款，而我们二层重叠式的“楼中楼”花园高级住宅一套至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

我签字售楼的当天有十几个公司及个人买楼。我笑容可掬与他们握手合影并且签上自己的大名。合同上规定十天以后付钱，并且清楚明确在合同盖好的财务章上有我们的银行帐号及帐户名称。

晚上，公司同仁一起庆祝了一番。售楼才一天，不，就一个下午二千多万到手，公司成员个个喜笑颜开。

十天过去了。没有人付款给我们。二十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人付款给我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没有一个人付款给我们。

雪上加霜的是，上边整顿了全中国的金融系统，调整了房地产的金融政策，原先与我们谈定的那笔贷款突然冻结，银行不再履行诺言。

公司突然没有了进款。全部工作只能停止。再接着下去，职员的工资都成问题。

所有人都撒出去找钱。

在四川，由总经理靖军亲自主持的一年一度松茸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成千上万包装精美印有“晓庆”牌商标的松茸每天都有货机飞往日本，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一直不停地增加投资，总公司帐号上的数字一天天向四川进发。

此外，饮料厂需要投资，化妆品需要投资，广告公司需要投资……

而姜文的摄制组已开拍一周。千军万马驻扎在某招待所，机器、胶片、人工、场地……每一天都张开大嘴需要钱。

原来的两家投资方付的定金一共只有二十万人民币，现在这二十万早已告罄，拍摄虽然仍在进展，但全部都是赊帐。

制片主任二勇天天打电话向我告急。我天天打电话四处催钱。

在这个关键时刻，原先与我签约的中方投资者也由于房地产经营不顺，收不回钱资金不能周转，单方撤销了与我们的合作，他不再付钱也付不了钱，整笔投资全部吹灯。

吞吞吐吐把此事说了一半给姜文，姜文暴跳如雷。我说别着急，我还有钱，先用我的钱。姜文说不用你的钱，就是不能用你的钱。我赶快说，先借一点，我马上去找别的投资商。

我交待会计取钱给摄制组。二勇天天来，天天带钱走，仿佛永远也填不满影片摄制一旦开始的无底洞。

摄制组的投资成了当务之急。

扔下所有的公司业务，我又奔走于各位商家之间。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派出手下得力干将四处游说。

不断收到会计的电话："老板，帐号上没有多少钱了，二勇来了给不给他？"

我总是咬牙回答："给！"

可是，没有人愿意投资。每个老板都人人自危，一筹莫展，根本没有心思顾及电影的事。在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电影太奢侈了。

曾经有一位商家愿意投资。为此我立即飞去签了合同，说好过几天汇票五十万带到北京。当然几天以后、几十天以后，也没有见到那笔钱的踪影。

我简直觉得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着急过。救场如救火，形势异常紧急。是我竭力劝姜文当导演，他听我的话当了导演，是我拍胸脯找投资，并且他相信我找到了投资，影片才正式开拍。可是此时，我陷他于不仁不义、四面楚歌的境地。

临场撤火，我未免太不够意思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组到处欠帐。每天厚着脸皮耍赖，拖着拽着，勉强进行拍摄。文隽那边是用机器、设备、胶片等等实物投入，而我的分工则是全面负责组内运转的现金。文隽方面的实物远在海外，从来就如期到达，我近在咫尺，人民币却一直出问题。

姜文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他搭光了自己的钱，创作班子也开始往里搭钱，可仍然是杯水车薪。组里怨声载道，风言风语不绝于耳。

电影界谣言四起，看笑话的，恶语中伤的，痛打落水狗的，大有人在。

二勇急得死的心都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成了最没有信誉、最穷光蛋的摄制组。时时刻刻都有地雷爆炸，此起彼伏。

我在公司的电脑上焦头烂额地进行数字游戏：这笔钱去这里，那笔钱到那边……几个会计一齐大喊："没钱了，老板！"

在我的帐号上显示的数字已是零。

几个项目把我的资金牢牢套死在那里。

另外的项目我立即缩小运作规模，加快步伐，可是时间未

到，拿不回钱来。

我每日每夜睡不着。找遍所有的银行，银行贷款全部冻结。抵押也不行。

我认真想过卖房的问题。可是房子不能立即变成现金，远水救不了近渴。再说，没有人在房地产低潮的时候买房子，就是有那么个把有远见卓识的人，也没有那么巧正好被我遇到。

我也找过文隽，文隽说他已经不容易，能履行合同就好，还是希望我从大陆解决。姜文急得都快发神经病了。

二勇天天电话催命。我快活不成了。

一跺脚一咬牙，对晓红说："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钱?"

"干吗?"晓红警惕地问。

"少啰嗦，拿出来!"我粗暴地吼。

晓红委委屈屈拿出了她的存折。我一看不够，接着又问："妈妈的存折呢?还有谁有钱，全都拿出来!"

全家人都交出了自己的"私房"钱。

"取出来。交给二勇!"我说。

二勇飞速跑来，取走了所有的钱。不到一小时，这点钱就消化在那无边无际的债海之中。

又开口要钱。啊，钱、钱、钱，真是命相连啊。

可此时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就是哭，也哭不出来。

最后下了狠心，让二勇把留着全家买菜买米用的一万元钱取走。

晓红哇哇大叫。我置若罔闻。

家里眼看着要揭不开锅了。

爸爸、妈妈及全家老小蒙在鼓里。自他们与我同住以来，一直过着吃穿不愁无忧无虑的生活。

无论我经历多大的风浪，总是在他们这里保持安宁、温馨、风平浪静、暖暖的绿洲。

晓红急得竟哭了起来。当我从她手中拿过那最后的一万元时，她哭着说："拍电影干什么嘛?现在吃饭都吃不起了，怎么办嘛?不拍那些鬼电影!"

那一万元是我从她紧紧攒着的拳头里抠出来的。

晓红说，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发愁过钱的事。

紧接着我宣布从即日起吃素。并大谈多吃青菜的好处。

在我做生意的消息传出之后，不知惹来多少人的羡慕。许多人学我的榜样，扑通扑通跳下海楞生生地就开始游泳，也有不少人向我咨询取经。

我都发自内心告诫他们，不到万不得已或是没有好机会，千万别做生意，假如非做生意不可也千万别作老板，心脏的压力承受不起。

我的许多生意场上的朋友几乎都有过我的这种时刻。在低潮时卖车、卖房，什么都卖过。有些从低谷中站了起来走向高峰，很多人就此一蹶不振跌进深渊，走向灭亡。

每天夜里都会被恶梦惊醒。醒来后大汗淋漓，一着急时常想干脆一头撞死在墙上算了。

直到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晚到来。

我派往云南的助手深夜将我惊醒。跳起来接过电话，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怎么样?"

"我现在同昆明宏达公司老板郭友亮在一起。郭老板跟

你说几句话。”助手说。

“等等，”我放低了声音，“你把电影的事跟他说了没有？”

“说了。你们再亲自通话吧。”

我只有等着。这种电话我不知打过多少次。每一次都说得云山雾罩，亲热无比，事后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喂？”我听见话筒里一个声音在说。

“是郭总吗？”我赶快问。

“是，我是郭友亮。”对方回答。

夜已深深。我简明、扼要地将电影的情况说了一遍。没有大加渲染，因为我已没有精力渲染。我话语中暗示遇到了大的困难，需要帮助。最后，我说了些客套话，诸如我将永远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云云。

说得个乱七八糟。

静默。一会儿话筒里传来了声音：“可以。五天以后我会到北京，支票一起带给你。”

我又照例说了一大堆不知所以的感谢话。

放下电话把枕头支好靠在床上想了十五分钟。经验告诉我不见棺材别掉泪，不见到支票不欢呼。没有到支票兑换出钱来的那一天都不能高兴。前一次不是有一个老板钱已汇出，传真件都给了我们，现在两个月都过去了还没有看到那钱长的什么模样吗？

不过有希望还是比没有希望好。今天晚上大概是可以睡得着了。

五天以后，昆明宏达公司的总经理郭友亮到了北京。

在此之前，我们将需要他投资的数目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悄悄增加到一百八十万元。他们也没有说什么。

在北京，一百八十万元的自带汇票交给了我。我立即把它放进了帐号上。

第三天我取出了钱来。我得救了。摄制组得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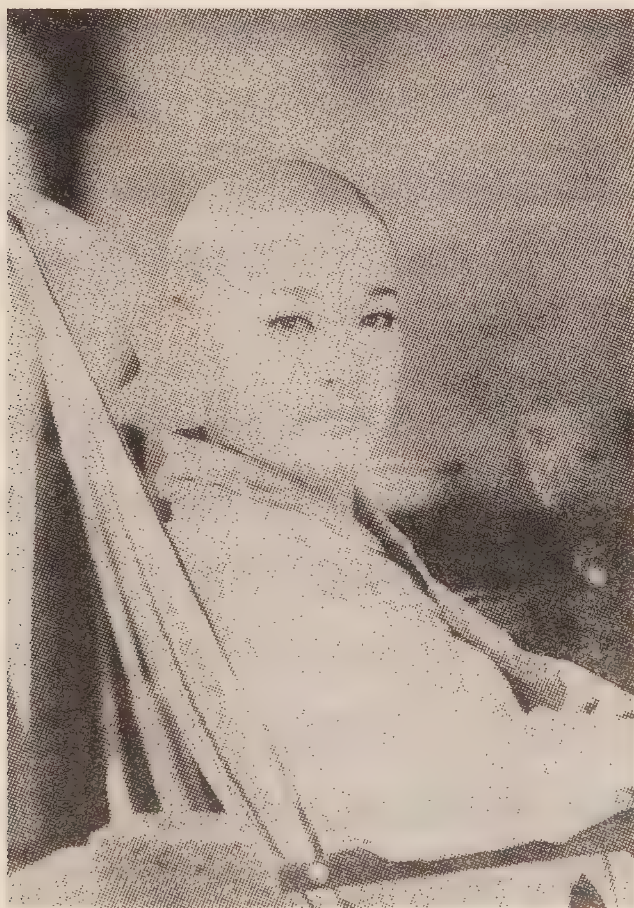
郭友亮成了我终生的好朋友。

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错综复杂。生死存亡只是在那一瞬之间。

此时，同样是昆明，一场官司已不可避免。

57

我成了“打官司专业户”



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有了一根救命稻草，刚浮上水面吸了一口气，又被拽入深水之中。

昆明这个官司在我众多的官司中排名第五，怪不得我荣获了一个尊称“打官司专业户”。

前三次官司都是我告对方，后两次是别人告我。离婚案，税案，与四川记者的名誉权案，我都是原告，这一次，我将第一回名副其实地登上被告席。在香港那次“多米尼加护照”风波

不算，移民局告的是晓红，官司虽然是我在打，但那木栅栏围住的通道里出来升堂的不是我自己。

乍一听我成为“被告”，真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听别人讲解了半天才啼笑皆非。

原来是昆明某台湾公司告我损害了该公司的名誉，起因是我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那个公司不讲信誉骗人。“他们连我这样的明星都敢骗”，劝当地居民“买他们的房子要当心”。

一共就三句话。三句话被人记下来并且录了音送上了法庭。那个公司说自从我说了这三句话后，他们盖的房子就卖不出去了。

但是他们是骗子，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他们办了一个演唱会，玩了一场骗局，我和一大批演员：董文华，那英，程前，江英，都成为那个骗局的受害者。

一九九×年×月，昆明这家台湾公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中国心两岸情，海峡之声演唱会”的演出，并讲明有当今中国大腕董文华、那英、程前、江英等人参加，还将邀请台湾演员同台助兴，以增进两岸艺术的交流及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友谊。

此事有文化部的批准及昆明市政府的文件，我深信不疑，于是同意前往。

在去昆明之前，我向主办单位的人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大陆演员必须窝底演最后一个节目；第二，不许录像，否则我拒绝演出，只好下次再合作。

主办单位代表答应尊重我的意见，并且约定如果出发前没有他们的电话表示反对，就是没有问题，我将准时前往昆明。

事后得知不仅是我，董文华等演员也提出过不要录像的要求，并一一被主办单位接受。

出发之前，一直没有收到电话。询问公司职员，任何人都没有收到来自昆明的电话及传真，于是我如约欣然前往。

到达昆明后不久，我们几位大陆演员便感到什么地方不对劲。

在体育馆后台到处都贴有广告“中国心两岸情海峡之声演唱会”，可有人告诉我们，只要一出了体育馆外，满大街都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广告“×××个人演唱会”！

×××是台湾的一位歌星。弄了半天是她的个人演唱会。

在开演的那一天，节目单上赫然印着差不多半场，至少四十分钟的时间，是这位台湾歌星一个人唱，而我和其他几位大陆演员将在上半场陆续鱼贯出场，每人唱两首小歌，以铺垫那台湾歌手的隆重登台！

那一天不巧我病了。贪嘴多吃了云南特有的“干巴菌”，不能消化上吐下泻。俗话说“好汉经不住三泡稀”，一天之内我脱了人形。

躺在病床上打吊针，我对这种骗子行径直感到恶心。几位大陆演员无一不气得打哆嗦。

我向来喜欢光明磊落，不愿意被人骗。事前与我们讲清楚，如果大家愿意为那位台湾歌手捧场，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种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的行径使我们怒火万丈。连我们都敢骗，并且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这个公司真是胆大包天。

而且，剧场里到处都有摄像机。

主办人根本无视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没有上场。

本来我可以上场。虽然我病重，但是至少我可以像主办单位要求的，上台站一下招手致意，随便说几句话便可对付过去。何况还有那等着给我的几万元钱，只要站了这一下便唾手可得。钱不算少。再说没有人会嫌自己的钱已太多。

我不要这臭钱。士可杀不可辱。

知廉耻者不吃“嗟来之食”。这个我从小就知道的故事，一直被我作为人格的准绳：有一位书生穷困潦倒，不得已上街乞讨。一次，要了好久不得，饿得头昏眼花。一路人见了不忍，盛了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饭给他，并大声吆喝：“嗟，来食！”那书生径直走过那人身边对那白米饭看都不看一眼，最后饿死了。

一介书生尚能自爱如此，我，一个堂堂中国著名的明星岂能随意任你像面团那样揉来揉去？

假使是我刘晓庆个人，也许把脸皮一抹放在兜里，上台一唱，几万块钱一揣，过了以后没事人一样也没有少了几斤肉。可是在那么多的摄像机面前，在成千上万的昆明人民面前，我是中国演员的代表，我没有为了几个臭钱随便处理自己行为的权利。

当然，我不出场，引起了轩然大波及种种猜测。在一次我为“星原大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问到了这个问题。

我由于心里对这件事感到太丑陋，不想过多说话。

我只说了三句话：“整个晚会是一场骗局。”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连我这样的大明星都敢骗。”

第三句话这样结束："你们买它的房子要当心。"

其实这几句话我早已忘到了九霄云外，以上记录的几句话也是从那公司告我的厚厚文件中摘录出来的。

就这样，我成了被告。

那个公司告我说了这几句话后，它的房子便卖不出去，要我公开道歉并赔偿它的经济损失。

这是我知道有官司这件事并且打官司以来最滑稽的一场官司。整个事件日月颠倒，恶人先告状，我没有腾出空来与它算帐，它反倒先咬了我一口。

并且，它动员云南新闻界，在报纸上至少骂了我不止三千句话，大大超额报复了我三句话这个区区小数。

开始我没有在意。真理在我这一边。虽然我是被告，但肯定会赢，因为我，不，因为我们是正义之军。再说我对输赢本身也不是太在乎，只要揭露那家台湾公司的丑恶嘴脸便已足够。

不仅如此，我反倒感激这个"傻帽"公司居然为我提供了一个说话的天地，我至少可以代表参加那台演唱会的一批演员出一口被侮辱被欺骗的恶气。

我又请了蒋律师。我没有去昆明。那个公司的代表不配与我站在一起，我们之间没有平等的人格可言。

在宣判那天，我心里觉得已稳操胜券。甚至，我给法庭的感谢信都写好了。我准备一接到昆明的电话就将感谢信传真过去。

可是结局大大出我所料。我打败了。太阳居然从西边升了起来。

法院把那个公司究竟骗没骗我这个事实放在一边，而判我不该在那样的场合、地点说。

我不明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多少条的规定。我不知道法院是真不懂呢还是不懂装懂搞出这么一个活报剧似的结论。我说它是骗子，它告我污蔑，我拿出事实来证明它骗了我，这就得了。什么不该在那样的场合、地点说？这绕的是什么弯子？故弄什么玄虚？我不该在那个场合、那个地点说，那么该在什么场合、什么地点说？难道去向那个骗子说吗？难道我被骗了，连说都不能说一声吗？

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好比一个人打了人，被打的人喊痛，并且告诉别人那人会打人要小心提防，结果判决被打的人就是痛也不该在那种场合、那个地方呼喊。那在什么地方喊？关起门来自己喊给自己听？

假使一个人要杀我并且杀到了我，我不能跟别人说他杀人，只能跟那凶手去说，又有什么作用？我当然应该大声疾呼，揭穿他的凶相，让别人不要被他迷惑再让他杀死。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那公司骗了我，我说它骗人，关键在于它骗没骗我这个事实，我已经证明了它骗了我，骗了我们。不仅我，所有的大陆演员都奋起作了证。

我决定不再对那公司怜悯。过去本来说实话，多多少少对它有一点恻隐之心。办公司不容易。利用公司作点宣传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这一次，我要怒而触不周之山。我要穷追到底。

58

为了武则天，我重又粉墨登场



这一天，一个不速之客来到我处。

他高大魁伟，一眼看是个北方人。我以为与我有生意要谈，于是请坐叫秘书倒茶。

寒暄了几句他便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要请我演武则天。

他叫刘大印，是这部戏的制作人。

我哑然一笑，揶揄地问他："知不知道我不想再拍戏？"

他说知道。事实上我已有五年没有在银幕上与观众见面了。

我再问:“这部戏你打算投多少钱?”

刘大印说是电视剧。三十集。初步设想投资四百万。

我笑得花枝乱颤:“这些钱给我一个人都不够,你出得起我的片酬吗?”

他慎重地说,也许出不起。不过,武则天非你莫属,相信你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我继续微笑,扬起头来说:“任何角色对我都是机会。”

刘大印说是。但是武则天不同。她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女皇帝。不,她就是皇帝。这个角色只有请你出山。

“那我以后腾出空来再演就是了。”呷了一口茶,我轻描淡写地说。

刘大印说不对。话虽这样说短时间内武则天这个形象不会再有。也许在你有生之年不会重拍第二次。

我放下了茶杯。

良久。“那就先看看剧本吧。”我终于说。

刘大印觉得有门。第二天就把剧本送了来。

匆匆浏览了一遍。不敢恭维。没有多少可演的戏。武则天写得和慈禧差不多。

还是算了吧。我决定不上这部戏。再说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的生意正蒸蒸日上,轰轰烈烈,正处在要劲的当口。

老板去拍戏,公司怎么办?企业怎么办?这么多职工怎么办?

武则天的事很快淡出了。我继续忙活我的生意。

估摸着时间刘大印打了电话来。问我对剧本感觉怎么样?

我说不怎么样,不好。我决定不上这部戏了。实在是抱歉。

刘大印说别别别,我们可以改。

“很难改。”我想了一下说。剧本基础与我之所想大相径庭,非大动干戈不可。“太麻烦了。”我接着说。

还是算了吧。以后再合作。

“一个星期以后拿新剧本给你看。”刘大印挂断了电话。

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新的一套剧本前五集又送到了。刘大印真是说到做到。

这是另一套新剧本,是另一个不同的作者。我看了一遍,仍然与我的想法南辕北辙,我还是没法喜欢,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刘大印又打了电话来。我歉疚地说真对不住。还是不大好。算了吧别麻烦了。我这么苛刻像个事儿妈。别人写剧本辛辛苦苦也不容易。

“请别的演员来演好了。”我再一次建议说。

刘大印说那就再重写。写到你满意为止。

我有些感动。我说这样吧,能不能与作者谈一谈,互相沟通沟通呢?

刘大印说好好好,我马上就安排。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记不那么清了。总之是很快就定在一天下午去一个地方与作者互相交流思想。扔下我日理万机的事务工作,跳上汽车去了约定地点,一屋子的人已经在等着我。

导演陈家林也在座。十年前我在长影见过他，那时的陈导英俊潇洒，数年不见，陈家林竟然满头白发，不过仍然目光如箭，像一头勇猛的山鹰。

一位年轻的编剧，据说是刚从内蒙古赶来。内蒙古？我心里闪了一下。那么远的地方请编剧？还没闪念完，就听见介绍说这是冉平，是《成吉思汗》及《东方商人》的作者，现在又请他来写新的一稿。

时间紧迫，我没有过多客套，一坐下就开始大谈特谈。

我把自已的思路尽可能想得到地讲了一通，也讲了对武则天这个人物的理解，并讲到我所希望的剧本的蓝图，最后说到我个人认为只有用这条线拍摄武则天才有意思，当然艺术创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有共同的想法大家就在一起合作，拍一部好戏，如果不一致就下次再合作，今天算我们交个朋友。

我挥汗如雨地讲了三个小时。当结束讲话时陈家林戏谑地问我："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多地讲话？"我笑了笑，心里想在公司一个星期也讲不了这么多话。平时我只要咳嗽一声大家都要寻思半天，要像这样讲话公司职员肯定觉得山崩地裂，吓都吓死了。

讲完后时间已到，再议论了几分钟我就告辞了。

后来知道大家都赞同我的想法，觉得这条线拍武则天蛮有意思。没有几天，我与刘大印签订了拍摄三十集电视剧《武则天》的合约。

啊，我又要粉墨登场了。过去熟悉的一切又将卷土重来。那令我烦躁，令我兴奋，令我辛劳，令我折磨，令我呕心沥血的一切啊。

在这当中又有了一次重大闪失。这一闪失差点要了刘大印的“命”。

在我与他签订合约的第二天，香港×公司就风尘仆仆到了北京，强烈请求我在上、下集电影《武则天》中扮演武则天。这部电影投资巨大，给我三百万的片酬，同时影片完成后，发行盈利还将分成。

我摇头。摆手。又摇头。又摆手。在摇头摆手拒绝了不知多少次以后，突然产生了动摇。拍电影当然比拍电视好。三百万当然比没有酬劳好。

我终于点了一下头。对方兴高采烈，表示明天就离开北京，一个星期内把我的一半片酬送来。

多少有些迟疑，我还是将事情告诉了刘大印。刘大印一听声调都变了：“别别别，别开玩笑，这事可开不得玩笑……”

听着他的声音我的脸色也变了。我的歉疚病又开始死灰复燃。与曹操相反，我一生秉行的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多少亲人朋友骂我，可我积习难改。我的心又在翻腾。

刘大印立即赶到我家。我们开始谈话，我希望能说服刘大印换演员，欠他的人情我再给他拍几部戏来弥补。

刘大印则表示我不演他就不拍《武则天》了。只要我这次让他圆了拍这部戏的梦，以后到我公司给我免费看大门三年。

他接着说自己真是运气不好，什么事都不顺，又发生这么大的事故。这一次变化，他的后半生都会夭折。小佛爷，我求求你，我给你跪下吧。

我跳起来手脚乱舞，别别别，别这样，还是我给你跪下吧。

闹了半天，我们谁都没有跪下。静场。

只听见刘大印差不多过几分钟就重重地叹一口大气。

我想起几年前，不，差不多十年以前，在香港，我与众多的成功者佼佼者们在一起聚会。席间我认真地问他们："什么是你们成功的秘诀？"

其中一位大款，是大大款，不，是大大大款说："生命第一，信誉第二。"听到这句话后我用眼光询问大家，人人都频频点头。

从那以后，"生命第一、信誉第二"成了我终生的信条。

做生意以后，甚至是"信誉第一，生命第二"了。

是这句话引导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台阶踏上另一个台阶，是它，使我朋友遍天下。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向来说一不二，说出来就跟写出来一样，写出来就跟做出来一样。

我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是我的一分钱不拉下，不是我的多一厘也不要。

话一讲出无论发现犯了多么大的错误，会出现多么大的亏空，也要兑现，实在兑现不了，也要讲清楚征得对方同意。

所以，我作为一个电影明星跨入企业界，依仗的就是信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及我的公司已誉满天下。

本来，搞艺术和搞企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当。需要截然不同的海角天涯的思维。搞艺术是感性思维，搞企业需要理性思维。艺术需要创新，企业需要经验。一般地来说，越是成功的艺术家越是成不了好的企业家。

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疯疯癫癫夸夸其谈，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来不随便许愿。就连没有经商以前还并不富有时也

是如此。

那次去香港与大陆来的一位朋友逛街。在首饰店发现一副精美的耳环，朋友喜欢得不得了，爱不释手。见到她如此模样，我看那耳环价值五百元，就说我买了送给你吧。殊不知第二天我带钱赶去，那副耳环是港币五千元！原来是耳环遮住了标签上最后面的那个“0”。

斗争了好长时间，我咬碎牙还是买了给她。尽管那时五千元几乎等于我在香港的所有开销。

回想我的一生中只有过一次失信。那是我发表了“息影声明”刚好一年，就又开始拍摄《大太监李莲英》，可那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再说发表的也是暂时息影，暂时的时间界限可长可短。尚可勉强说得过去。

这一次……

这一次不能原谅。为了钱？为了电影？不管为什么，不能把吐出去的唾沫再舔回去。不能原谅。

抬起头，我对刘大印说：“行了，我遵守诺言。还是拍我们的电视剧。”

刘大印的脸上一片灿烂。我知道，我的脸上也是一片阳光。

《武则天》如期开拍。

同时，“晓庆”牌化妆品在全国各地隆重上市。

除此以外，“晓庆”牌美容加湿器，“晓庆”牌饮料猴头燕窝，胡柚汁，金柚汁，“晓庆”牌花粉酒等等“晓庆”牌系列产品相继出笼，从轰隆作响的车间走到商品社会的大舞台上。

《武则天》全部外景、内景都在河北涿州影视基地拍摄。

涿州离北京路途不算太远，不堵车一个小时，堵车可就说不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有。

我每天晚上拍完夜戏赶回北京处理公司的大小事务，第二天一早五点六点又往涿州奔。

时常那小小武媚娘梳着崎角头，蹦蹦跳跳正与皇上调情，或是那秃秃的小尼姑拖着大肚子，趴在地上擦地时，一大群公司职员闯进来，找了半天才找到他们的老板“刘董事长”，而刘董摇身一变，正色地从他们手中拿过笔，煞有介事地在各种文件上签字画押。

每当在拍摄现场做完这些事后都忍俊不禁地扑哧一笑，而周围也总是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在我的职员们走了之后，摄制组成员全拿我开涮，对着我“老板”、“董事长”、“总裁”喊个不停。

在这种时刻，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像那么回事。随着小小媚娘日渐长大成熟，我变成了才人、昭仪、皇后，并为人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在那金碧辉煌的宝座中日渐苍老，伟大然而悲凉。

此时我向公司各位大小总经理宣布，停止我的一切事务，谁也不许来现场打扰。武则天要在那严酷的夏日里，在那密不透风的塑胶面具下，与“面首”嬉闹，病倒，经受兵变，最后退位。

在那面具的掩盖下，是武则天苍黄孤独的灵魂，揭开面具，是我的脸上布满水泡、血迹斑斑。我已进入到武则天的时间和空间，我体验她的全部，我拥有她的生命，我感受她的大喜大悲大怒大哀，如同我再生一次。

记者们总是这样问我：“你演武则天最困难的是什么？”

我总是回答:“皮肉之苦。”

坐惯了办公桌再回到乱哄哄的拍摄现场,又从十几岁演到七十八岁,皮肉之苦令我难以忍受。想起从前拍《小花》、《神秘的大佛》、《芙蓉镇》、《原野》等等电影,那些无法描述的皮肉之苦怎么一步步抗过来,简直觉得自己实在是有过了不起的时刻。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

不过,坐办公桌心累。做生意当老板需要极大的心理承受力。哪像现在这样做女皇作皇帝什么的,千军万马都有人给安排好,我只是满头满身刀刀叉叉玎玲当啷往那宝座上一坐,就万事大吉?

啊,电影,你这个海洛因,你这个罂粟花,你这个鸦片烟,你这个让人受尽磨难又让人上瘾的东西啊。

电影,是我们风华绝代的恋人。没有任何一项事业像电影这样甘苦并存得如此绝对,如此极端。

虽然被她弄得死去活来,却还是爱她爱得如痴如狂。而她又是这样地狡黠、这样地若即若离,有时候高入云端,让你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又风情万种地投入你的怀抱。

她的一颦一笑都是招魂术,使得你为她发疯,为她着迷,为她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你付出毕生的精力去追求她,以博得她的青睐,无论你吃尽千辛万苦,只要她回眸一笑,你的忧虑、烦恼、劳累都会荡然无存。你会忘乎所以,重整旗鼓,为得到她的又一次亲昵而再度冲刺。

也许当你年老力衰时她会逐渐离你远去,义无反顾地扔下你一个人独伴孤灯对愁眠,而你却无怨无悔。

她是这样地魅力无穷,使你一生都对她矢志不渝,永不会

移情别恋。你会觉得任何其他的事同她相比都淡而无味，兴趣索然，而对她却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电影，这个神奇的东西，你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啊？不管你是什么，我都会爱你，只要一在你的怀抱中我就感到自豪！

59

我心里是一片瓦蓝瓦蓝的天空



阳光灿烂。阳光灿烂！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完成了。

试演的那一天终于到来。

《武则天》业已停机。刚刚参加完在南昌举行的“百货订货会”，匆匆赶回北京来到放映大厅。

在南昌的订货会上，“刘晓庆公司”刮起的强劲东风，卷得南昌市内市外，会内会外，一阵阵尘土飞扬。大大小小的订单

越过人头向我们伸过来，如同那些想得到我签名的影迷。

银幕上，放映着姜文用心血浇灌而成的一个个画面。坐在椅子里，脑海中闪现的是那一页页影片的诞生史。

如今，我与姜文已不在一起，尽管我们还是好朋友。

环顾周围，姜文不在大厅，他躲在了别处。他一定是紧张得不能与大家坐在一起谈笑风生看自己的电影，这一点历来是我们共同的毛病。

我再一次感到生命的莫测。天下大势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

影片很好。非常好。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尽管我对剧本对场景的处理都很熟悉，太熟悉。

放映厅里座无虚席，每个人都对这部影片的创作者——当然是姜文，怀有崇高的敬仰。

我说不出地欣慰和欢畅。

晓红悄悄问我："怎么没有你的名字？"

我说："那不是啊？"

"你怎么在文隽的后边？"

"那有什么关系？我要的是姜文的成功，不是我自己的成功。你看这部电影怎么样？"

"很棒。"晓红由衷地说。

"这不就足够足够了。"

当天晚上，我给文隽发了一个传真。除了祝贺影片成功以外我详细把我经手的摄制组制片费列了一个清单，以澄清摄制组有传闻我携款逃走的谣言。

并且我再一次声明，做这些事只是为了姜文。我不要一分钱的片酬。现在，给我的酬劳已经太多太多，超出了我的奢

望。

我的心里,是一片瓦蓝瓦蓝的天空。

尾　声



《阳光灿烂的日子》如我所预想的那样，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了大奖。

《武则天》三十集电视剧也与广大观众见了面。

而我的商业网络已逐渐遍布全国。北京、天津、哈尔滨、新疆、成都、昆明、南昌、长春、内蒙古、银川、兰州、西安……"晓庆"牌系列产品的专柜与我经营的各个项目，像星星闪烁，点缀在那广袤的银河。我的足迹又一次巡回踏上祖国大地，

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是，我不再以电影明星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展示的是一个意气风发，朝气蓬勃，踌躇满志的年轻女生意人。

昆明的官司也以我的胜利而告终。

与此同时，我给了深圳首次文稿拍卖活动还一字未写的书的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拍卖了一百零八万，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先河。

本来，在拍卖会上，我的标题只拍卖了十七万。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就想，哼，怎么与我偷税案的数目一样。

结果，买到我标题的那位老板从此无宁日。

当天下午就有人打电话到他的大哥大上，提出立即付五十万现金给他买我的书，不，是买那个标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紧接着，八十万，一百万……不断地有人与他联络，结果他被誉为拥有一张“深圳最大的股票”。

于是我被这位老板又一次请去深圳。在深圳，我又与另一位老板、我的同乡魏晓霖先生面谈。

“一百零八万。”有备而来我提出了蓄谋已久的数字。

一百零八，要——定——发，我非要这个吉利不可。其实在我内心中，我对写这本书已打了退堂鼓。

“好吧。”魏晓霖倒来得干脆。

拍卖师郑晓星又来了一声吆喝：“我宣布，刘晓庆的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被深圳华深公司魏晓霖先生购得，一百零八万，成交！”

一锤子砸下去地动山摇。我递给魏晓霖签了字的合约书，他拿给我一张硕大的四十万定金支票。

不知有多少人说:“哇!不得了,十一个字卖了一百零八万,一个字十万块钱哪!”

殊不知在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此书不得少于二十万字呢。

并且合同规定好必须在签约的一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稿。如逾期不交,将退回定金并罚以一倍的数额,那么就要退回八十万了,假如一年之后还没有写出来的话。

这一天,我从北海飞往长沙。刚视察完北海又赶去长沙参加第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

北海没有直接去长沙的飞机。我只得路过深圳。时年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在飞机上望着深圳我在想:“啊,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突然间雷鸣电闪,我想起了我的书。

哎呀,天要塌了,我还一个字没写呢。要罚款八十万啊!

手忙脚乱赶快开始筹划。

从那天起,这本书的写作才正式排入我心里的日程。

紧接着去兰州,去西安,去西宁,去银川,去这去那,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摒弃了一切杂务、事务、公司业务……把杂七杂八的手上东西暂告一个段落。

十二月八日,正式伏案写作。

开始只是为了应付差事,后来越写越快,越写越忙,越写越深,我的手跟不上脑子的步伐。平均每一天写六千字,最多的一天两万字,右手食指居然磨出了一个小小的茧疤。

本来以为二十万字也得凑数,结果紧赶慢赶左删右删出

来了三十多万字王婆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每一天都身心疲惫。比拍电影和作生意加起来还累。

因为，我等于又重新体验了一次过去，已走过的道路又重温一遍。

我觉得每一个字都是用自己的鲜血写出。我的鲜血从血管中奔涌进心脏，从心脏翻滚进脑海里，再通过我的笔尖流到了纸上。

我掏空了自己。就像是一只橘子，汁液全都榨干，只剩了橘子皮。

朋友对我说："那位魏老板的一百零八万简直是买了你十年的生命，有眼光有眼光。"

有如大病一场，我报她以疲惫而苍白的笑容。

十年前，我写了第一本书《我的路》。

正好十年后，我又一次袒露出我的胸怀。

在电影明星扑朔迷离的生涯里，我已被社会和舆论戴上了厚厚的面纱。不，还不是面纱，是铁面具。不止是一层，是三层四层好几层。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庐山真面目。

这本书我把自己的面具揭开，让大家看看我究竟是什么模样，揭开面具的工程巨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铁面具已深深地嵌进了肉里，长在了身上。铁面具揭得我血肉模糊，鲜血淋漓，其苦其痛之深犹如经受那中美合作所著名的酷刑"披麻戴孝"，这种惨不忍睹的磨难使我在揭下面具的过程中无数次停笔停手，总是思来想去好一番激烈斗争，鼓足勇气后才又继续我的写作。

我的心、身体都已伤痕累累，我把这红通通的一个自己，

呈现在大家面前：伪装已尽数剥去，那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已揭开。

这就是一个赤诚真实的我。

我又掏出那血淋淋的心，抖着颤着捧过来。是东是西是左是右，任由评说。

我再一次伸出滚烫而真挚的双手，把它们伸到你的手边。

卸去谎言与虚伪的沉重盔甲，我感到一身轻松。

好久，好久都没有这样飘飘洒洒，好久，好久都没有回归自然了。太长时间了。

人本是赤条条到世界上来，就该赤条条地去。

由此，我将本书命名为《我的自白录》。

而将《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作为本书的副标题。

一年以前，这本书的标题以一百零八万拍卖成交的时候，许多人说买标题的魏晓霖简直是疯了，有钱没处使。

一年以后本书出笼，魏晓霖惹来无数对他当初大手笔大气魄的钦羡。

而我，感谢他当时的气贯长虹。

是他，得以使本书在此时诞生。不然，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充满惰性的我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铸成这部绞碎五脏六腑的长篇。

当然，还有深圳文稿拍卖组委会的王欣及其他有关人等。

最初拍卖的十七万其实早已被魏晓霖言中，他预言我不会动笔。

我是不会动笔。因为十七万，对我来说是倒霉、不吉利的黑色数字。

在写完本书的此时，我才陡然发现自己的人生其实是由一个个危机一个个灾难构造而成。

我已说过，再体验一次回忆一次这些重重惊险的噩梦令我心力交瘁。

可正是它们互相组合、阴差阳错、负负得正构成了一个大的成功。

我时常感到自己的一生都像是在打台球。本来想打的是这只球，可是却打到了另一只想都没有想过的球，那只球反弹回来将别的那只本来八辈子都打不着的球打进了洞里。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走进的是这道门，却去到了另一个房间。"

算起来我还是得了一分。尽管不是我预先计划和设计好的那一分。这就是无法捉摸的命运。

究竟是哪一分促进了今日的成就？根本不可能分得清楚。好比是下围棋，许许多多的棋子完成了你的决胜局。每个小小的棋子都发挥了它不可估量的作用，缺了哪个子都不成其为这盘棋。

"人"要一撇一捺才成其为人。拍电影是一撇，做生意是一捺，事业是一撇，情感是一捺，一撇一捺才是我完整的人生。

对我来说，从来没有过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每一个小小的成功都是我一次次艰苦奋斗得来，每一笔财富都是我一分一厘亲手挣来。

人们说我是在商海里游泳。殊不知我根本不是自己跳下去而是猝不及防被推进了海中。我喝水、咳呛、狗刨、乱抓乱挠，而每当我拚死觅活出于求生的本能几经挣扎飘到了岸边，手刚搭在救生的船沿上就又被狠狠地几脚踹进了那重重漩涡的水里。

一次次起落沉浮，我侥幸没有淹死，才成了懂得深浅的运动员，而会水的本领是我九死一生拚搏了不知多少回的结果。

今天，我把我十年的人生作了一个总结。为了一些必须的交待我把《我这八年》中的一些素材融进了本书里。有一二处时间、地点、人物与《我的路》中些微不同，均以本书为准。在本书中除了准确日期及事件的先后也许有点滴记忆上的出入以外，一切都来源于真实。正因为如此，写的过程当中我无数次停笔：究竟该不该写?这样写下去好不好?要不要把那些见不得天日的心灵角落写出来?无数次反复，我的勇气还是取得了胜利。

因为，一个人的历史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生命铺就的。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本自己的故事。在这里，是我的故事。

许多人问我："你将来有什么打算?要做什么新的事?"

摇摇头我说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我不能管理我自己。更不能管理我将来的人生道路。就像我不能一生下来就设计自己做电影明星，做电影明星时也没有策划过当企业家一样。

我无为而治。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生。假如我把人生设想成一根火柴，这根火柴可以点燃蜡烛，也可以点着汽油桶。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爱好。而我，希望自己这根小小的火柴能点着引信，把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送上那无垠的苍穹。

星光闪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并且明确它所在的位置。

我们不能拉大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加强生活的密度。

我仍将前行。还将披荆斩棘。这辈子我平静不了。也许。

我这样想。

但是,黄金的时代是在未来。

我早就在《我的路》中说过这句话。

我再重复一次。

完稿于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大年初四)

·附　　录·

作者简介

简历

姓名：刘晓庆

性别：女

籍贯：四川涪陵

出生日期：1955年10月30日

1970年	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附中，主科扬琴，副科声乐、钢琴。
1975年	进入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三个月后走上银幕。
1980年	正式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

职称与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一级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

中国全国表演学会副会长。

“刘晓庆”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

主演的影视剧

1975年	电影《南海长城》	饰甜女
1976年	电影《同志，感谢你》	饰杨洁
1977年	电影《春歌》	饰李翠枝
1978年	电影《小花》	饰何翠姑
1979年	电影《婚礼》	饰盛敏
	电影《瞧这一家子》	饰张岚

1980 年	电影《神秘的大佛》	饰梦婕
	电影《原野》	饰花金子
1981 年	电影《潜网》	饰罗弦
	电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饰七姑娘许真
1982 年	电影《心灵深处》	饰欧阳兰
1983 年	电影《火烧圆明园》	饰慈禧
	电影《垂帘听政》	饰慈禧
1984 年	电影《北国红豆》	饰鲁雪枝
	电影《三宝闹深圳》	饰女经理
1985 年	电影《无情的情人》	饰娜梅琴措
1986 年	电影《芙蓉镇》(上、下集)	饰胡玉音
	电影《红楼梦》(六部八集)	饰王熙凤
1987 年	电影《大清炮队》	饰冯玉舒
	电影《春桃》	饰春桃
1988 年	电影《一代妖后》(《西太后》)	饰慈禧
1990 年	电影《大太监李莲英》	饰慈禧
1992 年	电视剧《风华绝代》	饰春泥
1994 年	电视剧《武则天》(三十集)	饰武则天

制片

作为独立制片人制作了影片《无情的情人》、《大清炮队》。

个人影展

1986 年 3 月　在美国举办个人影展。

1987 年 7 月　在法国举办个人影展，

灌制的唱片及磁带

《原野组曲》

《慈禧组曲》

《刘晓庆的歌》

《贺新春》

《百花奖磁带》

台湾“千里马”唱片公司的唱片。

作品

1983 年　自传《我的路》在《文汇报》、《文汇月刊》刊载，中国各大报纸转载，台湾、香港、美国等地报纸翻译成英文、德文，以 14 种版本在国内外发行。

1987 年　《艺术与爱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2 年　新自传《我这八年》在《新民晚报》连载，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明报周刊》、台湾《大成报》、马来西亚的报纸、《中国作家》杂志、广州《羊城晚报》等全文刊载，大陆版权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海外版权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发行。

1995 年　三十万字自传《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获奖

电影《小花》

获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音乐奖。

影片中的何翠姑获“文汇电影奖”最佳配角奖，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二名。

电影《婚礼》

影片中的盛敏获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三名。

电影《瞧这一家子》

影片中的张岚获第三届“百花奖”最佳配角奖。

电影《芙蓉镇》

获卡罗威发利电影节大奖，最佳女主角奖；第七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美工奖；第十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

影片中的胡玉音获第七届“金鸡奖”最佳女演员奖，第十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上海电影制片厂最佳女演员奖。

电影《原野》

获第十一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1981 年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

影片中的花金子获第十一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获法国电视台最佳女演员奖，获北影颁发的“青年进步奖”，获中国表演学会奖。

电影《春桃》

获第十二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

影片中的春桃获最佳女演员奖。

电影《大太监李莲英》

获 1990 年柏林电影节特别奖。

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

获1983年文化部特别奖。

电影《无情的情人》

影片中的女主角娜梅琴措获1980年法国华人影视节最佳女主角金狮奖。

1980年　获文化部颁发的“青年优秀创作奖”。

1986年　获上海总工会评选的“最喜爱的女演员”第一名。

1987年　获《文汇报》“新时期十年”电影大奖最佳女演员奖第一名。

1987年　获“佛山杯十大影视明星”第一名；获济南“最喜爱的女演员”第一名。

1992年　获首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特别奖。

1993年　获首届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的“十大影视明星奖”。

此外每一类的民意测验均获得“最喜爱的女演员”第一名。

《刘晓庆的歌》磁带获太平洋影音公司颁发的“云雀奖”。

每天都捧出一轮太阳
（代后记）

当这本刘晓庆的长篇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出版之际，我，作为本书的主要出品人，心中有颇多的欣喜。

欣喜，是因为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确实，这是我商旅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读者们也许还都记得，在一九九三年冬天深圳首次文稿拍卖会上，我和深圳众鑫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以一百零八万的高价买断了刘晓庆当时还只有一个标题的书稿的版权。当时，我的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在文学界和企业界。因为，可以这样说，在我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过一个搞企业的人以那么高的价格买下一部书稿的事。从那时起直到如今，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来电，有对我表示钦佩和赞赏的，有表示异议说此举不可取的，也有表示不理解的。国内好些新闻机构也都为此来采访我。

有人说：魏晓霖是商人，商人投资是要考虑回报的，他敢

投巨资争这部书稿，一定认为这是笔赢利的买卖。

这话没错，但不全面。

我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投资当然要考虑回报。当时刘晓庆的书稿还只有一个标题，我就敢投巨资争到手，是因为我认定刘晓庆这个女人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女人，她的自信、自负、坦诚、才气、名气，能让人相信她的作品，回报必定不薄。后来，书稿出来了，一看，果然很不错，是一部难得之作。

说不全面，是因为投资求回报是商人的直接目的，但不是唯一的目的。

那么，我又为了什么呢?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持续高速发展，正信心百倍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与经济息息相关的文化事业却极不协调地处在困惑之中，文化事业的发展步履维艰，那些有能力、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等文化人，仍固守着清心寡欲的苦日子。每每听到或看到这种状况时，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

我以为，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文化建设是重要的一环。文化建设，不仅是精神文明所急需，也是物质文明所急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只意味着现代经济和科技的振兴，而且还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振兴。

有人说我是企业家，其实，我本质上还是一个文化人。

我和新中国同龄。从小喜欢读各种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向往着将来让自己的青春在文化领域里发出光辉。后来又两度人大学读书，学的都是中文。要不是由于命运的安排，说不定今天我也是个文人了。

虽然搞了企业，经了商，但我一直热心关注着文化事业的发展，总想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为推动文化走向市场，使文化和经济共同走向繁荣作点工作。因此，近年来，我的公司已相继拿出几百万元，投资搞一些文化项目和社会公益事业。在买得《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一书的版权前，我的公司还买过《深圳一百个女人》一书的版权，还投资一百二十万元独家拍摄十六集电视连续剧《无悔人生》，又出资三十八万元协办《大众服务报》……有人不理解，说我太傻了。而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事，对我来说是一种愉快的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可观，特别是能净化人的灵魂。

如此，人们便不难明白我为什么会花巨资买下刘晓庆书稿的版权了。我真正的动机就是，不是花百万巨资去圆一个立竿见影的回报，百万元的诱惑、刺激，对文人来说，绝对是大的；我是想通过此举，为深化市场的改革尽一点绵薄之力，以图更多有才能、有潜力的作家及文化人认识到肩上的脑袋、手中的笔，也能赚钱发大财。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商品社会，文不言商，文人艺术家离开商品社会，根基便是空中楼阁。

有些文人下海了，有人便认为是有失自尊，实际上，不下海就未必保持了自己的自尊，而下海的未必不自尊。下海与否，我们都应该持一种包容的态度。打个通俗的比喻，对待寡妇，我们应该允许她改嫁，也允许她守寡，为什么一定要强行她改嫁或守寡呢？文人下海，是下生活的大海，市场经济的大海。文人下海去体验火热的生活，是众望所归，是大势所趋。下海的文人，腰杆子挺硬了，不但自尊，而且他尊，那种死守文人下海就是有失尊严的自尊，其实只是一种可怜的妄自尊大。

当然,要使文化走向市场,将文化传播和高速发展的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任何一个企业和个人的力量都是极其微不足道的。但我想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本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有部重要作品《老人与海》,描写了一个老人在海上与鲨鱼搏斗了几天几夜,虽然老人最后失败了,因为他捕到的大鱼被鲨鱼全吃光了,但是,海明威分明是通过老人与鲨鱼的一次次搏斗,赞美了心目中的英雄,赞美了一种顽强不屈的精神。读来让人惊心动魄,肃然起敬。海明威由于写了这部作品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上,他在书面发言中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过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这样他就有幸会获得成功。"

一个作家是如此,一个企业家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像大海一样,每天都捧出一轮火红的太阳。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当我买下刘晓庆这部书稿的版权后,全国好几家出版社都来争这本书的出版权,我和深圳众鑫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几经权衡,最后将出版权授予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读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直到现在还经常买她的书,对她情有独钟,她在我心目中是一家全国出版文艺、文化、音乐书籍的著名而又正规的大社,有很高的威信;她出版的书籍不管是艺术质量、文字质量,还是设计装帧、印刷制作等,都是全国一流的。所以,我选择了她,非常乐意地将出版权授予了她。当读者见到本书时,我想,也会赞同我的观点和选择的。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和我公司全体同仁，衷心地向为本书的出版而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编辑及有关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祝贺我们合作愉快并成功！

深圳华深实业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经理
魏晓霖
一九九五年九月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金子信
封面设计：陆震伟
版面设计：陈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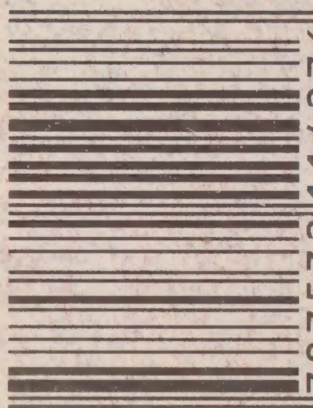
我的自白录
——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刘晓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杰申电脑排版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厂封面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7218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插页10 字数372,000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0,000册
ISBN7-5321-1427-9/I·1122 定价：25.00元

我的自白录

从电影明星到
亿万富姐儿

刘晓庆





ISBN 7-5321-1427-9